黑色文库 第21集

廖亦武 著

最后的地主

中国冤案录第三卷·上册 2005—2007

黑色文库 劳改基金会出版

最後的地主

中國冤案錄第三卷・上册

2005－2007

廖亦武 著

最后的地主（上）
黑色文库 第 21 集
作者/廖亦武
出版者/ 劳改基金会黑色文库编辑部
主编/ 廖天琪
封面设计/ frame-house 工作室
华盛顿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 作者 廖亦武
本书版权为作者所有，劳改基金会拥有中文发行权。非经作者及基金会同意，不得翻印、复制或转载文字与图片。

本书由劳改基金会编辑及出版。若获盈利，仅用作《黑色文库》的出版费用。

The Last of China's Landlords
Vol. One
By Liao Yiwu
Black Series Volume 21
Th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2008
www.laogai.org

ISBN 978-1-931550-19-2
Printed in Hong Kong
定价：**U.S. $ 35.00**

目录

■序言 1：让我们来讲故事
——阅读廖亦武兼谈文献　苏晓康 | 1
序言 2：失败者也能写历史　胡平 | 11

■望外的动机 | 21

■“麻风病人”张志恩 | 27
土改受害者阿泽 | 44
土改受害者张应荣 | 64
土改受害者张美芝（上） | 87
土改受害者张美芝（下） | 99

■午夜读旧报 | 118

■地主女儿同行 | 123
贫农李正才 | 133
地主后代刘金琴 | 151
民兵主任余学康 | 169
放羊娃彭绍宗 | 187
土改受害者董存英一家 | 196

■贫农酒鬼余金元（上） | 221
贫农酒鬼余金元（下） | 237
土改受害者孙如勋 | 251
土改积极份子孙宗文 | 277

夜　祷 | 293
土改受害者张茂恩 | 303
日　祷 | 323

■土改受害者孙大川、陈秀英 | 337
右派诗人流沙河 | 350

■用脑子里的摄像机记录苦难 | 371

■在自己家里坐牢 | 379
土改工作队队长洪钟 | 389
迷信职业者龙金涛 | 408
他们死后永不分离 | 427

■土改受害者张进谦 | 438
1 远征军发报员
2 未婚妻自尽
3 土改刑场
4 一个耳光判 8 年
5 饱死鬼
6 地窖或狗洞
7 差点没命了

■疯狂的石鼓 | 527
土改受害者和瑞尧 | 535
土改受害者郭正洪 | 547

“让我们来讲故事”

——阅读廖亦武兼谈见证与文献

苏晓康

我办网刊，老威来投稿，给我讲地主的故事。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要听这一类的故事，但我至少知道，我这一代人是听着“地主的故事”长大的，那是“标准”的地主，诸如高玉宝的周扒皮、白毛女的黄世仁、琼花的南霸天、四川大邑的刘文彩、潘冬子的胡汉三，等等，无非秃顶凸腹、山羊胡子、贼眉鼠眼，可是这一茬“地主的故事”威力无穷，其历史功效非同小可，不但是四九年中国政权的合法性基石，更是全民疯魔、红卫兵泛滥、女学生鞭死校长的全部行为的底火，甚至，毛泽东非整死刘少奇不可，也须借助这一路向的诠释才能圆说，虽然他俩不免皆为他们自己定义的“地富子弟”，真是堪称二十世纪奇观一桩。烟消云散之后，待到老威来给我们讲下一茬的“地主的故事”，却难了，因为世道变了。虽说是世道变了才容他来另讲一套，可不幸的是，他遇上了一个“盛世”，在那里连“帝王戏”都演滥了、“尊孔秀”都做腻了之后，大伙要看“身体书写”了，不久连那一套也懒得有人读了，那么，还有谁肯来听新一轮的“地主的故事”呢？况且，这世道是不是已经诞生了新世代的地主也难说，反正新世代的资本家已经被允许“入党”了，相应地也会产生新世代的“贫下中农”和“无产阶级”，而他们

又在“仰望北斗星”似的怀念毛泽东，那正是制造了老威版本的“地主的故事”里的一切苦难的魔王。如此说来，老威遭遇的尴尬，甚至比他在南陲采写的艰辛寂寞，也不逊色。

老威又叫廖亦武，我是编了他大半的故事才弄清的，他是个诗人我早知道，又偶然听说他还是个吹箫的，常常是在最冷寂的角落里，独自吹那听似凄楚却别有韵味的音曲，于是我想，他写的故事，我们不妨就当作他的箫声来听吧。他说他“固执录下生锈的苦难，久久游荡的万千冤魂就有了归属”，我好像有点懂他为什么喜欢吹箫了，据说箫声是可以穿透历史的，也许他要探进历史层积里去，向那里的灵魂采访。箫声可以穿越千年，而我们面对的苍白历史其实非常暂短，五十年，原是什么也洗刷不掉的，但在中国已经渺无痕迹了，从暴戾年代终于转换到艳俗盛世，又无形间对那基础底下的森森白骨加了一道密封。一个吹箫的来揭封条，其单纯的动机再自然不过，因为他的爷爷也是一个地主，可无数的“地富子弟”而今安在，他们都选择吞咽了吗？由此当局才无所忌惮？他们也派遣“乌鸦”对吹箫人稍事围剿干扰，并不认真，那意思却是：这点陈芝麻烂谷子，任你晾出来又怎的？

一个东方农耕大国的一场革命，说破天去也跳不出庄稼人的那点事。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口是农民，则用西方引进的某种学说，将其中的一小撮，比如百分之五设为“另类”，用以动员、控制和统治其余的百分之九十五，这就是中国人对马克思的“创造性运用”，也即“阶级斗争”的精义，这点诀窍，便叫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我们其实无须黄仁宇先

生另作诸如“上层结构、下层结构”的深奥诠释，而“大救星”毛泽东的全部本事不过是捉弄农民，除此之外都算不上神话。中国是不能没有“农民的故事”的，哪怕“经济起飞”“超英赶美”之后，农村与农民的体积及其含义，依然是中国之最，例如进入两千年后，中国最优秀的纪实文字还是叫《中国农民调查》，顺便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的庄稼人还在叫人欺负。说来荒诞的是，曾经跟着“毛主席、共产党”干了一场“农村包围城市”的庄稼人，到头来却被城市、资本、开发等怪兽组成的巨大权势围剿得暗无天日。“打土豪、分田地”之后半个世纪，农民这个阶层又沦落到了几近爆发“土地革命”的境地。由此看来，事情还得从那“打土豪”的源头捋起，所以讲了“农民的故事”之后，须得讲一讲“地主的故事”，才不算是糊涂到底了。在网上看到，已经有人在讲《土改学》了：“土改划阶级本来依据的是土地引起的穷富差别与剥削，但在有这种差别时，并没有划分出阶级，而在土地被没收、剥削被消灭之后，才有了阶级的划分。地主失去了土地，才成为‘地主’；贫农得到了土地，却被称为‘贫农’。‘阶级’是在取消了阶级之后，被创造出来的。这种森严的阶级划分，其实是一种权力与身份的虚拟，所以学者黄宗智将它称为一种新型的‘种姓’制度，是不无道理的。因为只有‘种姓’，才会联系历史和血统。”（叶匡政，见《观察》网刊）

读了廖亦武写下的故事，我们对新中国“种姓制度”的荒谬，从大背景、施暴者心态，直到受虐的细节，才会有血肉般的质感的了解。中文里“地主”一词的能指是空洞的，

那都是一些脸谱，是舞台上的戏子，是被人在腰间系上绳子可以拎起来扭动的木偶，他们不是什么具体的个人，他们是“一个阶级”，而且因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语），在五十年的第一个十年里就把这个阶级整个儿“消灭”了。消灭一个阶级，不是打日本鬼子，不是跟国民党蒋介石打内战，不是淮海战役，也不是用“小米加步枪”，那是另一套“系统工程”，犹太人给它起了一个说法，是中文里没有的一个词：“灭绝”（genocide）。我们的吹箫人就是去做了这场“阶级灭绝”的一个后来的见证人。在这个意义上，廖亦武是威塞尔（Elie Wiesel）在中国的传人。1974年6月3日，在纽约圣约翰天主教堂举行的关于大屠杀的国际讨论会上，威塞尔的开场发言说：

“让我们来讲故事……让我们讲故事来记忆人类在面对凶猛的邪恶之时是多么脆弱。让我们讲故事来阻止刽子手说出最后的遗言……大战后，死者向每一个幸存者问出了同一个问题：你是否能讲述我们的故事？现在我们知道了答案：不。他们的故事无法被讲述——也永远不会被讲述。开口的没有人听见；你听见的故事并非他们所说的故事。”

基本上，这也是廖亦武这部新作，及其面世之境遇，所给我的一个简洁印象。

“口述实录”体，几成廖亦武的唯一书写姿态，从《中国底层访谈录》到《中国冤案录》，再到眼下这本《最后的地主》，无疑，见证成了他还能剩下的书写冲动。然而，这本新作又有些不同，几乎是他在转述别人讲给他听的故事，

这转述的姿态，愈加凸现了代言、见证、控诉的仪式与意义，则是令我颇为动心之处。转述乃是对于“灭绝”的一次反抗、是书写面对灰烬的不甘、是悲恸之余的潺潺箫声。吹箫人毋宁处处刻意流露他的谦卑和惶恐、他的转述的局限和无奈、他在语言、文字尽处留下的空白、颤悸、窒息……甚至，他的这次采写访问，也具有某种救赎意味——是在一位基督徒孙医生的引领之下，犹如一次死亡阴谷的穿行，扑面而来的倾诉者，如75岁的彝族老汉阿泽、75岁的和瑞尧、80岁的张进谦、81岁的郭正洪、84岁的张应荣、84岁的张美芝、85岁的董存英、88岁的朱家学等，都是名副其实的地主，“一个被消灭的阶级”的幸存者，一个个口齿木呐、茕茕孑立、行将就木。这是四九以后从未进入过中文书写领域的一个客体，更遑论是纪实领域了。若非吹箫人的光顾，他们到死都不会开口，而他们的显身，也不可能替代早已占据在主流话语中的那些“地主脸谱”，然而，幸亏他们对吹箫人开口讲了他们的故事，这便恰如威塞尔曾写下的这些文字：“遗言属于受害者。这得取决于见证人来抓住它，使它成形，传递它，仍旧把它作为一个秘密来保存，然后向其他人传播那秘密。”

廖亦武的转述又是立体的，是转述的转述。这也是灰烬之余的限制，是见证的有限性——他已经找不到更多还活在人世的地主了，虽然他不放弃任何线索。于是，他顺便也采访地主子弟，如错划地主之子张三民（土改时13岁）、孙如勋（时年13、4岁），甚至不放过一位同行的地主女儿李世珍，“她的双颊充盈着山地人特有的赧红，而笑容很美丽，有一种不易觉察的高贵”。同时，他也采访其他的目击者，如贫

农李正才、余金元，土改积极分子孙宗文、土改民兵何秀元，土改工作队长洪钟、工作组长陈文高，民兵主任余学康，等等，从这一侧面对“土改”的重现，是廖亦武颇耐人寻味的一笔，虽佐以其一贯反讽、幽默的文笔，又不失冷峻的见证价值。

由此，廖亦武的纪实文字，便非预期地跨进了文献作业（documentary work）领域。我说他“非预期”，是指这位“前六四”诗人兼路边吹箫人，六四大屠杀以后不写诗了，乃是“to write poetry after Auschwitz is barbaric”这句话在中国的一个实践者，然而，他写了比诗更有魅力的文字、尝试了比诗作艰难无数倍的书写努力，我不清楚他是否自觉到这种转型，但这是一种开创性（groundbreaking）。

他以口述实录体陆续完成了五部民间底层的纪实之后，从 2005 年冬季开始，“自甘放逐到黑白混淆、朝廷与江湖混淆的云南边陲……堕入寻访土改受害者的不归路”，奔走在市镇、村舍、苗寨之间，不少地名竟然在云南省地图上均未标出，行文之间，也留下他采写曲折之痕迹，其中有一件事，颇为经典地印证了文献作业的反复与难度。云南境内有一著名基督教圣徒家族，其中心人物王志明牧师，文革中因抵制对毛泽东的“三忠于”膜拜而遭公开枪决，1998 年被列入英国女王宣布的二十世纪全球十大基督教殉道者名单，是其中唯一的中国人。廖亦武也去采访了王志明牧师的儿子王子胜牧师，忙乱中按错了录音机键钮而抹掉了这个访谈的后半截，他在心里骂自己：“廖亦武！你个盗窃记忆的贼。你要记住此时此刻！为了你的一个低级错误，朋友们跟着受累。特别

是孙医生，腰都快折了。幸好这个采访抹掉可以重来，然而许多记忆一旦抹掉，就彻底完蛋。十几年，我访谈了 200 多次，这是第一次出这种低级可笑的意外！”后来，在他再次赶去采访的途中，“我们打的斜穿春城西北角，抵达乱得不可开交的黄土坡车站。由于在行进中交谈激烈，竟将背包忘在了车子后备箱里。那可是我跑江湖的全部行头啊，计有：随身多年的洞箫、紫铜转经钵、算盘、口琴、铃铛、拇指琴以及好友岳建一不久前才送我的特制的埙。此外还包括照相机、录音机、电话本、各类音乐 CD 若干——时至今日，我仍觉得气紧和肉疼，不愿相信真的丢了。”后文尚有他百般追寻那个遗失背包的种种细节描述，末了一无所获，还是买了一个新的录音机，去继续完成他的作业。

廖亦武懂得记忆的难以往复性，懂得他的每一次都可能是最后一次，由此接近了见证和文献的真髓，这便是美国四十年代著名影评家詹姆斯·艾吉（James Agee）所说的：“每一个人，都曾以他们的身体和心智去经历，并将继续经历下去，而且这一切都将有不同的表达，来自他们自己、来自一个根，并且是对等的；其中的任何一种、或任何一个人，都不是可以被复制、被替换的，也是没有先例的；每一种都是新的、不可言传的脆弱生命，损伤于每一次呼吸，并几乎很容易地死于伤害；他们片刻维系在没有保护之下，任那巨大无常的攻击。”

1936年詹姆斯·艾吉结伴摄影师沃克·伊万斯（Walker Evans），在美国南部阿拉巴马州与三户佃农家庭生活了八个星期，做出轰动一时的摄影和文字报道，是为美国大萧条时

期的象征性见证，1941年他们的摄影和文字汇集成书《让我们来歌颂那些著名的人们》(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是一本超越当时传统模式和新闻限度的颇受批评性赞扬的作品。艾吉将有实际根据的事实，衬垫了文学的繁复和诗歌的丽质，展现了一种准确、细微的报道新形式，向广泛的受众详细报告他所看到的，并辅以蕴涵洞察力的感受和采写艰辛，由此创造了美国一个几近消失的人群的耐久雕像。但是，这本书在美国成为厘清“事实的纯度”的一个长期争论的范例，艾吉的文本，既是人种学的，也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也是小说的和诗意叙事的，有人认为这种豪华的诗性文本与伊万斯的黑白照片颇相配，有人恰恰认为这些华丽文字被照片的朴质反衬得不真实，有人说作者拒绝传统报告方式的野心是与其创造性平行的，无论怎样，它受到多年的高度赞扬，并作为新闻革新和文学灵感并存的教材，流行于学院里。

不错，所谓纪实、记录、文献作业，都是再现和代表他者所见证的、闻听的、无意间得知的（overheard）、感知的，等等，但是，无论见证、传达、再现，都无可避免的要同来源产生距离，这个距离，便是书写者、作业者添加的东西，正如普利策奖得主、美国著名儿童精神病学家罗伯特·科尔斯（Robert Coles）所指出的，它们“都是某种组合：特有的心智、兴趣、价值、推测、假定和前提，也是某种记忆和天赋对于存在之直接或间接的承受，最后，以某种文字、图象乃至音乐或人造制品的形式，或其中一种形式，显现于世界。一则文章或一本书，在其形式上，作者可以从两个方面添加进去来自他自己的因素和变数：一方面是社会的、文化

的、历史的，另一方面是个体的或特殊的。”

显而易见，西方的文献作业已然苛刻地厘清着“虚构”与“非虚构”的各自边界，以维护“事实”（fact）的纯度，但其间的张力极大，并非轻易可得之事，因为“事件是要被一个人的意识所过滤的，它本身不可能不被影响，被一个私人经历的历史所影响，被一切种类的抱负、挫折、渴念所影响，被那些不易捉摸的、有意义的心思所影响……”（科尔斯“传统：事实与虚构”）。换言之，传达人文性的信息、资源，不是传达诸如清晰无误的数据、公式、定律，没有那么单纯，而是复杂得多，一丝不变的机械的传达，毋宁是不可能的，是另一种失真。科尔斯亦曾提及他在哈佛授业之际，跟他的学生讨论文献作业，“他们通常就阅历所及而将自己置于不虚构之处，仿佛我们无疑是不会虚构的：即使不是以正确对比谬误，至少也是以真实对比想象。但是这样的对应或替代，并非十分公平，或是概念化地、实用地对待‘人的真实性’（human actuality），而那却是作家、摄影师、民俗学者、音乐学者和导演的职业，他们面对的是人们的言语、音乐、姿态、行动及其综合显现，并转达给其他的人们。”

反观廖亦武的这些故事，他“添加”了什么呢？属于他的“一个私人经历的历史”，他的“抱负、挫折、渴念”和“不易捉摸的、有意义的心思”，又是什么？我想，这似乎也是读者应当留意的，自然也会见仁见智。于是，我们要想阅读廖亦武，就不能不同时阅读他身处的这个时代，连同它的冰冷、倒错、滑稽、迷惘以及种种不可捉摸，在一定意义上，它是廖亦武之饥渴、挣扎、愤怒、追求的渊薮，是他得

以跟那个已经“被消灭的阶级”相遇的时间平台，也是我们得以阅读他的文化空间，我们甚至可以从他笔下的每个幸存者的絮絮叨叨之中，找到他的影子。他固执地要听他们的见证，几乎全被他们看作是无补于事的“马后炮”，这一点，又恰恰跟七十年前美国的艾吉相似，那个大萧条时期，当时的罗斯福政府亦曾无补于事地尽可能救助穷人，因为即使穷人，也需维护起码的尊严，而艾吉挑战文学的、政治的、道德的传统，也许对他所关注的穷人不能有任何实质性的救助，却对于更多的大众和读者，至关重要。艾吉的美文不是面包。廖亦武的故事，也不可能是“平反的政策”或“补发的赔偿”，却注定变成“受害者的遗言”！

失败者也能写历史

胡 平

一

有人說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其实未必，因为失败者也能写历史。但历史肯定是活人写的，死人不可能写历史。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偏偏是那些死人最多的历史悲剧往往只留下很少历史记载的原因：因为那些最有资格的见证者们都默默地長眠於九泉之下了。中共的土改就是明证。一场土改，逾两百万地主死于非命。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间，被迫害致死的地主又不知凡几。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维克多.弗兰克（ViktorE. Frankl）说："我们这些仗着许多机运或奇迹——随你怎么称呼——而活过来的人，都知道我们当中真正的精英都没有回来。"是的，你可以说，土改也整死了一些真正的土豪劣绅。但那又怎么样呢？谁能说纳粹集中营里整死的犹太人中就没有真正的奸徒恶棍呢？无可争辩的是，在迫害致死的地主中，绝大部分是好人，是无罪的人。可以想见，在几近三十年的对地主的毁灭性打击下，那些最有声望的、最刚正的、最有血性的、最重情义的人，都最难活下来——如果还有这样的人侥幸活下来的话。死者无言。一段最血腥的历史，就这样永远地消失在黑暗之中。

二

被整死的地主固然不可能再发声，为什么幸存的地主也一直沉默无语？通常，一场灾难下来，总还会有一些幸存者。这些幸存者总还会有一些成为那段历史的见证人。我把这种人称为“幸存者见证人”。所谓“幸存者见证人”是指这样一种人：他们不只是笼统的亲历者，他们是受害者，不是旁观者，不是施害者；他们不但是见证，而且作见证，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承受了灾难，而且向公众讲述出他们身受的灾难。例如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威塞尔，古拉格群岛的幸存者索尔仁尼琴。中国也不乏这样的幸存者见证人。提到反右，提到大饥荒，提到文革，提到六四，提到镇压法轮功，我都能想起一连串幸存者见证人的名字和代表性作品。可是，提到土改这场最血腥的政治迫害运动，提到地主这个最受打击的群体，即便是长期对这种事情密切关注的我，也想不起任何一个幸存者见证人的名字和作品。这就比恐怖更恐怖，比悲哀更悲哀。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记得当年“伤痕文学”问世没多久，就有人抱怨：好啦好啦，你们揭露共产党暴行（他们叫“错误”）的文章已经太多啦！不，不多，还太不够。我相信，最深重的苦难还没有讲出来。我担心，它们已经讲不出来了。

小说《如焉》里有位人物卫老师，是个老革命，也是个文化人，49 年后曾出任党的高级文化官员，55 年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备尝艰辛，二十五年后才获平反。大彻大

悟的卫老师复出后发表了不少作品，又被当局视为自由化分子。卫老师对朋友们说："（我）晚年写了很多主旨宏大的文章，却没有写过自己的经历和个人生活。不敢。想过的，真要动起笔来，受不了，那等于是将那些日子再过一遍啊。我就知道了，中国多少刻骨铭心的故事，都被它们的主人带到坟墓里去了。而那些写着的人，多数是隔着很远的。""中国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作恶者不说，因为心里有鬼，受难者不讲，是因为伤痛太深，或作恶者不让讲。年深月久，历史就给掩盖起来。"受迫害的老革命尚且如此，何况比他们遭遇更悲惨得多的幸存的地主们。不仅有永远抹不掉的伤痛，还有永远抹不掉的羞辱。有如令人头晕目眩的万丈深渊，你若敢俯身低探，你就很可能会一头栽下去。

第三帝国对犹太人的迫害是极端残酷的，但所幸第三帝国只有十二年的寿命。幸存者还可以从休克中苏醒，所以他们还可能讲出他们的苦难，成为历史的见证。中国地主的厄运太长了，太长了。想一想他们这几十年是怎么活过来的吧。起初，是极度的震骇、极度的愤怒、极度的悲伤和极度的恐惧，其后则是无边的忍耐，无望的屈服和无奈的认命，并伴随着永远的战战兢兢。痛苦的极致是麻木。唯有麻木才能苟且偷生。麻木竟然成为他们生命的保护神。他们一定有过强烈的诉说苦难的冲动。天大的苦难，只要讲出来了，或者记录下来了，就是可以承受的了。这个道理不需要哲人讲出来才恍然大悟，只要你身临其境就无师自通。然而对于中国的地主们，就连这样一种最后的愿望也是无处寄托的。因为"老大哥"无处不在，因为他们看不到一丝希望，也因为他们的周

遭一片冰冷，就连他们的子女都没有倾听的愿望，不和你划清界限，不抱怨你就是好的了。无比的哀愁悲愤在半个多世纪的压抑下终至萎缩于无形。当苦难的持续超过一定时间，人心就变得迟钝，麻木，而且开始遗忘。包括那股叙说与写作的冲动，你一次又一次地压抑，最后一看，它已经窒息而死了。

感谢廖亦武，从 2005 年年底起，断断续续用了两年时间，完成了这部土改幸存者采访录《最后的地主》。五十多年来，有关土改的文章、文件、学术论著和小说影剧并不缺少，撇开各自不同的真实程度和价值取向不谈，其中最缺少的是最重要的一方即受难者自己的声音。廖亦武这本书让我们听到了受难者自己的声音。这是来自坟墓边的声音。正如作者所说："的确，根据被访人肉体及精神的衰弱程度，我估计再过四五或五六年，作为亲历者口述的土改历史将彻底无迹可寻。"

三

在采访和写作的过程中，廖亦武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作为地主的后代，他本来是很容易从他的爷爷和父亲那里去了解土改，了解地主的，为什么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却没有想起这么做呢？那时候，自己很青春，精力充沛，满怀文学理想，周遭经历过土改的人不少还在世，为什么在当时自己却没有了解他们和记录下来的冲动呢？廖亦武写道："而应该成为本书缘起的我的父亲，另一乡村地主家族的长子，2002

年 10 月因肺癌逝世，享年 80 岁。我曾在他的病床边厮守近一年，却懵懵懂懂，没产生一丁点怀旧交谈的动机。如今徒劳后悔，惟愿他的在天之灵饶恕！虽然造物主让我们具有父子血缘，但彼此却缺乏真正的了解。”

其实，象廖亦武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大部分地主的后代对他们长辈的遭际都很少了解。这就是说，即便在地主的家庭内部，人们也很少触及，乃至于常常刻意地回避这个话题。

在毛时代，地主的后代因为家庭出身问题饱受欺凌压抑。他们未必都相信他们的长辈是坏蛋是罪有应得，但多少也认为他们的家庭是不光彩的，所以对之宁可回避。有些人则下意识地感到，彻底了解真相是会有麻烦的，是会使自己陷入尴尬境地的，所以通常他们也不会去追问。

毛死后，中共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一大批昔日的贱民恢复了名誉，社会对他们的评价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例如不少 57 年的右派，一时间被视为敢讲真话的英雄。在这种政治气候下，右派们自然不再忌讳向子女、向公众述说其所受的苦难，许多右派子女自然也愿意了解其父辈的遭际。地主的情况则不同。地主只是摘帽，那好比罪犯刑满释放。地主并没有平反，他们过去那段历史仍然是一片不准触动的禁区。因此，幸存的地主不得不继续沉默，而他们的后代则习惯性地继续回避。

再到后来，私有产权的概念重新获得合法地位，照说这就已经为理论上否定土改扫清了最主要的障碍。然而，今日中国之荒诞正在于，很多事情其实只隔着一层纸，无需费多

大气力就能看穿的，但只要当局还在那里一如既往地捂着盖着，多数人也就习以为常，不去探究那层纸背后的东西。尽管在今天，当局已经不可能操控人们的思想，但是它仍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操控思想的公开表达，它还有很大的操控话题的能力。其结果便是，有些被当局一贯封杀的话题，哪怕它们和我们的关系很密切，时间久了，就连我们自己也常常想不起来了。等到我们终于想起这些问题时，它们已经离我们而远去。

地主并不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地主就生活在我们的四周，就生活在我们的家庭里。可是，我们对他们是那样地缺少了解，而且已经不可挽回。我甚至怀疑，今天，有谁能用第一人称写出一部以地主为主人公的小说吗？那是否已经超出了作家的理解力和想象力。

四

谈到土改，谈到地主，我们还必须提及一种人：那些出身于地主家庭的参加过土改的老革命。中共的老革命有很多出身于地主家庭。他们成长于“旧社会”，对地主，起码是对自己地主家庭的情况相当了解。他们参加了共产党，直接参加了土改乃至领导过土改运动。因为他们既了解土改也了解地主，他们本来应该是这段历史的有力见证者。

譬如《地主之殇》作者野夫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老革命。野夫的父亲出身地主家庭又参加共产革命。就在他奉命去别地参加土改和镇压当地反抗的地主的同时，在他的家乡，他

的地主家族也遭到灭顶之灾。此后，他在子女面前绝口不提家族的故事，也从不还乡；直到 1994 年病故，被一面血红的党旗覆盖，“带着他隐忍一生的巨大秘密等待着最后的火焰——他几乎已决意要将一切胸中块垒都化为灰烬——他唯一的遗嘱是把骨灰撒向清江，让流水带他回到老家。”

这又是一个无可言喻因之也无言而逝的悲剧人生。怎么能不是呢？他们为着一个据说是无比美好的理想而革命，革命要求你去杀人，去杀那些你明知是无辜的人，而你自己的亲人也在这场革命中被杀死。但凡还有人性者，怎么能不被这样的革命所撕裂？作为这样的革命者，如何能向自己的儿女讲述自己家族的历史？如何能面对家乡的父老乡亲？在起初一段时期，他们或许还用这样的话来麻痹自己：要革命就会有牺牲，难免也会有一大批好人成了无辜的受害者。历史就是在这样的血污中进步的。可是到了后来他们不能不认识到，那个无比美好的理想实际上是虚幻的，那场血腥的革命因此也就是不必要的，是错误的。纵然你绞尽脑汁，力图给土改找出多少正面意义，可是它绝对抵消不了那滔天的罪恶。连老农民都知道：“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解放前我们村原来有一户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是啊，何必当初？被革命杀死的千千万万的人何苦被杀死？为革命牺牲的千千万万的人又何苦牺牲？

主义的布景一旦崩坍，鲜血淋漓的苦难——包括自己家族的苦难——便还原为苦难而兀立眼前，老革命们情何以堪？当俄狄浦斯最终发现他娶下的是自己的母亲，杀死的是

自己的父亲，他感到他无法再正视这个世界，于是刺瞎了自己的双目。我们的老革命们则发现他们说不清自己心中的种种不堪，剪不断，理还乱，于是只好不想，不说。是的，很多老革命写了回忆录，有的回忆录还提到了土改，甚至披露了一些原先一直掩盖的真相，但是他们没有写出他们内心的感受。人类的历史应该是心灵的历史。在应该有心的地方，他们留下的是空白。随着这一代老革命的凋零，这段空白已无从填补。

五

我尝言："对于中国人，历史是我们的宗教。""我们中国人一旦对历史产生了怀疑，怀疑历史能否沉淀出真实，怀疑历史能否对人物和事件达到公认的道德定论，怀疑历史的公正性和可靠性；换言之，我们中国人一旦失去了对历史的天真信仰，我们传统的道德秩序就整体动摇了(这正是现代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诚然，历史不是历史书，但是，我们是通过历史书去了解历史的。平时我们说"历史不容篡改"，"历史不容抹煞"。那都是说不应该，不是说不可能。暴政的罪恶不仅在于它制造罪恶，而且还在于它毁尸灭迹，营造假象，抹杀罪恶的存在，并无耻地把罪恶改成光荣。如果我们由于一时未能战胜暴政，因而未能防止罪恶的发生，那固然是我们的失败。如果我们由于恐惧，由于苟且，未能把暴政犯下的罪恶忠实地记录下来，并努力让它们流传下去，那才是更大的失败。人类反抗暴政的历史，就是记忆反

抗遗忘的历史。无比遗憾的是，在这场斗争中，难免会有一些十分珍贵的记忆不幸沦为牺牲品而湮灭无闻。我们读到的历史几乎都是残缺不全的，而越是暴虐的历史很可能就越是残缺不全。纵然有一天我们战胜了暴政，赢得了自由，我们也未必能完整地恢复记忆。毕竟，我们只能根据有幸留存下的记载重建过去，那些未被记载或被销毁了的事实，势必就永远地消失了。

土改的历史，尤其是作为受难者的土改史和作为心灵史的土改史，已经大块大块地沉没，我们现在只能打捞出一些碎片。亡羊补牢，我们当尽力而为。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拿起笔来。我们已经动手得太晚了，不能再晚了。

为了纪念反法西斯斗争的死难者，很多国家修建了无名英雄或无名战士的纪念碑。这里的“无名”当然和我们平常所说的甘当无名英雄一说有本质上的区别，这是一种被迫的“无名”、无奈的“无名”——不是我们不愿意记住他们的名字和记住他们的事迹，而是我们无法知道这些名字和事迹。同样地，我们在书写土改和地主受难的惨痛历史时，我们也需要留出一页空白，以此表明人类记忆的中断或遗忘，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这种遗忘，让大家知道那谁也无法知道的事情，并努力倾听、追思和领悟，怀着深厚的同情。

六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市中心地带，有一座三米多高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其形式取材于中国八九民运期间一度

耸立在天安门广场，而后又被中共的坦克碾碎的那座民主女神像。

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在讨论纪念碑的蓝图设计时，曾经提出三个草案，一个是柏林墙，一个是布兰登堡城门，一个是天安门民主女神像。所有东欧国家的代表，包括受苏共蹂躏最烈的波罗的海三小国，都毫无异议地投票给天安门民主女神像。民主女神的底座正面镌刻："献给一亿多共产主义受难者和热爱自由的人们"。背面是："献给所有受奴役的国家和人民的自由和独立"。

在超过一亿名共产主义的受难者中，中国人就占一半以上。我希望，未来，我们将在天安门广场树立一座中国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献给所有中国共产主义的受难者，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志不忘。

望外的动机

《最后的地主》写了两年，终于水到渠成。

为了摸索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遭受迫害的时间最早，受迫害所持续的时间最长，受害的人数最多，程度最深，至今没有得到平反，更没有得到任何补偿，苦难也被遗忘得最彻底的群体真相（胡平语）”，从2005年冬季开始，我先后奔走过以下乡镇、山村和城市：

云南省昆明市及禄劝县境内的撒营盘镇——则黑乡——向金沙江倾斜的打车村——夏天穿棉袄的马鹿塘乡——环形山脚底的撒戈铲村——世外桃源般的大住基村——正在进行圣餐仪式的德嘎村——作为西南神学院遗址的撒老乌村——禄劝县城——大理古城附近沦为废墟的凤阳邑——丽江郊区——作为长江第一湾的石鼓镇——极其闭塞肮脏的剑川县——西双版纳境内的普文农场——景洪市郊的曼喃村——武定县境内的高桥乡下长冲村——黑灯瞎火的田心乡发块村——元谋县城——能禹镇——苴林乡。

《霸王别姬》电影编剧芦苇曾建议，开篇即展示一张错综复杂的寻访路线图，给读者以直观印象。可待我找出云南省地图，眼巴巴地瞪半晌，不少地名竟然没标！唉，手边条件受限，请专业绘图又得耗费不少时间，这一缺憾只得留待将来弥补。

在这项记忆抢救工程进行当中，我的朋友康正果、胡平、一平、陈迈平、苏晓康、廖天琪等人均来信鞭策，遥寄厚望。的确，根据被访人肉体及精神的衰弱程度，我估计再过四五或五六年，作为亲历者口述的土改历史将彻底无迹可寻。今年中秋，我最初的访谈物件、因信仰上帝而被划为地主的张应荣长老，就已在家中溘然而逝，享年 85 岁。

而应该成为本书缘起的我的父亲，另一乡村地主家族的长子，2002 年 10 月因肺癌逝世，享年 80 岁。我曾在他的病床边厮守近 1 年，却懵懵懂懂，没产生一丁点怀旧交谈的动机。如今徒劳后悔，惟愿他的在天之灵饶恕！虽然造物主让我们具有父子血缘，但彼此却缺乏真正的了解。

我坐在这儿，坐在父亲生前曾坐过的桌子旁，写着字，像身为中学教员的他在批改作业。我绞尽脑汁回忆，这 5 年来干了些什么。成百上千的生活细节早已含糊，剩下的大致线索是：送父亲进火葬场，与家人一道四处寻找公墓，最终却鬼使神差，按盐亭县境内风水权威罗天王的掐算，将老人家的骨灰回归故里，和地主爷爷住一块。随后——我应邀参加作家王力雄发起的“为阿安扎西活佛冤案寻求司法公正”的呼吁签名，被传讯抄家。再随后——患难与共的妻子宋玉因无法排解的不安全感，提出离婚。再随后——事物发展就

捎带了戏剧性，某一天，逃离精神病院的法轮功信徒陈氏上小区 7 楼来敲门塞传单，我一时手痒，让进屋做个采访，稀里胡涂就种下祸根。凑巧的是，便衣警察如大片乌鸦降临敝舍的那个黄昏，刘晓波、余杰、张祖桦也在北京家中落网，知识界顿时风声鹤唳，连叫痛风害得下不了楼的王胖子怡，也丢开刚写完战斗檄文《冷兵器时代的政治》的笔，拔腿就避风头去。我的身板比他结实，自然在擂门的咚咚响中，从 7 楼翻窗上平台，因过分做贼心虚，险些失脚摔成肉饼。不料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白白奔逃上千公里，却在某某火车站被以逸待劳的我党逮个正着——还和逮刘晓波等人的我党不属一个部门！再随后——凄凉四顾，荒唐荒诞，持续数年的“与无赖政权拼热血沸腾”的人生观被彻底解构，无家可归又一把年纪的我，干脆破罐子破摔，自甘放逐到黑白混淆、朝廷与江湖混淆的云南边陲，同形形色色背景不明的家伙为伍,还协助湖北奇女子金琴，造出在江湖上以地下即兴音乐闻名的“丽江 38 号”。由于要糊口，还要满足一个文字证人重现历史的本能，我的《中国冤案录》采写一直没断，因此有缘结识堪称“冤案线人”的基督徒孙医生。再随后——就堕入寻访土改受害者的不归路。

现在，《最后的地主》马上收尾，再随后——是下一本《中国冤案录》，这在我目前的能力掌控范围内。可这当中还要发生何种变量呢？不知道。我父亲，乃至我爷爷活着时，我还比较青春，精力充沛，具有远大的文学抱负，我清清楚楚知道他们是地主父子，经历过解放、土改，以及毛时代的所有政治运动；我还知道他们的同辈人也跟他们一样，如果

那时我要写和《最后的地主》类似的书，想必是容易的，不管他们愿不愿意口述，至少地主及贫农多如牛毛。可我，的确没有了解他们的冲动；即使根根底底都了解，恐怕也没有写出来的冲动；即使写出来，恐怕也没有公诸于世的冲动。那时我同现今走红的作家们一样，热衷于纯文学，暗恋着诺贝尔文学奖，觉得诗歌和小说都贵在提炼，贵在升华，贵在把民族、人类、宇宙的内核，用悲剧抑或荒诞剧之箭，三点一线地射穿过去。最土也是最洋，最民族也是最世界，号称20 世纪现代派文学三大巨头的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就是现成的榜样！那么最惨最不开窍的卖文者（连作家都谈不上），就属于我目前这种，不提炼不升华，不人类不宇宙，上不了高雅或主流殿堂的台面。几年前，曾有一位相当著名的作家对我说：老威，《中国底层访谈录》是极好的素材，想不想让我将它们写成小说？

我咧嘴笑笑，不置可否。因为在将近 20 年前，我也许会说同样的话，而不觉得脑子进水。谁料到后来有六四，我会坐牢？谁料到出狱至今的日子这么没头没脑，没白没黑，没羞没耻，让人无法提炼也无法升华。孔子曰：危邦不居，乱邦不入。既然已经生在乱邦，居在危邦，就只有走一步看一步，居一处是一处。八九年胡耀邦死，学潮初起，有谁想到要开枪？后来就开枪了，咋样？还有你做梦都没想到的军中传言，“杀 20 万人，换 20 年的稳定”，老百姓的血不如水，不如尿，咋样？

土改时杀地主，也是抱着稳定江山的理想，所以杀戒一开，果真有至少两百多万颗人头落地。暴力革命之树植根于

人心，借助一次次运动的狂风骤雨朝上疯长，直至六四。一代代杀人者，统治技巧千变万化，为江山稳定而杀人的传承却不允许变——这是中国文化吗？这是中国传统吗？中国人已经忘了“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古话吗？

的确忘了。对于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甚至绝大多数文化人，只要能暂时忘忧地活着，有奶便是娘就包括全部内容。所以《最后的地主》肯定不合时宜。刚才我已经简述了 5 年来的遭遇：父死，妻离，抄家，归葬，逃跑，凄惶，流浪，厮混，吹箫，卖艺，寻访，写作。其中只有吹箫和写作是我愿意干的，而其它都是命运强加在头上的。我心存畏惧，不敢妄论如此的安排公不公平，因为事实证明，过去、现在和未来，种种疑惑和折腾均无济于事，过后还不是丑角一般乖乖接受？

但是《最后的地主》圆满完成，不是由正统行业殿堂内的权威学者、记者抑或作家，而是由我这么一个不懂行规、不知深浅的野家伙来完成，多少有点错位，甚至滑稽。也许，这又属于上苍开的一个苦涩的玩笑。

不可能成为可能，没动机成为望外的动机，我的指尖蓦然起了一阵暖意。我固执录下生锈的苦难，久久游荡的万千冤魂就有了归属，这难道不是上苍付给的酬劳？老母聒噪地健在，并存有主宰儿子私生活的不老心；我反抗无效，身心却徒然茁壮，越发迷人起来，这难道不是上苍格外的恩宠？那么，此前我骤然遭遇接二连三的变故是？

谜底似乎有了，可说不出。那么，就把我和《最后的地主》捆绑一体，交给上苍，交给冥冥中永远年轻的读者吧。

从今后我不去琢磨人的死和不死，尽管天天都有人在死去活来；书的朽和不朽，尽管文化垃圾已泛滥成灾。

廖亦武

2007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三，成都白果林

“麻风病人”张志恩

前奏

2005 年 12 月初，我于云南某小城与信奉基督教的医生孙某某相遇，当时，孙医生正在巡回医疗的途中，其状态颇似中国古代的游方郎中。交谈之下，我才晓得孙医生是江浙人，1974 年下放到云南西双版纳当知青，改革开放后考上北京医学院，接着在体制内从医多年，原本前途无量，却因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信了上帝，至此屡受牵制，步入了人生的坎坷历程，终于被抛出正式单位，流落于民间，靠医术讨起生活来。

由于我也曾以吹箫卖艺为生，所以双方沟通很畅。出乎我的意料，孙医生关注民生疾苦，有一颗赤子之心，当知道我正在进行《冤案录》的追寻和写作时，孙医生不禁心潮起

伏，站起来把住我的胳膊大声说：“我听说过老戚这个名字，你就是我要找的作家！”

我说：“你要给我提供线索？”

孙医生摇头：“什么线索？仁慈的主要我给你充当冤案向导。”

我也心潮起伏了一阵，接着就是彼此约定，互道珍重。

12 月 15 日，我照老习惯在家整理行装，然后出发去北京采访；28 日折回昆明，紧跟着与孙医生重逢。由于一位蒋姓朋友自愿驾车送我们一段路，所以 29 日大早的行程很顺利。小车披着金色霞光，沿着大道，没一会儿就进入禄劝县城。我们穿城而过，11 点多在极为破烂肮脏的小镇团街吃饭。我在一家简陋的超市买了几斤糖果，准备用于沟通情感。

再走就是坑坑洼洼的碎石路，还夹杂着基边不稳的土路。甲壳虫外表的小车颤抖着，喘息着，冒着青烟向上爬行，大约盘桓了一两个小时才上了顶。虽然关了车窗，仍能感觉到风大，云如大片的风筝，在阳光的丝线里穿插着飘飞，深深的红土沟壑，已叫岁月的血染透了。

拐了几个弯，碎石路还是平的。快拢山嘴了，孙医生说，这地方叫大平地，属团街石门坎村。把车停到路边吧，此行的头一个访谈对象就住在我们脑壳上面。

孙医生的讲述

大约一两年前，我第一次来这里，当时有个曾经害肺结核的人送我，步行了大半个小时，在这土路边上等车。由于

“麻风病人”的泥屋

地势较高，山风自1000多米深的谷底呼啦啦地朝上刮，我们的衣摆和头发都翻起来，于是就退到拐弯的山凹处避风。无意中抬眼，却见对面峰峦在云海之间连绵起伏，真是太美了！再移动目光，又见山凹上头草木葱郁，斜斜的荒坡旁，竟有一间枝头掩蔽的草房。受好奇心驱使，我就要绕上去看看。不料却被两只手牢牢地扯住：“去不得！去不得！那儿有麻风病！”我说：“我是医生，有啥去不得？”那人说：“好多年了，没人敢接近那地方。”我说不怕，就抹下那人的手，绕了几十米，从路边一个缺口登上坎。穿过我们刚才爬的那片杂树丛，就来到这儿。当时这房顶还是发黑的烂草，土墙也塌了几处，所谓的麻风病人张志恩和他的老伴唐开凤就坐

在门下晒太阳。我近前打招呼，与他们谈了一会儿，透过仔细的观察，发觉这位老人没有任何麻风症状。

我埋下腰，钻进门去看了看，房里像个山洞，甚至比山洞更糟糕。老人说，因为没力气，顶上的草已好几年没换，到处是大洞小孔，撞上刮风下雨，里头也翻江倒海。我叹息道，这日子怎么过啊？老人说，怎么过？整夜像推磨似的，满屋子转嘛，雨浇到脑壳上，就挪一个窝；再浇到颈窝里，就再挪一个窝……最后地上成秧田了，用来接雨的锅碗瓢盆都沈底，我们也挪不动了……

我呆不下去，就直接找这儿村里的人了解情况，他们都说："医生，你的胆子也太大了。"我说："他们不是麻风啊。"他们很惊讶："怎么不是？张老头以前的老婆就因为麻风被烧死的……"

我深感震惊。这以后，我和教会出钱出力为这对孤老人重建了房子，把草房改成瓦房，好歹能遮风避雨了。我还向这周围的群众反复解释，可直到如今，还是有不少人害怕。

正文

老威：你叫什么名字？

张志恩：张志恩，属羊的，今年 75 岁；她叫唐开凤，77 岁，属马。

老威：你们是彝族吗？

张志恩：汉族。

老威：两位孤老人，就一直住在这儿？

张志恩：从前住山沟下，团街的石门坎村，后来就不跟村里人住了，搬上来单独住。不过从前的从前，我们的老人也住这儿，有两代的坟在坡上，我们离他们很近。

老威：两代的坟？他们都是得麻风病死的？

张志恩：没么。

老威：那村里人在传言，你家谁得了麻风病？

张志恩：嘿嘿，已经死掉了。

老威：请你讲讲怎么死掉的？

张志恩：死掉了就死掉了。

老威：请你讲讲来龙去脉。

张志恩：我么，原来不是这儿的人，我在老家打了一捆麻蛇，就倒了霉……

老威：是哪一年？

张志恩：不记得了。

老威：再想想。

张志恩：还在生产队上，土地还没分到户么。

老威：那就是70年代。

张志恩：对么。那天一早太阳还没起，我就上坡，想寻些药材来卖。不料埋头爬着爬着，就撞上一座坟。坟周围的乱草齐腰深，我辨不出路，只好试探着下脚，却感觉到许多夹脚的石头。我左一滑右一拐，无意间踩着了一颗野杜鹃的根。我薅开杂草细看，见这杜鹃根特别肥，就挥起锄头掏，心想赶街时能卖个好价钱。可突然间，一捆麻蛇钻了出来，还缠着杜鹃根往上爬。我浑身一哆嗦，锄头就下去，把麻蛇的尾巴斩断了。麻蛇痛得扬起脑壳，丝丝地吐舌，我又狠挖

了几锄，把它打死，就背着杜鹃根回家了。

后来我就落下了心病，好长一段时间，皮肤着痒，骨头阵阵发寒，夏天都穿棉袄。我自己找了许多药吃，都不见好。有一次我去赶街，在买盐巴时碰上生产队长，他见我在太阳底下打哆嗦，感到奇怪，就喊："你咋么了？"我回答病了；他又问咋病？我说是叫麻蛇缠住了。

队长一听，吓了一跳："麻蛇打不得哟！看来你的病好不了！"我没想到，队长过后竟添盐加醋，报告给了麻风病院的医生王x安，于是王医生脚跟脚地赶来，在一米之外盯了我一会儿，就确诊为"麻风"。我不服，王医生就说："看你的脸灰得跟土一样，肯定是了。"

我被民兵拉到麻风病院，隔离起来仔细检查，又说没得病。可既然进去了，出来就不太容易，这样，我被强留在里头给麻风病人煮了几年的饭。因为实在没病，继续强留不符合党的政策，我终于叫"清理出院"了。

老威：你在医院里，与麻风病人接触过？

张志恩：天天在一处，没啥嘛。

老威：这是什么时候？

张志恩：不记得。大概毛主席都死了，大会也开过了。我出院后回到老家，风向已变，生产队再也不是集体劳动，记工分；土地全部分给了各家各户。因为分田地时我不在，大家就把我忘了。

老威：你也可以按政策要求补分。

张志恩：连土疙瘩也没剩下，分个啥？况且，我如果不出院，就背着麻风的皮，也没资格承包土地。

老威：你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了？

张志恩：所以我就找队上闹，我是几代贫农，还受你妈的窝囊气？这时，有个同村人出面调解，说你一个光棍汉，好几十岁了，闹下去也捞不着便宜。干脆我在别的地方给你介绍个对象吧。

我冷静一盘算：在老家呆不下去，就到外乡上门，媳妇和土地不都有了？于是答应下来。双方在赶街时见了面，都还不挑剔，接着谢媒请客，我打起铺盖就到石门坎村来做上门女婿了。

老威：女方知道你在麻风病院呆过吗？她没嫌弃你？

张志恩：听同村的人说，她也在康乐村的麻风病院住过，后来没事了，就出来了。

老威：什么叫“没事就出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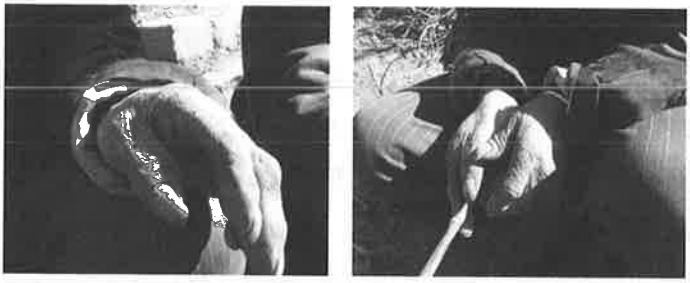
孙医生插话：

直到现在，乡下对麻风也很恐惧，只要大家认定谁有这种嫌疑，就马上送去隔离，关一段时间，没事再释放。而真正的麻风永远也出不了院，这其中包括一些被误诊为麻风的无辜者。我在这一片巡回出诊，经常听人们传言，某某村某某人得麻风了，就赶去看，结果根本不是。我当场给大家解释，也是文化稍高一点的信，多数人依然“闻麻变色”。

老威：麻风有些什么症状呢？

孙医生：开头的反应为一种皮疹，一般得皮疹又痒又痛，可麻风皮疹不痒不痛。往后，人的神经末稍就会坏掉，脚趾、手指、耳朵、鼻孔都会溃烂，眉毛也脱落。深度接触会传染，

但一般交往也没问题。我曾经在红河的麻风院替里面的病人动手术，割疝气和阑尾，稍加防护就没事嘛。唉，乡下的庸医不少，害了多少人！



泥巴里长出来的双手

张志恩：她在我之前还处过 5 个男人，都不务正业，又偷鸡又牵猪，在当地名声很不好，只有我是个正经种地过日子的。

老威：也就是说，你们俩谁也不嫌弃谁。

张志恩：徐美英长得好么。

老威：你们做了多少年的夫妻？

张志恩：不记得。

老威：不记得？我能看看她的相片吗？

张志恩：没有照过相片。

老威：结婚登记照呢？

张志恩：没么。上门就睡一起么。

老威：当时她多大？

张志恩：小我两三岁。我们开始睡，屋前的这条路才开始修。

老威：你们这些年怎么过来的？

张志恩：挖土么，找吃么。

老威：有娃娃？

张志恩：没么。

老威：她被烧死是哪一年？

张志恩：不记得。

老威：不记得？那她走了多少年？

张志恩：她么，已走了 10 来年。

老威：那就是 95 年前后的事。你们应该在一起生活了近 20 年。

张志恩：是么。

老威：为什么要烧死她？

张志恩：她得了病，好不了么。

老威：好不了就该送医院。

张志恩：你晓不得，她遇上了大蛊龙。那年春天，我锄地的时候，石缝里又钻出一捆麻蛇，我不想打，它偏要来缠，我一害怕，就下狠手把它灭了。随后清明节到了，徐美英去给她妈上坟，回来不久，她在富民县者北乡的一个朋友来我们家走人户，住了 3 个月。这个亲戚送了一大匹花布，徐美英用这匹花布缝了一床新被子……

老威：我不太明白。

张志恩：那夜下了很大的雨，天快亮的时候，哇刺打了一个雷，房子都震抖了。蛊龙突然现身，如锅盖罩下来，龙

头在云缝里，尾巴却在荒坟坡上扫来扫去。徐美英起身往窗外瞅了一眼，就啊地一声倒回床，我问你咋么？她不吭气，可没一会儿，她就扯开喉咙喊半边脑壳痛。紧接着，她的眼睛也瞎了，耳朵也聋了，我急得四处求医，把家当都败光了，可根本找不到病根。啥药啥草都熬了灌了，病却一天天加重。我快疯了，徐美英的事却传开了，并且越传越神，大家都说这是我打麻蛇的报应，蛊龙作法了。

我请端公来家摆道场，可蛊龙太强，端公也斗不过；这期间还有人牵来一个算命的老瞎子，皱着鼻子绕屋转了一圈，啥话也不说就摇头溜了。眼看徐美英不得活，我就先找舅老公（她的大哥），再去找村长商量办法。他们都一口咬定是麻风病复发，还有老人出面证实，徐美英的妈妈就是害麻风死的。

老威：麻风有遗传？

张志恩：我晓不得，也没主张。这样熬了几天，舅老公来喊我出屋，说是为我好。

老威：什么为你好？

张志恩：村长也来，同村的其它人也来，鱼苗一样，一串接一串，都说为我好。

老威：到底好什么？

张志恩：亲戚、村长这么说，同村人都这么说，我一个上门女婿，又没啥势力，能说么？即使能说，也叫群众的口水淹死了。

老威：你在麻风院呆过，应该知道麻风发病的症状。

张志恩：大蛊龙要吃她。

没扯《结婚证》照样向往新生活

老威：她的手指、脚趾溃烂了？

张志恩：没么。

老威：眉毛掉了？

张志恩：没么。

老威：身上起疙瘩了？

张志恩：没么。

老威：你们这时候还住一块？

张志恩：对么，还住一屋。

老威：没传染你？

张志恩：没么，我好着呢。

老威：你好着呢？！

张志恩：那天早上，舅老公带了 6 个人先到，接着是村长和他的侄儿，再接着全村人都到了。我被喊出屋，按在一边不能动，舅老公等几人就进门了。徐美英睡在一张门板上，

叫抬了出来……

老威：他们怎么给她本人说的？

张志恩：去看病么。

老威：看病？！

张志恩：对么。

老威：她有什么反应？

张志恩：没反应，她进出只一口气了。

老威：她挣扎吗？

张志恩：嘿嘿。

老威：她听天由命？

张志恩：嘿嘿。

老威：你无动于衷？

张志恩：我被遮住了，啥也看不见。舅老公领着人，一路吆喝“让开让开”，就把她抬下山了。照规矩，村里每家每户都出一捆柴，架起一个很高的柴堆，徐美英被他们连门板捆在柴堆顶上，然后浇了几遍柴油，直到从上到下都透了，才点火。

大家隔着我，不能靠拢去。我只能望见黑烟冲天而起，一下子把太阳都给盖住了，然后是火苗子呼呼地窜。我不敢看，但还是偷偷垫起脚后根，火像一堵亮闪闪的墙，只能感觉到徐美英如一张皮子，一点点打卷，颜色也越来越深……

老威：活人被烧，真的就没任何动静？

张志恩：她又聋又瞎，又几天没吃啥东西，早迷糊了。

老威：即使是蚂蚁，遇火也要奔命啊。

张志恩：我没看见，大家也不想让我看见。徐美英已迷

糊了，她就是醒来，也就几秒分把锺，又得死过去。那火太猛了，隔着十几米都灼得人肉疼，起先大家还逼得近，随着火圈越来越开，大家就一步步后退；烧了一会儿，柴堆塌了，在烟雾中，徐美英陷了下去，跟一捆柴也差不多。这时，一些人就将手里的棍子投进火里……

老威：拨火棍吗？

张志恩：拨人棍。村上的青壮年都拿着棍子，守在火堆边防着许美英，万一她突然跑出来，就用棍子敲。

老威：真是无法无天了。

张志恩：你说谁无法无天？

老威：那些害死你媳妇的人。

张志恩：大家都怕麻风啊。

老威：你就这么麻木？

张志恩：没有办法么。

老威：烧了一个小时？

张志恩：两个小时。徐美英再瘦，也要烧这么久。

老威：你哭了没有？

张志恩：没么。

老威：不心痛？

张志恩：烧她的时候，有人看见大蛊龙拖着长长的尾巴，一圈圈盘着下来了。

老威：你信？

张志恩：我信。徐美英死后，她缝的新被子我舍不得扔，继续盖，不料在有一天晚上，梦见碗口粗的麻蛇将我缠得死死的。我透不过气，就举起弯刀砍，可胳膊都整酸了，就是

家徒四壁，照样信主

砍不断。我浑身是血，好不容易挣扎醒来，差点翻到床下。我再不敢睡了，就点灯熬到天亮，拖着那条被子出门。奔到地头，燃了把火，你猜咋了？那被子居然烧出油来！还一股肉焦了的味儿！我眼鼓鼓地干完这事，家里才清静了。

老威：你烧死了大蛊龙？

张志恩：烧死了它下蛊的棉被嘛。

老威：我看，你们这一村人都中了大蛊龙的邪。

张志恩：徐美英娘家人挑头，他们晓得么。

老威：你出面收尸了吗？

张志恩：我舅老公收的尸，把没燃尽的骨头捡成一堆包了，埋在白沙坡那边。

老威：麻风都集中埋在那儿？

张志恩：没么。

老威：这事就完了？

张志恩：没么，还要办饭。

张志恩的老伴唐开凤

老威：烧死你家的人，还要你办饭？

张志恩：我出东西，他们办饭。村长领人进屋，把我家的猪牵去杀了，梁上腊肉也取了。那头烧人的烟子还没散，这头就在几十米远挖了两眼露天的地灶，架上锅，一边煮肉一边蒸大米干饭。天没落黑，全村人就点起火把，捧着海碗，集中到锅边来等着开席。

老威：全村有多少人？

张志恩：30 多户，每户出一个强劳动力来吃。我花了 250 多元钱，耗穿了家底，还欠了帐。家里没有那么多米，所以大锅饭吃掉的细粮，先由村里垫着，秋后收苞谷，卖了钱再折算还帐。

老威：有点像吃丧宴。那你收没收祭幛之类？

张志恩：没么，都是为我家出力嘛，所以办饭我没怨言，不能亏了大家。直到每个人都揉着肚皮说，圆了，再也胀不下了，我心里才踏实。

老威：烧活人犯法，你想没想过报案？

张志恩：没么，大家是为我好么。

老威：你直到今天，还认为都是为你好？

张志恩：村里人都这么说。

老威：改革开放这么多年，这儿似乎没啥变化。

张志恩：有变化，团街过这儿的路越修越好么，人也晓得做生意了。我也养了猪，养了狗和鸡，岁数大了，坡上的地种不动，就包给别人去种，每年补给我们 120 元钱。我们两个老人吃不多，能凑合着过。

老威：你现在的老伴进门多久了？

张志恩：有五、六年。她是大麦地那边的人，儿女不管她，有人就介绍她到这儿来。

老威：她可知道徐美英的事？

张志恩：她没提，我也没说，估计她不想听。

老威： 你们也没办《结婚证》，就住在一起了？

张志恩：没么。这门前一年不见几根人毛，她来了就有个说话的人。

老威：也没请客？

张志恩：请不起，也没人来。

老威：总该照张相吧？

张志恩：你刚才已照了嘛。

老威：你还想徐美英吗？

张志恩：嘿嘿，这只能怪大蛊龙么。她去了不久，我舅老公的媳妇也被大蛊龙缠住，不得活，听捉龙的端公讲，要喂人脑髓，所以我舅老公在半夜摸到荒坟地，挖死人掏脑髓喂自己的媳妇。舅老公还躲在桥下，听蛊龙呜呜地叫过。

老威：死人脑髓病毒更多，没病也叫搞出病来。

张志恩：嘿嘿，你晓不得。

老威：我晓不得？那你可晓得毛主席死是哪一年？

张志恩：毛主席死开过大会嘛。

老威：邓小平死呢？

张志恩：邓小平死了？我晓不得。

老威：唉，在这山梁子，时间好像停顿了，每天只有风声呼——，呼呼——。

张志恩：路上还要过汽车么。

老威：你们今后怎么办？

张志恩：信靠主么。

老威：为什么？

张志恩：感谢主，让我们有了瓦房；感谢主，还有了医生。教会的人也没嫌弃我们，有时还能下山做礼拜。我们天天向上帝祷告，大蛊龙就不会再跑出来害人。

孙医生哦，你终于来了，我已憋了他妈的三个月，大便不通，小便不通，我已喊了好多回，教会的人一个不来，咋办么？

孙医生：我教你一个法子，把黄连洗干净，切成片，熬了之后再加蜂蜜；每天喝几次，一直喝到通了为止。

土改受害者阿泽

前奏

2005 年 12 月 29 日下午 3 点 32 分，我们一行 3 人，在完成了对“麻风病人”张志恩的拜访后，继续驱车在碎石路上绕行。不久抵达一个岔路口，右边的下坡是狭仄的机耕道，孙医生说，顺着这路下到底，就是团街乡治安村，以前叫养龙村，我们的下一个寻访对象就在那儿。

我有些迟疑，因为司机朋友是个与我同岁的女同志，而且所驾的小车底盘矮，跑碎石路已十分勉强了。我们都下车仔细察看路况，孙医生不禁劝道，蒋老师你还是打道回府吧，下面这十几公里我们自己走，估计天黑前就到了。

我也说，万一抛锚咋办，弄不好走路还比开车快些呢。

蒋老师微笑着回到车里，招呼道，两个大男人让一个女

去山脚的路

人拉着跑，还这么多的废话。

车摇摇晃晃地下了机耕道，一望无际的红泥巴翻滚着，犹如大片大片的伤口，有的已凝固成痂，有的还脓血流淌，车轮一碾上去，就四溅开来，没一会儿，小车就像刚打了败仗的大笨熊，显得一塌糊涂。右边是千丈沟壑，梯田沿着令人绝望的裸体山峦蔓延，我不禁叹了口气，这彝族地面的土真瘦啊，也不知他们一年到头怎么种怎么吃的。

蒋老师说，这儿还不算最穷，我在楚雄州下面做过几年县长，那儿才称得上穷山恶水，几十年来，每年都吃政府救济。孙医生也附和道，对对，在与四川接壤的金沙江边，坡更陡，从山谷来的风更大，我经常下乡，也在上面站不稳，可彝族人祖祖辈辈在上面刀耕火种。

路面越来越软，巨蟒一般蜿蜒的泥梗吱吱磨擦着汽车底盘，蒋老师不再吭声，似乎眼睛和双手都在用力，我在副驾

座上起落着，觉得前方的坡道像一把弓，我们沿着弓背，如一颗弹丸向下滑，速度却与骑自行车差不多。

先后有男女两个村民招手，请求搭便车，我们接纳了。接着撞上了修路，在两个拐弯处，两堆村民在往漏洞一般的坑里填石头，见了我们，就闪到一边，惊奇地议论著。小车先喘息，后咳嗽，终于陷入了泥潭；右轮扎进泥梗里，挣扎了半天也出不来。我们下来，动员若干村民一起推车，并在退出的空档下垫入石块和木棒。发动机一阵接一阵冒青烟，从轮下喷涌的泥浆射了我一裤裆。孙医生问一村民，路怎么烂成这样？村民答，被采石料的卡车压的，这些家伙同政府有一腿，所以光他妈的搞钱，不修路。

斜阳将山水映得更红，闪闪烁烁中，有一群亮眼睛孩子围拢过来，唧唧匝匝地叫着彝语。我给他们照了好几张相，特别天真无邪，令人想起战争废墟边的伊拉克或伊朗的孩子。

幸而车后又来了一辆底盘极高的越野车，司机技高人豪放，主动在前开路。如此，历经近两个小时的折腾，我们方下到山脚的一片谷地。孙医生探出头去，同来来往往的人打招呼，似乎回家了。

受村民指点，我们将车停靠在一个有桥有树的岔路口，旁边的土屋据说是个村中小卖部，却不见人影。领路的村民说，没关系，一会儿人就来了，我们先去办事吧。

我们在村落里穿插，与中国所有的偏远农村一样，狗们惊喜得阵阵狂吠，男女老少都出来了，领路人也就越来越多。我们还与不少驴子、马、猪擦肩而过。盘桓而上的仄道潮湿而肮脏，露天石碾，歪脖子树，除了偶然传过耳的拖拉机声，

路边的孩子

这里的一切看上去和百年前没啥两样。

上了一个陡坎，再沿着两三层菜地绕回来，我们脚下露出一片瓦顶。我们一步步下，瓦顶右边有一扇柴门，狗叫了，领路人也大叫“老爹”。一个挽着裤腿的蓝衣老汉应声钻出骂狗，并拉开柴门迎客。一行人继续下到土墙边，视野开阔了，我们站在半个院坝里，又应邀上了三、四级台阶，向老板凳坐了下去。

屋里屋外都很简陋，很零乱，夕阳迈过门坎透过去，使我模模糊糊望见了落满灰尘的圣母玛丽亚和毛泽东的像。75岁的瘦老汉阿泽在黑漆漆的供桌上摸了一会儿，端出半土碗蜂蜜和一双筷子，小心翼翼地放在矮凳上，连说，吃吧，野生的。

天光还很充足，我照相若干张，再拿出录音机开始交谈。渐渐，夜色以猫的步态，一伸一缩地跃上台阶，接着跃上我们的膝盖；透骨的凉风擦过下巴，我们不约而同地打个寒战。一对时间，已快 8 点了。老人抱歉地说，我家太寒酸，没办法招待，只好带你们到另一家去吃。

我们连称不好意思，老汉又说，我刚替他们杀的年猪，走嘛，村里有吃杀猪饭的习惯。

的确，人家已派人来催了 3 次，最后竟来了 3 个人，打着手电筒为我们引路。几分钟后，进了那人声鼎沸的院落，坝子里已摆过好几桌，妇女们正在收拾残羹。作为上宾，我们被热情迎入正屋——一角落里，一堆妇女儿童在看老掉牙的黑白电视，其中有一个包着头帕的老祖母，至少 80 多岁，哮喘的声响很大，几乎压过了扎扎的电视音量。

矮桌上铺开 8 个菜，除了炸虾片，全是白花花的肉。我吞了 3 碗饭，还喝了两杯酒。其间，对吃得心满意足的老汉进行了补充了解——他的跟前有一碗生剁猪肝，他一筷接一筷地整去大半。我刚要去尝一筷，就被孙医生以眼色制止——里面有太多的寄生虫，他事后解释道。

正文

老威：你也坐嘛。

阿泽：我蹲就是了，彝族人都习惯蹲着。

老威："阿泽"是你的姓氏还是名字？

阿泽：晓不得，我从小就叫阿泽。长大以后，父母才替我取了一个"李天旭"的汉族学名，不过平时用不着。我的祖先姓禄，在曲靖、会泽、昭通一带，至今还有许多禄姓的彝族，在很久很久以前，他们与我们都属于同一血脉。不知何年何月，我们这一支从会泽迁到了这片彝汉杂居地。照彝族的习惯，这"养龙村"分两头，这边叫卡念，那边叫卡布。

老威：为什么你没用祖先的姓？

阿泽：这只有父母才清楚。不过我的一个堂妹，在昆明水电工程设计院工作，她要寻根，所以就改姓禄了。我还有个堂兄叫李天禄，名字中也有不忘祖先的的含义。

老威：听口气，你还有些文化。

阿泽：只读过几年小学，家境就衰落了。我的老家是团街上头的高家乡白石岩，老爹（祖父）过世得早，我没见着；父亲还有个亲弟弟，可我这个叔叔过世得更早，刚刚结婚，

连个后代也没留下。

父亲好歹有我这点骨血，他 38 岁过世时，我才十五、六岁……

老威：这是哪一年？

阿泽：记不得了。有一次，父亲上山砍柴，不小心从岩子上滚下来，把腿骨摔断了。那年月，大山沟里医疗落后，家里只能找个草药郎中，遍山寻些草药来捣碎包扎。父亲整夜挣扎，吆喝连天，为了止痛，就狂抽鸦片烟，很快上瘾了。这可不得了，以后为了抽，就卖祖上留下的田产。他又不会做生意，光出不进，家就这样败了，临近解放，只剩下 20 多亩田和一户院子。

老威：你父亲死后，家里还留下几口人？

阿泽：母亲、我、媳妇和不满周岁的娃娃。

老威：自己种田吗？

阿泽：养了一头牛，全家都下田。当然，也佃给别人一部分，收些租。

老威：你家院子有多大？

阿泽：正房有 3 间，左右厢房各两间，下头关牲口的碾房有 4 间。

老威：如此看，你这个地主做得有些勉强，如果放在较富庶的平坝地区，可能你只能算个富农，甚至富裕中农。

阿泽：父亲再晚死两年，田和房子都抽光啰。

老威：那按当时的土改政策，你就是贫农，共产党的依靠对象了。我爷爷是地主，据说他的弟弟就是靠一杆鸦片烟枪，败完了几十亩家产，而成为贫农的——撞上解放，他又

翻身做主人，去分他哥哥辛苦挣来的田地了。

阿泽：这是命啰，土改时候，村子里 20 来户人家，就我和我的堂兄家被划为地主。这彝族地盘太穷了，相比之下，我家的日子稍微好过点；其它还划了 3 户富农，也不见得有多富。

老威：听孙医生讲，你的堂兄是老革命，还当过中共云南宣威县长？

阿泽：他就是李天禄，读过许多书，在家族中文化最高。1947 年他师范学校毕业，就走出家乡投奔革命，从此几十年没回来。不过，这不影响他的家庭被划为地主，查抄财产，瓜分田地，他的继母还叫抓去判了刑呢——亲不亲，路线分，他是革命干部，哪怕在外面晓得家里出事，也不能吭声嘛。

老威：听说在四川大凉山，黑彝被称为贵族，白彝和红彝被叫做娃子（奴隶），你们这儿呢？

阿泽：我们这个方圆两里的村，除了汉族，住的都是黑彝。所以划阶级与这个没关系。

老威：20 来户人家就划了 5 户剥削阶级， 敌人的面也太宽了。

阿泽：是啰。

老威：接下来的遭遇呢？

阿泽：解放了，上头派来工作组，下村子一摸情况，明摆着。于是提出要“合理负担”，即所有地主与富农都要照政府的要求纳公粮，每个月按人头交两百多斤。动员会开过好多次，群众也充分发动起来了，在大形势下，我们最先得雇人，走 5 天 5 夜，将 1000 多斤粮食背到昆明去入库；后来团

录音机前的老地主

街建立粮站，送粮就只有大半天的路程了。

老威：有人押运吗？

阿泽：农民协会来个口头通知，你就是饿饭也得送。新政府的意图就是要把你的汁水挤干，然后才抽筋剥皮。到了1951年3月，家里无粮可交了，就捕人了。

老威：工作组来捕人？

阿泽：我这种死老鼠，来几个民兵就吓得没魂儿了。我从来没见过工作组，只有贫雇农才有资格见工作组。3月抓了我母亲，4月又抓我，都关进团街区上的监狱。

老威：你母亲被捕后，你没逃跑？

阿泽：周围都有眼睛，连地缝也没得钻。

老威：你和你母亲是被绑走的？

阿泽：他们带了麻绳，见我们太老实，就没绑。一伙人端着枪，指着我们出门。嘿嘿，也不晓得那种老枪能不能打响。

老地主的乡邻们

老威：他们有没有逮捕手续？

阿泽：啥子手续？就说了一句“区上要捕你”。

老威：“区上”是什么机关？

阿泽：晓不得。总之一到团街，就塞进一户老院子，那也是从地主手里没收来的，每间屋都塞满人，有两三百号啰。

老威：全是你这类的？

阿泽：有一半是各乡各村的地富，其它就是小偷小摸、奸淫、土匪之流。昼夜都在审讯，搞得一片鬼哭狼嚎。

老威：你没挨打？

阿泽：关了几个月，审讯我 3 次，没挨打。

老威：审你的是工作组？

阿泽：本地人，也算政府干部吧。

老威：地主也是罪名？

阿泽：我有 3 条罪名：第一，抗交公粮。冤枉死了，锅都吊起来当锣打了，哪还有粮？第二，窝藏反革命。我老岳

父因反对解放军被划为反革命，在没解放之前，我曾把老人家接到家里来玩了几天，村上人人都晓得，却没想到后来成了我的罪。第三，造谣惑众。有人揭发——阿泽说的——捉到一个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国民党要奖赏多少多少钱。我是跳河也洗不清嘛。

老威：嘿嘿，新社会算旧社会的帐。

阿泽：临近解放时，地方上很乱，今天听到这种风声，明天听到那种风声，这个也闹革命，那个也闹革命。把人都搞胡涂了。特别是我这种死脑筋，啥子叫革命？晓不得。

老威：命已革到你头上，还晓不得？

阿泽：晓不得。做过的事认帐；没偷没抢没通匪，你再逼我，也认不出帐。

老威：接下来呢？

阿泽：接下来就在龙海召开万人大会，公审公判，团街区下面几个乡的群众都参加。我们六、七个反革命地主被五花大绑，跪在台下接受批斗。两三个小时后，有判六、七年的，有判七、八年的，我判了 5 年。

老威：由哪一级的法院宣判的？

阿泽：区上的法庭，好像是工作组。

老威：没有查抄财产吗？

阿泽：这是清匪反霸阶段，没收财产是后来土改中的事。我已经劳改去了，在楚雄州的罗茨劳改农场，一呆就是 20 好几年。直到 1978 年，在邓小平手里落实了地富政策，我才彻底自由了。

老威：你不是只有 5 年刑期吗？

阿泽：罗茨是个极偏远的乡，我去时，农场有七、八百犯人，全部在开垦荒地，每天挥十几个小时的锄头，非常苦；后来又种水稻、玉米。我天天扳指头熬到 1956 年刑满，心想要回家和老婆团圆了，政府又来开会骗人，农场干部在会上说，现在你们已获得新生，有公民权，在人格上与我们平起平坐了。如果愿意留下来，继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场，就太好了。政府将无微不至地关心你们，给你们修工人宿舍，让你们结婚生孩子，安家落户，这总比你们回到社会上无依无靠，还受歧视强。

犯人头脑简单，许多人相信政府的甜言蜜语，就留场当了工人；也有人表示不愿意，政府就来硬的，不留也得留。到了 1957 年，反右运动一来，我们的工人资格又被取消，重新成为专政对象。以后运动来运动去，七专政八专政，我们就没清静过了。强迫劳动，强迫学习，外出要请假，违规要遭罚——政府的许愿全成了泡影。

老威：这么多年来，你的家庭还在吧？

阿泽：早散了。母亲也被判了刑，牢还没坐出来，就在土地改革那年死了。

老威：怎么死的？

阿泽：晓不得。

老威：也就是说，自你们母子分别被捕，即成永诀？

阿泽：以后还见过一面，那是在判完刑押送去劳改的途中。当时武定还是楚雄州的一个比较大的专区，管禄劝等十几个县，我们 100 多犯人由禄劝转武定，在专署门口暂时集中，再等着分派到各个劳改队。我们下了囚车，被绳子串着，

周围都是全副武装的解放军。记得那天还下着雨，在飘飘的雨丝中，每个人的脸都是青的，下巴还滴着水。我们在泥浆子里站了几个小时，为了转移浑身的难受，眼珠子就东溜西溜。就在我歪颈子的瞬间，我突然看见了母亲她老人家！竟在我身后的两三米外！唉，才分开三、四个月，她的头发就已花白了，而眼睛遮在头发里，猛一撞见，还以为是个瞎子。

那时她才 50 岁左右，却已像六、七十岁的老太婆了。我心里如开水煮，却紧咬舌头，不敢出半点声。母亲也发现我了，她猛然抬起绕着绳头的右手，堵住嘴。我感觉她流泪了，幸好在下雨，要不就叫解放军给看出来。

老威：怎么会这么巧？

阿泽：我母亲也判完刑，在武定看守所搞劳动，等着转到其它地方去。

老威：她判了几年？

阿泽：晓不得，也没敢问。

老威：母子就那么彼此望着？

阿泽：还同走了一段路。当时已捱到下午五、六点，政府才来点名分配，由于从武定到罗茨劳改农场的公路正在铺，所以许多人被弄去修路；而我和其它 5 名犯人被挑选出来，派到山上一座寺庙旁边去烧石灰。

老威：你母亲呢？

阿泽：也没剩下，可具体去哪儿晓不得。几十个犯人互相牵扯着，排着队从武定出发，在真枪实弹的逼迫下走了大约 10 公里烂泥路。我和母亲肩擦着肩，在犯人队列中埋头赶路，路况较平展时，领队的干部为了提神，就 121，121，123

——4！地喊口令，大家立马挺胸抬头，脸红筋涨地跟着喊；我和母亲也喊，她的声音只有一尺多远，却只能感觉到细细的尾音，像一根铜丝在刮耳朵。

老威：那么远的路，至少要走两三个小时，你们就没有谈话？

阿泽：周围都是解放军盯着，所以一想说话就很紧张，不敢转头，眼角也不敢乱瞟。遇上烂泥潭或土坎，母亲的步子就不太稳，好几次滑倒，连累了一串人；我本能地伸手去扶，觉得她浑身都在打哆嗦。有一回，我的手慢了一拍，母亲的膝盖就咚的跪到地上，绳子把前排走的人都差点拖倒。

如今回想，路那么长，从天还亮走到天黑尽，再有大手电筒和火把照着，也不可能不说话。母子感情，十指连心，牵着疼啊，况且彼此不知消息已好几个月，家里的媳妇、娃娃也晓不得咋样了……

我已想不起来到底说了些啥子，要不就是我说了她没听见，或者她问了我没反应。解放军也没咋管犯人说小话，可我们母子晓不得咋搞的，就是对不上号。唉，有啥说头！一样都没有了，人都快熬成灰了，顾不上顾不上了。

我留在了烧石灰的地方，就像做梦一样，母亲他们不知消失在哪儿了。几十年后才晓得，她第二年就死了，娃娃也死了，媳妇也死了。

老威：绝户了？只剩你 1 人？

阿泽：是啰。

老威：在土地改革那年？

阿泽：一土改，我家就叫瓜分掉了，媳妇她才十八九岁，

却抱着 1 岁多的女娃娃，被赶出自己的院子。后来恳求贫雇农主席团，给了她一个猪圈大的破屋。

老威：孤儿寡母怎么过呢？

阿泽：地主婆嘛，在村里讨饭，要得到就吃，要不到就捱着。有时也帮贫雇农干活，人家就赏几斤粮。我娃娃营养不良，没多久就病死了，至于啥子时候、咋个死的我也晓不得。

老威：你老婆没跟你离婚？

阿泽：没有。

老威：不错嘛。

阿泽：农村女人文化低，所以认命。她是 1958 年大跃进死的，当时全民大炼钢铁，她被弄去背柴、敲矿石，粮食定量又低，她又累又饿，终于垮了。

老威：你在她身边吗？

阿泽：不准假，就回去不了。我后来才晓得她病了好长一段时间，都成骷髅了。平时没知没觉地躺着，只要听到那儿有吃的，眼睛方哗啦一下睁开，手也乱抓，把布条、泥巴、草，啥子都往嘴里塞。

老威：1956 年你刑满，就该是有公民权的工人了，为啥还不能探亲？

阿泽：转眼就变了。再说 1958 年的革命形势很厉害，不仅我们不准上街，农民也不准上街，都被圈在劳动现场。店铺关门了，赶街都取消了，为了节省时间，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一两年内超英赶美，大伙买盐巴也是委托一个人，以最快的速度去供销社跑个来回。区乡的街上、马路上，

全部空荡荡的，偶尔有外乡人路过本地，如果叫眼尖的发现，立马就会被腿快的群众围住，拉你到田里地里或者山上的炼铁场去做贡献。城里人也好，干部也好，你解释没用，中央的大政策摆在那儿呢，你不放下架子，群众就用拳头和口水帮你放下架子。

所以一个小小的地主婆，累病累死算个啥？

老威：人都快死了，还不通知亲属？

阿泽：一年多以后，我才晓得媳妇不在了。

老威：大跃进时代的效率也太低了。

阿泽：我没钱，她更没钱，所以没法寄信；不寄信，双方就晓不得情况。1959 年夏天都过了，我已好久好久没她的下落了，在这个世界上，我啥子亲人都没有啰，除了她，我也没啥想头。刚好，队上额外开恩，给每个犯人发了一张明信片，我就迫不及待在这上面写了几行字，当家书给媳妇寄出去。

老威：这公开的家书怎么写的？

阿泽：太简单了：“好长时间没写着信，我也没钱带信，也不晓得家里的生活怎么样？”

老威：没收到回音吧？

阿泽：媳妇没回音，那边村里一个好心人却回了信：“你老婆已经不在了。”其它就没说啥了。唉，又过了许多年，我才真正弄清媳妇她是怎么不在的。

又能咋个样嘛，人还得活下去。接下来就是三年自然灾害，种的粮食不够吃，就以瓜菜填肚子，油荤见不着，人也浮肿，数我命大能熬，好不容易起死回阳。

老威：看样子，你在劳改队已呆习惯了。

阿泽：人长了两条腿，做梦都想到外面的世界走动嘛，所以一有探亲假，我还是要回家。

老威：你的家在哪儿呢？

阿泽：村上的熟人家还是可以去一下。阶级斗争搞了几十年，也疲了，特别是通过文化大革命，许多人看穿了，无所谓。

老威：里面也搞文革吗？

阿泽：反右、文革都在干部中展开，和犯人无关，因为我们比右派和走资派还要坏些。不过运动一来，监狱就会严管，一律不准探亲假，稍有言论，将以破坏罪论处。

我还以为要在监狱混一辈子了，灰心得整日眼皮都懒得抬。不料毛主席一伸腿，邓小平上台，地主阶级摘了帽子，出头了。50 几岁的我被清理出狱时，真比贫农还贫——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生产队干部看着我都头痛。幸好筋骨还结实，干活是把好手，就在热心人的介绍下，到这家上门。当时她是个 50 来岁的老寡妇，带着两个娃娃，正需要个帮手。

一晃又 20 多年，我已 75 岁，老伴带来的娃娃也都成家，连孙子辈也有几个了，虽然不是亲生，我也可以满足了——所以我极少对人提起过去，忘了就忘了吧，搞得心情不好有啥意思。

老威：你落难时，你那个当官的堂兄没拉你一把？

阿泽：他在路线斗争中多次受冲击，文革中更是自身难保，只有在邓小平手上，兄弟俩都老了，才敢见面相认。他晚年比我凄惨，去年 1 月，他忧虑过度，患癌症去世了，太

可惜。

补记

夜宿乡村医生家，见上帝与撒旦在一面墙上并列

吃罢杀猪饭，再与村民们闲聊了一会儿，不过 9 点锺，夜就显得很深了。在伸手不见五指中，几个领路人前后照应着，用手电筒带我们走了大约两里曲折小道。有个 8 岁女童尤其热情，拉着我的衣角，像个毛乎乎的刺猬，感动之下，我塞给她 50 元钱和一包糖果。

我和蒋老师被安排在乡村医生张彩香家住宿。张家有前后两套院子，丈夫和儿子又在外打工，所以在村里算富户。可是院内潮湿而肮脏，我们敲门进入时，先是一条狗，后是

一群鹅，再后才是两头猪，连奏了好一阵畜生交响乐。跟着，炸起一串吆喝，畜生指挥家张医生扯亮了大门、中门、侧门、圈门、里屋门的乱七八糟的灯，我们在灯影中垫起脚后跟，但还是连踩了两三次畜粪。终于登堂入室了，张医生端出一盆碳火，就坐下与我们聊了一会儿天，这个50来岁的脸蛋红扑扑的妇女，回忆起当年跟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学医的情景，依然充满憧憬。

我却对着墙上并排张贴的东西发呆，那左边是基督教年历，外圈大红大艳，对联为“辞旧岁数算神恩，传扬圣经救世真道”，横批是“神爱世人”；而在右边大红大绿的背景前，屹立着油头粉面的毛泽东，对联为“巍巍青山历史丰碑，彤彤红日民族正气”，横批是“伟大领袖”。

“妖魔和上帝怎么能够混在一起？”孙医生不禁对张医生的信仰提出质疑，后者回答说没有多想。孙医生立即起身告辞，到村里另一个小学教师家去歇脚。

张医生送客毕，有点尴尬地望着我们，问信主吗？我们沉默。这个赤脚医生出身的信主的妇女打了个哈欠，把蒋老师带入四面透风的2楼；我在底层打滚多年，眼光四下一溜，就坚持就地睡沙发。事后蒋老师说，她一夜被子蒙头，也冻得无法入眠，看来老威不愧江湖油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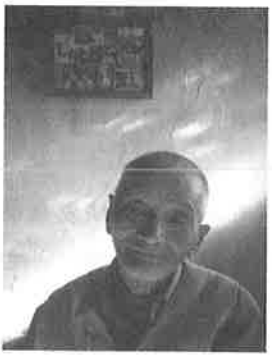
院内无茅坑，夜里我在野地拉了屎。大清早起来又肚疼，只好在张医生的指点下，钻进土路旁一个半人高的洞。我下准脚，闭目咬牙蹲坑，感觉置身于一个密封的大粪罐筒。突然吱呀一声，我受惊睁眼，却是一个狗嘴伸进了门缝。慌乱之中，我也变成一条狗，汪地窜了出去。就在这眨眼间，大

小四条狗已与我擦身挤入，愤怒地抢吃新鲜大便。

将近7点锺重新上路，蒋老师觉得她的车技高超了不少。在山顶绕行时，路过“麻风病人”张志恩所在的大平地，我虽是个泛神论者，却在内心为他们做了专一的祷告。8点过锺回到团街，我们与蒋老师告别，目送着她风尘仆仆地驾车返回。

本想吃碗热面，可从禄劝县城发来的长途中巴已吱地刹到脚边。我和孙医生立即登车而行，并相视一笑，庆幸此行的运气不坏。

土改受害者张应荣



前奏

2005 年 12 月 30 日上午 8 点过钟，我和已习惯走村串乡的孙医生在垃圾四溢的滇北小镇团街登上了从禄劝县至则黑乡的长途中巴。薄雾渐渐散尽，窗外葱葱郁郁，令人的精神为之一爽。车内还有一小半的座位空着，我和孙医生由于坐得宽敞，所以都袖着手，笑嘻嘻地聊了一会天。腹内饥焰熊熊，我们就分享了好几块准备捐献给山区的软糖，觉得味道很美。我不禁联想到昨天饭桌上的生剁猪肝，感到还是该尝尝鲜，理由是既然曾生吃过鱼和牛羊，那猪也不在话下，况且那猪肝里还拌了杀菌的姜蒜与酒。孙医生闻言，笑脸顿时沉下来。说你们这些作家啊，如此缺乏基本的卫生常识，搞不好那天在路上走着走着，突然倒下去死掉都不知道。我说

路倒路埋很惬意嘛。他说人不能这么对自己不负责任。我在彝族地区跑了几年，发现寄生虫引起的发病率极高，并且很难治。乡下猪圈臭烘烘的，猪们吃喝拉撒都全在里面，这样长出来的所谓生态肉肯定也含有多种寄生虫，人一旦生吃，寄生虫就找到了扩大繁殖的温床。有的彝族，经常头疼，明明是脑子里已爬满寄生虫了，还自以为是喝酒喝的。

我理屈词穷，只得点头称是。孙医生又说，在乡下最好吃素，荤以牛羊鱼肉为佳；可遗憾的是，彝汉民族都以养猪为主，所以他不得已用餐沾肉后，都要啃个生萝卜化解。我立即检讨道，我就是吃猪肉长大的，一天不吃就无精打采，这都是小时候饿饭，或一个月只配给半斤肉的毛时代造成的后遗症，今后一定痛改前非，从少吃不吃到改吃其它肉。

孙医生笑了，连说没这么严重。如此说说笑笑，路和风景就被抛在后面了。不过我还是注意到基督教堂在这儿分布很密，大约都是乡下人自筹自办，所以外观看上去比较简陋，只是把土墙刷了一层白。可是那醒目的大红十字却不断耸立在所有的屋顶之上，清山绿水之中，给人一种已改朝换代的错觉。

9 点 41 分车抵撒营盘镇，便减速拐弯入客运站内停靠。司机宣布休息半小时，于是多数旅客下车上站内的收费厕所，然后站在院坝里东张西望。我和孙医生小便罢，逃跑似的窜到大街边透气，不料又迎头撞上一辆客车；避闪之间，但见三架马拉砖车狂奔而至，车夫敞胸露怀，挺立车头啪啪舞鞭，激起阵阵烟尘——回想一下，我可能十几年没见过如此蔑视交通法规的马戏表演了。

在昏日头下，小镇像个浑身打满补丁的邋遢婆娘，街道短而阔，两旁的房屋矮而挤，污泥浊水四处明目张胆，纸片及塑料袋随风起落。孙医生说，撒营盘是老区了，旧社会就管撒老乌、则黑等好多个乡。

我们在车站大门旁的小吃店要了两碗猪肉臊子米线，孙医生先头拒绝，后来经不住诱惑，还是连汤带水都下肚了。因为前后左右都没啥看头，我们 10 点过就回到车里，公厕的臭味时浓时淡，我一看到时间了，就叫为啥还不开车？售票员置若罔闻。拖至 10 点 20 分，车里又涌进一拨彝族农民，满了，又有人吼道。司机趾高气扬地从靠背上回头望一望，才不紧不慢地缩回去，发动机卡卡响了。

出了撒营盘没多远，就碰上修路，车速顿减。我原本在打盹，却突然被抛起，脑袋撞顶，又咚的反弹回来。我哎哟一下张目，见满车旅客都在前倾后仰，犹如置身激流之上的气垫船。孙医生在旁边摇摆着下巴说，老威你好福气啊，这种路上也睡得着。

我嗯了一声，探头出窗——一边峭壁一边悬崖，之间才是肚肠一般的曲折山路。一堆筑路民工正各持器械，把横七竖八的条石撬到边儿上，给我们腾出前面的道。我吐了吐舌头，满腹疑惑地对孙医生说，怎么这路修得跟水渠似的？后者回答，避免翻车嘛。这条路出过不少车祸，前不久才有一辆中巴，拐急弯没刹住，就直接冲下悬崖，连岩石也没挡得住。那车打了几十个滚儿，落到两千米以下的河沟里，完全

路边风景及在撒营盘车站内

扁成一只烂饺子了。我问死人数量，孙医生说有近 20 人。

我联想起饺子馅儿一般胡涂的人肉酱，肚内一阵翻江倒海，可有什么办法，人类还是要继续前进。这不，刚过去这一段，又连续三四个急弯，我们像无法左右自己命运的风中芦苇，大起大落，大摇大摆。兀地从山嘴又冒出一辆货车，我方只得在三四米外站住，而后轰轰撤退约 20 米，方擦着靠崖的堡坎停下来，让对方鸣笛而过。

地势越来越高，峰峦犹如一伙患了牛皮癣的秃头巨人，在忽明忽暗的云层中沉浮着；太阳偶尔露一面，但很矮，几乎就与人的眉毛平行。此时，我看见了顶端平展的轿子雪山，它在深不可测的天幕的拂动下，微微起伏；随着车的绕行，它也像一块来自天国的白围巾，在人脖子之外远远地绕行。，

隐隐约约，我还在轿子山脉的某一处皱褶里，发现了一颗米粒大的红点。孙医生说，那红点是基督教堂的十字架。我叹息道，连那么高那么缺氧的地方也信主了。孙医生却说，那不是轿子雪山，而是旁边的凳子山，从我们这个角度看过去，两座山就重迭了。当然，那里的彝族村都信主。也都经历过土改。

下坡了，由于条石长堤在两边无限延伸，所以我觉得中间的狭路似水流淌，似光阴流逝。下午 2 点 21 分，车抵达则黑，这是一个与撒营盘类似的山区小镇，区别只是比前者更小更旧，街两旁低矮房屋的颜色更暗淡。旅客们瞬间就作鸟兽散，我也跟随提着两包行李的孙医生走在空荡荡的街中心。

除了停息在街边的几辆货车与拖拉机，再没什么现代化气息。马和骡子三五成群地拴在街上，沿途都是畜粪，居民

山区基督教的重镇则黑

们从屋檐下打量着两个外来人。空气寂静，一旦驻脚，恐怕能听到苍蝇的嗡嗡或骡子尾巴的煽动。

从正街拐往一个斜坡，再一直爬到底，就是则黑乡最高的建筑物——5 层楼的白色的基督教堂了——那蓝天下的大红十字架比稍远一些的政府部门的五星红旗醒目许多。

基督教堂底层有两三间铺面，孙医生拾阶而上，进了其中一家“康民药店”。接待者是个中年汉子，他为我们泡茶，并说昨天就接到孙医生的电话，教会的张长老已做了安排。客随主便，我们先去街上寻了两碗羊肉米线吃了，再回来等候。孙医生在背阴的药店里喝茶，我却提一只小凳，蹲坐在“三春饲料经营处”的短墙外晒太阳。脚底是一溜斜坡，两

边的污水沟蜿蜒着，顺坡而下，将房屋的石头基脚侵蚀得墨黑。我极目望远，见山丘朦胧，成片的瓦顶光斑闪烁，可塑料垃圾仍然颤动着，飘飞着，成为中国所有乡村风景中不可缺少的点缀。

孙医生又进饲料经营处打了电话，转瞬间，一个黑脸汉子骑着摩托，威风凛凛而至。我们由他带路，贴着土墙，从斜刺里穿过去，在拐弯后又上了一个坡，就来到上村。

依着地势，如飘带蔓延的则黑乡由上中下 3 个村组成，中村为机关与店铺集中的商业活动区，上下村则镶嵌在田野之中。我们在红土裸露的上村走了几分钟，路过若干农家院落和一堵年代久远的斑驳红墙，上面有“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标语，据说还是红军时代的。

过完红墙，我们进了一个敞开的院落，然后上了又高又陡的石阶，一对慈眉善目的老人自门里露面，他们就是我此行的拜访对象之一，则黑乡基督教会最德高望重的张应荣长老及老伴李桂芝。

我随孙医生上前握手，彼此寒暄，并应邀进屋在冷却的火塘旁坐下。爪子一般毛绒绒的阳光探入门坎，我环视了一下半明半暗的房间，掏出录音机，谈话于 2005 年 12 月 30 日下午 3 点 30 分正式开始了。

孙医生与张长老重逢

约两年前我们在地上，如今他先去了天国

正文

老威：随着时光的流逝，老的基督徒越来越少……比如90 多岁的袁相忱牧师，前年我在北京拜访他时，其身体和头脑的反应都很敏捷，可今年我听说，他就已经不在了。

张应荣：我也 84 岁了。

老威：所以我想听听你无所顾忌地讲讲自己的经历，同时留下一个见证。

张应荣：嘿嘿。我嘛，1922 年生，具体的生日晓不得。因为我 5 岁死了妈妈，爸爸作为中国内地会的长老，全副身心侍奉主，忘了自己儿子是哪一天生。我读过 3 年小学，从小就跟父母信主，但是懵懂的；一直到 16 岁那年，有两个外国牧师来到禄劝县撒老乌传道，我参加了一个礼拜的圣经会，又和许多人一起参加了三个礼拜的圣经班，才受了感动，在圣灵前承认自己的过失并决定将此生奉献。接着，由撒老乌教会推荐，我去武定县滔谷乡入六族灵会（即由黑彝、白彝、干彝、黎族、傣族、汉族信徒聚合而成的初级圣经班），苦学了 3 个年头。

老威：来则黑的途中，我们曾路过撒老乌。隔着一大片沟壑，我们望见山脚下的两三块白色屋顶，在周围土屋构成的村落中显得格外醒目。孙医生指着窗外说，那就是由两个西方人创办的西南神学院，大半个世纪前，他们病死并埋骨于此，至今还留有残碑。

张应荣：他们是夫妇，一个是澳大利亚人，那时 50 多岁，中文名字叫张尔昌；师母是加拿大人，我已记不住名字了。

西南神学院的创办人还有英国的郑开元牧师，他原来在四川那边办学，抗日战争开始，就来到云南这边的禄丰，联合筹办了西南神学院。半学期后，校址由禄丰迁到撒老乌。自六族灵会毕业不久，我又成为神学院的首期学生，在此修完了3年正规学业，假期中还跟传道人四处跑，逐渐积累了一些经验，为出校门后就任专职传道人打下了基础。

老威：当时坐汽车吗？

张应荣：这儿是各个民族杂居之地，在全中国范围内都算偏远落后，修公路搞开发也就近些年的事。当时的交通工具是马、骡子，还有人腿，驮着东西，从昆明走拢则黑要一二十天，再往里去，过一条金沙江，就是四川的大小凉山了。

本来经过祷告，我已决定自己的奉献方向就在云南境内，可在我即将毕业之际，神学院接到一位传教士从四川昭觉县发来的求援信。对方是医生，来自英国伦敦，正在当地筹办医院。由于大凉山是彝族腹地，语言和风俗又不同于汉族，因此仅仅懂一点汉话的西方人所遭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

于是神学院派我和另一名黑彝族毕业生去昭觉，在医院服务10个月，当翻译，还教英国医生彝语。完成任务回到云南这边时，已经是1950年圣诞节了。

老威：此时全国已解放，你还能继续传福音？

张应荣：1949年圣诞节前后，云南就全境解放了，可四川大小凉山直到1950年春天还在国民党手中。我是基督徒，不管天下由谁统治，福音肯定要传的。1950年底，共产党忙着更换基层政权，还没功夫操心宗教的事。还有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再接着是土地改革，我也满30岁了。

老威：还没成家？

张应荣：我 30 岁才定亲、结婚，跟着，家里就被划为地主。

老威：你家在当地算大户？

张应荣：我家 5 哥弟，两姐妹，我是老二。我的大哥当过乡长，但家里的财产和土地却很少。我本人更穷了，在土改以前，都一直在神学院住着。

老威：那么划你地主的依据是什么？

张应荣：第一，本地信主的人很少，而我们又是子承父业的基督教家庭；第二，1949 年云南都解放了，我还被神学院派到国民党统治的四川彝区，除了充当帝国主义走狗，到底还干了什么？历史不清；第三，我大哥当过伪乡长，株连了整个家庭。

老威：请讲一下你所经历的土改。

张应荣：清匪反霸期间我还住在西南神学院，阶级成分定了，我就被弄回则黑，和几十个乡里的地富分子一起，集中关押在则黑小学内。群众大会开了若干回，重点是没收土地财产，以及罚款。在没有对地主和富农动武之前，一些人还在夜半三更偷偷埋点吃的穿的，打算避过风头再挖出来。可没想到运动越来越激烈，群众的眼睛也雪亮，藏得再深，也会被搜到，哪就罪加一等了。信主的人，讲究个诚实，罚款，没钱；财产，没有。他们搜来搜去，掘地三尺，仍榨不出几滴油水，一怒之下，把我丢在神学院的行李都拿去了。

老威：你的行李很值钱吧？

张应荣：就一床铺盖，连被面也没有。他们气坏了，连

骂我不老实，天下哪有这么穷的地主？开过斗争会，叫我跪在地上，三天三夜不准起身，民兵捏着大棍子在旁边盯着，瞌睡了要挨打，伸懒腰要挨打，就是动一动膝盖也挨打。

老威：在牢房里吗？

张应荣：在露天。膝下铺着敲碎的砖头、瓦片，天像漏了似的，一直下雨，夜里还一个接一个的闷雷，震得房梁与瓦片嘎嘎的抖。雨浇在身上，开始还冷，过后就麻木了，因为水已经淹没了我的大腿根。膝盖和头上、腰上的血淌得多了，把水凼凼都染透了。我嘴里反复念叨着：神啊，神啊……

老威：你能熬过来，也算神迹了。

张应荣：当时，雨里跪了一大片，几十个地富分子，喊爹叫娘的，被贫下中农逼着，各交代各的问题。我的问题主要是 1949 年至 1950 年在四川境内，受神学院指派，与外国人接触过，与解放军接触过，与国民党军队也接触过，到底出于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后来这些国民党军官，有的被捕了，劳改了；有的从昭觉县去了西昌，去了台湾——自土改到 1979 年邓小平出山，政府来人宣布为我揭地主帽子以前，我写了几百份《坦白书》，反省那些越反省越不清的“历史问题”。

李桂芝插话：

他叫抓去好多天，我在撒老乌的家里，把眼睛都哭穿了。有人悄悄带信来，说你家那个人可能不行了。我一急，就往则黑赶。天不见亮，一路稀泥巴，我披一件蓑衣，怀里揣了一包煮熟的洋芋，紧赶慢赶，不知摔了多少筋斗，才在天黑

透时到了则黑。看见他跪在雨里面，样子像个鬼，我蹲在眼前，他也认不出，不是认不出，是魂还没回到肉壳内。我喊了他几声，他总算嗯了一声，我摸出洋芋喂他，民兵就吆喝着，一棒敲过来。洋芋掉进水里。可怜啊，他被整了三天三夜，啥东西都不准吃。

老威：撒老乌离则黑有多远？

李桂芝：90 里，我连夜打来回，要走 180 里。

老威：我们从撒营盘坐车过来，好像走了三、四个小时。

李桂芝：眼下在修路嘛。当时我们都抄小路，要近得多。我去那地狱里探了一趟，啥忙也帮不上，只好边哭边往回赶。拢家时，脚都走瘸了。房子周围有贫雇农监视着，我一天到晚躲在屋里，再不敢出门。

老威：后来呢？

李桂芝：运动快完了，他就回家了。

老威：被民兵送回来的？

李桂芝：一点一点爬回家的。那次我整夜没睡着，鸡叫最后一遍了，天也蒙蒙亮了，我恍惚感觉到房外有哎哟哎哟的呻唤，就起身去看。一打开门，却见脚下有个浑身磨得稀烂的东西在伸手扯我的裤腿。我赶紧弯腰相认，可怜啊，蒙神的照看，一个快被整散架的仆人才能爬 90 里山路回家。他已经动弹不了，最后连呻唤的劲儿也没有了。我把他抱进屋，在他身子下垫了一张羊皮，羊皮下又垫了一堆草。就这样缓了一会儿，民兵又来押他去开则黑全乡的公审大会。他动不了，人家就用木板子抬他去，再骂装死狗也没用，他就躺在台子下面挨斗，还不准闭眼睛。

张应荣：四周有三四千人，围得跟铁桶似的；我的身体却如一块生铁，哪个部位都不能动，扭脖子也要出一头虚汗。那天被公审的有十几个人，除了我，全部五花大绑，插黑牌子。我大哥就立在我旁边，弯腰 90 度，还有两个民兵将他的手臂朝上抬，文革中把这叫“坐喷气式飞机”。

我躺在地下往上看，下了很久的雨终于停了，耳边还能隐约感觉到小河的水淌。太阳从渐渐散开的乌云中露出脸，天太蓝了，怎么会有这么蓝的天呢？而在太阳和蓝天之下，人们彼此仇恨，被划为贫雇农的大多数人要把另一些地富分子踩在脚底。难道这就是“解放”？难道在“解放”以前，人们没有在同一个太阳下，同一个村子里，蒙上帝的恩宠，和谐地生存了许多年？

“阶级敌人”已经被打变形，每张人脸都是肿的，脑袋被石块、棍棒揍得坑坑洼洼，口水和粪便在上面干了，起壳了。但是还不够，还要判刑，枪毙人。就在这次会上，撒营盘和则黑的区长、乡长、大地主都叫枪毙了；他们的儿子也

判了十几二十年的刑，有的疯了，有的出狱没几天就死了。

我与政治没啥关系，也说不上“剥削”了谁，因此苟活了下来。可从此落下了风湿病根，终身残疾。

老威：你没判刑吧？

张应荣：当时没判刑，只是作为四类分子，交群众监督改造，更不准传福音。但是到了 1958 年，形势一紧张，我就去劳改了。

老威：是正式投入劳改吗？

张应荣：1958 年秋天，公社在撒老乌修水坝，我们 3 个地富分子被押去挖泥巴，跟着又编入四类分子学习队，在禄劝县的角家营和胶山一带烧了 10 个月的碳。

老威：学习队有多少人？

张应荣：二百五、六十人，才劳动了 1 个多月，就有 50 多人病倒。

老威：劳动强度太大了？

张应荣：主要是大跃进之后，生活开始紧张，吃不饱。一天才三两米的定量，熬成稀米汤大家喝，如此，肚子虽然鼓鼓，可一干重活人就全瘪。我的身体本来就弱，脚上还长了个大疮，开头还硬撑着，可有一天出公差，从早晨走到下午，实在挪不动了，就停下来想歇脚，却被押解的民兵抽了一棍子。脚上的浓疮哗地绽开了，我痛得虚脱，就倒在地上，无论怎样挣扎都起不来。我感觉要死在这路上了，就在心里祷告：主啊，我不行了，只能这样去见您了。不料过了一会儿，他们居然扶我起来，还命令其它人替我背行李。晚上，也破例没开我的斗争会。第二天休息，第三天递给我一把斧

头，仍叫我上山砍柴去。

那是1959年的夏天，已开始大面积地饿死人了。在胶山真金万的时候，同我住一起的四类分子就饿死了3个。啥都吃光了，树皮、树叶、草，畜生能咽的东西人也咽，畜生不咽的东西人也咽，所以不少人中毒而死。我看见的3具尸体都是光溜溜的，衣裳和裤子扒掉了，嘴皮萎缩，牙齿如锄头伸出来，好像随时准备着去阴间挖吃食。他们都吆喝了半夜，后来就不吭气了，大家还以为睡过去了，第二天吹哨子也不起，一揭铺盖，人已是硬的。

民兵监督我们把坑挖深些，免得饿疯了的人再去掏。光溜溜地去吧，反正那年头，大家都看惯了。

李桂芝插话：

他被弄走不久，我们3个月大的女儿腰就塌掉了，整日啼哭，拖到1岁零17天就死了。还没缓过气，我的堂兄又悄悄带信回来，你家里那人也快饿死了。这怎么得了，他万一死掉，我也活不成。哭了一晚上，天不见亮就去守在队长家门口，等到人家起床了，才进门跪在地上。恳求半饷，队长终于答应借给我10斤燕麦、5斤粮票和3元车钱。因为听说学习队不准单独开伙，我就将燕麦炒熟，磨成面，然后搭车去撒营盘，再转车。

拢了学习队，见那儿已饿死不少人，遍山遍野都是新坟包包。那些坟包起得很浅，可能是人们已没力气往上压石头。树也砍得差不多了，但是碳窑还开着，几个活着的刚才还站在窑门口，可一眨眼，他们就坐下了，再一眨眼，就横着竖

着躺倒了。

房子里找不着他，我就抓一小把燕麦面给一个人，让他带我去寻。沿着山沟绕了一会儿，看见他蜷在一堆烂草里，进出只有半口气了。我蹲下去喊了几声，他才抬一下眼皮，那眼神又聚了半天，才认出我，两颗泪珠子啪地掉出来。

他吞完 2 两燕麦面，人就有力气站直了。跟着，趁没人时，他把救命粮和粮票都藏了，答应我一定度过难关，平安回家来。感谢主，59 年秋天学习队解散了，他到底还是回家了，虽然已是个瘫子。

老威：他瘫到什么程度了？

李桂芝：他的风湿病一阵阵发作，两三个月之后就躺着动不了。既然动不了，不出工，粮食定量就要减半，别人一天 1 斤 2 两，他就只有 6 两。

老威：这时公共食堂还在办吗？

李桂芝：大跃进之后，公共食堂办了两三年，不过，我们地富分子不能进去，打饭在外面，通过贫雇农及民兵的手，6 两就变成 5 两了。他的病眼看一天比一天重，身上的疮烂得也快，最后打来的饭都吃不下了。我很着急，又去恳求队长，再借一点大麦面救救人命吧？队长犹豫了一会儿，因为大麦是细粮，他做不了主，就去与队上其它干部商量。结果还是从仓库里称了 10 斤大麦面给我。

我每天熬一小碗加了野菜的大麦糊糊，一口一口喂他；接着，我又找队长借了 8 斤荞麦面。这时，四川那边来了个草医，仔细察看了他的病情，就开出一幅药方，让我抓齐草

药后，用药炖鸡给他吃。我发了两夜的呆，在队里想不到办法，只好走几十里路回娘家，费尽力气弄了一只小鸡娃。回来马上炖了，连汤带药带渣都叫他咽了，第二天就有了些起色。

草医说的，人没有一点油荤，药也起不了作用。可那个年月，公共食堂都好久不冒烟了，我的身上也有些浮肿，因为要在每天的口粮中扣一半，还从队上借的细粮，我几年都没吃过一顿饱饭。可他是我的精神支柱，死活绑在一块了，抹下脸皮，我到处去讨。有一个人在食品公司工作，心肠比较好，听了我的哭诉，就给了我 5 斤粮票。当时凭着这食品公司的粮票，能买到每碗带两小片猪肉的饭。这太贵重了，如果现在碰见这个恩人，我把房子给他都愿意。

我把这肉片让他吃了，他又有点起色。这时，村里有个懂医的汉族老大爹出了个主意，叫我在屋后挖一个半人深一人长的坑，第一天，在坑里填满桑叶，然后用树干将他架在上面，点燃了，以暗火冲出的桑烟熏烤身体，从太阳露头直到太阳落山，湿毒才透出表皮；第二天，又换松针填坑，再依法炮制。这个土办法还真见效，不久，他的手脚就能慢慢活动，也能下床了。不过还是体虚，最多站分把锺，汗水就牵着线从鼻尖往下淌。

感谢主，又有好心人送了一瓶那年头十分稀罕的云南白药，他服了头一次，汗就止住了；全部服完后，虽然还是干不了重活，可命总算保住了。

张应荣：这次从鬼门关回来，我看开了许多事。反正都是政治运动员，就随喊随到，斗争会上也不用你来按脑袋，

我先就埋下去了。四清、社教，一般的政治运动还以文斗为主，风头一过就罢了，可怕的是文化大革命，你看看我的嘴，只有一颗牙齿，这不是自然脱落，而是被造反派打掉的。一次斗争会打去两三颗，开四五次会，嘴里就空荡荡了。

老威：文革结束后呢？

张应荣：四人帮粉碎时，依然不准信宗教；稍后，民间经历了基督教的自然复苏时期，但在1982年以前，谁也不敢公开信主。私下聚会被群众检举，队上就要开大会批斗我们，拳打脚踢。前两年，这儿又经历了十字架发光运动，一个村一个乡，成片地信主；而几十年前那么多人信的共产党，现在已没人信了；甚至那些党里的人，也来教堂做礼拜，忏悔自己的罪，还捐款修教堂。

老威：请从头至尾，讲更详细一些。

张应荣：被关被打被吊的次数多了，记忆就有点模糊了。总之，50年代初土地改革，我才30岁，就因为信主，被划成地主，跟着受了几十年难以想象的逼迫。 每一次陷入绝境，我都以为不行了，却在暗中得到神的保守，居然多活了50几年。这好比《圣经》上写的：“神因西西加的苦难而增添他15年的寿数。”

老威：感谢主给了你一个好妻子。

张应荣：她嫁给我时，才17岁，人漂亮，又出生贫农，按条件，很多好的男人可以任她挑拣。当时我和哥哥去她们乡里传福音，有人来说媒，我就曾推托过。但她主意已定，并且说得到了神的允许。果然，主经过她的手，将大爱赐于我，她却因我受了几十年的拖累。而现在，我的身子骨还算

硬朗，她却生了 7 年的病，风湿加上妇科，手臂一抬就疼，好像已没有痊愈的希望了。

她的思想很苦闷。我就说，不必苦闷，这是神的旨意，对于我们，神是知肉知灵的神，在我们没有抵达人生的终点，得见他的真面之前，他要一次又一次地把我们熬炼清楚。否则，我们如何能赎清原罪，做到纯洁坦然呢？

老威：讲得很好啊。

张应荣：虽然我太渺小，不能减轻她的痛苦，她却从神的大爱中得到了安慰。

我的一生翻过 4 次生死的大坎。第一次是 8 岁，我在半山腰放羊，不知不觉睡着了。那是秋天，阳光非常温暖，可一觉醒来，却起了风，一大团乌云将太阳吃了，羊也走散了。我害怕父亲责怪我，就呜呜哭起来，还用手背横着擦眼泪。我不晓得两头狼就蹲在背后，等着猎物回头，好咬断我的脖子。太险了，后来有人发现，那狼嘴几乎抵着我的颈子了，可我还在越哭越伤心，弄得狼们也一头雾水，迟迟疑疑，不敢轻易来扑。

老威：这有点神话色彩了。

张应荣：狼很凶残，疑心也很重。我哭了那么长时间，显然超出了它们的理解能力。我父亲终于赶来了，老远望见他儿子的背上耸着两头狼，顿时吓出一身冷汗。他懂得狼的习性，就停步，把双手圈成喇叭筒，拖着长声吆喝，跟着，牧羊狗也狂叫起来。狼立马起身，还不甘心地与父亲对视了半分钟，才转身逃跑。父亲气喘吁吁地冲上坡，一把将我抱在怀里，连说好险好险。我却一点感觉也没有。

羊也一只不拉地跑回家了。大家都说，没有神的照看，这娃娃不可能毫毛无伤地坐在这儿。所以这事儿传开后，不少人信了主。

第二次是我17岁的当口，一家人都出痧子（天花），那年头，这弄不好要死人。我不晓得厉害，仍跑到外乡去。直到在返回的路上，突然觉得浑身发闷，好像许多豆芽从毛孔往外窜，刹那间，天旋地转，脸憋得通红，刚巧不远处有条沟，我就挣扎着爬过去，把嘴直接戳进水里喝，后来，又在兜里翻了些砂糖，一捧一捧兑着喝。麻痘痘就像虫虫这一堆那一堆，我一会儿昏一会儿醒，从太阳当空折腾到太阳快落山，才被一条狗发现，一叫，才唤来几个人，把我抬到附近村子一个草医家。又过一晚上，好歹捡了一条命。

如果没有神的保守，狗就不会来，我也就呛死在沟里了。第二天，我父亲赶来，将我接回家去。后来他说，我儿子大难不死，是神挑拣他，将以使命赋予他。

第三次就是土改，我跪在水凼凼里三天三夜，风湿都侵进心肺了，还被抬去开大会，陪杀场；第四次则是1958年被抓进学习队，又饿又累，风湿大发作。

没有她我早就死了，而目前，她的病越来越严重，我也风烛残年，不能分担她的痛——这可能是翻人生最后一道坎了。

补记

残阳如血，3个多小时的访问结束了。由于被张长老的经

历和气节所感召，还没有信主的我，也在出门前与这个四世同堂的基督教家庭一道，虔心作了祷告。接着，教会的卫生员李世珍赶来，接张长老和客人去下面吃晚饭。我们伴着老人慢慢地走，沿途赶牛和赶骡马的村民都语气崇敬地招呼老人，并纷纷让路；在斑驳红墙边，老人说，这就是则黑首户杨心林的院子，从旧社会一直留到现在，可他的后代却早不住在里面了。

边说边走，我在一片渐渐变暗的火烧云下，望见了一座老教堂，本想爬上去看看，但天色已晚，只好拍了两张照片。掩映在树伞中的繁体门匾有些模糊，但有一种无言的苍凉。老人说，那是我小时候天天去的地方，现在教堂已新修，过去的就用不着了。

我们陪老人在教堂旁边的一户人家用餐，夜色降临，神的光芒却继续照耀。我们祷告着，语言和食物都温暖而清淡。告别时，老人扶着门框，半盲的眼里星光闪烁，“孩子，再见嘛，以后又来嘛，”他说。那微弱的口气令我想起 3 年前去世的父亲。

我是个不习惯告别的人，可此时突然感到酸楚而遗憾，因为自己从来没有在出远门的时候，对尘世与天国的亲人说过“再见，以后又来”。

伴随张应荣长大的老教堂，如今已成废墟

夕照染透的村落

土改受害者张美芝一家（上）

前奏

告别则黑乡基督教会的张长老之际，我习惯性地瞟了一眼壁上的挂钟，已经 2005 年 12 月 30 日傍晚 7 点 40 分了。我顺便问起本地曾经最显赫的家族如今怎样？张长老说，杨区长的遗孀还在，我指一条路，你自己去找她了解吧。

天黑尽了，我们由一位当地妇女领路，在土墙组成的村子里摸索前行。地下沟渠蜿蜒，散发着阵阵人畜粪便混合的臭味，好几次，我们都犹如山羊，在沟与沟之间连续跳跃；接着又绕过大小三道生活垃圾屏障，扁着身体穿过两道墙中间的仄道，终于豁然开朗。我弯腰摘除粘在运动鞋底的塑料袋，再抬头，就感到清风扑面了。远处，重重迭迭的乌云下面，黑黝黝的山丘动荡着，好似大群被栅栏圈定的巨兽，随时都可能咆哮着越栅而逃；稍近一些，则是开阔地和肠子一

般盘桓其上的小河；冥空里的树影发出若有若无的低啸，如迷失在阴阳界找不到归宿的冤魂的歌谣。领路妇女转头说，那块向阳的坡地过去是操场，解放军初次进则黑，就在那儿训练民兵，教他们打枪、拼刺刀；后来又在那儿开土改大会，枪毙地主。

我刚要问什么，狗就叫了，跟着，全村的狗都此起彼伏地叫成一片。领路妇女推开一扇矮栅栏，用当地土话骂狗和唤人，然后进了短墙围绕的大院。

我还没看清院内的情景，就被好客的主人们迎上石阶，让进堂屋。领路妇女给我们作了简单介绍，正中坐沙发的老奶奶颤巍巍地站起来，她驼着背，年轮密布的脸上透出笑来。我和孙医生急忙扶住——她就是本文的主角，84 岁的地主遗孀张美芝。隔着火盆与其相对的，是她的四女儿杨思仙，今年 59 岁；五儿子杨思义，今年 57 岁。

气氛融洽之后，我顺势掏出老录音机。这是 8 点零 8 分，门外的风突然停了，月白如洗；而在门内的昏黄灯光下，在一家几口不间断的抽泣中，尘封已久的回忆裂开一条缝……

正文

老威：今天下午我拜访基督教会的张长老，路过你家的院子上头，觉得一长溜青瓦之下，那面桔黄色的斑驳旧墙很特别，比周围所有的农家大院都气派。我在墙前照了像，还问过张长老，是否可以见一见这户主人？张长老说，这是当地最大家族的宅子，可目前只剩一个外壳，住不了人，就弄

成牛圈了。我追问人呢？张长老说，几十年前就搬出去了……

张美芝：土改那年，我们就叫撵出来，挤在旁边的牛圈里；而贫雇农翻身了，成了我们院里的新主人。

老威：请讲讲当时的情景，为历史留下一个记录。

张美芝：记录？

老威：是啊，目前距离1952年的土地改革已相当久远，50岁上下的人，有所耳闻，但记忆早模糊了；而40岁上下稍微年轻一点的人，恐怕只能从小说、电影、官方教科书里去了解；再往后的人，连了解的兴趣也没有。

张美芝：是啰，陈年老帐了，谁也不耐烦听。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

老威：我是个写书的，不愿意你们这代人如此被淡忘掉。

张美芝：说不清啰，我26岁就撞上土改，今年已经84岁啰。又哮喘，胃又疼了好久。

老威：奶奶你莫着急。

张美芝：着急也没用啰，感谢主，我还活着。我不会埋怨谁，更不敢埋怨共产党、毛主席，因为土地改革是大形势，我们普通人是无法阻挡的。在这地方上，我们家世代为官，为老百姓断案时，虽然尽了力，也不能说就没犯过错。除了全能的上帝，连一贯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也不敢打保票说，自己没错误。所以，我们家被划成地主是应该的，贫雇农开大会斗争我们也不过分，过去几十年了，不给地主平反也算了，全能的上帝心里有数。我们家现在还过得去，又有读大学的，又有做官的，胜过好多贫雇农家庭。

老威：奶奶你满足了？

张美芝：我总有一口气咽不下去，我经常做恶梦，醒来时浑身抽筋。我们家作了什么孽，要被杀掉那么多人？我的丈夫杨心林，原来是这儿的区长，我的哥哥张应心，是乡长，在1950年的斗争大会上一起被枪毙，两具死尸抬回来，连舌头也叫人割掉了，凭啥就这么惨？

老威：我们还是从头说起吧，你们家原来有多少口人？

张美芝：算不清啰。往上说吧，我家外祖生有两个儿子，由于两兄弟非常要好，没有分家，就把彼此的儿女都视为己出。老大育有3个儿子，老二育有两个儿子，照统一排行，这一辈的老大就是杨县长，他可是多少年以来，则黑这偏远地方出的大人物。他早年外出求学，毕业于云南讲武堂，与共产党解放军的总司令朱德是校友。25岁即由云南省主席龙云举荐，去云南德钦县任县长。

老威：藏族地区的彝族县长？

张美芝：是啰。那时的德钦还叫安东，吏治不清，盗匪横行，龙云就特别举荐志向高远的大哥去解决难题。果然大半年后，那地方就清净了——杨县长因此名声大振，还受过政府的嘉奖。大哥是解放前夕病死的，他幸好病死了，否则也难逃劫难。

老威：为什么？

张美芝：大哥做人的宗旨就是“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讲武堂读书时，曾经因为被洋教官谩骂成“东亚病夫”而拍案而起，并公开与洋教官比武获胜，结果却让龙云绑了。但是，他的民族气节在同学中影响很大。

老威：共产党也打“民族气节”的牌。

张美芝：可大哥他既然信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不会再改换门庭，去信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我二哥是撒营盘（解放前叫永山区）保安大队长；脾气也和大哥一样。老三就是我的丈夫杨心林，当时是永山区区长；四弟和五弟没啥作为，就是个不愁吃喝的普通人罢了。

另外，我娘家也不算差，哥哥张应心，做过则黑（解放前叫永安）乡乡长。

地主家四女儿杨思仙

地主家五儿子杨思义

张美芝的四女儿杨思仙插话：

我看过小说《苦菜花》，我们家真是比苦菜花还苦！土改那年我才 5 岁，本来是个不懂事的小女娃，但却在一夜之间失去了爸爸和舅舅，呜呜……

老威：怎么失去的？

杨思仙：呜呜，1952 年头上，爸爸和舅舅就叫民兵五花大绑带走，和几十个地富分子一起，关在则黑小学内，以后

又升级，关进了乡公所。

老威：你们去探过监吗？

杨思仙：当时妈妈也叫抓走了，19 岁的大哥因为害怕，就跑进山里躲起来，家里就剩两三个娃娃，连自己都顾不过来，那敢探监？直到开大会那天……

老威：你们也去了？

杨思仙：我们躲在牛圈里，门窗紧闭着，饿了两三天。大白天根本不敢出门，因为一碰上贫下中农的娃娃，不仅讨不到吃，还要遭围攻。只有夜里才从门缝钻出去，像老鼠一般在野地里窜来窜去，见啥捞啥，能进嘴就行。那一整夜，我们都不敢出去，因为民兵轮换着巡逻，一见影子就开枪打。我们抱在一块，滚在烂草里，迷迷糊糊觉得天透亮了，墙外响起许多脚步声，并且一直不停。我们连大气都不敢出，等脚步声过完。估计一两个钟头吧，墙外才清净了，好像那些人都到河边的操场开会了。从门缝朝外瞅，还有民兵端着枪来来回回走动，一个人嘴里还叼了根烟，我听见他们在议论："今天要敲七八个脑壳。"

有个人不信，说敲不了那么多；另一个人反驳："只有多，没有少。"两人就开始争起来，面红耳赤。直到民兵排长过来制止，并且说："过一阵响枪就见分晓，你们两个猪脑壳打个赌啰。"于是两人就打赌，输家割 2 斤肉来办招待。

老威：杀人还打赌吃肉？真跟过节差不多。

杨思仙：旧社会，除了过年，乡下难得有啥大事，解放了，共产党搞阶级斗争，就月月有大事。特别是土地改革，斗地主，分田分地分财产，就天天有热闹。那天上午，我们

在两里之外都听见喊口号，排山倒海似的，一阵接一阵。快散会了，妈妈被放了回来，披头散发，浑身都在流血。我们扑上去叫妈妈妈妈，她才慢慢坐下，魂不守舍地抚摸孩子们的头，问饿不饿。又说要去村里给我们讨吃的。过了大约十几分钟，门口嘈杂起来，我们还来不及紧张，有人就轰轰擂门。妈妈刚挣扎起身，门就一下子倒下来，我们看见刺目的光亮中横着两具血淋淋的尸体，爸爸和舅舅就这样被人抬回家了。

张美芝：我被关起来很多天，受尽了折磨，那天开公审大会，枪毙了七八个人，其中有我的丈夫和哥哥。我一早就与几十个地富分子一道，被民兵五花大绑了，押去批斗，并且陪杀场。在离会场不远的河边，被宣判死刑的阶级敌人后颈窝插了黑牌，五花大绑后，大腿也叫麻绳给缠了，嘴里塞了一团烂布。我在两米外，眼睁睁地看见我的丈夫和哥哥被民兵们按跪下去，拔掉黑牌，用步枪嘴抵着胸口，砰砰两响。我哥个头大，晃了几下还没倒，后面的预备枪手接着上来，抵着那已被打烂的胸口补枪。血砰的又窜起很高，有一支血箭叭的喷向枪手的肩头，吓得他一闪，就顺势一脚，把我哥踹翻。他一边擦血一边骂娘，还迈步上前，踩着在地下挣扎的我哥再补枪。咽气时，我哥就横躺在我丈夫身上，他的手向天空抓了一把，就鞭子一样软了，脑袋也滚到左边，刚好与我丈夫的脑袋碰到一处。血骨碌碌地冒着，在阳光下显得很亮，两个亲人像在说悄悄话。我被两个民兵架着，头发也被揪着，这样就没法低头，可他们是我的亲人呀，再没法低头，

我也不忍心看下去，好多次，我闭上眼睛，但人家骂我，把我的眼皮撕开，我的眼珠子都叫弄出血了。泪水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满脑袋全是包块，伤口淌出的浓血也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我一直想自己站起来，因为被人家架着太难受，而且形象不好，挺丢脸，我好歹也算个贵妇人呀。在大难之际，也应该保持起码的气节。可是，我无论如何站不了，脚尖一试再试，腿肚子就是抽筋。唉，丢脸也是没办法呀！

最后，我突然看见，两个民兵举起枪，用枪嘴捣我两个亲人的门牙，还拿刺刀使劲撬。我毕竟经历过一些事儿，我晓得他们要干什么，顿时天旋地转。我猛然狠咬自己的舌头，我想喊："把我的舌头拿去！别再折磨死人了！"可是，脑袋轰隆一声，就啥也不晓得了。

老威：他们是当众割死者的舌头吗？

张美芝：是啰。

老威：群众有什么反应？

张美芝：大概有几千人从会场那边跟过来，乌压压一片，把周围的庄稼地都踩平了。我恍恍惚惚，只听见大家都在呼口号："打倒地主阶级！""某某某死有余辜！""土地改革胜利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万岁！"还有许多小孩向阶级敌人扔石头、泥巴，挤在路两边用树条条抽坏人。我挨了数不清的打，已不晓得痛了。

唉，这是大形势啊，莫说舌头，就是当众将所有地主千刀万剐，群众也只会鼓掌欢呼。

老威：那主持大会的干部呢？

张美芝：我在台下，只听见宣判死刑的声音，没看见人。

老威：我能看看《判决书》吗？

张美芝：没有《判决书》，那次毙了七八个，劳改了十几个，都没发《判决书》。好像那个时代，不兴发《判决书》。

老威：我曾见过 50 年代的《判决书》，是用手写的，很潦草。

张美芝：我不晓得。

老威：哪一级法院判的，档案里应该能查到。

张美芝：都是本地工作组判的，我也不晓得是哪一级。

老威：是吗？那割掉的舌头能做什么用呢？

张美芝：当药。

老威：内服还是外用？

张美芝：当跌打损伤药外用。后来听说，我两个亲人的舌头被他们割去，交给了当地的民兵连长。因为那时的医疗条件比较差，而这个模范连长在执行抓捕任务时，被狗咬伤了大腿。不晓得是不是报应，那腿伤感染化脓，一两个月都不结疤。人家采了很多草药，捣碎包扎；乡里区里的卫生所、还有民间的郎中都看了治了，就是不见起色。人家急了，就照高人指点，把我亲人的两根舌头阴干，切成片，捻成粉，撒在伤口上。

老威：果真有效吗？

张美芝：按理说应该有特效，可人家用舌粉天天敷，不仅无效，而且还溃烂成了碗口大的一个洞。人家起不来床，呻唤了 20 几天，被十几个民兵护送着，又是担架又是车，辗转一个多星期，抬到武定县城。结果还是抢救无效。死了以后，丧事办得很隆重，乡里开了追悼大会，区政府派人来念

悼词，人家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杨思仙插话：

我和弟弟看见死了的爸爸、舅舅，感到非常害怕，因为那已不是平时所熟悉的长辈了。他们血肉模糊，胸口翻开比汤碗还大的洞，特别是那张脸，犹如一块被砸碎的玻璃，到处都裂着缝。妈妈面无表情，像在梦游一般走过去，抬起破衣袖擦爸爸的脸，又转过头，叫我拿木桶打水。5岁的我和3岁的弟弟用棍子抬了半桶水回来，妈妈一点一点给爸爸和舅舅擦洗，她咳着嗽，一会儿又发呆，还一下一下拉扯他们的嘴皮，好像要让豁开的嘴闭拢，但是已不可能了。因为里面既没舌头也没牙，就一个叫彻底捣碎的圆洞，下巴都快脱下来了。

妈妈给他们洗了大半天，我和弟弟抬了很多次水，饿极了，但不敢出一点声。天慢慢黑了，我们却没有力气把我们的亲人抬进家门。太阳落坡了，风开始大了，鬼哭狼嚎，像些冥空中的爪子，将房上的瓦片翻得夸夸地响。妈妈说，你们进屋吧。她却又在外面站了几分钟，才进来关了门，把我们紧紧搂在怀中。我们挤在烂草堆里，已哭不出，或者已没力气哭了。我在心中叫了无数遍爸爸和舅舅，在我的脑子里，他们永远是慈祥的，总是讲道理，没骂过谁，没动过谁一指头，见着家里的长工也总是笑脸。我不懂啥阶级斗争，也不懂他们为啥非死不可，并且死得这样凄惨。

张美芝：第二天，我悄悄联络娘家的人，用木板板把两

个亲人抬上山，草草埋葬了，连个坟包也没敢留。由于慌张，也由于饿得缺力气，坑挖浅了，两个亲人的尸骨当晚就叫野兽刨了，肉全啃光，剩下的白骨拖得东一块西一块。真是造孽啊。我只好收拾残骨，重新埋了一次。

老威：唉，人死如灯灭，惨剧总算结束了吧。

张美芝：远远没有结束，远远没有尽头！在土地改革中，我们家族到底死了多少人？我算算——大哥杨县长家，大女婿被枪毙，大女儿在极度绝望之中，先用麻绳勒死了自己的孩子，然后服毒自尽；二哥杨大队长家，二哥和两个儿子同时遭镇压；老三杨区长，也就是我们家，死了父亲、舅舅、三儿子、外婆、外公……

老威：都是公开镇压的？

张美芝：孩子他外婆是叫民兵从家里拖出去，活活打死的，他外公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就乘值班民兵松懈，用裤带吊死在监狱里。我的三儿子死于 1954 年，民兵在坡上发现了他，就开枪了。我四弟当时才 20 多岁，结婚没几天，由于生性老实，日子也过得平凡。可他也受到家族株连，叫弄去枪毙了，冤啊。

老威：真是人命贱如草啊。

张美芝：应该是人命不如草吧？都长在野外，草和草之间至少平等吧？

聆听往事，悲泣的孙女儿

土改受害者张美芝一家（下）

插记

谈话至此，屋里已抽泣成一团，我不得不暂时关掉录音机，悔罪似的低下头。户外狂风大作，似有无数无形的脚，踹得房梁嘎吱嘎吱地摇晃。我曾寻访过无数冤案，自以为已心如铁石了，不料此刻却心乱如麻——这样追下去的意义何在？大家都是人，都有权利忘掉噩梦，选择轻松一点的活法。

我的耳边再一次响起日本新民谣歌手冈林信康的声音："你就是你，你不能变成我；即使你在那里苦苦地挣扎，我也只能默默地注视。"

能够"注视"已经不错了，又不能一直停在原地。注视以后呢，就走开？或者像我这样，写下来公开出去，给你我他的生活添一点点徒劳的不快，短暂的郁闷？

再以后呢，地球依旧转动，专制依旧进行，人类如虫蚁

般生生灭灭，能否改变一丝一毫？上帝在哪儿，当我空想这些问题时，他觉得好笑吗？

最体面的解答是，这个民族需要历史。可国家、民族、政府等东西除了给每个中国人带来数不清的麻烦和灾难，就是虚妄和疯癫。

打住吧，别费这多余的脑筋了。

正文

老威：我不知该说什么好，但话题还得进行下去。其实我也是地主家庭出身，当我爷爷的田地和院落被瓜分掉，人叫抓起来斗争时，我爸爸正在外县教书，他不敢回去，怕人指责阶级立场不稳。后来我在老家了解到，我爷爷婆婆被划成四类分子，几乎天天挨斗，还挂黑牌游乡。有时候，民兵将砖头竖起来，命令我爷爷站上去，这种体罚最多持续几分钟，人的腿肚子就哆嗦，接着就摔倒。一两个钟头，我爷爷要挨几十次摔，直到爬不起来……

张美芝：这不算啥啰，在我的丈夫和哥哥被杀害之后，他们也把我抓去，连斗 40 个昼夜，天天五花大绑，只有吃饭和解手才松绳子。由于不准回家，我两岁的小女儿吃不上奶水，就活活饿死了。

老威：你有多少儿女？

张美芝：除了没活成的，当时我家共有 5 儿两女。我小杨区长 19 岁，是续弦，所以我嫁过来那阵儿，前房留下的孩子已成人了。大儿子叫杨思源，19 岁，旧社会就在读武定县

初中，一解放，受家庭株连，上不了学，还被人诬陷，说他有歹心，要杀解放军多人。天哪，老大是文弱书生，连枪都不敢摸，还提杀人？但是大形势下，有口难辨，他也只有逃命，躲在山上做了两年野人，1954 年才被捉住，判了 20 年徒刑；我二儿子叫杨思蒲，不满 16 岁，在本地上小学，被贫雇农检举，罪名是“书写反动标语”……

老威：什么反动标语？

张美芝：晓不得啰，检举人是文盲，可也是根正苗红的贫农，一说工作组就信。就这样，老二被抓起来判了 7 年刑，服刑期满继续留场，也和老大一样，相当于坐了近 30 年牢。我的三儿子 12 岁就死了，很惨。

剩下的儿女都在本地，就一言难尽了。

（此时，老人抬脸望瞭望房梁，两滴浊泪粘在眼角，接着又垂下脑袋，连说“不中用了不中用了”，还以那老树根一般的手指狠戳腰眼）

老威：老人家累了，你们可以接着讲吗？

杨思仙：可以。

老威：你当时才 5 岁，记得清楚吗？

杨思仙：我虽然小，但记忆已经烙在心灵深处了！只可惜从小被剥夺了学习的权利，文化浅，不能像你们作家一样，把这苦大仇深的家史写出来。

老威：讲出来也一样。

杨思仙：爸爸和舅舅都是当年抓当年毙，乡里杀了十几

地主家的老照片

个地主，都齐齐倒在河滩那边，据说水都变色了，河底的鱼由于喝了太多的血，眼睛也变红了，大白天嗖嗖地往上窜。我大哥如果不跑，下场绝对与爸爸他们一样。那时没正式的法院，也不讲究调查，说你杀解放军，你就莫辩解了，乖乖地把脑袋交出去吧。

我大哥是中学生，在乡里算很大的知识分子，改朝换代的事情，在书上也看过的。杀旧朝廷的人，株连九族，都在意料之中。所以在 1952 年头上，他就逃了。他跟妈妈说要学伯夷叔齐，上首阳山去，我还不懂是啥意思，因为则黑周围没有叫首阳的山嘛。

我记得他逃的那晚，也跟今晚差不多吧，风把瓦片刨得夸夸响，月亮偶尔露脸，像个吊死鬼。

老威：你一个小女孩，怎么会觉得月亮是吊死鬼？

杨思仙：我最怕看月亮，因为在漆黑一团中，反而要安全些，还能去野地弄些吃的。我大哥睡觉从来不脱衣裳，还把一个裹着几本书的小包袱当枕头，这样，墙外一有风吹草动，他就弹簧一般蹦起来，挽着包袱，顺着屋角的杆子朝房顶爬，那儿有早就掏好的一个洞，平时用泥巴糊成的盖子塞着，不容易看出来。

家里的大人都抓走了，白天抓妈妈的时候，我们几个小的都抱住她的腿，但民兵用枪托子打，用脚踢。小孩子只顾着哭，却没有像大哥二哥，始终站一边，听天由命地看着这一幕，表面上麻木，其实心里已在打主意了。大哥后来说，那个民兵连长盯了他好几眼，那瞬间他的汗毛都竖起来了，我和弟弟却仍不明白，还喊饿，没有了大人，长兄就当父啰。

大哥煮了些红苕分给我们，他自己却没吃；他叫我们睡下，又从门缝看了几回动静。我不久就开始做梦，眼睁睁的看着大哥从门缝跨出一条腿。我想喊，可发不了声；我还要翻起来拉他，也动不了。我在梦里晓得是在做梦，我还说，大哥，你为啥不去爬杆子钻洞呢，人不可能长翅膀飞嘛。大哥摇头说，贫雇农主席团的人都长着翅膀，乌鸦一样歇在瓦顶，所以我不敢朝上钻。我说，那就变小，藏进灶台里。大哥说，我又不是耗子，钻不进地心啰。我说，你先变小嘛。大哥说，小娃娃懂个屁，我们这种阶级的人，只有脱胎换骨才行啰。

我晓不得这梦做了多久，可大哥却边和我说话，便扁着身子出门了。他本来就瘦，这时更像一张纸，被啥子东西吱啦吱啦拖出去。最后是手，包袱吊在上面，还向我摇了摇，一本厚书露出角角。我本想说，哥啊，逃跑还带书干啥，不如带两包老玉米在路上啃，可那手却消失了。我迷迷糊糊地挣起来，可门却栓着；我正纳闷大哥他是怎么出去的，却听见大哥在我背后吃吃笑，我吓得叫出声来……

老威：几十年前的梦你也记得吗？

杨思仙：非常清楚，因为醒过来大哥就不见了。天大亮时，果然来了 20 多个民兵，把房子铁桶般地围起来，然后猛一下把门踹开，大吼一声："举起手来！"我们一窝娃娃只得投降，到门外靠墙站着。民兵连长喝问："杨思源呢？"我们都没吱声。接着枪托子就下来了，我们像几个足球，被捣得满地滚，屋里又被抄了个底朝天，15 岁多的二哥和 10 岁多的三哥都叫麻绳扎了，揪住头发往墙上撞了很多下。

老威：你们全被带走了？

杨思仙：二哥和三哥弄去拷打，几天后三哥放回来了，二哥却在爸爸被枪毙不久，判了 7 年刑，送蒙自的草坝农场劳改，稍后又转富源县煤矿。在那儿一呆 20 几年。

老威：你们去探过监吗？

杨思仙：原以为 7 年刑满，他好歹也会回家，没想到他与家里人重逢已是 30 年之后。按当时的劳改政策，反革命分子刑满将被强迫留场。如果不是邓小平上台搞改革开放，我们和大哥二哥就永远见不了面。

老威：你们家 15 岁以上的人都抓走了，剩下的？

杨思仙：我5岁，弟弟3岁，姐姐不足10岁，妹妹更小，妈妈被抓后，她缺奶，饿死了。三哥说，民兵把他们兄弟俩用麻绳串起来，押着去搜山。全乡的青壮年都出动了，像赶野猪，几百人朝山上拉网，又是鸣枪，又是在洋铁桶里放鞭炮；遇上林子或者山洞，还点茅草、湿柴，哇刺哇刺向里面扇浓烟。当年的山里，啥子野物都有，所以人没逮着，野猪、野兔、野鸡倒猎了不少，据说还放翻了狼和熊。

老威：真是一场集体狩猎。

杨思仙：是啰，大伙在山上折腾了一天一夜，最后扛着各种野物，欢天喜地回来。他们在乡公所外头挖了一眼灶，架上海锅，就剐皮煮肉了。而我的两个哥哥被吊在旁边的树上，如等待着宰割的野物。有人吃饱喝足了，就拿骨头去逗他们，命令他们伸出舌头舔，可又不让舔着。二哥不愿受辱，就紧闭嘴，将脑袋偏向一边，却把人家惹毛了。二哥挨了无数骨头，嘴还叫刺刀撬开，灌了一碗粪便。

张美芝：我被斗了40个昼夜才放回家。在则黑小学里，先是逼着我检举丈夫和哥哥，后又要我交代大儿子的下落，是不是受我的指使上山为匪了？我一个妇道人家，自从嫁过来，无非相夫教子而已，那晓得场面上的事情？大儿子是个读书人，与土匪更联系不上了。我还晓得，如今斗我打我的贫雇农里，做过土匪的不少，当然那是解放前，国民党统治下的匪，天一变，就成了“苦大仇深，逼上梁山”。

那是雨季，我和几十个地富分子一道，跪在一滩污水里。膝下铺着碎砖和炭渣，天上下着倾盆大雨，我都痛麻木了，可身子一歪，民兵就过来把脑袋踩在水中，让你醒脑。风湿

劳改多年，已死去的杨家长子杨思源

的病根就这样留下的，直到 80 多岁了，腿和腰还直不起来。

还有打，吊，一把接一把揪头发，用皮鞋、布鞋、草鞋的鞋底扇嘴巴，用杠子压腿……人想得出来的刑全搬出来了。从那年开始，我的牙就没剩下几颗。我没想到能活出来，感谢主，我真没想到我的寿命比好多贫雇农还长。

回到家，两个儿子又没了。老三悄悄告诉我，他晓得大哥藏的地方，我都惊出一头冷汗。原来大儿子没跑远，就躲在后山垭口的一眼废窖里。

老威：虽然逃过了这一劫，往后的日子怎么捱呢？

张美芝：在我丈夫和哥哥遭枪毙的会上，他也被缺席判处死刑。乡里村里都张榜抓他，所以他绝对不能回来，更不能在有人烟的地方出现。

老威：只有做野人了。

张美芝：大白天在窖里埋着，下半夜拱出来，去坡地里掏些生东西充饥。大儿子读过书，加上一个人在坡上坎上晃荡久了，听觉也跟野兽差不多。这样，时间一长，土改高潮一过，人们就淡了，好像不再为一个反革命野人多费工夫。

老威：后来呢？

张美芝：后来家里人也上山种地。大儿子的双手经常刨东西，指甲又长又厚，于是他就在家里的荞子地底下，掏了一眼窖，顶上盖石板，石板上盖土，土上再种荞子。外人根本看不出来，也想不到。

老威：如此复杂的埋人工程，得要你们的合作才行吧？

张美芝：一家人只能抱成团，要不一个也活不出来。我被盯得紧，哪就把吃的（有时是粑粑、炒面，有时是煮熟的洋芋、苞谷）绑在几个没成年的儿女腿上，带上去。我们还在地窖边上种满竹子和向日葵，竹子里面的节疤是可以打通的，而向日葵的秆内有天然的气眼，这样，既可以透气透光，又可以将葫芦里的水灌进去，给窖底的大儿子喝。

老威：这算地球上最绝妙的地牢了。

张美芝：没人发觉，渐渐也没人过问，张在村里的逮人榜也褪色了。我呢，还是开会，还是挨斗，但罪状就那些，也挖不出啥新鲜货色。秋去春又来，生土种成了熟地，我还以为大儿子会永远与世隔绝地生存下去，又在地边的一棵老

树干里慢慢钻了两个气眼，以防意外。

老威：可人不是蚯蚓啊。

张美芝：赖一天算一天，顾不上多想。我大儿子活埋了两年余，已忘了太阳怎么升怎么落。地窖里寒湿重，憋得他浑身长疮，衣裳也烂成刷刷，最后在身上挂不住，就赤条条的了。有一次，我磨蹭到天黑，终于等到脚边慢慢挪开一个洞，我儿子的脑壳像木头桩子一般拱了上来。我一阵心酸，就趴下去，母子俩搂抱着，唉，这哪是我一表人才的读书郎啊，除了裆里缠了一团乱草，真一丝不挂，并且瘦成了一副骨头架架。

老威：这算是阴阳两个世界的接触。

张美芝：作了什么孽，我儿子变成了鬼？那么大个子，却轻得如一段泡桐木，我都能把他给抱起来。这副没有一块好肉的糙皮壳子，汗毛一寸多长，像霉豆腐，又细又白。特别是头发，齐腰深，破麻袋一般，我岔开手指替他梳理，才几分钟，虱子就一把芝麻似地朝下撒。做妈妈的肉疼啊，忍不住，就哭出声，儿子他急忙堵住我的嘴，眼睛一闪一闪地四处张望。幸好快秋天了，荞麦长出半人高，母子俩坐在黑地里，外面瞅不见。

我还没来得及把吃的拿出来，儿子他就急不可待地在我身上捏，把到手的红苕和炒面往嘴里塞，噎住了，就响尾蛇一般丝丝仰脖子。奇怪的是，他吞了那么些干的，喉咙都顶出一串包了，也不喝一滴水。直到肚子填得差不多了，才野物一样四肢着地，嗖嗖跃至十几米外的水沟边，趴下去埋脑壳饮水。

目睹此情此景，我晓不得该说啥，又不敢久留，因为那年月搞阶级斗争，民兵随时可能上门。我凑在儿子耳边说："思源，妈妈走了。"他点点头，啊啊了两声；我又说："过几天再来看你。"他还是啊啊了两声，我明白，他一个人呆得太久，已不习惯讲人话了。

老威：这样下去十几年，他也许就忘掉人话了。

张美芝：我站起来走出荞子地，下山回家。我感觉儿子始终在看我，就回头，还举了举手，不料他转身就逃，眨眼就不见了。唉，他还以为我在发出"人来了"的信号！

老威：小时候，我看过反映解放区土改的革命歌剧《白毛女》，剧情是恶霸地主黄世仁逼死贫农杨白劳，强奸杨喜儿，搞得人家走投无路，只能上山当野人。天长日久，仇恨与营养不良使喜儿成了白毛女。

张美芝：那我儿子是啥呢？

老威：算地下版的《白毛女》？也不对。总之，《白毛女》影响了几代中国人，黄世仁成了天下地主最著名的代表，它的作者贺敬之因此晋升为共产党的中宣部副部长——历史就这样永远颠倒下去，谁也想不到地主在土改中被逼成了《白毛男》。

张美芝：《白毛女》我看过，她终于盼来了共产党，翻身得解放了。可我的儿子，我们一家却永世不得翻身！1954年秋天，他已经在山上躲了两年半，头发都齐大腿深了。我的三儿子杨思洪，当时只有12岁，与他的大哥感情特别厚，就经常上山见面。开始，兄弟俩在一起呆一会儿就分手，也没啥事儿；渐渐，就有些难舍难分。我被阶级斗争搞怕了，

就阻止他，让他莫去得太勤，暴露了秘密将不可收拾。可这娃娃表面上点头，心里已经拿定了主意。那一段，农村正在搞初级合作化，生产占了上风，对四类分子的管制好像要松懈些，集中学习开会时，体罚也减轻了许多。我心里的弦也没绷得那么紧了，甚至想，杨思源“失踪”了这么久，对村上乡上来说，也许根本不存在了。

杨思洪人小鬼大，最后一次，他居然在山上呆了两个多月！白天与他大哥挤在地窖里，晚上出来活动。我又担心又着急，就叫其它几个娃娃去劝他回家，不听，我就亲自去，把利害关系讲了，口水也说干了，他们却只顾点头，就是不动脚。我一时心软，想到都是没父爱的娃娃，既然他们要患难与共，我也不能太不通情理。

杨思源还说：“妈妈，您就让三弟再陪我几天。我反正已是活死人，过去学的文化对这个社会也莫用，但三弟聪明，教给他，将来或许有用。”

我只能叹气。

杨思源又说：“如果不是三弟上来和我说话，我恐怕已变成舌头打结的哑巴了，更莫提思考问题。”

我说：“你三弟人小，你可不能连累他。”

杨思源一下子哭了：“我宁愿死，也不愿连累家里的任何人！”

我也哭了，接下来的许多天，我都让几个娃娃轮番给他们送吃的。但那几天，我老做恶梦，血淋淋的场景，一会儿是我的丈夫和哥哥，一会儿却是那藏在地窖里的兄弟俩，一个压着另一个，身上布满了枪眼，醒来时冷汗直淌，手脚全

抽筋。这是咋回事，果然村里的民兵又来了，他们对着本子，挨个清点人数："还差一个！"

我敷衍说："一大早走亲戚，晚黑就回来。"

民兵排长瞪眼道："狗地主，为啥不报告？"

我说："正要报告啰。"

民兵排长说："狡猾的地主婆，敢给老子耍花枪！你娃娃走的是那家亲戚？从实招来，是不是进行反革命活动去了？"

我一时答不上，民兵们就一拥而上，用细麻绳将我五花大绑，严刑拷打。我家缺一个人的敌情被迅速上报乡里，上级指示：无论老幼，一律严加控制，由贫下中农监督劳动，并且要彻底查清地主三儿子杨思洪的下落。

事已至此，我心急如焚又毫无办法。家里人上不了山，那兄弟俩饿急了，肯定在地窖里呆不住。而一露面，哪怕半夜三更露面，也可能成为阶级斗争的猎物。那时我还没信上帝，只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祈求列祖列宗和天上的神保佑我的儿子逃过这一劫。

老威：我晓得那个人民战争如汪洋大海的年代，你的一举一动，也躲不开群众的耳目。

张美芝：除了劳动，吃喝拉撒都有专人看管；晚上睡觉，民兵就用两根长绳子，从老到幼，一手一脚地拴一长串，绳头还固定在门斗上，娃娃翻一个身，门也嘎嘎响。

老威：看管你们的人也不舒服吧？

张美芝：那时的人阶级觉悟很高的。况且烦闷的时候，还可以打骂我们，想方设法用我们取乐，比如一边打锣一边

领着我们游乡啦，让我们学狗爬啦，往我们身上淋尿啦。听说民兵们还争着看押我们，仿佛是一桩肥差。

老威：肥差？集体变态。

张美芝：莫办法，谁也顾不了谁。我那两个儿子在地窖里憋了四五天，又渴又饿，都在喝自己的尿了，才忍不住从土里拱上来。民兵刚烧过山，四处焦土，树子和荆棘都赤条条，没个遮没个挡的，偏偏那晚又是大月亮。兄弟俩的脑袋冒出地面，还如一对地老鼠，东张西望了一阵儿，才一前一后向水沟爬去。解了渴，肚子更咕咕叫，于是他们又四肢着地，跳跃到几十米开外的另一块地里，埋伏在地坎下掏红苕。他们掏了两个大红苕，搓了搓泥巴就开啃，然后继续掏。他们在地里耽搁了十几分钟，将一包红苕运入洞里，还把战场打扫干净。

他们又憋了三四天，因为第一次没出事，第二次出土胆子就要大些。哥哥说，兔子不吃窝边草，我们最好跑远些。于是兄弟俩野物一般翻着蹄子，跃过了几块地。那晚月亮实在太大了，白白的光都刺眼睛，他们已习惯不穿衣裳，所以在掏了红苕之后，就滚下一个地坎，脑袋抵脑袋，在那儿吭哧吭哧。他们啃得太香了，没想到夜太静，更没想到前次出洞就留下了痕迹，人家已发现红苕被动过。

轮番埋伏了几夜的民兵已把枪口指定了他们，有人突然大吼一声："有鬼啰！"兄弟俩一惊，扭头刚要跑，枪就响了。吓得崖石顶的一群歇鸟扑索索地飞起来。

第一下擦着哥哥的耳朵过去，激起一团泥烟；弟弟大叫"完了"，转身扑倒哥哥，第二下就响了，他的肩膀叫射出个

大窟窿。跟着是稀里哗啦的乱枪，他的头叫射爆了，脑浆子四溅，盖了他哥哥满脖子满脸。隔了好久，枪声歇下来，民兵们提着冒烟的猎枪围拢去，借手电光埋腰查看，才发现那个失踪已久的12岁的地主娃娃已被射成一张肉饼，裹在他的野人哥哥身上。

他们把一死一活的兄弟俩绑在一块，用麻绳子牵着下山。回村后将死弟弟卸下来，换根铁链子将哥哥吊在牢房里。整个村子轰动了，老老少少都半夜起床，打着火把要去看野人。

因为山上一响枪，脚底的群众全都惊醒了，有些人早就穿了衣裳，钻出房门打望。而我们却浑身哆嗦，魂都飞了。

第二天，乡里又是出告示又是打锣，方圆百里都开了锅。第三天，全乡开大会，反革命野人被押上戏台，在上万群众面前亮相，我们全家也被揪去陪斗。由于两年多不见天日，我大儿子在台上睁不开眼睛，他大约瞎了一个星期左右，才能辨清模糊的人影子。

张美芝的五儿子杨思义插话：

我1949年生，当时才5岁，可也是在大庭广众下第一次看见我大哥这个样子。皮肤和拖地的长发都是灰白灰白的，嘴很尖，牙槽都突出到嘴皮外了。以前在晚上见过面，不觉得像鬼，而现在，他真是个可怜的活鬼了。许多人还向他扔石块吐口水，还扯他的头发，忍心哦，他的命可是我三哥的命换来的。

老威：他不是被缺席判了死刑吗？

杨思义：土改过了，政策宽松些，乡里区里也不能随便

毙人了。所以大哥他被判了无期徒刑，送昆明的云南省第一监狱劳改了近 30 年。家里人，包括我大嫂，都直到 80 年代才与他重新联系上，晓得他刑满后就在监狱隔壁的机器厂就业。

四女儿杨思仙插话：

兄妹分离时我才 7 岁，可重逢时我已 35 岁，是 3 个娃娃的妈妈了。最小的女儿还在吃奶，我就抱着她，坐了一两天长途汽车才抵昆明。打听了几个钟头，快天黑了，才在一个好心人的指点下，找到了已 50 多岁的大哥——当时他正在洗脚，一听别人说妹妹来了，一下子傻了；接着就跳了起来，洗脚水翻了一地。

老威你看，这张照片就是第二天上午照的，大哥还穿着劳改就业服装，手里抱着他的小侄女，脸上有微笑了，这很难得。

我大嫂一直没有另外嫁人，大哥出狱后，他们又生活了 20 多年，却没有后代。大哥两三年前害肾衰竭，死得很不甘心；大嫂现在还与我们住，她熬不住夜，已经睡了。

老威：我明天能见她吗？

杨思仙：见到她也问不出啥，这个现代的孟姜女，一辈子就活在泪水里。

张美芝：我这一生经历了太多苦太多痛，逆来顺受，却活了 80 多岁——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啊。生离死别了十几回，人都麻木了，所以能无知无觉地熬到头。几十次政治运动，

几百次批斗，稀奇古怪的刑罚……我一个妇道人家都见识了。又能咋样，感谢主，我还活着。我曾经恨自己为啥不早早地死，因为儿女都受阶级的牵连，只读了小学，就不能再升初中，也没有钱升初中。任何朝代，没有文化就完了，我以为这个辉煌了好几代的家族完了，被共产党毛主席整来整去，恐怕连耗子也不下崽崽了。家谱族谱也烧得干干净净，贫雇农协会没搜尽的地方，我自己再搜一遍，免得再惹祸。恶梦啊，恶梦啊。

老威：你记恨那些整过你的人吗？

张美芝：大形势摆在那儿，我能恨谁？全能的主在头上，他安慰我们，教导我们要用宽恕去惩罚敌人。我的儿子辈没受到正常的教育，可孙子辈翻身了，出了几个大学生，他们毕业后，有的留在昆明工作，有的自愿回到家乡，又像他们的祖上一样，成为这方圆百里最有文化最有出息人，村里乡里要办啥大事，都缺不了他们。我的一个孙儿还做了官，于是，几十年前把我们朝死里整的那些贫雇农的后代，又上门来巴结了，口口声声叫我这命大的地主婆为“老祖母”。我耳朵背，听不太清，人家就贴上来连叫好几遍。我不好意思，就答应了，还笑呵呵地问：“你的亲祖母呢？”人家回答：“没您老福气高，早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了。”不知咋的，我一阵心酸，就点头说：“晓得晓得，她还小我 5 岁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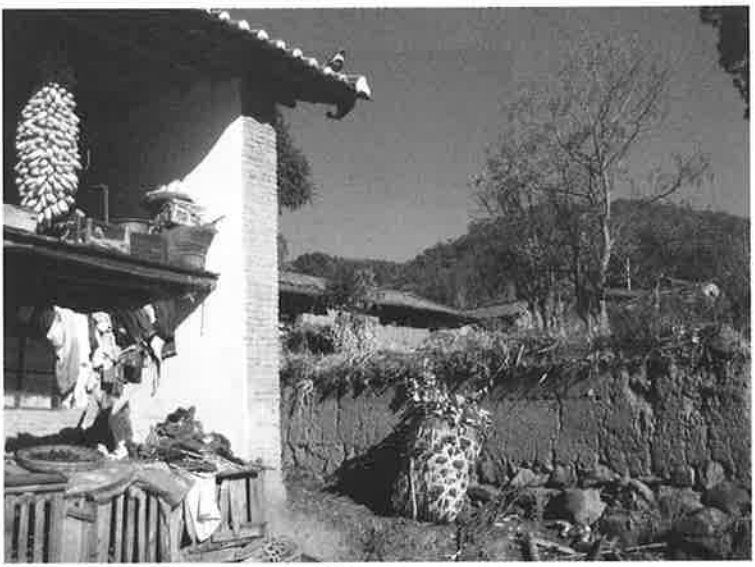
老威：他们的父母给他们讲过土改的事儿吗？

张美芝：估计不会讲，你想一个杀人犯会给自己儿孙提“当年勇”么？党和政府也一直鼓励人民群众要“一切向前看”。

老威：老人家的政策水平还蛮高的。

张美芝：我孙儿每天把单位里的报纸拿回家，我就认认字，受受启发。去年，我那当官的孙儿出钱在我们杨家大院的旧址上，摆了十几桌酒席，筵请在土改当中与我家同命运的地富分子——一大半都死了，就让那些冤魂的儿女们来代替他们吃酒吧。我们还请了一部分贫雇农，都是从土改到镇反到四清到文革等几十次政治运动中，对杨家比较好的，暗中关照也算，整人时没下狠手也算。我特别叫孙儿把杨家过去的长工ｘｘ请到上席，坐在我身边。他小我两三岁，是个老实人，在土改中，工作组反复动员，要他起来斗争我们，他死也不吭声。因为划不清阶级路线，他还挨了打。如今，我当着众人替他夹菜，还大声将孙儿唤过来敬酒，我说：“这是我的老兄弟，按辈份你该喊老爹，他家的事就是我家的事。比如现在，他孙女读书缺钱，你每月能不能补贴一点？还有给他家老么在街上找个铺面，做个小生意好不好？”孙儿当然满口答应，ｘｘ连说当不起。

这次具有特殊意义的酒席在当地影响很大，相当多的人都没请，只能远远地观望。50 岁以下的人或许不太明白，但老一辈心里肯定有数。我的重孙儿女们还放了鞭炮，那个高兴劲儿啰，相当于杨家自己给自己平反。我将几个大学生孙儿叫到一边说：“是不是太招摇了？”他们都回答：“奶奶您还担心个啥？过去已过去了，杨家彻底翻身作主了。”



已经衰败的地主院落

午夜读旧报

结束了对土改受害者张美芝家的拜访，已是 2005 年 12 月 31 日凌晨。我和孙医生步行回教堂的中途，风嘎然而止，月亮拖着一根长长的丝带从云里闪了出来。我不禁刹步，请孙医生先行。面朝浩浩旷野，茫茫群峰，我解裤下蹲拉起了野屎。快活之间，吹了一段口哨，不料惊动村庄里此起彼伏的狗吠，还有些昏黄的狗眼在四周飘飘落落，与天上的狗眼混杂。我想，那稍远处横贯着小河的旷野过去就是召开土改大会的操场吧？如今时过境迁，枯骨之上已长满了庄稼。

没带手纸，我就像个真正的农夫，拔了些衰草擦屁股。草根很肥，浸透了血似的——也许张美芝家的死者已融化为植物生生不息的胎记了，法国诗人瓦雷里早就在长诗《海滨墓园》里吟叹过：“大理石下面夜色深沉，却有朦胧的人群接近树根。”

我慢悠悠地继续走，还与一头水牛擦肩而过。终于接近

街面了，桔黄色的路灯令肮脏的小镇显得浪漫。我埋头上斜坡，又在十字架的笼罩下进了半掩的窄门，拐了一个弯，就准备入室休息。

两张床并排，一张床横着。孙医生已入梦，鼾声隐约。由于经常出门，他把随身带的床单、被套都用上了。我打开供基督教徒歇脚的被子，在令人不适的异味中躺下。由于养成了睡前看书的不良习惯，我又爬起来东找西翻，想不到在一个尘封已久的旮旯里，搜出一卷边角焦黄的报纸。我蹲在床尾细细查看，多数是文革时期的文字垃圾，不堪一读。唯有41年前的大半张旧报，竟与地主的命运密切相关，现公布于后，可作为这次系列追访的官方左证。

《人民日报》1964年12月14日版，作者：景文灿

这是“人情”，还是毒药？

（编者按）山西文水县马村十一队贫下中农社员阶级警惕性高，他们从地主分子送几个粽子给队长的“小事”中，识破地主的阴谋，帮助队长划清阶级界限。

山西文水县孝义公社马村大队十一生产队的贫农张松富向我讲了他们队里一件事，很开脑筋。这件事情是这样的：

今年端午节前一天的傍晚，平素很不老实的地主分子王淑珍，鬼鬼祟祟地溜进队长孟耀吉的家里，从围裙里拿出几个粽子，对孟的妻子景秀如说：“您嫂子，我知道您家没有做下粽子，特意给孩儿们送来几个。”从这以后，接连

几天，王淑珍不是提出要白给景秀如看孩子，就是要把磨面的家具借给队长家使用。

在王淑珍给孟耀吉家粽子的第二天上午，一伙在地里锄玉米的贫农下中农就纷纷议论起这件事来。有人说："听说王淑珍昨晚上偷偷给耀吉家送粽子。咱们可不能眼看着地主把队长拉下沟底不管啊！"也有人说，怕管了到头来要吃亏。他的话刚落音，便引起好多人的反对："咱们给队长提意见，是为了大家好，也为他自己好。不该不吭气。"经过一番讨论，大家决定好好帮助队长孟耀吉认识这个问题。

在贫农下中农的提议下，在送粽子事件发生后十来天，十一生产队召开了社员大会。在会上，贫农下中农一方面揭露了地主分子王淑珍的阴谋活动；另一方面，又热诚地批评和帮助了队长孟耀吉。贫农张松富说："可不能小看这几个粽子，你想想，为什么地主分子不给别人送粽子专给你家送？为什么从来不送偏在你当队长以后送？为什么他们过去一毛不拔，现在愿白给你家看孩子？"贫农张秀峰说："我们一眼就看透了王淑珍的鬼胎，可是你还在鼓里蒙着，原因就是大家脑子里有了阶级，你脑子里还没有阶级。当干部的脑子里一定得有阶级；有了这东西，不管敌人耍什么鬼把戏，都不会轻易上他们的贼船。"贫农刘占奎说："现在不法的地主分子换了新办法跟我们软斗，当干部的可要时时刻刻操他们的心啊！"

孟耀吉在贫农下中农的帮助下，恍然大悟，当众检讨了自己的思想。他说："要不是阶级兄弟早点拉我一把，非要犯错误不可。今后一定要划清阶级界限，照着党的阶级路线

办事。”从这以后，孟耀吉大有进步，遇事主动找贫农下中农商量。他说：“只要多和贫农下中农商量，常请贫农下中农指点，就走不错路；万一走错了，也能早点改正过来。”

马村大队第十一生产队的贫农下中农主动地监督和帮助干部，把错误纠正在刚刚露头的时候。这是值得表扬的。

这篇报道的时代背景是1964年，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因此旁边还配有草垛下斗地主的图片。不过贫农下中农都戴着工作帽，显得衣冠楚楚，而地主却一身补丁棉袄，像是大家共同的长工。我想，土地改革已过去十几年头，再顽固不化的敌人也气息奄奄了，更别提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村地主婆。可假想的阶级斗争仍然没有弱化，送几个粽子也成了“阴谋”，还上了官方最高级别的宣传喉舌《人民日报》——这就意味着地主的铁案永世不得翻了。

共产党就是做土匪起家的，我采访过自称“职业革命家”的何家栋先生，据他回忆，30年代初期，红25军曾把他家征用为临时监狱，将做小买卖的，农忙时雇工的，总之，家境稍富一点的都当作“土豪劣绅”关起来，倒吊，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整天搞得鬼哭狼嚎，其目的是“榨些油水”。这跟山匪绑票是一种性质，因为红军当时没有自己发行钞票的能力，所以“打土豪，分田地”成了扩充军费的主要手段之一——直到夺取政权以后，煽动仇富的惯性就蔓延为大规模的国家迫害，并且一直持续了30年。理论家胡平在《谁来写中国地富调查？》一文中披露，在土改期间死于非命的地富分

子至少有200多万，而被划为地富成分的总人数超过2000万。

我虽然是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可也受过株连，因为爷爷是地主，所以我在文革中跟父亲下放到某地农村，就近上一所小学时，就被老师强迫在“家庭出身”一栏填上“地主”，还因此被剥夺参加红小兵的权利。当我解释说，我爸爸是人民教师，我也该出身于“教师家庭”……额头上竟被戳了一食指：“地主的儿子当了教师，就不是地主了？你就不是地主的孙子了？”

至今我还记得一个孩子强忍泪水，张口结舌的情景。但又能怎样？我的爷爷和爸爸都死了，包括这个不幸上了《人民日报》，成了阶级斗争活靶子的地主婆，恐怕也没等到揭帽，就已作古了——我这个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今夜碰巧读到了有关她的旧报，徒劳地辛酸着，而她的后人呢，又在何方？是否保存了这张旧报，以及一段荒唐的历史？

教堂外的鸡叫了，旁边的孙医生喃喃嘀咕了一句梦话。我记起还要起个大早，翻山越岭去另一个彝族山寨寻访，就迭起旧报，熄灯宽衣。刚躺下，腰间一阵猛烈的刺痒。估计是跳蚤，狠挠了几把，也懒得顾它了。倦意袭来，人就如瘫痪一般，感觉中只打了一个盹，身体就剧烈摇摆起来，原来是孙医生在催起床了。我瞪着一双眼，却仍在做梦。“洗个冷水脸就清醒了，”孙医生说。

与地主女儿同行

2005 年的最后一日，我和孙医生赶早起床，出了教堂，高楼遮蔽的街面一片昏暗。我们在冷水管前匆匆洗漱，教会的卫生员李世珍早已候在一边，今天由她充当我们的向导。

6 点 40 分，我们用罢简单的早餐，从小吃店钻出来，向郊野走去。夹杂着卡卡电流声的劣质高音喇叭一直弥漫着，《东方红》《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社会主义的三朝皇帝赞颂完毕，《新闻联播》才粉墨登场。孙医生叹息道："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在形式上反了 100 多年的封建，可眼下，独裁者的阴魂依然不散。"李世珍却灿然一笑："这儿的人几十年如一日，天天听免费广播，耳朵都起老茧了。"我说："毛邓江都全了，尚缺当朝皇帝胡的马屁歌，估计过两年会添上吧。不过，这氛围令人回到了童年，我随爸爸下放在一个叫柏梓的乡场，那儿的高音喇叭也是每早 6 点，必播《东方红》。"孙医生说："这不是扰民吗？依照法律，大家

有权要求精神损失赔偿。”我摇头道：“这些陈年老帐和土地改革一样，没法算。孙医生你看过电影《告别列宁》吗？或许某一天中国的柏林墙突然倒了，我们这些在专制之下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还觉得不适应呢——没有敌人没有方向，也就没有因此被激发出来的悲壮和荣耀。我们将在平庸中虚度光阴，最多只能杵着拐杖，在旧政权留下的遗址周围回忆、感叹，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将令你流泪——原来专制播下的种子已经在自己体内扎根了，每一种过去叫人受不了的东西眼下都牵扯着你的神经。”

闲扯之间，头脑清醒了许多。紧贴小镇的是圆馒头一般向高处起伏的红土坡，我们爬了十几分钟，《新闻联播》就销声踪迹了。回头眺望，我这个著名的懒觉大王终于欣赏到天色初开。对面的群峰如一些牙齿，在开口咀嚼之际，将一团青色的泡沫吐了出来；接着，泡沫在蔓延中变淡了，化作薄雾，沉入弯弯曲曲的山脚。组成则黑的 3 个村落在薄雾的笼罩下，宛如世外桃源；再接着，一丝腥红在微微摇荡的天幕中央浮现，像是两瓣肉红色的山体留下的唇印。我不禁掏出相机，可只拍了两张，电量不足的红点就出来了，该死，我昨晚竟忘了充电！

继续赶路，穿过一片矮树林与灌木相间的地带，坡度突然陡了起来。此刻再回头一瞥，我们就如 3 只蚂蚁，跨在巨大的沙发椅的靠背顶端，下面的一切都深不可测。只能向上，汗水出来了，我和孙医生开始宽衣；而我们的向导却连帽子也没揭——这是一位比我小 10 岁的妇女，浓密的黑发都压在旧军帽的舌头下，她的双颊充盈着山地人特有的赧红，而笑

容很美丽，有一种不易觉察的高贵。当我们横七竖八地爬过一道又一道坳口，气喘吁吁之际，我顾不上与她搭话；直到1个多小时以后，我们越过两排城墙般的天然巨石，眼前豁然开朗。

我们来到陡坡间的打车村

挥袖抹把汗，步履在广大的山顶平川上从容起来。田野和稀稀落落的房顶铺满一层白，而红色的土路，如镶了两道曲曲弯弯的雪花边儿，将人的心情勾得美滋滋的。于是我凑拢向导找话，先问这山顶村庄叫啥？她回答："鲁嘎，是个彝族村。"我顺势又问："那你也是彝族人？"她回答："是啰，可不是则黑这边的人。""嫁过来的？""嫁过来十几年，女儿都读小学了。"接着，她反问我是否去过轿子雪山？我记起在来的路上，远远看见一座顶端平展的积雪的山峰，当时我把它想象成来自天国的白围巾，在我的脖子之外绕行着。我还记得雪峰之畔的小红点，孙医生说那是十字架。

大约是我的脸部表情鼓励了她，这个比较年轻的母亲开始讲述她家族的故事：

“我于1968年出生在轿子雪山背面的凳子山乡，海拔比这儿高得多。听父母讲，西方的两位传教士在20世纪30年代就把福音带去了，还建立了教堂。他们在村子里一住好多年，风闻日本鬼子要从缅甸打过来，他们也没跑；可共产党来了，要解放，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他们就不得不撤离。”

“这是一对夫妻吗？”我问。

“是。”

“他们有孩子吗？”

“晓不得。哦，我忘了，那男的没住不久，就得了重感冒，死了。那个时候，那么高的地方，一感冒就得死。现在看来，可能是不太习惯凳子山的气候，大半年见雪，一年四季都得穿棉袄。女的脂肪厚些，活了下来，还在丈夫的墓前建了两三层楼高的教堂。由于她的坚持，整个村子都信了主，山脚村里的人也赶来听福音，我们家族也不例外。”

“观察你的言谈举止，你的家庭教育应该不错的。”

“我的祖上靠贩牛起家，我的老爹（祖父）继承家业，由于精明强干，又大大地发展了一番，成为方圆几十里的养牛大户。但是在解放前夕，由于社会情况复杂，国民党、共产党、彝汉地方势力的纠缠不清，土匪就猖獗起来。不仅拦路抢，甚至也结伙来村子里杀人越货。有一次，20几个悍匪骑着高头大马进村，先一阵乱枪，把大伙都吓得躲在家里不敢出门，然后几声呼哨，直奔我们家，团团围住了大院，架上了柴草，再喊话威胁，要一家老小都举着手出来，或者先将金银财宝扔出来，否则就斩草除根。老爹的脾气倔强，指

挥家人用鸟枪抵抗，但几分钟就叫土匪的洋枪压了下去。土匪被惹毛了，在墙外放火，再以原木桩子撞门，一下子就涌了进来。那时，我们家院子很大，关了上百头牛，所以土匪虽然破了门，可还是叫密密匝匝的牛给拦住了。牛群叫烟火一熏，炸了营，牛角将土匪骑的马挑伤了两匹。土匪更毛了，一边开枪，一边指名点姓，要老爹出头，换全家 20 几口的命。老爹不怕死，先暗中安排家人从地道逃跑，然后站上 2 楼平台出头。红了眼的土匪根本不讲信用，隔着牛群，枪炮齐发，据说老爹中了几十弹，像个马蜂窝，从头到脚都打烂了。土匪把我们家洗劫一空，老爹那血肉模糊的尸体还被吊在全村最高的柱子上，示众几个小时。待土匪走后，才叫同村人放下来。

“我爸爸说，他没来得及从地道逃跑，就急中生智，埋腰钻入牛肚子。他在比森林还密的牛腿里爬来爬去，那些懂人性的畜生竟没踩过他一蹄。土匪有的马上，有的马下，提着冒烟的枪管四处瞅，也没找到他。当天擦黑，他鬼一般从牛肚子里爬出来，大喊救命时，路过的人几乎认不出他是谁了。”

“后来呢？”

“后来就解放了，我家虽然伤了元气，但与同村大多数相比，还算大户，因此被划为地主。被土匪烧一遍抢一遍的家，又在 1950 到 1952 年的土改中被抄了许多遍。最后全家人还扫地出门。他们将我爸爸抓到乡里，关起来严刑拷打，几十天后，公审公判，我爸爸判了 13 年有期徒刑。”

“什么罪名？”

“恶霸地主。”

“哪个法院判的？有《判决书》吗？”

“没有法院，也没有《判决书》。那个时候判刑，甚至枪毙人，都由工作组说了算。”

“工作组算哪一级？”

“晓不得。只要两三个贫雇农向工作组检举谁，谁就倒霉了。在那种大形势下，也不敢申辩。”

“你出生得较晚，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能去凳子山拜访你爸爸吗？”

“他已经去世了。”

“哪一年？”

“1979 年。”

“就是共产党为全国 400 多万地富分子揭帽的时候？”

“爸爸他没熬到揭帽就去世了，当时我还不满 11 岁。临终前，他几乎成了一把枯柴，出气进气，浑身皮肤都如扯风箱一般大鼓大瘪。我们三兄妹被妈妈叫到床边，让他一个一个地摸索手和脸。那个凉那个抖啊，特别是那对眼珠子，定定地落在我们身上，像要从眼眶里爆出来……”

“他给你们留下什么遗言？”

“没有遗言。他啥也说不出，就那么瞪着眼珠子，让人心里发毛。我只好低下头，可妈妈说，好好看着你们爸爸，他也算个读书人啊，在旧社会，你们老爹就送他读完了初中。他一直想当个教师，为家乡做一点贡献，但阶级成分把他给限制死了，还连累你们不能升学，你们可不能怪他，都是时代的原因啰。

“爸爸他听妈妈这么讲，两颗胡豆大的泪珠坠了下来。妈妈忙替他擦了，又说，老汉啊，你放心啰，你的后代不会是文盲嘛。毛主席死了，邓小平上台，形势总会一天比一天好。这也相当于改朝换代，说不定以后地主子女不仅能读中学，还能读大学啰。”

“你们家有大学生？”

“我读完了中学，三兄妹里数我文化最高。但家族的香火不能断，我会培养我的下一代，让他们上大学。我爸爸 50 多岁就死了，差那么一点点，他就能亲身经历地富分子揭帽了，虽然这不是平反，也没有一文钱的补偿，但对我们这种要求不高的家庭，这就相当于解放了。”

“真是终身遗憾。”

“爸爸他劳改了 13 年，在煤矿，每天要挖十几个小时的煤，真是暗无天日啊。我太小，不可能晓得那种日子怎么熬，连妈妈也不是太清楚，因为爸爸不愿意提。劳改期满他只多留了两三年场，就回家了。因为劳累过度，得了硅肺病，丧失劳动力了。

“一个废人叫送了回来，放在生产队也干不了农活。幸好爸爸他还有文化，到了文革后期，阶级斗争也搞疲了，队里干部就瞒着公社，把他弄去教村小。教书虽不是干农活，可比农活更费心思。爸爸说，黄土都埋到下巴了，才做上了自己喜欢的事儿，所以得争分夺秒，为家乡多培养几株文化的苗子……

“就这样拼了几年老命，人就差不多油尽灯枯了……”

“按目前的标准，这样的地主可以评教育战线的劳动模

范。”

“许多当年斗争过他的贫雇农的子女都做过他的学生，有些还升到县里读中学，听说还有去昆明读书的。”

“听口气，你还是有遗憾。”

“我们家没出过你这样的文人，这就是最大的遗憾。我是教会的卫生员，按主的旨意，在缺医少药的农村服务，也不错；可我这辈人没有能力，将家族的血泪史写出来。”

“你们可以写啊，不用担心写不好。就按编年的方法，1949，1950，1951，1952，一直记下去，到你父亲去世，地主揭帽，哪一年发生了什么事，尽可能地详细。不用添枝加叶，也不用像个多愁善感的文人，加入那么多文采、观点、议论。只要有心，只要懂得记叙文体，小学生都能做这种事。”

“许多事说说可以，下笔就不太容易。”

“试试吧，你们有家谱吗？先整理一番。”

“小时候听爸爸说，祖上曾传下来一厚本牛皮家谱，土改时，把它埋在地下，后来又经历了一次次政治运动，最终在文革期间掘出来烧了。因为一旦被查出来，就会成为企图复辟的变天帐，弄得全家遭殃。”

“太可惜！如果中国每家都有变天帐该多好，那将构成一部丰富的民间史，令官方的所谓正史化作废纸一堆。”

山顶平地如人类的记忆继续延伸着，但有关地主女儿李世珍的家史却在下坡之际中止了。因为她抠了几次脑门，也寻思不出更多的细节。我记住了她爸爸的名字——李光裕，并且暗祷上苍，让多一些土改受害者的名字被记录下来。孙

医生说，其实少数民族，特别是彝族，都有保存家谱或家史的传统，可经过共产党这几十年的政治洗礼，这个传统叫彻底毁坏了。

心情莫名的沉重，我不禁回头望瞭望那高处的十字架，还有正好闪耀其中的露出云端的太阳。向导说，这山顶村庄鲁嘎全都信主，连党支部书记也信，所以治安秩序也最好。

下坡的路又滑又陡，并且在密林中盘桓了一长段。我们踩着泥泞，与叮叮当当的骡子队伍擦肩而过了几次，精瘦的赶骡人一再冲我们微笑。大约 9 点锺，我们挟带着若干泥星子从山顶落到一条红泥盘山公路旁，再穿过公路，往更深的渊底俯冲。由于脚掌在小道上刹不住车，我和孙医生的屁股都亲吻了几次地面。而在另两条与这边平行的坡道间，彝族农夫们吆着骡子，悠闲地上下穿梭。

“这坡至少有 60 度，”我一前一后蹬着腿喘息道，“累死人了。”

“过了这打车村，再往里走，就是金沙江。”向导说，“那坡还要陡，江风刮过来，人都站不住。但是彝族人还要在上面开荒种洋芋呢。”

我打了一个寒战，忙问：“我们要拜访的人在那儿吗？”

向导摇摇头，笑了起来。远处，日头将裸露的万丈峭岩烤得通红，大团大团的蒸气向上弥漫，而金沙江在锅底咆哮着，一边一半划开了云南和四川。

爬上这座红土坡，天色刚亮，回望则黑，恍若梦中

贫农李正才

前奏

现在是 2005 年最后一日的上午 9 点 30 分，我们一行三人，进入了这个名叫“打车”的彝族村寨。羊肠坡道迂回在陡峭的山势之间，在每一个岔路口，都聚着一些村民、骡子和狗。彝族人无论在哪儿，都习惯蹲在地上，所以远远看去，像歇在坡坎上的黑糊糊的鹰鹫。我们的向导用彝语沿途打招呼，还不时刹步，笑嘻嘻地与衔着烟杆的“鹰鹫”们聊几句。不知不觉，孩子和狗就在我们屁股后牵了一长串，我不禁叹息道：“环境如此恶劣，人居然过得如此悠闲。”向导摇头道：“土地太贫瘠，下种再勤，不一定能收获好庄稼嘛。”“哪咋办？”“吃不饱穿不暖，就偷就抢就杀啰。”

我的头皮一阵发麻，孙医生又解释道：“这儿从古至今，民风都无比强悍，动不动就拔刀子。前两年，还有抢亲的陋

习，不仅到别的村子抢，自己村里也互相抢，也不管女人愿不愿意。这两年基督教传得开了，信主的多起来，人心才慢慢变得善良，小偷小摸还是有的，但杀人案件几乎绝迹了。”

向导也附和道：“对啰，没有教会，我可没这个胆子带外乡人来！这一带彝人的眼光特别凶，莫说抢，就是不转眼地死盯着，也够你心里发毛的。”

太阳沿着峭壁继续上升，可蜷伏的金沙江还在脚底，那种波涛的深呼吸不时窜过耳，令人的神经隐隐颤动。我信口一问：“那儿是？”向导也信口答道：“与打车村接壤的，是黄草坪村，它在金沙江和普渡河的交叉处；而过了金沙江，则是四川大凉山的会东县。当年红军长征，被国民党围追堵截，就从这不毛之地过江，窜去四川，皎平渡口现在成为革命遗址，很著名，离这儿不过十几里路。”

“那两省人民来往挺容易。”

“是啰，金沙江两边的场口数不清，土匪也数不清啰。刚解放那阵，毙了好几百，局面才平稳下来。”

由于交谈分神，我又屁股着地了。孙医生拉我起来，安慰说快到了。的确，绕过了一块弯曲的庄稼地，眼前出现了一堵依坡坎而建的赭红石墙。我们从墙根边爬到墙头，自旁门进入院落，一个戴军用棉帽的焉巴老头倚柱而立，用无比愁苦的眼神打量着不速之客。向导为彼此作了介绍，老头就热情地邀我们进屋。

我口头答应着，但双脚却迟疑，目光习惯性地乱溜。此时我站在赭红石墙之上，望着天边的群岩与云雾纠缠，犹如锁在时间深处的变形的古兽，时而露头，时而露爪，时而将

爬上环形山巅，还能隐隐感觉到金沙江在锅底咆哮

新了几十年的中国还是旧面貌

尾巴凌空扬起，于是明镜般的天顶被破开一道裂纹……

孙医生与我并肩而立，目光却朝下，死盯着石墙根的猪和鸡，它们都被圈定在脚下两人深的露天囚笼底。浊臭一阵阵升腾，不仅熏退了我们，还提醒此行的目标——他还是一

脸愁苦，在门后袖手等待。我连忙道歉，跟着跨入门坎，在一派昏暗里坐了下去。

简单的寒暄之后，我乘老头埋腰地坑，呼呼吹木炭余烬之际，掏出录音机放在膝上。

正文

老威：你是地主吗？

李正才：不，我是贫农。

老威：贫农？

李正才：是啰，1952 年土地改革，是根据我们家当时的情况，划的阶级成分。

老威：你们家一直是穷人吗？孙医生经常来这一带，据他了解，你的身世非常悲惨。

李正才：都过去好多年啰。

老威：我是写书的，你不想留个记录下来？

李正才：莫提了。

老威：你信主吧？

李正才：信，如果没信，我只有去死。

老威：为什么？

李正才：你看见了，解放几十年了，我们家还是破破烂烂，没一个女人。父母去得太早，剩我一个孤儿，好不容易托人介绍，当了上门女婿，可老婆又饿死了；把儿子丢给我，一把屎一把尿，好不容易拉扯大；为了娶儿媳妇，我耗光全部的积蓄，原以为可以勤劳致富，打翻身仗了……可三个月

前，媳妇又得病死了，活鲜鲜一个人，突然得病，几个钟头就不行了，连得了啥病都晓不得！丢下一个还在吃奶的孙娃儿，一门三根光棍，哪个来疼哪个来怜……日子还长啰，我又得了寒湿，浑身不自在，不信主咋得了……

老威：唉，老人家你别难过了。

李正才：呜呜呜。

老威：人活的就是精神，你现在信主了，有精神支撑了。

李正才：我天天都祷告，为我的儿子，为我的孙子。也为我自己早日解脱，去天国见主。我晓得，我没有，也拿不出啥去荣耀主。我只是在赎罪，我恳求主将所有的罪加在我的身上，包括我爸爸和妈妈，包括我老爹和奶奶。我1937年生，同志你看，这是我的《身份证》，我们家出事的那年，我才11岁……

老威：1949年？

李正才：记不太清了。那年的冬天，也像这样的天气，一会儿阴一会儿阳。爸爸天不见亮就起床，在院坝里抬头望瞭望，然后对妈妈说，有星星啰，是个晴天。妈妈就说，那就早点出门去赶街嘛。当时在金沙江两边，有一二十个场口，父母心情好，就商量着要去赶河木口。

老威：河木口？

李正才：是金沙江与普渡河交叉的一个场口，属于云南东川，江对面是四川会东。那天爸爸妈妈带上我们三弟兄，高高兴兴上路。开始还点着火把引道，爸爸在前，妈妈背着5个月大的小弟在后，我和比我小 1 岁的二弟在中间，一个牵着一个的衣角，在羊肠小道上旋来旋去，后来天麻麻亮了，

爸爸才熄了火把。

我爸爸个子很高大，比现在的我还高半个脑壳，膀子很粗。据村里人说，在我还没出世的时候，爸爸曾乘着酒兴，与一头大牯牛扳角，大牯牛红了眼，拼命要将他挑起，他就用那两条粗膀子，死死地压。太惊险了，如果压不住，让牛头翻起来，他的胸脯肯定叫牛角戳穿，牛蹄也要跟着上，那人不成肉饼也成肉酱。但是爸爸他压了十几分钟，硬是把大牯牛给压跪了，最后猛一扳，大牯牛就四蹄朝天仰在那儿。这次比赛，我们家赢了一座院子。

老威：你们的家境在那时还算不错吧？

李正才：日子过得去。可爸爸他酒量大，脾气坏，喜欢赌博，所以在金沙江两边的场口来来去去，暗中结了一些冤家。妈妈挺担心的，但爸爸说自己人正影子正，不太在乎。所以出事的那天早上，爸爸嫌娃娃们步子慢，还扛着我和二弟走了几里路，直到望得见场口，才放下地。

老威：看来你爸爸心情很好。

李正才：他沿途都在吼山歌，说山歌能将蛇和野兽吓跑。坡下完了，金沙江水的味道都能嗅到了，平地突然起了一阵怪风，从脚底下往上翻着吹，我和哥哥站不住，急忙抱住爸爸的腰。眨眼间，刚刚露面的日头被裹进云里，雨点劈劈啪啪打下来。这就是大江边的气候，比娃娃脸还变得快。妈妈说，这不是好兆头，当家的你可得当心点啰，国民党共产党打来打去，云南四川的土匪也两边抢。日子不太平，我们最好是早去早回。爸爸说，没事，拢了场口，自然要找老相识，摇几把骰子，碰一下运气。妈妈问爸爸到底带了多少钱？爸

爸嘿嘿笑了两声，妈妈就不吭气了。我却感觉到爸爸的腰里鼓出一大包，估计都是银元。

老威：你爸爸是老赌徒了。

李正才：那年他才 36 岁，一点不老。况且世世代代，只要是彝族男人，就没有不赌的。软赌硬赌，穷也赌富也赌，天晴赌天阴也赌。如果手气不顺，或叫人做了手脚，赌毛了，就你一刀我一刀，在手臂上肚皮上划；甚至你一头我一头撞桌子撞墙。女人家根本不敢发杂音，因为男人一旦输了，面子下不来，就打老婆，打孩子，气再不顺，就把老婆孩子当宝给押了。

老威：你爸爸不至于这么疯吧？

李正才：爸爸他不疯，因为上有老下有小，他在中间是顶梁柱。他脾气虽然坏，却有老爹和奶奶管着，出门之前，都让他将裤档、衣服抖了又抖，把多的钱留下来。

老威：他还算个孝子。

李正才：那次出门却是个例外，他乘老人家还没起床，比平时多带了一两倍的钱。他对妈妈说，局势不太稳当，谁晓得明天会咋样，所以要多赚一些银元在手上。那时，河木口的黑赌场很有名，明的暗的，稍微有点背景的人家都设局。爸爸他拢了河木口，领着我们，马马虎虎赶了一个来回的街，然后将一把零票塞给妈妈，吩咐说，买几斤盐巴，扯几尺布，再给娃娃们买点糖果果。妈妈还想说啥子，爸爸就摆摆手，像根粗泥鳅，在人流中钻不见了。“才 9 点多锺，慌啥子啰。”妈妈嘀咕着，只好把我和二弟拽到阶沿边，放下背兜，给小弟喂奶。

那时一会儿太阳一会儿雨，场口旁边的金沙江也一会儿明一会儿暗。妈妈买了盐巴，扯了布，又带我们在鸡肠子一样的街上挤了好多个来回。饿了，糖果果填不饱肚子，妈妈又在街边大灶给我们买了两碗热腾腾的烧肥肠，我和二弟吃得满头大汗。

过了正午，赶街的人就少了一大半，从前的话，要到偏下午人才会少。妈妈连连叹气，不太平啊，不太平啊。就带着我们挨家挨户地找爸爸，却越急越不见人影。终于，百多米长的街面空了，店铺也接二连三地关门，稀稀拉拉的人，

猫在眺望我们

稀稀拉拉的雨。妈妈抬头瞅了瞅天色说，快 4 点锺了，你们先到渡口去等着。我问，妈妈你呢？

妈妈不回答，接着又不耐烦地催促，娃娃家莫管大人的事，快去快去！

我和二弟几步一回头，妈妈留在场口，继续打听爸爸的下落。去渡口还有一段路，我们走了 20 几分钟，还眼巴巴地望着渡船来回了好几趟。太阳依旧时隐时现，金沙江笼罩在一片雾气之中，虽然我们是娃娃，心也提在喉咙里，那滚滚

的江水更叫人发愁。船老大吼了几次，两个娃儿，过不过？再不过，就过不去啰。这年头，兵多匪也多，当心遭抢哦。我说，谢谢船老大，我们不去四川那边。

我们盼呀盼呀，父母到底赶来了，可神色很慌张。拢了跟前也没二话，爸爸一手拽起一个娃儿就跑起来。就这样，一家四口沿着普渡河边跑了两三里路，才刹步歇气。妈妈边给小弟喂奶边说，当家的你咋去那种地方啊？爸爸说，我钻了十几个窝子，都赌纸票，唉，纸票天天贬值，弄不好明天解放军打来，就成废纸了。我总得找一个赌银元的去处。妈妈说，那些人太凶神恶煞，我一探脑壳进去，刀子就拢下巴了。爸爸说，一个妇道人家，乱钻个啥？不懂门道不懂规矩。妈妈说，你是顶梁柱，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爸爸说，有个三长两短你又能咋样？妈妈就哭了起来。爸爸说，好啰，嚎啥子丧嘛。不是我不想走，是人家不让走，我赢了钱啰。甲乙丙丁方下的赌注都大，我的骰子一甩，连着两个清一色，外加一个最大点，不到半个钟头，包包就鼓得不行了。接下来，庄家搞联合，要让我吐渣，熬得昏天黑地，俗话说，输家不开口，赢家不准走嘛。我故意吐了些小钱，还打躬作揖，口称得罪，因为终归是要走的。放心啰，我的胆子肥，气力大，狗日的再有背景，还虚火我几分。你都看见了，我说声告辞，哪个敢拦我？

扯着闲话，父母又领我们赶了一截路，天就黑尽了。我们在河边的岩洞里歇了一晚，又冷又饿，却不敢生火。天亮时吃了点干粮，准备继续走。爸爸口渴了，就钻出岩洞，趴到河边饮水。他的整张脸都埋入水里，一家人站在后面等他。

爸爸食量大，喝水也多，我还看见他的后脑勺腾腾冒热气。这一刻，我真是终身难忘！因为嗖的一响，一颗子弹从我们头顶射下来，击中了爸爸的背心。血如箭一般喷出，爸爸浑身猛抽了两下，一只手臂抬起来，划了个半圆，又哗的落到水面。

血随着河水淌了好远，我们都惊呆了。好像变魔术，转眼从大树顶，从石头后，甚至从河中的礁石缝里，钻出了 10 来个包黑头帕的土匪，有的端枪有的举刀，哇哇叫着包抄过来。爸爸又挨了十几枪，腰里的银元包裹被搜去。有个土匪开枪打断了妈妈的腿，当他还要补枪时，脸上有条刀疤的土匪头吼了声“莫浪费弹药”，就上来卡住妈妈的脖子，在她的前胸后背戳了一二十刀。二弟也被戳了一二十刀。鲜血把菜刀地面全染透了。

老威：什么？

李正才：菜刀是一个地名，遍地乱石头，连根草也不长。估计河木口设赌局的本来就是土匪，或者勾结土匪，经常干赌得赢就赌，赌不赢就抢的勾当。他们撂翻我爸爸，剩下的就好解决了。

老威：那你是如何逃脱的？

李正才：我才十一二岁，都骇得尿裤子了，哪敢跑？全家人都躺在地上，血淋淋的。妈妈太惨了，身上那么多洞，还没断气，手还去抓背兜里的小弟。我的小弟啥也不懂哦，哇哇哇，一抽一抽的哭。土匪头过来，嫌我妈妈的手碍事，挥刀一砍，妈妈的手就飞到河里，一浪一浪飘远了。

老威：他们连吃奶的娃娃也不放过？

我与悲苦的父子合影

李正才：他们没杀小弟，只是掀翻背兜，像倒一麻袋洋芋似的，将他倒在妈妈身上。小弟在妈妈周围又爬又哭又抓，一会儿也染成血娃娃了，他啥也晓不得，还在找奶吃啰。听人说，小弟熬到第二天才死的，晓不得是饿还是冷，到死嘴都张着，脸上的泪都冻住了。

土匪嫌背兜底有奶娃儿的稀屎，就放河里漂洗。土匪头还叫我过去，当着我的面，从屁股后抽出一把小刀，在鹅卵石上磨了磨，就一点一点，很仔细地割我爸爸的脑袋。他割了十几分钟，终于自脖子根，整整齐齐地割了下来。这时候，爸爸脑袋里的血已流尽了，看上去白惨惨的。土匪头捞出背兜，将手中提着的脑袋丢进去，然后命令我“背起来走”！

我眼前一片空白，屎尿拉了一裤裆，却啥也晓不得。土匪头吐了口唾沫，将爸爸的无头尸体蹬入水中，顺势踹了我一脚，小杂种，等死么，背起来走！

我打了个寒战，只好背起爸爸的脑袋。土匪们牵出骡子和马，都骑上去，只剩我一个小娃娃在地上走。天还是时阴时阳，爬坡的时候，我的鞋子脱了一只，要埋腰去捡，土匪从马背上一绳子抽过来。莫办法，我就光着脚板，一拐一拐在林子里窜……

老威：你走了多久？

李正才：两天两夜啰。头天晚上歇韭菜地（地名），住的还是岩洞。土匪们栓了马，在洞里生了一堆火，就围着喝酒吃干肉；我却被捆在一边，守着我爸爸的脑袋过夜。

老威：你睡得着吗？

李正才：一个娃娃跟着骑马的土匪，拖了一整天，还有不累的？土匪丢给我一块粑粑，我几口就下肚，然后往背兜里一栽，与爸爸头抵头，睡着了。朦胧中还听见土匪们在笑我没心肝，真是一报还一报。

老威：什么“一报还一报”？

李正才：当时我也不懂啰。后来听说，在一年前赶街时，算命先生就给我家拿过脉，料定有血光之灾。我爸爸问咋个消解？算命先生提醒说，少赌博，少得罪大户啰。不要怕穷，熬到江山改了，你家就转运了。

老威：后来呢？

李正才：后来天蒙蒙亮了，土匪又揪我起来，背着爸爸的脑袋走了一整天。

老威：你这一路上害怕吗？

李正才：我害怕走不动，土匪要打我。但是人再咋个卖力，也撵不赢骡子和马，所以差点就被累死了。当然，我恨土匪，做梦都想报仇，可当时没啥子办法，为了活命，是泡屎也要吃。终于走到撒营盘和则黑交界的一个地方，天晚了，又下起了毛毛细雨，土匪们就在林子里燃起一堆篝火，准备安营扎寨。这回他们没把爸爸的脑袋与我弄一块，而是高挂在一棵大树上。在篝火的映照中，爸爸的脸很白，两颗眼珠子挺出来了。

我虽然是小娃娃，可也感觉到快到尽头了。我的寒毛都竖了起来，因为那一个个土匪面露凶光，搞不清楚他们如何对待我。放回家，还是杀掉？腿发软，跑不动，也不敢跑，所以最后只有打哆嗦的份——饿也忘了，土匪给的粑粑也咽不下。

老威：像圈在笼子里的待宰的动物。

李正才：差不多，像猴子、猪、狗一类，看见周围的同类被杀掉，连气都不敢出粗了。土匪们还拿我开玩笑，说娃儿啰，你爸爸的脑壳挂在树杈头，看得清哦？想不想给他喂口饭？还说，你咋个不哭啰？都绝户了，还不哭，是不是骇成傻子了？

那两天，我莫说哭，连屁也不敢放啰。直到翻过这个坎，我才哭了很多场。后来，回想一辈子这么苦，我有流不完的泪啰。

老威：可你还是活下来了。

李正才：多亏杨区长和张乡长赶来了。当时，土匪用绳

子的一头绑住我，将另一头甩上树叉，然后一拉，我就腾空起来，与爸爸的脑袋一般齐了。土匪们在下面手舞足蹈，还边看边指挥拉绳的家伙，再高些，太高了。你这蠢驴，往右拉，让娃娃往左靠，死活两颗脑壳就挨着啰。

我与爸爸脸贴脸，如贴着一块冰。土匪们仰着脖子爆笑，看这个双头怪物嘛！那片大林子里的乌鸦被惊得噗啦啦地飞。土匪头还掏出匣子枪，哗啦啦地弄扳机，吓得我双腿猛蹬，却落不了实。正晓不得土匪到底要干啥子，那边，区和乡的保安队都出动了，几十个人在林中悄悄围拢，把土匪包抄住。突然，有个声音喊道——山贼们听着！马上放下武器，原地不动！谁动谁死！

眨眼间，天地都不出气了。静了几秒钟，土匪头回了一句，你是啥子人？那个声音又响了——我是永山区（撒营盘）区长杨心林，这位是永安乡（则黑）乡长张应心。你们吃了老虎胆，敢抗拒官府啰？

土匪们立刻魂飞魄散，稀里哗啦地缴械。杨区长从黑影子里现身了，个子很高大，他叫人放我下地，一松绑，我就软在火堆边。杨区长又让人拍醒我，喂我喝的吃的。跟着，派人连夜送我回家。

老威：那时的官府怎样处理土匪的？

李正才：他们当场没收了土匪的武器、骡子、马，还有抢来的金银财宝，接着就绑起来押回则黑了。我那时太小，加上遇这种顶破天的事，都蒙了，所以晓不得土匪们的下落。

回到家中，才晓得老爹和奶奶都卧床不起，没几天，他们全气死了。奶奶落气时，把死在她前面的亲人都挨个喊了

一遍，最后说“我也来了”。

如果我懂事，说不定也不想活了，可我只有十一二岁，只能傻子一般往下活。如今我69岁了，爸爸那被割掉的脑袋还经常出现在梦里，我拜祭他，给他烧了数不清的纸钱，也不管用。那脑袋毛毛的，白白的，在我身上滚来滚去，永远也甩不掉。

老威：你感激解救你的杨区长和张乡长吗？

李正才：在旧社会，他们是官府，应该保一方平安；到了新社会，他们成了恶霸大地主，成了罪人，叫人民政府枪毙掉——我是贫农，要与他们划清界限，即使心里同情，表面上也要做出苦大仇深的样子。

老威：我昨天刚拜访了杨区长的遗孀，已84岁的张美芝老人。她说她也永远甩不掉被割掉舌头的丈夫与哥哥。

李正才：她的确吃过太多苦头，与我一样，能活到今天不容易啰。愿主降福予她。

老威：也愿主降福予你。

补记

李正才在交谈中多次哭诉自己解放后的不幸遭遇，比如孤苦伶仃，做上门女婿，饥饿，老婆死后拉扯儿子，几个月前儿媳妇突然夭折，等等。其间，他瘦小的儿子回家了，还抱着更加瘦小的孙子。三根光棍靠一块，李正才最高，他儿子要矮半个头，他孙子的生长期就长了。冥冥中，我仿佛看见李正才的爸爸，膀阔腰圆，比在场的所有人都高——这种

倒退着的遗传似乎暗合了拉丁美洲魔幻小说《百年孤独》里的结尾，庞大的布恩地亚家族经过上百年演变，最后只剩下一个耗尽了繁殖能力的长猪尾巴的婴儿。

那是在遥远的亚马孙河边兴衰的家族，而我眼前则是长江上游的金沙江边的一个彝族家庭，但两边的故事可以互相

家徒四壁，还杀鸡给我们吃

置换——割头、砍手、赌博、绑架、改朝换代、因果报应、祷告——某种注定的灾难的力量涵盖或扭曲了那时那刻或此时此刻。我问，不是已经解放了吗？经历过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你成了贫农，新政权的依靠物件了。李正才立即反驳，啥子解放啰，比没解放还穷还坏。我是贫雇农，好些在旧社会当过土匪的也是贫雇农；在江两岸场口赌博，输得倾家荡产的也成了贫雇农。地主斗久了，没啥子可斗的了，就贫下中农之间互相争互相斗啰。人懒土地也懒，没得吃，一样地偷抢杀。

我们的向导见李正才情绪激动，就接过话题道，这儿不比汉族地方，地主的财产是靠几辈人积攒，有时也存在剥削。

彝族地主特别惨，因为他们曾经是金沙江两岸的赌博高手，过去赌博致富，一解放，从前的输家翻了身，就将他们往死里整。比如刚才提到的永安乡（则黑）乡长张应心，就是闻名一时的赌王，听老一辈讲，他曾与四川昭觉境内最大的财主赌骰子，搞了一天一夜，都红眼了。那个财主把自己全部的金银财宝押上，驮了20多匹马；张应心呢，不仅押了全部的财产，而且还押上一条命。他说，这一把输了他就不活了。结果对方眨眼间变成穷光蛋，大冷天单衣单裤，走路回家；张应心却变成则黑首富，乐善好施了多年，可叹不得善终。

闲聊间，不觉日已当午。李正才热情留饭，并称已杀了一只鸡。我们只好又共进了一顿基督教徒的午餐，圣歌和祷告都免不了的，但在用餐时，出于职业习惯，我还是问了不愿下山的土匪在解放后的命运。李正才说，骗啰，政府派人去谈判，保证下山后，啥事没有，该分地就分地，该讨老婆就讨老婆。等到上套了，就突然翻脸，统统枪毙。工作组长教育我们，这叫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

大家都笑了，孙医生道，这叫以土匪的办法对付土匪吧。

饭菜很香，我不好意思，就付了100元人民币，李正才的眼睛再一次湿润。在告别之际，他将我们送出相当远，然后按彝族人的习惯，一个人蹲在正在铺修的土路边，一再向渐行渐远的客人招手。我们爬了10分钟的坡，一回头，他还蹲在那儿；爬了20分钟，再回头，他还在那儿，只一颗黄豆大小。我掏出相机，将他往自己胸前拉，我后悔只与他握了手，没有使劲地抱一抱。我对我的访谈对象太克制了，长此以往，人是否就会炼成钢铁？

告过别，已翻两个土坎，猛然回头，李正才还在眺望我们

地主后代刘金琴

前奏

2006 年元旦，我在则黑乡逗留。再次拜访了地主遗孀张美芝一家，在玻璃般透明的阳光下拍了些照片。我对孙医生说，应该采访几个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从所谓的正面了解一下土改。孙医生点点头，答应等下次继续，因为这次他还要在春节期间跑好几个乡，时间比较紧张。

2 号一早，我又在晨曲《东方红》的聒噪中起床，孙医生也醒了，执意要送我赶早班车。我们在鬼火般的路灯里穿出教堂，一溜小跑，然后拥抱作别。

汽车启动了，接着又连续颠簸了两天，我回到在云南的暂居地。整个骨头架子在嘎嘎作响，而女友却有些怨声，“在花花世界呆着很爽吧？” 她控苦道。我自然以傻笑应之。

接着，为了弥合代沟，我对她讲述了一路的见闻。我知道她有 10 年乡村生活的记忆，不会如绝大多数 80 代的年轻

人，只活在当下或潮流里面，不仅对土地改革，甚至对反右、文革、六四屠杀的反应都很淡漠——目前风靡一种叫“斗地主”的扑克游戏，所以一提“地主”，人们想到的肯定是娱乐。

没料到女友的脸部竟浮现起一种与她的时代背景不太协调的沉思。她开了瓶啤酒，吹了一口，又开始数手指头。我知道她的精神强迫症犯了，其实，每一个在孤独中成长起来的孩子都有程度不同的精神强迫症，我在童年也酷爱数数，指头、蚂蚁、树枝，还有自己的汗毛。直到现在，我也与公众社会有些格格不入。

这是2006年1月4日夜，我的女友开始讲述不幸的童年及更不幸的地主的故事。由于录音机故障，我又极不人地道在5月8日和7月9日的昼夜，让她重复了两次。

她控制不住，发火了。拿鲁迅的话说，我感觉自己活在非人间。

正文

老威：你是哪一年出生？

刘金琴：1980年1月31日。我的原籍是湖北省枝江的安福寺，属宜昌、枝江、当阳三县交界的丘陵地带，物产还是比较丰富，不像你寻访过的那些狗吃屎的大山沟，穷得令人恐怖。

老威：这个种族是非常健忘的，对地主、贫农及土改的记忆，如今连40岁左右的人都已淡漠了，可你一个如此新潮

的 80 代人，居然还……

刘金琴：这跟我小时候的经历有关。我亲生父母都是城里人，至今还住在枝江。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回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到安福寺上面的刘家冲当知青，并因此与我养父成为朋友。后来，文革结束，知青返城，我父母结合，就有了我和我弟弟。但是，80 年代初，政府抓“计划生育”，挨家挨户查超生子女。宋丹丹演过一个小品，叫《超生游击队》，内容就是农民为了逃避罚款和强制坠胎，背井离乡，四处流窜，连几千里外的新疆都去了。

老威：我也看了这个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播出的小品，同全国人民一样，被宋丹丹演的农村妇女逗得哈哈大笑。过后还模仿她那土得掉渣的腔调——老三叫“吐鲁番”，老四叫“海南岛”——却没意识到那种暴力笼罩下的惨叫已被几亿人的嘲笑所淹没。

刘金琴：总之，按政策，一户人家只能生一个孩子，违者重罚。所以我两岁的时候，父母就在风声鹤唳中，把我送到乡下，过继给人家做养女。生父和养父有交情，可深浅如何我不知道。

老威：你养父家有孩子吗？

刘金琴：没有。他是条老光棍，头上只有个母亲，日子本来就非常苦，又添了我这么一张小嘴巴，就苦得没法说。我在养父家呆了 10 年，不懂得什么叫温暖，更别提宠爱了。住的是土坯房子，经常漏雨；吃就更马虎了，油炒饭，加一点鸡蛋就算锦上添花。很少有菜，乡下人都图省事，因为要忙农活。我在农村十余年，可能将一辈子的油炒饭都吃尽了，

就如你在监狱中天天吃土豆和南瓜，过后一见那种熟悉东西，就反胃。

我走路还摇摇晃晃，就要干活儿了。婆婆煮饭，我站在灶前烧火。那老人家已六、七十岁，弓着腰，一张树疙瘩脸都栽进锅里了。我这边柴草火没架好，一冒浓烟，就熏得她眼泪、鼻涕直淌，最后都坠入饭里菜里。还有半瞎的红眼睛，糊满眼屎，我至今回想起来都恶心，可当时，一个单纯小姑娘，还是觉得婆婆的饭蛮香的。

与农村孩子一样，捡柴、打猪草、捡花生、捡野菌，我什么都干，也不敢说不干。就这样，我就泥一把灰一把成长起来了，脸从来没干净过，头发虱子成堆。由于地处山坳，又是单家独户，所以性格就一天天自闭。

老威：你的精神强迫症就是这样炼成的？

刘金琴：也许吧。可能是童年的环境太脏了，所以我现在有洁癖，一见到脏东西，就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还有自言自语，还有自己强迫自己数数，1、2、3、4、5、6、7，不数就过不去，压得心脏直抽。

老威：接下来呢？

刘金琴：孩子嘛，还是怕孤独的。我要花好几分钟，才能从单家独户的哑巴环境里走出来，到村落里去。可其它孩子老是欺负我，不和我玩。

老威：你好歹是从城里落难的灰姑娘，农村孩子还嫌弃你吗？

刘金琴：所谓“刘家冲”，就是一条河冲积而成的这个村庄都姓刘，他们世世代代繁衍，有共同的家谱和宗祠，所以

从骨子里很排外。我上小学是在邻村的赵家冲，两个村的同学都经常在路上伏击我，把我推倒，往我身上糊稀泥巴。加之养父是地主家庭……

老威：我记得早在1979年，中共中央就宣布给地主和富农揭帽了，怎么到了80年代，还在搞阶级歧视？

刘金琴：不明白。我7岁上小学，语文老师还在课堂上讲，地主如何剥削，如何惨无人道，大年三十如何带着狗腿子，上贫下中农家讨债，掀房顶，抢女人，逼得人上吊等等。听得孩子们非常气愤，恨不得早生几十年，跟着共产党、解放军，亲手将地主消灭干净。直到放学回家，我还心潮澎湃，拉住婆婆的衣角问："你见过地主吗？地主为啥那么坏？"不料婆婆翻了我一眼："有啥稀奇？我们家就是地主。"当时，我犹如挨了一闷棍。婆婆又说："如果不是成分高，你大爹也不至于这么大岁数还娶不上媳妇。"我心虚地嘀咕："不可能吧？"婆婆说："有啥不可能？刘家冲有十几户地主呢。教你认字的驼背爷爷就是地主，对你最好的大妈家更是大地主。"

我真叫弄胡涂了。驼背爷爷的老伴是聋子婆婆，都是好人啊。由于路太远，中午不方便回家，养父就把我安排在学校附近的老两口家吃饭。驼背爷爷是方圆几十里最有学问的人，他给我讲故事，还教了我不少成语，什么"登高望远""冬虫夏草""月白风清"，可以说，我最早的文学基础就是他替我打下的。当我背着手，大人一般清清喉咙，在一群邋遢娃娃中间"出口成章"时，连老师都在一旁吃惊。

老威：直到现在，你说话也爱用书面语。

回归途中，浑身长满野毛

刘金琴：对呀。多年后，我还梦见自己坐在驼背爷爷和聋子婆婆中间吃饭，他们的对话在头顶上，跟打雷似的。驼背爷爷做过国民党军队的书记官，解放前夕回到家乡，本来没什么田产，可因为“历史反动”，就打成了地主。他们本来有一个儿子，可不知在哪一次政治运动中，不堪折磨，跳江自杀了。儿媳妇也改嫁了，带走了两岁的孙儿。听说这个孙儿长大后还回家看过他们两次，但那种血缘感情已相当淡漠。终于有一天，他们丧失了劳动能力，被送进地狱般的乡敬老院，没多久就死在里面。

由于太孤独，老两口把猫和鸡都当成孩子养。咯咯一唤，小鸡就会跳到他们手上来啄饭粒；那只猫已养了十几年，毛色还比较鲜亮，可见老人对它的无微不至的关爱。猫儿太通灵了，人一叫，它就喵喵答应；老人每天与它说话，喂了饭还替它擦嘴，唉。

老威：为什么叹气？

刘金琴：我想起了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觉得这些事犹如发生在几百年前，可又像发生在几个钟头前。

老威：这是你印象最深的地主吗？

刘金琴：影响我一生的地主是大妈——这是按当地的辈分叫的，她其实已经很老了。

老威：一个几岁的孩子，怎么会深入接触一个很老的地主婆呢？

刘金琴：她的学名叫张世秀，旧时代的女子都喜欢取这样的名字。我与她特别投缘。

老威：她家里有几口人？

刘金琴：她还有一个儿子和儿媳妇。她的儿媳妇被搞计划生育的人结扎了，不能生孩子，这成了她最大的心病。所以，她第一次见我这么个小不点，就感到亲，把我当作自家的孙女。

老威：她当时的家境如何？

刘金琴：住的是瓦房，比我养父家好。由于在单家独户呆不住，我从小就经常溜出来，沿着田梗去邻居大妈家。尽管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大妈还是很慷慨，时不时抓花生、豌豆、瓜子给我吃。有时怕儿子发现了要骂，就把东西揣满我的衣兜，让我赶快从后门逃走。大妈用一种植物的根搅的凉宵最好吃，长大后，我还时常想起那酸酸甜甜的味儿。

大妈的白发用油或者水，梳得光光的，衣服尽管旧，可总是十分整洁。因为屋里屋外一把手，农村妇女无论老少，在平常都有点蓬头垢面，大妈往里一站，就显得鹤立鸡群。可能是没人说话，她也不管我年幼无知，三天两头拉着我唠叨。我边吃东西，边把她的唠叨当故事听，一年两年三年，她在我耳边重复了几十遍，我不想记也牢牢地记住了。

大妈早年是方圆几十里出了名的美女，身世却跟林黛玉

差不多，幼年丧母，家道中落，不得已，她外婆就把她接到舅舅家来住。她舅舅也是大户人家，所以她跟着院里的孩子，入私塾，天天念《三字经》《女儿经》《百家姓》《千字文》，还温习唐诗宋词，操练琴棋书画，甚至涉猎算术和天文。待长大出阁，由于没母亲，父亲也长年在外，舅舅就拿着她的八字，替她作主，与刘家冲的首户结下姻缘，算是门当户对。

当时刘家冲一大半田地都是属于她婆家的。可她本可以做富家公子的丈夫却不稀罕，偏偏信奉胡适的教育救国，去做了新派的教书先生，拿着家里的钱，到更偏僻的山沟办平民学校。那是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她夫家 4 弟兄，都跑到外面去，读书，经商，参加各种思潮和运动。这有点像巴金的《家》中描述的，老爷子艰难支撑家业，差点就找不到一个中规中举的继承人。

大妈一讲起过去，昏花老眼就放光。做姑娘时，虽然足不出户，可也受进步思想的冲击。比如裹脚缠到一半，舅舅从武汉回来，跟外婆嚷嚷，不让缠了。所以直到晚年，她的脚还是半大不小。她说，幸好没成三寸金莲，否则日后跟随夫君东跑西颠，就会很惨。

中国太穷太大，所以她先生虽然有理想，肯花心血，甚至饥一顿饱一顿，但对于偏僻山区的若干孩子，无异于杯水车薪。在解放前夕，她先生终于积劳成疾，撒手尘寰，丢下难于割舍的老婆和 4 个年幼的儿女。

大妈又回到刘家冲，打算守寡终生，学孟母教子，将儿女培养成夫君那样的人才。不料眨眼之间，天下就姓共；穷人翻身闹革命，大妈婆家和娘家都被划为大地主。公公婆婆

死于非命，田产、宅院全叫瓜分了，连倾向于共产思想的叔伯弟兄也未能幸免于难，自革命队伍清洗回原籍，沦为天天挨斗的四类分子。覆巢之下无完卵，大妈被赶出传了几辈人的刘家大院，带着孩子挤在以前叫化子住的破房子里。1952年，土地改革正式开始，大妈被关押起来，大会小会挨斗；与其它地富分子一道，戴着高帽子游街，还陪过恶霸地主的杀场。

那时，一个小小的贫农组长都掌握着大妈他们的生杀权。我这个年纪的孩子，真不明白人与人之间竟有那么刻骨的仇恨——组长将大妈吊在大树上。你知道怎么个吊法？是将大妈右手的拇指用麻绳缠紧，然后单臂高吊——大妈当时是个20 多岁的妇女，由于历经折磨，已皮包骨头。可再瘦，她也有几十斤啊！一根指头悬几十斤的重量，下面的人一松手，大妈就吼叫一声，昏死过去。那是一种怎样刺耳的叫声啊，像挨宰的母狼被扼住喉管的一瞬，嗷——！刀子一样尖利，又突然折断，跟着，整个身子都在晃荡中噗噗冒泡，白沫和舌头都从嘴里直喷出来，吓得围观的人们缩头闪避。据一位当事者说，大妈的舌头挂在外面两三分钟，才一颤一颤朝里缩。有个人将一根树枝戳进去，以免她咬掉舌尖，只听得喀嚓一响，树枝真断了。血滴、汗水、鼻涕不断线地淌，屎尿也嘀嘀嗒嗒地淌……

老威：如此惨状，人们看得下去吗？

刘金琴：人们看得可高兴了，还鼓掌呢。接着，组长指挥大家，拉成长队，用木桶从河沟里打水去泼大妈。连泼了十几桶都没醒，又接着泼，直到醒了，呻唤了半声，脑袋又

耷拉下去。

老威：吊了多久？

刘金琴：不知道。

老威：这样搞下去会出人命的。

刘金琴：大妈的生命力够顽强，不会轻易死。

老威：我的朋友芦苇是电影《活着》《霸王别姬》的编剧，他为了搜集电影素材，曾到陕北老革命根据地采风，据他了解，当时的土改也很可怕。当过中宣部高官的著名作家陈ＸＸ也当过工作队长，只要姓陈的一下乡，土豪劣绅的屎尿都得吓出来——因为此著名文人之著名一招，就是先把人捆起来，使其动弹不了；再将油煎得透熟；最后才挽起袖口，柔声细语地审问金银细软的去处。不招，他就笑着拿起一只调羹，从烟熏火燎的锅里舀起熟油，往人肉上浇。

刘金琴：你一说，我的寒毛都竖起来了。

老威：大妈后来怎样了？

刘金琴：她成了终身残废，右手抬不起来，拇指变为一截麻花。可组长还不放过她，连耕田也用一根绳子把她牵着。

老威：押着她劳动吗？

刘金琴：消遣。组长说，解放前，地主剥削我们，逼着我们做长工，还到田头地尾监视我们。今天，穷人翻身作主，我也不让地主婆做我的长工，我要让她继续做地主婆，监视我吆牛犁田。

老威：什么意思？

刘金琴：就是在田埂上铺一层碎瓦渣子，叫大妈头戴纸高帽跪在上面，脖子挂一尿罐。不准抬头，不准耸肩，连眼

皮也不准抬。

老威：这样折磨人很有乐趣吗？

刘金琴：受过种种肉体和精神的摧残，大妈却忍着，事隔多年，也没好意思对外人讲。老威：那你怎么知道的？

刘金琴：大妈的邻居，我的婆婆，总之，与她差不多年龄的长辈都知道。他们经常当饭后茶余的龙门阵，讲得眉飞色舞。那时的农村又没什么娱乐，老爷爷老婆婆就聚一块，东加长西家短的。我和大妈感情好，所以心里很不是滋味。

老威：后来呢？

刘金琴：日日都有民兵看管，大妈回不了家，孩子没人管，全完蛋了。

老威：什么叫全完蛋了？

刘金琴：4 个孩子，老大才 5 岁。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刘克润，饿得实在受不了，就离家出走。这孩子算机灵，沿途只要有人户，就跪下去磕头乞讨，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的乱叫一气。人心都是肉长的，隔了山隔了村，没人知道他是地主的崽子，就给些吃的。他饥一顿饱一顿，夜里歇庄稼地或岩缝，白天就凭着动物本能，顺着路或路的印子向前走……

老威：5 岁的孩子，不想家吗？

刘金琴：他的 3 个弟弟妹妹，有个还没断奶，都饿死了。他离开的时候，3 岁半的二弟还没落气，还伸出那枯柴棒子一样的手，拽住他的裤腿说：“哥，带我走。”他刚答应一声，二弟的脑袋就歪到一边，有出气没进气了。

他扳开二弟的手指，哭着跑出家门，才十几分钟就眼冒

金花。路边寻了些野菜，胡乱朝嘴里塞，眨眼间肚里就翻江倒海。他吐得一塌糊涂，可只有一滩绿水，他就倒在自己吐的绿水里，爬不起来了。幸好一个过路的人丢给他一个糠馍馍，他看也没看就吞了下去。等他坐起来，那个人已无影无踪。黄天厚土，万籁俱寂，连一丝风都没有。当时他只有一个念头，这是蚂蚁和蝗虫都会产生的念头，就是尽可能逃得越远越好。

老威：我两岁的时候，正遇上大饥荒，也差点饿得没命了——从那一刻起，一颗不爱故乡不爱祖国的种子，就在我的骨头里发芽。

刘金琴：5岁的刘克润，皮包骨头，眼珠子都快顶出来了，可他几天几夜，走了100多公里，没回一下头。他终于倒在一户人家的屋檐下，天蒙蒙亮，主人家开门，吓了一跳，蹲下去摸鼻孔，感觉还有气，就抱进屋里灌米汤——命大的刘克润终于苏醒了——他成了救命恩人，一个贫农家庭的养子，至此十几年没回过老家。

老威：大妈怎样了？

刘金琴：她被斗了100多天，直到村里都知道她家出事了，民兵才放她回去。还没进门，尸体的腐败味儿就扑面而来，苍蝇跟炸了营似的。她不管不顾地抱住孩子，张嘴干嚎了老半天，却既没有声音也没有泪水；她像个80岁的老太婆，头发掉得掩不住头皮，喉咙撕裂得哑了。

这个母亲和她的死孩子们共渡了一宿，除了一盏灯，除了苍蝇的嗡嗡，再没任何别的。村里的人都悄悄拢一块，在不远处议论、猜测，这地主婆到底躲在屋里干啥？有人说，

她的娃娃都生蛆了，难道她也等着生蛆不成？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大妈一晚上都在收拾尸体，用竹签将腐肉深处的蛆虫一下下挑出来，像在做极仔细的针线活儿。天快亮时，大妈直了直腰，从家里搜了些旧布，勉强将孩子们裹了，然后，先将老二装进背兜。费了半天劲儿，她才背着老二开门出来，在朦胧曙光下上山去。

她来回搬运了三趟，太阳就升起两根竿子高了。在一面荒坡上，她选了松软的土坎，起落着左臂刨坑。她的右臂已经残废了，她拖着它，十分累赘，可还要以单手举一把小锄头，不断地喘气、刨坑。她在烈日下刨了一上午，三个簸箕大的浅坑浮现了。她将孩子们并排放入坑里，自己坐在坑边歇气；她喃喃说着什么，然后站起来，四处寻了些树叶和青草，她用一只手将草和叶洒在孩子们的身上。

蓝色的晴空一望无际，一阵呱呱的叫声突然自远方传来。开始大妈还以为是耳鸣，就起劲地钻耳朵，可呱呱的聒噪越来越响，终于如轰炸机一般。大妈猛一抬头，才发现周围的三棵大树上全歇满了乌鸦。她头皮发麻，立即填土，她的左手像上了发条，越动越快。乌鸦们越逼越近，有几只呼地扑到地上，那只最大胆的，甚至凌空划了个半圆，从她的肩头擦了过去。她惊得一弹而起，挥舞着锄头去赶乌鸦，鸦群一炸而起，在刹那遮没了太阳，然后如大把的灰烬，纷纷扬扬地洒下来。她继续挥舞着锄头，直到累跪下，只剩喘气的份。乌鸦也不动了，也不起劲的聒噪了，人和鸦对峙着，大妈丢了锄头，一把一把往坑里推土；还将整个身子扑下去，以肩膀和下巴推土。这个母亲，甚至想将单薄的千疮百孔的身体

盖上去，永远笼罩住自己的死孩子，不让他们再受到一丝一毫的糟蹋。

她不知在坑上趴了多久，似乎还最后贴着孩子们睡了一觉。总之，天色已晚，她终于完成了掩埋，连坟包也没力气垒。她下山时，月芽已经上树梢了。

老威：鸦群还没撤退，她能放心吗？

刘金琴：她是不可能睡踏实，据说在午夜的朦胧之间，她还听见了嗷嗷的狼叫。第二天大早，她就赶上山，却惊呆了。昨天的浅坟已一片狼藉，坑里坑外布满狼或野狗凌乱的爪印，可孩子们呢？除了与泥土混杂的碎布，孩子们在哪儿呢？

她下意识地在坑里翻找，又捞起几撮头发，在离坑几米远的树下，又寻着了一地鸟血、鸟毛和一颗牙齿。显然，狼或野狗为了享受尸体，曾与乌鸦有过一场血腥大战，最后大约以狼的胜利告终。

老威：目睹过如此惨状，母亲能活下去算个奇迹了。

刘金琴：她活下来了，并且活了 80 多岁。

老威：是么？

刘金琴：她右手残废，孤苦一人，活着的理由也就是还不死心啊，她的大儿子刘克润还没找到啊。接下来的日子，她跑遍了方圆数百里，逢人便打听，直到十几年以后，才终于知道儿子的下落。

老威：那母子见面，悲喜交集吧？

刘金琴：没有喜没有悲，形同陌路。那已经是 60 年代，快长大成人的刘克润东躲西藏，死活不跟生母回家。可大妈

也死活不愿放手。这种拉锯战持续了大半年，终于由公家出面，将孩子断给了生母。刘克润的命运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本来他已换了血，成为贫农的儿子，共产党的依靠物件，可转眼间，他还是地主阶级的狗崽子！那时不像现在，还能背井离乡——户口已把人限制死了，去趟县城，住个旅馆，还得由大队党支部开证明呢。可怜的刘克润只好与养父养母抱头痛哭一晚，再跟候在旁边垂泪一晚的生母走。这一段，我听大妈亲口讲了若干遍，刘克润可谓三步一回头，回头肝肠断。大妈不忍心，就远远坐在一个山坳等。还连着唠叨，造孽啊造孽啊，我也是没办法，除了这个儿我还有啥呀。

老威：亲生母子相守，日子总会一天比一天好过。

刘金琴：可那年头，地主受歧视，刘克润在生产队里抬不起头，就将一腔怒火转移到母亲身上。母子俩要么不说话，要么就吵得不可开交，特别是成了小伙子后，就因为家庭成分，连找了好多个对象都告吹。

老威：我也是地主的后代，文革当中，我姐姐 20 多岁，出落得如花似玉，本来她按自己的心意，接受了一位解放军连长的求爱，可男方组织上一开展政审调查，发现女方出身地主家庭，马上就对那连长进行严厉批评，“亲不亲，阶级分”。个人那一丁点感情在时代的大环境里算什么？一粒芝麻。

刘金琴：所以刘克润很惨，拖到 30 多岁还是光棍一条，只好一咬牙，去几十里外的另一个生产队当上门女婿。女方是寡妇，拖了两个小孩，并因为计划生育原因，被政府动员去做了结扎手术。

老威：也是个十分不幸的人。

刘金琴：双方刚见面就“相中”了，一说真实情况，“门当户对”嘛。刘可润也不在乎老婆不能生崽，只要互相不嫌弃，就朝老时过啰。当了几年的上门女婿，文革结束，地主也揭帽了，刘可润就带着老婆和白捡的两个儿女，认祖归宗，与母亲同居一个屋檐下。

老威：总算是个大团圆结局。

刘金琴：刘克润倒希望大团圆，但媳妇和婆婆却势同水火。大妈是旧社会过来的大家闺秀，受传统的束缚，传宗接代的观念根深蒂固，可媳妇却叫结扎了……

老威：她不是有两个子女吗？

刘金琴：但不是亲生的，这让大妈日夜受煎熬，觉得一辈子的苦白吃了，刘家的香火眼看要绝了。婆媳的争吵成了家常便饭，而儿子总是偏袒媳妇。大妈的脾气越来越古怪，斜吊着右手，似乎与任何人都合不来。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走进她的生活的，我生得乖巧，嘴也甜，一老一小相当投缘。大妈一见我，就笑，就叫乖乖过来，于是我就过去靠着她的膝盖坐下。

我抱给养父 10 来年，几乎天天与大妈见面。后来我回到亲生父母身边，还时常打听她的消息，因为大妈已经成为我童年记忆的一部分。

老威：就这样完结了吗？

刘金琴：我常常回刘家冲，名义上看养父和婆婆，其实最挂心的还是她。冥冥中，我和她才有真正的精神血缘。2002 年，她大概有 80 岁了，我从北京回宜昌探亲，一听说她病危，

就马上赶去。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老威：她得了什么病？

刘金琴：人老了，骨头脆了，可有一次，婆媳之间爆发家庭战争，她再次戳到媳妇不生崽的痛处，于是，被激怒的媳妇推了她一掌。她跌倒在地，却再也没有如过去许多次那样，从灾难中爬起来。

她的腰椎和盆骨都摔断了，一下子痛得晕了过去。正高声尖叫的媳妇猛然呆住，直到儿子进门，弯腰将母亲抱到床上，她才回过神，跟过去照顾。

就这样拖了一二十天，大妈根本动弹不了。在一生中，她是个要强的女人，再苦再难，跌得再深，哪怕跌入地狱，都不要人扶持。她是刘家冲少有的两三个知书识礼的女人，虽然穷，却总是打扮得齐齐整整，干干净净。可是落到这一步，就只能任人摆布。

时间终止了，几十年，几百年，这儿在进步还是退步？

婆媳间的宿怨永难化解，但是媳妇当着人面，还得摆出无微不至的模样，为婆婆喂水喂饭，接屎接尿。当我出现在门口，那媳妇正从大妈的身子底下抽出秽迹斑斑的尿布，动作很粗野，把大妈的腿都划破皮了。我看不过去，大妈却对我笑，遮羞布扒拉开了，她依旧无所谓地笑。我眼泪快出来了，连忙俯下身去问她需要什么。

我喂她水，她的舌头在满是燎泡的嘴里卷动了两下，然后问我好不好？接着是沉默，接着她又回到从前，时断时续地唠唠叨叨。她说做闺女的时候，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规矩太多太严，好不容易放回风，与弟兄姐妹上街，竟觉得样样都新鲜。遇上卖洋布的货郎挑子，就一齐围住，比比划划。满意就买下，不满意，也不能妄加评论，直言不好。我只说了声“不对”，也叫外婆听见，立即唤到一边教训道：“大户人家的闺女怎么能说不对？先生没教过你吗？该说不然。”

老威：这算对美好旧事物的回光返照吧。

刘金琴：是啊，我们分别大约三、四天，她就去世了。我不知道她信不信神，或许她已经通过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我们看不见的长长的走廊，回到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旧社会。

民兵主任余学康

前奏

自 2006 年初从云南省禄劝县境内采访归来，我一直刻意追寻有关土地改革的人与事。我试图另外找一个点，再度深入，以图在著述里形成地域上的对称。可非常遗憾，知道 1950 至 1952 年土改的中年以上的人比较多，能够提供具体线索的有心者就稀少了。大半年下来，我先后跑了北京、成都、重庆、湖南省长沙市和我的老家四川省盐亭县的乡下，收获甚微。原因大约是幸存的老地主们虽然快走到了生命终点，可还心有余悸，担心自己在一个陌生人跟前说共产党的坏话，会祸及子孙。

感谢上苍，赐予我孙医生这样的基督徒。经过三番几次的电话联系，2006 年 8 月 3 日，我们又在昆明重逢了。用罢晚餐，我们在阴风惨惨的街头徘徊了一会儿，接着又去了孙医生简陋的住处。因为极其忙，此次孙医生不能陪同我下乡，却对我的行程作了细致的安排。

睡前与孙医生聊了一会儿，都是光棍汉，就对彼此的经历怀着浓厚兴趣。但当我提到某一位朋友想用摄像机跟拍他几个月，成就一部当代游方郎中的纪录片时，孙医生的反应却比较淡漠。“没人看。”他说。

“不在乎，”我说，“应该有个新世纪上山下乡的记录嘛。”

他不置可否，并很快进入了梦乡。

2006 年 8 月 4 日 6 点 50 分，我们起床洗漱，出门时阳光灿烂。我们在一个路边鸡毛店匆匆用罢早点，孙医生又将我送到黄土坡汽车站。分手在即，老孙又以极快的语速，把沿途注意事项冲我复述一遍，我只得如一个幼稚晚辈，挺感动地点头。稍后，我在肮脏的车站内登上去禄劝县的更加肮脏的中巴。屁股朝异味刺鼻的坐垫下去，膝盖就抵到了胸前。一个哑巴姑娘上车卖非法印刷品，她先递过来一块写着“自强不息，自谋生路”的纸牌。想起自己也曾干过地下出版这一行，就捐了 10 元钱。哑巴姑娘不依，涨红着脸，非要我选她怀里抱着的劣质书刊，我随手抽了一张《生肖运程》的单子，“属狗的。”我不由自主地解释，姑娘似乎听懂了，甜笑着，还翘了大拇指。

车摇摇晃晃地出站了，烟尘弥漫；跟着出城了，天高云

淡。在金光飞窜的风中正好养精神。于是我仰头便睡。不料一睁眼，两个多小时就溜过了。灰不溜湫的禄劝县城映入眼帘，哪怕周围粘满补丁般的垃圾，一种亲切感还是油然而生。

行人和建筑都老一套，就不费口舌了。总之我下了车，沿土坡爬到马路边，一个公用电话就招来了接头的面包车。司机是个彝族瘦子，姓张，我递上孙医生的路条，上面写着："此人是我的好友老威，请按电话里说好的条件，尽力帮助。"

沿着上次的路线，我们继续前行，没多久上了土路。尘土飞扬中，人头与骡马源源不断在车窗外沉浮，有时，车已抵着马车了，才一个急刹。司机老张探出脑袋，以喉咙代替喇叭，恳求让路，可在马车上摇晃着的衣着花哨的彝族女人们都回头报以微笑。老张也只能微笑，并解释说，今天团街逢场，大家都出来赶街了。

堆积着人的柴油货车与骡马拉车越来越密集，终于遮天蔽日起来。前方会车，我们停下来等，见若干农民如起义一般，从四面八方往车上爬，其中一个还在两车相交的缝隙中扒拉车门，惊得我连吐舌头。老张却说，他以前赶街也爬车，图个方便。

我小时候也爬过车，那是受父亲之命，从盐亭县城回 20 多公里外的李家坪探望老地主爷爷。遇着货车上长坡，就撵着车屁股，一顿猛跑，使出吃奶的力气翻上货厢，就洋洋得意。可如今，我的父亲、爷爷、姐姐都长眠在李家坪的祖坟里了。

经过乡场时，我胡乱拍了些照片。接着几个小时的折腾，我们又到了破烂肮脏如昨的撒营盘。在路边一个清真馆子要

上 司机兼向导，小张的胃口不错

中 乱七八糟的乡场

下 2006 年 8 月，我二进禄劝，沿途见赶街的乡民蜂拥来去，爬车者不顾死活

了牛肉和两斗碗干饭，狼吞虎咽罢，才发现碗底尚存苍蝇一只。而更多的苍蝇在我们头上嗡嗡欢呼着。

胃口相当争气，就如这破面包车，再怎么历尽颠簸，它也不熄火。又跑了 1 个来小时，到一剪刀似的岔路口，往下走去则黑，我们上行，沿着盘山道直奔此行的目的地，海拔 3600 多米的山顶小镇马鹿塘。

下午两点左右，进了空荡荡的马鹿塘场口，太阳依旧明晃晃，却如悬在空中的白铁皮，没有热度。我们在场上唯一的“美发厅”前刹车，打开车门，立即加衣服，并向一女孩打听本站联络人小孙。不料一回头，瘸着一只腿的小孙已站在我们身后了。

小孙也是大地主家族的后代，头脑在乡村青年中算灵活的，也曾在深圳打过工，却因病险些瘫痪，只好回乡。前不久，孙医生巡回至此，为他治过腿，还认了本家。

我们被请进乱七八糟的美发厅稍歇片刻，就穿过街面，跟小孙下一斜坡，绕入人畜混杂的农家院子去拜访马鹿塘乡的高龄老人余学康。在狗儿们的狂吠中，一个系围裙的粗壮妇女自猪圈钻出，摊着两手与小孙搭话毕，就仰脸冲着木楼叫“老爹”。余学康从楼影里探头，眼睛与皱褶几乎难以区分，我们立马趋前打招呼。小孙贴住他的耳门叫道：“成都来的同志，想找你款款古。”

老人嗯嗯答应着，弓着腰，带我们上了 2 楼。由于屋里太阴暗，四个人就搭矮凳蜷在楼道中。谈话还没开始，楼下院坝里已立满大人小孩，以及猪、狗和牛。老人脸朝外，皱褶中挤出两道得意的目光：“现在还有人听款古？”

我急忙点头道："我想请你讲讲土地改革，也就是斗地主的事。"

老人一脸迷惘。小孙就替我做传声筒，并且补充道："你随便款，解放前、解放后，想咋款就咋款，人家要写你啰。"

夏天穿棉袄的马鹿塘到了，我要接头的小孙是个能理发能拔牙的多面手

正文

老威：老人家高寿？

余学康：蒋介石手头就出生了。

老威：到底是哪一年？

余学康：记不得啰，只晓得今年 81 岁了。

老威：你算这马鹿塘乡里的长者，我今天特意来找你款款古。

余学康：款古么？我的脑壳已经胡涂啰。小时候，听老祖讲，我们的祖脉在金沙江对岸的四川东川县境内，由于与

彝族打冤家，输了，就千里迢迢迁过来。当时迁过来的还有李、田、孙、张、杨、冯等汉姓，都是叫彝族赶过来的。

老威：这是哪个朝代的事？

余学康：早啰。我已经是迁过马鹿塘来的第 10 辈余姓人了。祖宗他们刚到的时候，这儿还是万山老林，人钻进去就眼睛发黑，深处还听得见野猪和熊叫。祖宗他们扎下来，经过刀砍火种，开出向阳坡地，种下荞子和洋芋，也种下大烟。

老威：这些都是彝族的主食吧？

余学康：入乡随俗啰。云南的黑彝性子温和，不像四川大小凉山的彝族，一冲撞就要动刀动枪，所以这儿的汉彝历来都和平相处。满目荒山，愁的是没有劳力去开啰。不晓得背太阳过山了多少年，这与外界隔绝的马鹿塘突然热闹了，先是朱德领头的红军过，去金沙江的皎平渡口与毛主席汇合；后是国民党的中央军追过来，三天三夜的马蹄和脚步声。红军进到我们大村，找人带路，翻山越岭跑拢江边，许多战士饿得不行了，就采地里的蓖麻子充饥。蓖麻子可以榨油，闻着比花生油香，却是闹人的。听说不少人口吐白沫，叫毒死了。红军是在韭菜地、黄草坪扎耙子过的江，险得很。

村里带路的人，有的没回来，参加红军了；有的穿密林子回来，衣裳都烂成刷刷了。他们说，红军过雪山草地，又没有吃的，所以经常是进几步退几步，看着看着，人就往下倒。他们不愿送命，就当了逃兵。马鹿塘的人从老祖开始，就种烟抽烟，红军中也流行吹大烟，还问他们吹不吹两口提神？那时候红军的政策还是好的，逃跑不远的，追着你转去，不追究，还有大烟吹。

老威：红军在马鹿塘驻扎过吗？

余学康：歇过嘛。村乡里的大户叫绑了十几口，通知家属拿银元去赎人。在下面的大松树干仗，活捉了国民党军家眷，男的女的一串，也弄到马鹿塘上头来，召集乡民大会，统统砍头。我那时小，也跟老爹们去看，血滴了一路，尸体就埋在坡沟下。红军还在土墙上贴告示，我听长辈念道："杀官安民，打富济贫……"许多年过去，我还记得这两句。解放军、工作组继承了红军的光荣传统，搞土改，也就是"杀官安民，打富济贫"啰。

红军如风一般刮过去，他们从大户那儿弄来分给大家的东西，没人敢要；当时接了，事后都原封不动地还回去。这儿的人乡情重，只要不挨饿，就不管脑壳顶的哪一方天。我记得那时的保长也换得勤，今年是李保长，明年就是杨保长了。

老威：保长的权力大吧？

余学康：通知开会，派款派壮丁，保长就上门了。壮丁的政策是每家每户，三丁抽一，五丁抽二，轮到那个是那个。我12岁死了母亲，家里两兄弟一妹子，加父亲，共四口人，所以没人当兵。但村里有好几个人去当兵。我的一个老表，一走就没音信，几十年后才晓得，他随国民党军过海，在台湾安家落户了。八几年天子换了，他坐飞机到昆明，包了几辆车回马鹿塘寻祖，还有政府官员陪着。一下村里，没人认得出。还比我大好几岁，可西装一套，像我的儿子辈。村里人都围着这个命好的人，昏款了一晚上。有人问他那边出不出荞子和洋芋？他点头说，啥子都出，就是花椒不出，因为

怕麻死人。把大家逗笑了。我问他台湾有多远，咋过来？他说从南边绕大半个中国，再从香港进来。我问有没有我们的老祖来得远？他连说概念不一样，老祖们是走路，翻山越岭，从金沙江对岸过来，一两个月都说不准；我是坐飞机，如果拉直线，台北到昆明，大半天就到了。一大屋人全傻了，搭不上话，因为我们最远才去过昆明啰，到一趟禄劝县城也算大事情啰。

我这个老表心慈，连着抹眼泪，说几十年了，没料到家乡还是这么穷。他打算以后在昆明安家，可以引一些海外资金来家乡扶贫。现在，他的女儿倒是住在昆明，他没有回来，听说是台湾那边不让。

老威：老人家，你在旧社会有多少土地呢？

余学康：3 亩多。

老威：一家 4 口人才 3 亩多？

余学康：眼下我家有 10 几口啰。

老威：我说的是旧社会。

余学康：旧社会么？我的耳朵也老了。坡上的地种不完，一家一户，少说也有几十亩。

老威：那家家都够地主了？

余学康：我们家有几十亩地，可是自耕自种，没余粮，没请长短工，没有租子可收，更没有丫环、奴仆，所以是贫农啰。

老威：这些都是划阶级的标准吗？

余学康：土改中，我们把这个叫做“称大秤”。是猪还是骡子，有多重，自己先称一称。第一等是地主，分恶霸地主、

一般地主和破落地主；第二等是富农；然后是富裕中农、中农。贫农和雇农是依靠物件。在马鹿塘，老林子多，野猪、熊瞎子、游击队都在里头出没，四几年，国民党军从撤营盘过来，清剿了很多次，把游击队打急了，就轰的一声散开。有的就钻进村里躲。不少人家都窝藏过游击队，因为他们的纪律好，哪怕饿瘫了，也不偷不抢，要口吃的，也征求住户的同意。还有，他们个个能说会道，啥子为国家为民族为人人平等，到了动情处，眼泪就哗哗的掉。不料真让他们猜准了，眨眼间解放，游击队果然又回来了，不过，这回可不是钻老林子，搞偷袭，而是在青天白日下进马鹿塘……

老威：游击队成了解放军？

余学康：解放军 1949 年就来了，先是一小股，过后才是大队人马。我还为解放军的侦察兵带过路啰。我是说工作组，有县里的、区里的人，跟在解放军后面进马鹿塘，村里的人一认，原来就是游击队。大家都是熟人啰，那家肥那家瘦，在旧社会就摸底啰。

老威：这么说，土改起来很容易？

余学康：马鹿塘的所有村子都驻了工作组，我们大村也驻了 4 个工作组的人，先是分散到穷苦人家，同此同住同劳动，讲新旧社会的变化，启发阶级觉悟。因为过去无论穷和富，都是一个村子里的乡亲，我雇你到我地头干活，你在青黄不接时，来我家借点粮食，都太平常了。10 根指头还不一样长啰，那个能辨清楚，是细的么指头好，还是粗的大指头好？但是共产党来了，人民翻身做主人，新社会，旧道理就讲不通了。发动群众，划阶级，上面的政策就是铁板钉钉。

在工作组的领导下，贫雇农的主席团也有了，民兵也有了，我当上了民兵主任……

老威：当时你有多大年龄？

余学康：20 多岁，还没结婚，一根脑壳简单的光棍啰。

老威：你恨地主吗？

余学康：应该恨，政策叫我恨我就恨。要不咋个当民兵主任？

老威：你手下管多少民兵？

余学康：十几个。其实也不是那个管那个，大家互相监督，看政策执行得好不好。秤完大秤，工作组就叫我们民兵将伪政府成员、恶霸地主从家里一个不漏地清出来，押到马鹿塘乡公所集中看管，勒令交代隐瞒的浮财。

老威：你是文盲吧？

余学康：我没有文化，记性也不好，可工作组都表扬我政策执行得不错。

老威：是么。

余学康：村里的民兵都是大肚皮，饿痨饿虾的，好像从妈肚子一出来就没吃饱过。所以，他们总是扣地主家属送来的饭菜，几个家伙分吃光。还命令必须送肉，送白米饭，否则就打人，小孩、女人都不放过。这就不符合政策啰。我审问时，发现一个孙家的地主，已瘫在墙角，有出气没进气了。连问几声浮财埋哪儿，那人却伸一伸颈子，直翻白眼。我瞅着不对头，忙叫舀一碗水来灌，没想到进去半碗就出来半碗，还从胃里带出黑糊糊的泥巴和铺草节节。原来他 5 天没上吃一口饭，只好在地下胡乱抓东西填肚子。

57 年前的风光荡然无存

我一下子就冒火了，地主都饿死了，找那个去追浮财嘛？即使该枪毙他们，还要给一顿砍头饭啰。于是就批评那些扣饭吃的民兵。他们不服气，与我吵，说地主饿死活该，如果全世界的剥削阶级都饿死了，共产主义就实现了。我没文化，只好反映上去。工作组在大会上表扬了我，认为我觉悟高，有全局观念。我可没想到全局，但贫农要有志气，不能给共产党丢脸啰。

老威：老人家还是蛮实在的。

余学康；我做过民兵主任，做过保管员，在村里是有口碑的。所以你们这些后生，不要认为我在昏侃。

老威：哪里，哪里。

余学康：其实地主很不好对付，他们要么读过书，要么比较聪明，否则发不了财。称了大秤，开了会，人人都盯死你了，可他们还以为能蒙混过关。于是工作组与贫雇农主席团一合计，集中起来审。我先挨个劝他们，也叫声老表、叔

叔、姨爹啥子的，都是乡里乡亲，你还是吃软吧，都吐了吧，大政策大形势摆在眼前，你不说实话不行啰，就是对抗政府，对抗共产党啰。

老威：你还挺会攻心的。

余学康：但是行不通。这些狗老财，放租放债都不交代，或者只交代一点点，想大化小，小化无。你说他有丫环，他说那是亲戚家的丫头，暂时住几天；你说他有奴仆，他说吃住一窝，干活一块，哪能叫奴仆？至于雇长工，他更是满腹委屈，说吃穿、工钱都没亏待过人，有人快饿死了，找上门来磕头作揖，求你雇他，给他一口活命饭吃，你能不答应啰？这位同志你听听，这哪像罪行交代？不来硬的行么？于是我扇过去一耳光，说："你欺负我没文化是不是？你把剥削浑侃成做慈善，那我就要看你有多慈善！"

攻心不成，我们就要伤他们的心了。把他们全拉出来，跪碎瓦碴，跪刺耙笼，膝盖烂了，还往上头抹盐；还挂黑牌，戴高帽子游乡、游地坎。你可晓得火塘里架柴烧的铁十字？我们就是把烧得半红的铁十字罩在他们头上，带焦糊肉味儿的青烟一冒，脸都变形了，他们就会大吼："吐，吐，全吐，肠肠肚肚都吐！"

老威：真有点恐怖。

余学康：还有扎烟火、推阴阳头、往头上倒红墨水……

老威：什么"扎烟火"？

余学康：就是把燃着的烟头往人身上扎，一扎一个眼，看你能顽抗多久？

老威：还有什么刑罚？

余学康：打陪衬。就是镇压一个恶霸地主，将所有的地主押到公审会场，陪斗几个钟头。在枪毙的那一刻，让十几个跪成一排，前面都挖了坑。这样，都以为自己活不成了，屎尿一裤裆的，喊爹叫妈的，昏过去的，嘴巴啃土的，太热闹了。民兵用枪托子捣，手膀子都酸麻了，还制止不住。轮到真开枪，那个恶霸地主天灵盖一飞，作陪衬的地主多半也死了一回。这时候，再架回去趁热打铁，就啥子都招了。金银埋在哪个窖；首饰藏在哪一家；还有细粮灌在哪个树洞；咋个样教唆自己的媳妇、闺女勾引主席团的人下水，梦想用美人计改变阶级，逃避斗争等等，甚至上一辈子的丑事都往外抖。

可这个关头就太晚了，工作组指示，不仅要将已经交代的浮财，包括田地、房子、余粮、骡马牛羊全部没收充公，而且要视其态度恶劣的程度，给予轻重不同的赔罚。罚款数目是50元起价，100、200到300，最高600元。那时一匹骡子才卖50元，所以地主们没有后悔药可吃了。

老威：给不起罚款怎么办？

余学康：土改时，工作组就是金口玉牙，说一就只能是一。罚款的目的，就是要彻底摧毁剥削阶级的嚣张气焰。出不起罚款，人头就落地，马鹿塘有两个大地主，都因为交不起300元钱的罚款，而被镇压了。

老威：这算是保命钱了。

余学康：差不多啰。交够数的，当场就叫家属写张《保证书》，领回家去听候处理。想逃是没门的，村与村都设了岗哨，除了工作组和主席团，任何人，哪怕走亲戚，都要查《通

行证》。

老威：这有点像抗日革命根据地了。

余学康：皎西、马鹿塘、大松树都轮流开过群众大会，镇压伪政府、反革命和地主。我那时年轻，热血沸腾，都去执行过任务。我还被派到皎平，帮助那儿的群众土改。

老威：你枪毙过人吗？

余学康：我扛过枪，打过靶，可胆子小，没打过人。那是要受专门训练啰。

老威：斗地主的名堂还比较多吧？

余学康：案头上的肉，想咋个切就咋个切啰。那时候，贫雇农家里死了人，也叫地主来当坐街先生。

老威：什么？

余学康：就是临到出殡，让几个地主披麻戴孝，在大棺材前头鸣锣开路。解放前，马鹿塘一带就有雇叫化子当坐街先生的习俗，解放了，天地一翻个，剥削阶级就免费充当劳苦大众的孝子。从阳间到阴间的路，由他们先趟出来；埋死人的活儿，也是他们干；那年头太好呵，连祭年祭月，给老祖上坟，都由地主代劳。

老威：新社会不是讲究移风易俗吗？

余学康：土改阶段，新风尚还没提上来嘛。

老威：你们这一带到底镇压了多少地主？

余学康：记不清了。总之，乡长、民团队长、保长，还有几个大姓中的大户，都镇压了。从 1951 年下半年到 1952 年，公审大会开了无数次，每次都是上千人；集中到撒营盘开，起码就上万人了。我们民兵的革命担子可重啰，从看管

到押送，到维持会场秩序，有时一整天都轮着啃干粮，神经高度紧张。

老威：就是站个岗放个哨嘛。

余学康：同志你太小看我们民兵了，地主的公愤那么大，如果不是我们隔在他们和群众中间，地主一个也活不出来。许多乡都发生过没经过公审，地主就叫群众用石头活活砸死的事，受到上面的批评。有时候，群众就如海里的浪子，一波一波涌过来，一波比一波更猛，我们就把枪横在胸前，拼命阻挡。我们经常叫掀翻在地，又立马蹦起来，甚至学解放军，手挽手，汗水把衣裳、裤子都湿透了。有的人蹦跶着也够不着地主，就隔着我们这道人墙，喷口水、扔石块，还把棍子、竹竿老远打过去。我们挨了多少误伤啰！一次，棍子头没碰着地主，而扫到我的耳门上，只听得砰的一响，我差点就昏过去了。右半边脸肿了 10 多天，牙都松了。

老威：当时的法庭是怎样组成的？

余学康：以工作组为中心，周围是贫雇农的主席团。那个该杀那个该留，大伙碰个头，工作组点个头，就铁板钉钉了。唯一一次例外，就是镇压李保长。已经押到会场，挂了黑牌，插了亡命标。群众和领导都一致认为，他该死，死定了。当时也是人山人海，口号早就喊了几轮，“拥护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共产党、毛主席万岁！”“枪毙反革命恶霸地主、伪保长李ＸＸ！”

李保长在台下打抖，吓得站不稳。两个民兵将他往上架，可他的双腿拖在地上。屎尿没吓出来，清口水却挂了一尺多长。我还吼了一声：“狗日保长的威风到哪儿去了？”

执行民兵排出 4 颗步枪子弹，在鞋帮子挨个摩擦一遍，就喀嚓上膛了。李保长被五花大绑，按在土坑边跪下。十几米外，埋人的井早就挖好。台上的工作组长把手轻轻一挥，烂泥巴一样的李保长立马就要报销。可这时——枪口都抵着那后背了——有个声音吼道："留人!!"

我们睁大眼睛一看，原来是禄劝县杨县长的通讯员。那十几岁的小兵满头满脸全是灰，正骑着高头大马冲向会场。群众纷纷两边闪，大会顿时乱成了开锅稀饭。那马还扬了扬蹄子，啾啾叫了两声，就一直撞到主席台下才刹住。小兵跳下马，一个箭步射上去，隔着前排十几个贫雇农主席团成员，全身猛扑，向台子中央的工作组组长递上一封急信。

组长匆匆看了，吓出一头冷汗，也吼了一声："留人!!"紧接着又吼了一声："散会!!"

老威：怎么回事？难道这李保长是杨县长家的亲戚？

余学康：比亲戚还亲。解放前，杨县长在马鹿塘的万山老林里打游击，曾袭击了好几个乡公所。国民党为了报复，就悬赏抓他。有一回，都将他们十几个游击队员包围了，是李保长出于江湖义气，亲自护送杨县长等人钻密林小道，走了几天几夜，才拢金沙江边。李保长与杨县长拱手作别，还叫手下人送了一麻袋荞子粑粑。李保长一直看着杨县长他们过了江，估计安全了，才回头走自己的路。

老威：李保长明为国民党干公差，却暗通共产党，真是吃里扒外。

余学康：江湖中人只顾义气，不顾党派，更不管那个坐江山。解放后，李保长倒血霉，眼看老命不保，就在监狱里

土改时期的民兵主任余学康

把自己与杨县长的“救命”关系坦白出来，却没人信。他被打断了两根肋骨。可到底捡了一条命。

老威：杨县长也算有情有义。后来如何？他们“后会有期”了吗？

余学康：救命是一回事，阶级界限又是另一回事。共产党的县长当然不能轻易见一个恶霸地主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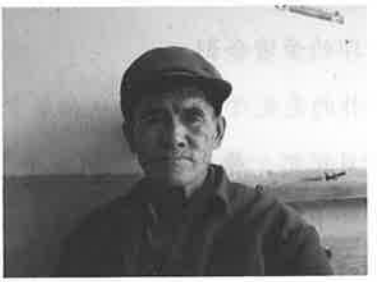
老威：过了生死关，李保长这辈子也算平安了。

余学康：一两年后，上面有政策，进行土改复查。李保长活罪难逃，他是“历史反革命”，被判了几年刑，劳改出来，没两年就死了。

老威：他可是共产党的功臣啊。

余学康：我没啥文化，不太懂这个。

放羊娃彭绍宗



前奏

现在是2006年8月4日下午4点45分，我与81岁的老人余学康道完别，从嘎吱作响的木楼过道下来，尾随热心的跛腿小伙子孙如策，从大村的烂泥坡爬回马鹿塘街面。斜阳如一颗被压扁的橘子，浆汁四溅，把山川染得斑斑驳驳。又起了一阵风，我们不由瑟缩起来。

在浸入肺腑的冷太阳中，孙如策突然转头问我，是否跟湖南卫视的ＸＸ栏目有联系？我愣了一下，小孙又继续说，他曾经将自己的人生故事写成材料寄去，并探问可不可以上荧屏，当众表露心声？对方回信认可，却声明旅费自理。我

关切道，值得花这大笔钱吗？小孙道，只要能找回老婆，花多少钱都值。接着，就从上衣口袋摸出一张彩色照片，上面是他和一摩登女郎的亲密合影。

回到灰尘扑扑的美发厅，小孙又从抽屉拿出一厚本影集，全是小两口的昔日记忆。原来，他们同成千上万的山村青年一样，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好不容易凭日以继夜的勤劳在深圳站稳脚跟，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小孙得了一种查不出原因的怪病，不久竟瘫痪在床，连生活也不能自理。而他年轻的老婆守候了几十天，苦无良策，就在绝望中带着幼子偷跑了。

幸好有同乡人的鼎力协助，小孙才回到马鹿塘，凭借着土方与针灸，竟奇迹般地站了起来。当然，这也包含孙医生在内的许多土郎中的努力。小孙说，他一点也不责怪“临阵脱逃”的老婆，哪怕她跟了另外的人。他只是渴望通过电视，把自己健康的形象展示给大众，希望她能看见，让全家破镜重圆一次。她还是自由的，去和留都可以。

我正在赞赏小孙的豁达，挂着破毛巾的窗口闪过一位戴蓝帽子的老头。我直觉到这当中有名堂，就叫小孙追出门去招呼。老头弓着虾米腰，摆着手推辞了两回，就随小孙进屋了。眼下，他与我并坐在长椅子上，两手搓来搓去，像个惹祸的小学生。我一开口，他受惊鸵鸟一般耸起了肩膀，脸色泛起潮红。我笑了，连称“没关系”，接着在东拉西扯中开始

了新一轮访谈。

兴致正高的小孙这么快就被晾在一边，我瞟了他一眼，感到十分歉意。

正文

老威：我已经看见你在这街面上晃了几个来回了……

彭绍宗：人老了，没事干，就这么瞎兜圈儿啰，

老威：马鹿塘有多长？

彭绍宗：就一条直肠子街，你抬眼就看得穿。现在，街两边都修了水泥房子，显得光鲜了，宽阔了，哪怕赶街日，货摊一家接一家，人如稀牛屎，一堆连一堆，汽车也能从中间挤过去。翻回去一二十年，你眼前就是土路土房子了，一下雨就是泥巴凼凼，货郎赶着骡马车卖东西，汽车是稀罕货，可能要几天才看得到一辆。

老威：这么说，你老人家在马鹿塘瞎晃了几十年了？

彭绍宗：土生土长，从来没有离开过。马鹿塘的地势太高，七八十岁的老人比较少啰。夏天好过，冬天不好过啰。原先我没事兜几圈儿，门槛前坐着吹烟的同辈人不少，一眨眼，就一个接一个走了。

老威：你的身子骨还不错嘛。

访完放羊娃，天不早了，可还得往大山沟里钻

彭绍宗：马鹿塘出了许多能人，乡里乡外，呼风唤雨了好一阵子，结果都走得早，我是个只晓得种庄稼的蠢汉，所以就落后了。

老威：老人家生于哪一年？

彭绍宗：1937 年，如今 70 岁了。

老威：解放的时候你还是个小孩。

彭绍宗：1946 年，我才 9 岁，就替李保长家放羊。

老威：就是那个共产党游击队的救命恩人吗？

彭绍宗：是啰。公审过了，埋人的井也挖了，枪筒都抵着他脑壳了，禄劝县杨县长一声“留人”。这事儿把马鹿塘，把方圆几十里都震住了。

老威：我已听民兵主任余学康讲过。

彭绍宗：是么？他与我三哥一路，土改的积极分子，当然比我一个小孩清楚啰。

老威：你三哥还在？

彭绍宗：我三哥彭绍周十几年前就走了。他曾经是贫雇农主席团的成员，参加了马鹿塘所有地主的审判，却没有比他跳得还凶的余学康命长。

老威：你觉得李保长该死吗？

彭绍宗：清匪反霸的时候我不敢说，因为他是国民党的保长，贫雇农都骂他该死。我一个放羊娃哪敢放屁？眼下不搞阶级斗争了，我才敢实事求是地说，李保长是个大善人！我家里穷得叮当响，没办法，李保长看不过，就主动对我爸爸说，让宗娃子到我家混口饭吧。真是饿狗进了肉铺，第一天，我就连肉带饭胀了 5 碗，气都喘不过来了。李保长摸着我的脑壳叹气：“可怜的娃呀。”接着还问我，愿不愿意跟他的孩子一道念私塾？我怕挣不到工钱，要挨父母骂，就摇头。而今想起来，很后悔，没文化吃了不少亏啰。

我替李保长放了几年羊，吃得饱穿得暖，冬有棉夏有单，人虽然在坡上跑，辛苦些，但身板炼得结实，脸盘子也黑里透红。那几年是打身体底子的关键时期，所以直到现在，我都不咳不喘不畏寒，估计，我至少能活过 80 几的余学康。

老威：老人家有底气。

彭绍宗：我三哥帮的不是李保长，身体吃亏就比较大，所以他对地主阶级充满仇恨，判死刑判劳改，他统统举手。

马鹿塘解放要慢些，1950 年吧，我十二三岁，工作组就下来，先还有解放军陪着，清匪，反霸，向剥削阶级征收公粮。李保长为旧政权干事，当然是恶霸地主啰，被抓起来关进乡公所，严刑拷打，据说还朝嘴里灌辣椒水，灌粪便。李保长叫冤枉，说自己是共产党游击队的恩人，没人信，两瓣嘴被鞋底给扇豁了，牙齿一颗接一颗掉。更具体的情况就不太清楚了，因为我太小，没有参加斗地主的会。

老威：你是孩子，不爱凑热闹吗？

彭绍宗：我是李保长家的放羊娃，土改运动一来，工作组组长李国柱就亲自来动员我，要我起来诉阶级苦，我憋得脸红筋涨，捶了半天脑壳，也挤不出一滴苦水。李组长就说，这个娃娃已被剥削傻了。于是，工作组命令我坚守阵地，看住李保长家打了封条的院子，还有骡马、牛羊、猪。这可是个苦差事，我一个老实娃娃，叫困在那块阴森的地盘，连门也不敢出。

老威：你要管住多少牲口？

彭绍宗：八、九十只羊，五、六头牛，六、七匹马。本来猪还有十几条，可没人喂，就饿死了。

老威：一个儿童要养这么多牲口！

彭绍宗：他妈个屄，长 8 双手也忙不过来。幸好我放羊多年，够麻利。那些羊儿马儿啊，与我有感情，一见了我，

立马啾啾呜呜地乱叫一气，又是亲又是啃的，它们哪晓得人间发生了啥子事？我天天累得手脚抽筋，也弄不来那么多草喂它们。我几乎站着都打瞌睡，梦里，牲口扯我头发，将我汗臭熏天的头发当草吃啰。

老威：李保长家没人了？

彭绍宗：土改才开头，就宣布没收包括土地在内的全部财产，将他们全家十几口赶出去，挤在大村下面一个猪圈那么宽的茅草房里。顶上有簸箕大的洞，连叫化子都嫌太风凉。直到李保长拣了一条命回来，才将破屋修修补补，勉强过下去。可没几天，土改复查，他又被判刑劳改了。

真是好人没好报啊。

那些日子晓不得咋过来的，好多房子好多牲口，就我一个人在里头窜来窜去，你说见鬼不见鬼？夜半三更，穿堂风忽忽地响，跟着房梁也响棺材也响，吓得我铺盖蒙脑壳，还牙齿打颤。有一回，天刚蒙蒙亮，铺盖突然叫掀了，吓得我光着屁股跳起来，却不敢睁眼睛。我直喊："鬼大爷饶命！"你猜是个啥？

老威：李保长家的先人回来探亲了？

彭绍宗：逑。是我养了几年的那匹灰马饿疯了，扯断缰绳，踢开房门撞进来，叼起我的铺盖就转身跑。我回过神，一直撵到马圈，那铺盖已四分五裂，一大半被几匹马嚼烂吞

了。没办法啰，它们都只剩几根骨头撑一张马匹。幸好不是食肉动物，要不连我也吃了。

老威：你没向工作组反映吗？

彭绍宗：他们都忙啰，我三哥也一天到晚不落屋。直到1952 年秋凉，土改的几个阶段弄完，要分土地、浮财了，工作组和农民协会才从我手里，将牲口、财产一件件数出去。

老威：都分给谁了？

彭绍宗：我一个孩子，晓不得啰。可惜的是那些大肥猪，都饿死了，死前把食槽都啃脱大半。长蛆了，只能挖井埋掉。接着，四、五家贫雇农搬进李保长的院子，床、柜子、农具都是现成的，屋子也大，把一伙泥巴脚杆乐颠了。我亲眼见马鹿塘出了名的滚刀皮ＸＸＸ在李保长的漆皮描金雕花床上打滚，连吼了几声："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土地改革胜利万岁！"有人拍着他的脑壳开玩笑："狗日的，做梦也没想到有今天啰？"滚刀皮点头："老子在旧社会滚草，二十几年没沾过床边边；如今托毛主席的福，分了恶霸地主的大金床，下一步，老子要娶媳妇，天天日戾，争取下他十个八个崽。"大家就起哄："你养得起啰？"滚刀皮拍着胸脯说："怕个逑，以后是社会主义了，贫雇农千秋万代，只管下崽；让地主、富农断子绝孙。"

老威：这家伙真无赖。

彭绍宗：不管无赖不无赖，人家的确除了自己的鸡巴，别无长物，这就是土改的本钱。划阶级凭三把尺子，一是有没有丫头、娃子；二是有没有租赁、放债；三是有没有长工、短工。三条占全就是地主，够两条划为富农。

老威：当时马鹿塘划了多少地主、富农？

彭绍宗：多啰。我太小，因为守院子，没机会参加斗争会，所以记不着。余学康是民兵主任，他记得着。

一辈子没出过山的路边老奶奶，听不懂我的话，也不晓得在守望什么

土改受害者董存英一家

前奏

直到从70岁的的放羊娃身上再也榨不出油水，我才贪婪地吞下两口唾沫，中止了录音。我将老头送出门，太阳更红了，犹如一颗橘子，被挤得更烂，山影笼罩下的马鹿塘街面，有一半浸透了太阳的汁水。司机老张在车里打瞌睡，此时探出头发零乱的脑袋问："下一步？"

我也问："下一步？"跟在身后的孙如策抬起腕表应道："快6点了，可下一步还远。不如在马鹿塘先歇，明天一早走。"我脑子里打了个转，就追问到底有多远？小孙吞吞吐吐道："车下不去，走路要花一个多钟头，我的腿……"

我正拍着他的肩膀表示安慰，司机老张却插话道：“现在离天黑还有两个多钟头，抓紧点，我们还能赶到。”

小孙反问道：“你能找到么？”

老张满不在乎道：“这方圆几百里，没有我找不到的地方。你就放心地给你家亲戚打个电话，让他们腾出床铺，准备晚饭，我和威老师要在那儿过夜了。”

小孙还在犹豫，一个10来岁的孩子却从斜刺里蹦了出来：“我愿带路！”

我和老张立马欢迎，于是两大一小在寒风习习中上车。小孙扒住车窗，挺遗憾地与我握手，连说“还没有办招待，还没有好好聊”。我晓得他的心思，就拍着他的手背许愿：“我会把你的悲情故事告诉更多的人。”

车开动时，小孙还跛着腿往前跑了几步，我不忍心，就冲他大叫“明天见”。其实明天见了又咋样呢？在如此危机四伏的社会环境中，我这种自身难保的异类文人除了耍耍嘴皮子，能起到什么作用！

沿着盘山公路，车开得风驰电闪。这是盛夏，可在路两旁，不时飘过裹棉大衣的农民。斜阳在云里忽隐忽现，穿行得极快，令我蓦然回到早年在川藏高原驾驶卡车的时光：几

1

2

3

4

1、山脖子间的院落。面包车历经折腾，无路可去，我们从牲口蹄下开始步行

2、路遇石灰河，没有一滴水

3、暮归的山民

4、群山肚脐眼里的又一村庄

司机小张在前，十几步之后才是我

十里不见人烟，除了车轮与地面的摩擦声，啥也没有。地球空寂得要命，雪坡平缓向上，似乎打一个盹，车就开进天幕了。有时风一起，太阳就变得脸色煞白，断线风筝一般哗哗晃动，眨眼就坠下雪峰。接着，星星或银鱼浮现在深蓝里，令人的心脏也为之窜动。

当年我 20 几岁，曾感叹“宇宙是个巨大的鱼缸”，可余音未散，我就 40 几岁了。而司机老张 30 几岁，已有两个孩子。眼下，跑了 20 来分钟的“好路”终结了，他一打方向盘，

车就拐上了一条机耕土路。一边岩壁一边深沟，可车鼻子前的空间还越来越窄。我的身体和脑袋不由自主地晃悠开来，有那么两分钟，我死盯着老张，因为三条命都捏在他的手板心里。小孙的弟弟，那个自告奋勇带路的孩子，本来横躺在后座睡大觉，此时也被颠醒，把住车门东张西望。老张笑骂道："小狗日的，眼睛放亮点。"

一直是下坡，老张的刹车踩得嘎嘎响，有两次，车轮忽地定死在悬崖上，老张伸长脖子，边看边退，而后继续往下放车。我抹了一把冷汗道："早知这么险，今晚就歇在马鹿塘了。"

老张吐了口气："险的还在后头啰。但愿上帝保佑夜里别下雨，要不明天车就上不来了。"

小孩在耳朵后插话道："上不来就多玩几天啰，反正学校放暑假。"

我有点冒火了，可转念一想，风云变幻，谁能左右呢？只好闭眼 3 分钟，向我姐姐的在天之灵祷告，愿归途顺利。

高度降了几百米，机耕泥路换成了碎石路，车在眨眼间变为淘气的小鬼，蹦着高下行。拐过一个直角山嘴，我在震耳欲聋的机器声中望见一个红彤彤的十字架，精神不由一振。尽管时间非常紧迫，我还是在车过教堂顶时，让老张停

住，下去拍照。真是天随人意，一抹阳光刚好从乌云缝隙中透出来，我手指微颤，以陡峭如天门的绝壁为背景，拍下了那交叉着的永远的火炬；还拉拢镜头，拍下距离教堂十几米远的一位安详的驼背老太太。她戴着紫红圆帽，将手作遮阳帽沿，正转眼凝视我。

后来这两张照片成为我这个摄影盲的“经典之作”，被一些朋友吹捧，认为那背景令人忆起劳动党统治时期的阿尔巴尼亚，那个几乎被当代社会遗忘了的“山鹰之国”。可惜还没听说上帝的荣光笼罩过它。

老张还以为我是基督徒，就说这教堂里的人他熟悉，可以进去参观的。甚至住下也行。我却断然说：“上车吧。”

面包车又跳了一刻钟的舞，把个老张搞得咬牙切齿，犹如在驾驶坦克。小孩觉得好玩，故意上下颠屁股，我急忙制止。突然，车不跳了，老张换了个挡，却更加小心翼翼，眼珠子死瞪着右前轮。原来路在眨眼间收拢了三分之一，只够骡马车通行。老张没有退路，就照着绵软的旧辙印，一尺一尺向前挪动。为了配合驾驶，我将脑袋伸出窗外，千仞绝壁自车门齐刷刷地切下去，令人一阵眩晕。我急忙摘下眼镜，狠掐鼻梁。幸好我在现实里没有恐高症，可在梦中，我却一再经历目前的场景，车轮滚动在悬崖上，滚动在塌陷的路面上，我连人带车坠下云端，沉入河床，可还落不到实处；河

床也是漏洞，车都嘣嘣摔散架了，还从漏洞里往下掉。我拼命大叫，脑袋挂在一边，看着身子在几十米的低处翻筋斗……

当年我在川藏线开卡车，我们车队里就有一个翻车冠军，5 年中翻了 13 次，每次都从解放牌的车头奇迹般地露出血肉模糊的脑壳来。不知为什么，20 多年后，我又在采访途中望见他躺在脚底，躺在夕光笼罩的山谷中。

还有我的保护神姐姐，也于 1988 年逝于车祸。

但是，现实、记忆、梦魇的界限还是在 20 分钟后清晰了，车安全抵达了位于山腰的列朵涅村，贴着岩壁，停靠在一户农家的院墙外。不及喘气，老张就跃上陡峭的台阶敲门。指着车与门内妇女交涉了两分钟后，才甩了甩有些麻木的膀子说：“妥当了。”

我们急行军一般穿越这岩石上的村庄。经过一牛马充盈的破落院子，我举起相机拍照。步履稍慢，老张就转过身，不由分说地从我肩上抓过背包，赶在前头。向导小孩此时方显出山地人本色，羚羊般跳跃的同时，还不忘与狭道旁的其它孩子打招呼。我们屁股后照旧跟了一长溜黑黝黝的人和狗，直到将我们送出村尾才刹步。

有一股山泉哗哗淌过村子，在拦腰部位，人们建了一公共水池。一个老人蹲在水池边刮洗洋芋，我拍了照，习惯性地要与他交谈几句。不料刚听清“我今年 80 啰”，老张和小

万丈沟壑间的十字架，能否拯救万丈沟壑间的中国人？

孩竟齐声冲我吆喝。骇得我也模仿羚羊连蹦几个高。

出了村尾，箭一般射过一片梯级苞谷地，夕阳就已稳稳嵌在对面山头了。裸露的山体，犹如几个互相撕扯的疯子，在苍穹的病院里痉挛起伏。我们在疯子连绵的肩头上暴走，鞋底嗤嗤摩擦着尖利的石块，溅起一阵阵粉尘和火星星。又过 20 多分钟，山体的颜色由黄褐转为铁青，山道也越来越龇牙咧嘴。我挥了若干把汗，又跌了两跤，险些就栽下深渊；可前面那一大一小两混蛋，竟头也不回，反而还连走带跳。

我蓦然记起老张说过，他那彝族老家，陡得洋芋也没法种，如果遇上天降暴雨，山头的土就哗哗往山脚倒。

“难怪狗日的越奔越欢，”我想，“刮风的速度，衬衣不脱，连汗也不抹。”

就这样吭哧吭哧了近一小时，我们进入一个长长的斜坡。沿坡一排树林，细细的枝干相互缠绕，密得像铁丝网，而网的里面，是粉白的碎石床。我刚拍了一张照片，那两个又窜出数丈之远，逼得我不得不大叫。他们才如梦方醒，自顶端回首，二目已中蛊一般恍惚。

我们在山腰缓行了几分钟，老张有点抱歉地与我搭话，将刚才出发的地点指给我看。脚下是探不到底的天井，原来我们围着井口，绕了大半个圆。暮霭自底部渐渐升腾，随风在两边拉起一座莫须有的虹桥，令人觉得转眼就可以飘回蚂蚁般蠕动着的彼岸村庄。

下坡的道太陡，犹如一条顺着井壁弯曲滑行的蟒蛇。我跟在两个“羚羊人”的后面，连滚带爬，出尽了洋相。最惊险的一次，我忽地溜出五、六米远，骑在了一棵树桩上。终于，在海拔又降了千把米之际，我们也降入又一个汉彝杂居的村落。接着的村间小道要平缓些，我举相机拍下一面肉红色的土坡，还有背着小山似的柴草归来的村民，他被压得满面愁容，却努力对我挤出纯良的微笑。

天色已混沌了，但能见度不算最差。我抓紧时间，又将一个准备进门的老富农摄入了相框。他已 81 岁，还目光如炬。他说，几乎全村子都晓得我们要来。

“真的？”我感到惊讶。

“山沟沟，外面来个人就算个大事啰。”

几乎随着最后一线天光的飞逝，我们钻入位于一面缓坡的撒戈铲村之陈家。院墙内，猪狗鸡已归圈，可一见生人，就汪汪嗯嗯咯咯地表示立场和态度。我们上了台阶，一个十分整洁的蓝衣婆婆连胳膊逮住我的手，然后才转过头，听老张和小孩介绍情况。

蓝衣婆婆叫董存英，今年 85 岁，裹着很精致的三寸金莲；跟在她旁边的反应迟钝的爷爷叫陈义尧，今年 84 岁。老两口正是我此行的主要采访对象。

我们被请进堂屋，饭菜已经摆上矮桌，有腊肉、鲜肉以及两三样菜蔬，这在山区已十分丰盛了。共进晚餐的有老两口的大儿子陈国良，1945 年生；二儿子陈国聪，1947 年生；三女儿陈国芬，1950 年生。还有五、六口，属媳妇及孙子辈，因与土改相去甚远，暂不记载。

访谈开始时，已是夜里 9 点过，按中国乡村的作息规律，这一家老小早该上床休息了。但却一个不少地聚在我的周围。

85 岁的地主婆董存英，三寸金莲非常稀罕

我注意到陈义尧爷爷始终蹲在门边，不吃不喝，只抱着头呻吟。婆婆说，这个查不出的病根，自他劳改回来就落下了。

正文

老威：我是四川过来的作家，想了解一些土地改革的情况。

陈义尧：我晓得，可是说不成了。

老威：讲一点算一点嘛。

陈义尧：真的说不成了。

老威：几句也行。

陈义尧：我一说，脑壳就疼得厉害……哎呀！说不成！

老威：老人家得的什么病？

陈义尧：说不成……

（难堪的沉默。蚊虫像微型轰炸机群，嗡嗡袭进门来。老人以双拳挤脑袋，痉挛的脸颊淌下两行热泪）

董存英：他是说不成了。他今年 84，脑壳就疼了 20 几年。他心头是清楚的，说不成着急啰。

老威：清楚的？不能说？

董存英：一件事情，他颠来倒去想好多遍，同睡一张床，我不睁眼睛，也晓得他的嘴皮子在咕哝咕哝地动，可就是说不成！脑壳一炸，啥也没有了。

老威：我不太明白。

董存英：他 28 岁判刑劳改，56 岁才释放回家，虽然岁数大了些，可头脑、心眼都还好使。有一回，他上山砍刺笆，鬼推磨一般，刀口翻转，差点砸了自己的脑门。回来就不对头了，眼眶内白多黑少，一有响动就举胳膊，甚至吹风也举胳膊，好像上面有看不见的人，很凶的人，要敲他。晓不得

是疼还是吓，他动不动就鬼叫、鬼叫。可怜啰。

老威：跟劳改有关系吗？

董存英：他劳改期间倒是规规矩矩，没犯病。

老威：他是哪年判的刑？

董存英：减租退押那年，他被判了无期徒刑。

老威：什么罪？

董存英：晓不得。

老威：地主？

董存英：我们家田地很多，一解放就成了地主。他三天两头叫押去开斗争会，每次都鼻青脸肿，走着去，爬着回来。他说，农民协会堆了几大箩筐的罪，他都晓不得该认那一条。

老威：总有具体的名目吧？

董存英：他在旧社会当村长的时候，曾领着一伙男男女女去乡上开会。其中有个年轻人作风不正，沿途调笑妇女，他实在看不过，就骂了几句，言语比较重。后来这人想不通，竟吊脖子死了。这事过去就调查了，明明白白结了案，可土改时却被翻出来。人家硬说是他害的。

老威：这叫旧帐新算。

董存英：晓不得。那年头，只要有两三个贫农说你有罪，工作组立马拍板。

老威：就这一条？

董存英：我们的老家不在这下面，是在马鹿塘上面的草海子。旧社会，他家里比较富裕，送他到禄劝县读了中学，然后，他自愿到马鹿塘附近的普福村教了两年书。因为有文化，他跟着又回草海子，被选为村长。

老威：按土改的标准，这也是一条。

董存英：四几年，共产党的游击队藏在万山老林里，经常溜出来偷袭乡公所。国民党派部队剿匪，强征当地农民“协办”，他也被弄去。枪不敢放，替“剿匪部队”煮了几个月饭。

老威：按阶级斗争的标准，爷爷他没掉脑袋算幸运了。

董存英：他读过古书，经常背着人念叨：上下几千年，每次改朝换代，都有人头要落地啰。所以我们一心想的就是逆来顺受。

大儿子陈国良插话：

我那时六、七岁，已经能记事。房子、田地、牲畜、财产，该交的都交了，大爹、爹爹两弟兄合计，共产党泰山压顶，既然保不住家业，还不如争取个主动态度，少受些罪。可减租退押还没结束呢，罚款又开始了。金银铜铁，锅碗瓢盆，只要值点钱的，都他妈的拿去啰。稍微象样点的衣裳都脱下，甚至带金边的包包、绣花鞋也没剩。

可结果呢，大爹和我爹都关起来，吊、打、跪刺笆、跪

瓦碴子、顶石板、顶火塘里烧红的铁三角。还用枪筒子剁嘴，搞得大爹和我爹一会儿冒烟一会儿出水，牙齿一颗一颗掉光了。铁打的人也遭不住哦。可家里已叫挤干净了，一跤跌进门坎，连挡脚的砖头也没多余的。

唉，聪明点的富户，都晓得先偷偷挖地窖，藏些东西。因为共产党的运动，都是一环扣一环，步步升级的。清匪、反霸、征收公粮、减租退押加罚款……你挤一点我交一点，最后搞急了，要拿命去了，再把肠肠肚肚全翻出来。这样，没伤筋动骨，人家也好一个战役接一个战役，向工作组汇报成绩。我爹把古书倒背如流，却没想到老框框套不了新政策。你要争取主动，一下子全交，但下一回就没得交。

陈义尧：比李自成进北京还狠！

老威：老人家清醒了？可以讲了？

陈义尧：民国的时候，我家的银子用铜盆装。几辈人的辛苦……

老威：是嘛。

陈义尧：说不成了，说不成了。

老威：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陈义尧（猛敲天灵盖）：这里头，好多虫虫在爬在咬！我要说，说不成。

老威：你喝水吗？

陈义尧（啜泣）：我、我……

老威：你能写吗？我给你笔。

陈义尧：哎哟。

董存英：老头子，你咋个啰？我晓得你心头明白，你就坐在一边听嘛，不同意就摆手嘛。实在恼火就先睡啰。

老威：爷爷你莫难过，爷爷你四世同堂了，重孙子都这么有出息，还有啥子看不开？莫激动啊。

董存英：他现在好多了。同志你晓不得当年那个惨！男人身上榨不出油水，就拿女人开刀！娃儿他公公、奶奶也抓了……

81岁的富农份子，天快黑了，来不及访问了

陈国良插话：

民兵将奶奶五花大绑，吊在走廊的门柱上一天一夜，膀子都扯脱了。他们一直拷打，只要还有一口气，就朝死里弄。奶奶下身是光的，有些整法我说不出口哦。记得民兵回家吃饭的时候，我才敢从床底钻出来，搬一个小马扎垫在奶奶的脚下，让她稍微歇口气。我舀了碗水，要递给她喝，可人太矮，够不着。我哇的哭了，奶奶这才从昏迷中醒过来，叫声“良娃子，奶奶活不了”。她那个样子比鬼还吓人，头发被拽掉了大半，天灵盖像个坑坑洼洼的核桃，脖子细得撑不起脑壳，抬一下，马上就耷下去，于是她鼓了几分钟的劲，再抬一下。我说：“奶奶，你不要死，我找妈妈来给你松绳子。”奶奶呻唤着说：“你妈给我松绳子，她也不得活，这是铁板钉钉的政策啰。还是叫你妈从她后家想想办法。”

老威：什么办法？

陈国良：妈妈和大妈的娘家都是大地主。我太小，晓不得大人们咋个设的法，在 3 天内端了一铜盆银子来，民兵才把奶奶放下地。家里人给她穿裤子，但是两腿已肿得套不进去。由于膀子从后面扎在一块好几天，一松绳，就瘫了，直到死，也是个残废。

老威：老人家，你娘家的情况怎样？

董存英：我后家在大松树村，19 岁做了陈家的媳妇，带了许多陪嫁，来到草海子。我不愿回头，免得伤心。在土改中，舅老公、舅老太都死掉，只剩一个侄儿子，养了一个侄孙子。他妈的，说不成了，都“改”光了。他和大哥一直关着没放，余下这一窝人接到工作组和贫雇农主席团的通知，滚出草海子！七、八辈人变牛变马，才有了这点根基，那个料得准，共产党一来，就要连根拔。他这个呆子，又把古书读翻山了，株连九族，戴枷戍边，这是朝廷重犯才有的下场啊。马鹿塘离朝廷几万里远，出了这万山老林，我们连只小虾虾也算不上。

老威：真是覆巢之下无完卵。

董存英：本来堂屋中央，还供有“天地君亲师”，列祖列宗的牌位，过去是允许带走的，而新社会，都当成封建迷信，先就叫穷棒子砸了。临走的那天半夜，娃娃们都睡着了，我放下还在吃奶的三女儿，与他们的公公、奶奶、大妈、还有小大妈一块，跪在草窝棚里，悄悄对着那世代相传的陈家大院作了揖。我们都哗哗地掉泪，可捂住嘴巴，不敢出一点声——如果民兵发觉了，要罪加一等啰。

第二天大早，出动了 30 几个民兵，还有十几条枪，先将我们押到乡公所登记。除了穿在身上的，任何东西都不准带，否则以“对抗土地改革”论处。被撵出草海子，我们歪歪倒

倒，走了一天一夜，只能以随身揣的 12 个荞麦粑粑充饥。

老威：草海子海拔高，这撒戈铲已快到山谷底了，气候还是要好些吧。

董存英：我们在高处住习惯了。那儿有去撒营盘和禄劝的大路，民国的时候，就与外界通商。相比之下，这边是个坛子，叫四面山封住了，出一趟门很不方便。

老威：我们从马鹿塘绕下来，大概花了两个半小时。

董存英：你们是坐车一半走路一半啰。从撒戈铲去赶街，最近的场口是马鹿塘，爬坡下河，腿快的年轻人也要走小半天。所以，要去就得满天星出门。如我这种小脚老太婆，几十年上去不了几回。

老威：万一病了咋办？

董存英：村里的卫生员发几颗药。严重了用骡马驮，颠簸不得就抬滑竿啰。

老威：太危险了。

董存英：习惯了就不危险。不过时间久，从山路上马路，再等过路汽车到撒营盘或禄劝，七弄八弄，说不定半路就报销了。所以，还是草海子好，哪怕是几十年前，也比撒戈铲的现在好。

我们刚下来，这儿穷得叮当响，连地主、富农都住土坯房子。我们没住的，民兵把我们丢在露天坝就不管了，还说，

看月亮吧，这儿的月亮比草海子的好看。我们只得忍着饿，在避风的岩边边搭了一个草棚子，从坡上兜了些乱草铺地下。一家人就垫着草挤一窝，没被子，就脱了衣裳当被子；没吃的，就在荒坡间四处寻，兔子似的掏洞，能入口的根块、树皮、野菜全找回来煮。

熬到土改过后，他劳改去，大哥却意外地回来了，一家人又有了顶梁柱。他领着我们，几天修了一座小土坯房子，就算正式安居了。共产党的天下，天地翻了个滚，该轮到我们为贫雇农做牛马了，砍柴、喂猪、背粪、耕田，啥子都抢着干，才勉强糊口。接着，我们家也分了边边角角的一点薄田，凑和着种吧，人总得活下去啰。

陈国良插话：

后来又是合作社、人民公社、大跃进、公共食堂，还有三年自然灾害、四清和文革，我家是四类分子，公社、大队、生产队，每一级开批斗会也少不了。我家三子妹，因为受阶级成分限制，都没有念啥子书。老威同志你看，这是我二弟陈国聪，小我两岁，性格最像爹爹。认不了几个字，还喜欢翻报纸。如果环境正常，弄不好是个秀才。可在 1958 年，他才 11 岁，替集体放牛。天突然降暴雨，他急忙把牛往回牵。坡上太滑了，风又大，那牛有点老，眼睛昏花，一脚踩虚，

就向岩子下栽。我二弟挽着牛鼻绳，抱住牛腿拼命顶。一个娃娃哪能顶住老牛啊，一个狗吃屎，牛就从他脑壳上压过去，翻了几个滚，落下岩子死了。

本来二弟也受了重伤，直到现在，他的脑壳都一下雨就痛。跟爹爹一个毛病，说不得话，记不得事。但地主子女摔死了集体的牛！这不反了天啰？这不是借牛进行阶级报复啰？生产队马上开全体社员大会，批斗我们全家。最后还决定，要二弟为牛披麻戴孝。

虽然是个娃娃，虽然二弟为了救牛，脑壳落下病根。可还是披麻衣，拖几丈长的孝帕跪在死牛旁边大半天，每隔半小时要磕三个响头。

老威：真够荒唐。

董存英：大山沟的农民，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也没个乐趣。毛主席、共产党来了，把阶级斗争当成乐趣。俗话说，蛇咬人有药医，人咬人就没药医啰。哪怕我儿子是个懵懂娃娃，大伙让他给牛当孝子，也觉得好耍。

我是个小脚老太婆，他们在土改时，硬逼着我在田埂上来来回回跑，一大伙人跟前跟后参观。跑不动，就用赶牛的竹竿抽。我栽进田里，满身泥水地爬起来，他们就拍着巴掌，跳着脚笑。文化大革命，他们又押着斗争了几百次的四类分子，都是些吊着半口气的焉巴老头老太，到毛主席像前请罪，

跳忠字舞。嘴巴都不关风了，还要唱“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的脚小，一转圈就跌跤，可偏要叫我转圈，他们好找理由打人，好捂着嘴巴笑。我还偏着耳朵听他们发议论：“幸好有了毛主席，弄些地主、富农来斗，要不贫下中农的日子也不好打发。”

老威：你能熬到如今，不容易啊。

董存英：减租退押那年，他去劳改，我以为永远回不来。民兵又把我抓去，打得太凶，我受不得罪啰，就趁他们不注意，跳草海子自杀。可没两分钟，来了十几个人打捞。我喝了一肚皮水，还是叫人家从几米深的海子底，揪住头发提上岸。擀面杖在身上滚来滚去，我痛醒了，盯着上头明晃晃的太阳，怀疑自己是不是已死过了？却听见一个声音说：“狗日地主婆，还敢跳水，抗拒土地改革！”“另外一个声音说：“你就是跑到阎王殿，也要把你弄回来！有种的又去跳。”接着就是打雷似地要打倒我的口号。

我被关押了一个星期，逼着交代自杀动机；我说没动机，就是不想活。他们就打，就说还没到死的时候。如果人民政府要你死，你想活也得死。而自杀是不允许的，你自杀，给整个草海子村的土改形象抹了黑。

我在大会上一次次认罪，死也死不起啰，要连累后代啰。所以只能活着，为共产党、毛主席活着。为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活着。嘿，想不到贱命这么长，85岁了。

老威：老人家的政策水平蛮高嘛。

董存英：1979年，地富分子揭帽，他又从监狱回来了。

老威：平反了吗？

董存英：听他说，早两年刑就服满了，又留场。后来中国跟越南打自卫反击战，边境不稳定，就把所有留场人员清理一遍，该放的就放。

老威：没有一个说法吗，爷爷？

陈义尧：哪儿来哪儿去……我我我……

董存英：你就说两句啰。

陈义尧：哎哟，说不成，说不成！

补记

访谈勉强结束，已近午夜12点。装了十几个人的堂屋闷如火药桶。这个历尽劫难的家庭，年龄最大的85，最小的已衔着妈妈的乳头睡着了。

我和老张被安排进孙儿媳妇房间，同床抵脚而眠。随着神经的松驰，便意袭来，于是我起身出门寻臭。不料那个曾为牛尽孝的迟钝的陈家老三竟闻风而动，举着电筒，顺院墙跟引路。山风呼啸，树影摇曳，我的衣裳下摆被刮翻起来。

几乎失忆的土改受害者陈义尧，也 84 岁了

而脚下的石板嘎嘎响，如果不小心踏空，就会降落四、五米，躺在另一农户的房顶。

拐一直角，又上了 10 多梯土坎，陈三哥把我直送到屋后的茅坑前。一掀草帘就如厕了，可他还要手握电筒，电线杆一般立在外头充当警卫。这实在让人难堪，我强笑着，一再谦让，可对方更加有礼，臊得我不禁怒吼一声，夺过电筒，对方才醒悟似地撤退。

粪坑之上，横着碗口粗的木棒二根，我探入左脚，被惊扰的蝇群爆炸一般升腾开来。我赶紧缩回，变成憋急的兔子，不问深浅地往上直窜了几丈。方下蹲撒野。

畅快了没几秒，从对面山谷嘘嘘来了一阵旋头风，如一把无形的铲子，将我整个端了起来。无奈，我挪了个窝，要继续畅快，可外露的肉馒头却触电般哆嗦，我蹦了个高，转

身拿电筒当机枪扫射过去———一条蛇！天哪，矛头形状的脑壳已直竖起半尺高！我差点就坐在蛇窝里！

我后迈两大步，一转身来个勇士跳崖，刚巧在茅坑外跌了个狗吃屎。动静巨大，惹得一柱强光自下方刺来，由于裤子已在膝盖，我的私处暴露无遗。

无奈，只能从头收拾旧山河，让站岗多时的陈三哥接应回屋。掀帐上床，倒头贴着鼾声轰隆的老张侧卧一小会儿，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朦胧起来。其间，因奇痒，梦游似的直坐三回，狂抓头颈、肩背、肚脐周边、大腿两侧，致使伤痕累累。

而后便无梦。

鸡叫数遍，接着是狗叫，牛叫，及猪叫。天蒙蒙亮，老张先起床，出外洗了把冷水脸，折回叫我“威老师”。

风起如昨，我觉得不必擦脸了，就抓起背包，登上新的旅途。

贫农酒鬼余金元（上）

前奏

2006年8月5日早晨9点多，经过约3个小时的爬山涉水，我们又从撒戈铲村原途返回马鹿塘。冷太阳下的街面空寂依旧，双肩瑟缩的我敲开联络人孙如策的“美发厅”，里头睡的却不是他。可我们上斜对面的汤面馆刚落座，他竟出人意料地浮现了。

四张嘴围住圆桌，有声有色地吞掉四斗碗汤面，然后呼着滚滚热流出门，紧跟一身迷彩服的孙如策，一瘸一瘸奔向

下一个工作对象。小孙虽然两眼辣红，也许心潮澎湃了一夜，却再也未提自己的私事。我猜是孙医生与他通了电话。

从昨日寻访民兵主任的坡口上行十来米，就插入一片直上直下的房檐，抬头仰望，恍若顺岩壁搭建的老积木玩具，于风中吱吱摇曳。小孙在蛇形石梯口与一喂猪的农妇打招呼，后者对我们微笑点头，斜指着苍天道："老爹在上头等着呢。"

岩壁间，一个院落似一个玩具平台，我们曲曲折折拐上第三平台，那醉眼朦胧的大鼻子老头刚好自堂屋出来，冲我们嘻开了一览无余的瘪嘴："欢迎啰。欢迎啰。"

由于地势高，从四周万山老林煽起来的风荡平了马鹿塘，自脚底往脑壳钻。我们赶紧跟老头躲入门坎，蹲坐在一窝余烬的火塘边。眼睛适应了两分钟，才混沌初开，我到底认清了最里面熏得黑红的"天地君亲师位"，两侧还有"观音菩萨，秉令尊神，福禄财神，进宝郎君，地脉龙神，五谷之神"的字样。

老头扁着脑袋，嘟着鸭嘴吹火，角落里顿时尘埃弥漫。我不禁迷眼躲闪，连道"不客气"。好不容易有了火星子，老头得意地抬头，对我喷了口酒气说："快烤火，一会儿又没了。"

因为疲倦，老张靠住蜕皮的老墙闭目养神。小孙用本地话为我作开场白，老头却打断道："晓得啰，你昨天就介绍

过啰。”而后转向我：“同志你喝酒不？”

重返马鹿塘的路

我笑道：“酒不喝，倒是想喝口水。”

老头不以为然：“大清早，没有准备水。况且农村没有烧开水的习惯。”

我依旧笑道：“那就不麻烦了。”

老头将茶缸当酒盅举起，直抵我的下巴：“酒比水解渴，喝嘛。”

我只得啜一口，接着翻出录音机和照相机。带子扎扎开转时，我又啜了一口，果然不渴了。烈酒及烈酒浸泡的往事，竟如此激荡着那颗83岁的心脏，嘭嘭嘭，我已感觉到一种即

将喷血的剧跳，但无力，也不想平息。

两三个小时，我们喝光了两大茶缸，约 1 斤半高度白酒，彼此犹如恋人，勾肩搭背，如胶似漆。可职业本能还让我一再按相机，拍下若干特写，包括嵌在那张老脸上的童稚目光。记得告别时，老头扶着门框，唱了一首土改时期的革命歌赠给忘年知己；我则鼓掌赞叹，如风中杨柳，晃晃然，飘飘然，拾阶而去。

可事后酒醒，我不禁出一头冷汗，这真是平生最凶险的一次拜访啊。

正文

老威：老人家好酒量！

余金元：没酒量，只是喜欢喝啰。

老威：这酒如何？

余金元：马鹿塘本地的酒，比外头的纯。你尝尝就就明白。如果你不会喝，就使舌头舔一添嘛，先感觉到烧，有些冲鼻子，接着就是苦和麻，再接着，才是回甘。如女人的手，从嘴皮、舌头的两边，顺喉管一路按摩下去，直落到胃里头，还在继续拔火罐，一热一紧，很舒服。过了量也不会出多大的问题，死猪一般睡啰。第二天，脑壳照旧在肩膀上，不晕

不沉。

老威：真是几十年的经验之谈。

余金元：贵州的茅台，你们四川的好多名酒，我在旧社会就喝过了，还是不如云南的土酒。马鹿塘的地势高，没酒不行，没大烟也不行。过去，这一带的人，无论穷富，都吹大烟。共产党、新中国来了，破除迷信，破除陋习，提倡新风尚。不准吹大烟，不准祭祖宗，不准供菩萨。就只剩下酒……

老威：你吹过大烟吗？

余金元：大烟是越穷越吹，越吹越穷。所以我只喝酒，再贵也要弄来尝。你莫小看这茶缸子里的东西，8 元钱 1 斤啰，一般从村上的作坊打酒，最多一两元 1 斤，我是要亲自守在现场，眼睛不眨地盯着出酒，头尾不要，只拿把壶接中间的。他说 8 元就 8 元，值得。

老威：这辈子，你对酒的感情胜过人吧？

余金元：不好说啰。酒不害人，人会害人。如果我滴酒不沾，挣钱干啥？就学孙如策他老祖，去买田买地，发家致富？那到了土地改革，就划大地主，连脑壳都保不住。

老威：你们家过去有多少田地？

余金元：没有田地。所以划成贫农了。

老威：那以前靠什么生活？

余金元：跑生意，就是低价收购本地的奶猪，再运到昆

明高价卖出去。

老威：老人家算长途贩运、发展经济的先驱了。

余金元：我是做一笔生意就停下来，喝完了再做。父母骂我多少次，没出息!，可到了土改，划阶级，称大秤，我家自然是贫农。

老威：共产党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余金元：四几年就在这一带打游击了。1950 年马鹿塘解放，好多游击队就变成了工作组，跟部队来剿匪、征公粮。我还记得住在大村的工作组里有个河南人，叫张志；还有个年轻女娃娃，姓周。他们四、五个人，在这儿开展了 1 年多的工作。

国民党的官进来是坐轿子，住乡公所；共产党是骑马，这让穷人觉得亲切些。他们一下马，就往最脏最烂的地方钻，不管三七二十一，替人干活，替人出头。访贫问苦搞串联，一心要把没房子没地的、没人管没人理的、穷得要饭的、混一天算一天的，总之，把天下最遭孽的撮合到一块，组织起农民协会；再从最遭孽的人里面，挑选最最遭孽的，进贫雇农主席团。这就是工作组要依靠的核心力量啰。

老威：你算不算核心力量呢？

余金元：安排我做过卫生组长。我的记性好，嗓门大，所以也叫我带大家唱歌。

老威：你会唱土改时期的歌曲吗？

余金元：整个马鹿塘，就数我会的歌最多。每场政治运动，都要学几十首，现在我记得的起码有几百首。

老威：你就唱首土改歌吧。

余金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是土改工作组教的。我再唱一首：

中国封建了几千年，
朝朝代代，皇帝坐江山。
现在呀，老百姓一定把身翻。
农民弟兄们快起来，
清匪反霸，减租退押，
该我们人民坐江山，
幸福生活万万年。
毛主席呀坐江山，
人民的幸福万万年！万万年！

老威：这是哪年的歌？

余金元：1951 年，减租退押的歌。

老威：还有呢？

余金元：1950 年刚解放，工作组在村头教我们唱的是：

阴湿的地方需要太阳，

苦难的中国需要共产党；

太阳照耀着万物生长，

共产党领导民族才能得解放。

还有歌颂毛主席的，调子也跟如今的不大一样：

南京到北京，

哪一个不闻名？

人民领袖呀，

就是毛泽东……

老威：嘿嘿嘿，笑死人了。

余金元：当年全村的人都集合起来唱，几里外都听得见。那个工作组的女娃子还站在磨盘上指挥，一遍又一遍，要叫剥削阶级听得发抖。还有迎接解放的歌：

排排走，排排走，

欢迎朝阳升起来，

山花遍地开。

排排走，排排走，

欢迎月亮升起来，

银光照大海。

欢迎海风吹过来，

风吹浪花开。

老威：还挺抒情的。

余金元：迎了解放，就要闹翻身，脚跟脚地来：

金凤子，开红花，

一开开到穷人家。

穷人家呀齐翻身，

大家喜洋洋……

老威：翻了身就搞土改，也是脚跟脚地上吧？

余金元：是啰，走一坡唱一歌：

土改的锣鼓到了每个村呃，

贫农和雇农一家人……

老威：有斗地主的歌吗？

余金元：好多年不唱，就忘了。我想想看……哦，还记得一首：

坡上的豌豆刚成熟，
狼心的蒋狗吃了它；
地里的苞谷才长大，
背时的保长又来啰……
呀呵嗨。

老威："蒋狗"是谁？

余金元：蒋介石及走狗。

老威：嘿嘿嘿，让我喝口酒。

余金元：你笑我？老了嘛，牙齿缺了，嘴皮又不关风，所以就跑调了。土改时我才 20 多岁，喉咙亮得很，工作组经常表扬嘛。你还在笑？嘿嘿，牙齿没有你多，可命长，见的事就多啰。抗日战争，云南是大后方，全国各地来昆明的流亡学生可密了。我跟他们学会了《松花江上》，回到马鹿塘也哼哼。洋盘啰，泥腿杆，哪个会这种歌？晓不晓得"九一八，九一八"是啥子意思？

到了 1952 年，划阶级，分土地，我们家 16 口人，分得不少……

老威：到底多少？

余金元：记不得了。过去我是贩猪的，不习惯种庄稼。共产党硬要分土地，就只好种了。还买牛买羊自己养。

老威：由生意人变农民了。

余金元：原来也是农民，祖宗多少代都是农民，要不，咋个不住城里面？扯远了。总之，贫雇农都得了共产党的好处，《地契》，还有《租地合约》，从地主家搜出来，开完大会就统统烧掉。地主、富农的土地全部连成片，重新丈量，再按你们家、他们家多少人口，平均划多少亩，肥瘦搭配。政府发给《土地证》，地多少，房屋几间，宅基地出来多宽，都明明确确写在上面，盖政府方方的大红印。

我家白白地分地，先还不敢要，觉得不踏实。后来工作组和贫雇农主席团来做工作，一定要要！我一高兴，就想唱《松花江上》，可又感到它与工作组教的革命歌不一样。就找到女娃子小周说，我在抗战时学了一首歌，不敢唱，害怕它反动。小周说，你先悄悄唱给我听听，不好今后就别提了。于是我麻着胆子唱："我的家，在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想不到，小周一听就跟上来了，并且说，这是我们共产党的歌，为东三省沦陷作的歌，为啥不唱？

老威：白得了地，唱点人家喜欢的歌，也划算嘛。

余金元：嘿嘿，大形势啰。

老威：除了哼哼唱唱，你还晓得啥？

余金元：我晓得红军从马鹿塘过，那个时候的地主叫土豪，红军抓土豪，叫“绑肥猪”。家属如果不在期限内多端几铜盆银元出来，就要张贴告示，召集乡民，当众杀猪啰。这村上，我们的老人，有跟着红军跑的；有带路去皎平渡口会师，吃不得苦，又开小差回来的。后来打抗战，红军成了八路军，脑壳上戴青天白日帽徽，服从老蒋；再后来，又换回五角星，叫打倒老蒋的解放军了。云南解放那会儿，昆明驻扎的是卢汉的国军，与解放军在郊外对阵，双方都朝天打枪。跟着搞到一堆，卢汉的兵就统统换五角星了。

老威：再后来呢？

余金元：国军宣布起义，云南全境和平解放。游击队变工作组，下乡来搞征收。50 年清匪反霸，51 年减租退押，52 年土改，53 年复查——成份划过火了，不符合实际的，就降下来；因掌握政策过于保守而漏划掉的地主、富农，该升就升上去……

老威：马鹿塘这边土改复查过几次？

余金元：就 53 年一次。政策有变化，工作组又下来了。以前都是用贫雇农主席团，那些最最遭孽的。几个要饭的公报私仇，乱划了成份，乱杀了人，我们这些主席团外边的，

都说不起话。这次好了，不要主席团，工作组找上门，与我一头睡觉，拿书本本念给我听，问我们肚子头有没有气？尽管发。

我们村有富农升地主，也有一两户贫农升成地主；降下来的有三、四户。村头老袁家的三公公愿赌服输，解放的前几年，把房子、牲口、田地全部抵押给了孙乡长，剩个光屁股，土改复查就由贫农升为破落地主。后来政府发《土地证》，他跪在田坝里笑："呵呵呵，这个地主才值得哦，分了两间房，还赶条牛给我。"

老威：凭刚才激情澎湃的歌声，老人家你是名符其实的土改积极分子。

余金元：我虽然没参加贫雇农主席团，可唱歌、跳舞、开大会，还有办墙报，为刷标语的提浆糊桶，样样有份。

老威：墙报的内容是什么？

余金元：农民多数不识字，工作组就画些表格在墙上，每个人的名字都有，大家来评议。比如某某人是大户，或者在乡公所，或者作威作福，或者有奴仆、丫环，或者有通匪嫌疑，总之是坏蛋，上头一念名字，下面就抢着在他的名字旁边，一颗接一颗，画一堆耗子屎。如果你是谁都不得罪的老好人，或者上顿吃了无下顿的遭孽人，就画大白米；赌钱、做小生意、吹烟，有其它恶习，可没剥削人，还向共产党靠

近的，就画小红米……

还画了好多种粮食啰，我都不太记得了。男女老幼，每人都上，给自己，也给别人画。这是动员阶段开的会，又热闹又好耍。

老威：你给自己画的什么？

余金元：当然是大白米啰。

老威：你做过奶猪贩子嘛。

余金元：我心里有数。政府让农民自己给自己打分，就一定不要手软。当时大家全盯着，你会觉得脸皮火辣辣，可过后就特别踏实。

老威：你这 80 几年的酒真没白喝。

余金元：你又笑我？

老威：我天生爱笑。好好，罚一口酒。

余金元：我大你几十岁，你要加紧喝，才能赶上我的进度。

老威：还没赶上你，我就醉死迷了。

余金元：我天天鸡叫三遍就起床，一个人坐在这火塘边喝，也没见醉死。你摸摸我的手杆，没有抖嘛？你再摸摸我的腮帮子，如果我瞎鸡巴款，你就扇它两巴掌。好多比我清醒的、聪明的、不沾一口酒的，都跑到我前面去死了。我劝他们慢点，莫整人害人，莫操心过度，莫削尖脑壳往官帽子

里钻，都等不得，非要早早死给我看。

老威：老人家扯远了，也罚酒一口。

余金元：开会，白天黑夜都开。我那时没满 30，在家里对婆娘说，把国民党手头全部的会加起来，也没共产党 1 年的会多。

老威：划阶级的会是咋个开的？

余金元：几百上千人参加，工作组简单动员几句，就坐上面，稳起不吭声了。只由村里的主席团说话。在国民党手头做乡长、民团队长、保长；还有替他们跑腿的、吹喇叭的、在村里乡里耀武扬威的；还有神通广大的、富得流油的，统统是恶霸地主。矮一等的，虽然达不到以上级别，可在减租和退押中，拖拖拉拉，消极对抗，甚至隐藏财产，想方设法逃交罚款，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的，划为不悔改地主。又矮一等的，按田地、奴仆、长短工、收租子等称大秤的标准，评为普通地主。再就是现在衰败了，可查家庭历史，或曾经称得起大秤，或与旧政权有牵扯，就评为破落地主。再矮一等的就是富农，分恶霸富农、普通富农与劳动富农。接着是中农，富农达不到，做中农又冒出去，就是富裕中农，跟着是一般中农。

再底下，就是贫农了。再再底下，就是雇农，除了人一根，啥子都没得，在旧社会最最遭孽，最最叫人看不起的。

老威：相当于现在的打工仔。

余金元：打工仔算个迷。那个时候，雇农被共产党请来坐上把位，是最最吃香的。主席团里头，如果有两三个雇农要你死，肯定就不得活，因为工作组只听他们的。

老威：为什么？

余金元：亲不亲，阶级分啰。毛主席说过，他们革命最彻底。

老威：应该是“绑肥猪”最彻底。这也算从红军时期一路继承下来的盗匪传统。只不过人家打下江山，成了正果，绑肥猪的自己倒吃成了超级大肥猪。如今，有人再要学习前辈绑猪，恐怕已没哪么大的力气了。

余金元：搞迷不懂啰。来，喝酒喝酒。

贫农酒鬼余金元（下）

插记

谈话才开展了不到两个小时，酒已经喝了 1 斤多。我的脑袋不由自主耷下来，老头却越战越勇，二目神光四射。我先后起立几次，到屋外借冷风与冷水醒酒，还好，体内动静不大，起作用的大概是此前的那碗汤面。

为了召唤或者戏弄我，老头又把“背时的保长回来啰”唱了一遍，还跺脚转圈旋到门旁。男人的自尊受到挑战，我就从他手中夺过茶缸，灌酒一口。待两人复位，我撑起眼皮，也竭力让自己射出神光，以产生逼视的现场效果，使访谈及有关酒量的口水战能够进行到底。

其实我天生没酒量，稍微一沾，注定从脑顶盖红透至脚底板。上个世纪80年代做诗人，只咂几口葡萄酒就胡话满篇，与历朝历代及同时代之嗜酒如命的众多诗人相比较，可谓狗熊气短。不料发生六四，更不料我写诗写进了监狱。出来后，物是人非，我诗兴没有了，却时常喝两口闷酒，无所谓好坏吧，也发不出“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的高级感慨。搞《底层访谈》那会儿，我在成都殡仪馆隔壁的烂茶馆里，偶与遗体整容师老张结识，为了套近乎，进而套出他秘而不宣的身世，我竟舍命陪他喝了七、八回酒，每回都翻倒在硬板凳下，人事不醒。拿老张的话说：“除了一口气，跟尸体也差不多。”

我从未觉得酒好喝，感谢抱过无数死尸又来抱我的老张，栽培起了这点酒量，自此厮混江湖，倒无大碍。在云贵高原，我最喜欢的是50度以上的青稞酒，纯如水，却烈如火，喝它犹如猛士跨门坎，一道又一道，往深处走去。先还跨得顺，渐渐的，就会感到跌跌撞撞，体力不支了。在这个时候吹几口箫，再吟啸一阵，就觉得眼前的世界那么远，那么远，似乎在无数道门坎之外。门坎外面的人（其实就是你身边的人）缥缈得只有米粒大，你往上升或往下沉，想在哪儿就能够在哪儿。先秦？魏晋？唐朝？都行。至少你可以用那种语气与人说话，而不会被人怪罪。晋朝的阮籍为了躲避做官，竟赶

在司马昭的使者到来之前狂饮，死尸一般趴在案桌上，三天三夜不起。你看，酒是多好的保护伞，它至少让老阮在暴政之下，即张扬了个性，又得了善终。哪像圣人稽康，脑袋都快掉了，还那么清醒地弹琴，将一腔热血寄托于丝弦，寄托于时过境迁的春秋刺客聂政，真是可怜可叹的精神自摸啊。

由此我联想，在警察登门之际，我等反动文人能否也学习先辈，狂饮一番，醉他个三天三夜？万一警察也晓得阮籍的老掌故，有雅兴重演呢？太可笑了，该不该扇自己的嘴巴？因为在实际生活里被警察堵住，只会有两种清醒的结果：越窗而逃或束手就擒。酒是没用的，哪怕烂醉如泥，也将被弄上警车，丢进局子去受审。

该如何就如何，就像眼前这个老酒鬼说的：“该你死就不得活。”

哪怕不胜酒力，我的录音机还是开着。可灵魂深处的空虚、恐惧是录不下来的。现在好多了，老头儿，我再喝一口，你满意了？

正文

老威：继续讲嘛。

余金元：讲啥子？

老威：土改，划地主。

余金元：马鹿塘的大地主，孙家多啰，6 个老祖（曾祖父以上的通称---老威注）都是地主。他们这个家族根基深，清朝开明老祖的时候，就从曲靖的小衡山往这边迁了。不仅开垦万山老林，还办铜厂、办纸厂，出了许多做生意的好手。后代也很密，主脉在马鹿塘，禄劝和则黑的大住基村也有，其它地方串没串种，我就晓不得了。到了二三十年代，还出了个孙万昌，号称“孙百万”，据说在昆明和禄劝都办有铜厂和纸厂，摊子极大，受到过国民政府的表彰。

老威：算个受国家扶持的农民企业家，类似如今靠“希望牌饲料”发家的刘永好吧。

余金元：可到了解放那会儿，孙家已经衰败成空架架了，只是名声还算大，于是统统划为恶霸地主。加上其它姓，马鹿塘一共有十几户地主。除了人以外，对地主的所有财产实行没收，对富农则实行征收。

老威：什么叫征收？

余金元：房子留着，外面的财产，包括田地、租石、别人的欠帐，全部要征收。牲畜要征收，梁上的腊肉、过年猪也征收。此外，每户富农，一律罚款 300 元。当时的骡马价才 50 元 1 匹，所以搞得富农也喊爹叫妈啰。

老威：交不起咋办？

余金元：交不起就抓，就关，就翻来覆去开斗争会。饿你，打你，让你跪瓦碴，跪烂泥坑，吊你个几天几夜。还有烟屁股、辣椒水、大杠子，不把屎尿给你整出来！再不交，就要喊“开牌”。

老威：麻将牌还是长牌？

余金元：拿炮火敲你的茶壶。

老威：啥子鬼茶壶这么值钱嘛。

余金元：茶壶就是脑壳，一炮火崩掉脑壳，当然一了百了，不值钱了。可富农的日子肯定比地主好过，至少还有房子，罚款数额也明确。对地主的罚款是一路往上涨的，你给得起300，就再添100；400给了，还要增加到500，甚至600，就是不封顶。上面的政策，理解得通俗点，就是又挤又捏，直到榨干剥削阶级的最后一滴油。工作组的同志说，如果将地球上所有地主、资本家的骨油统统榨干，那共产主义就实现了。

老威：有没有交不起罚款被崩掉“茶壶”的？

余金元：孙姓三老祖家的大公公。啥子都没收了，大半年，罚款挤了550元出来，还差50，任你咋个整，把脚杆手杆弄断，也交不起。有天早晨，太阳刚刚露脸，民兵就将他架到坡上，当面挖了一口井，然后端枪指定他说：“最后问一句，交不交？”大公公吓得哆嗦，手脚绑住了，还一个劲

儿磕头，脑门子都栽烂了。人家又扳起他的肩膀说：“等你一句话啰。”大公公磕不下头，眼泪如垮堤一般淌下来，他干嚎了一声：“找不着交啰!!”

人家可没手软，说：“找不着？开牌!”一炮火冲后脑勺去，轰隆！人就趴起了。

老威：50 元一条人命？

余金元：村里人都说，大公公家大业大，到头来还抵不着一匹骡马钱。

老威：还杀了哪些地主？

余金元：光交罚款这一场，就镇压了三、四个。孙姓六老祖家的大公公，一辈子节约，不但穿补疤衣裳，连拉在路上的屎都不肯浪费，要包回来肥地。所以没有人晓得他到底积攒了好多钱。经过减租退押，赔罚不封顶，弄他跪了十几天瓦碴，膝盖烂成两个窟窿，鸡巴已经尿血了，还口口咬定“没钱”。于是全家老小都被圈拢来，陪他跪。没一会儿，女人们就遭不住，又哭又喊：“老背时的！老挨刀的哟！为了几个钱，全家人的命都搭上啰!”这一闹，老吝啬鬼就垮了，两个拳头又捶胸又捶地：“扶我起来！扶我起来！带你们去挖！带你们去挖!”周围的民兵一听，高兴得拍掌，立马架起他跑了 1 里多路，才在一个荒园子边边刨出 6 个大白锭，每锭银子足足有 10 两。

四老祖家的孙光诚是个烟鬼，他把鸦片膏埋在盐巴坛子底下。枪抵着他，把一坛坛盐巴搬开，挖几锄，烟坛子就露出来。开了封，乌亮亮、黄澄澄，一坨又一坨，全是上等货。

老威：割肉哦。

余金元：存了几十年的鸦片膏，跟金条子的价钱差不多啰。

老威：交干净保命嘛。

余金元：没有一个地主心甘情愿交钱。不斗争，银子不会自己长腿跑出来。开头，尽管大形势和政策都明摆着，地主们还你比我，我比他，甚至学“狡兔三窟”，将浮财藏好几处。拿工作组的话说，敌人总要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可结果呢，人吃了亏，有的还落下终身残疾，可罚款不能不交齐，否则“茶壶”难保。

不过，“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共产党说话算数，多数地主还是释放了。养完伤，熬到重新落户、重新分地，无论好歹，还是有一份啰。只要没判刑劳改，都给出路。地主中也有老好人，干活比贫雇农更卖力，大家都看在眼里。1958年，合作社过渡到人民公社，地主、富农也一概入社，成为和大家一道评工分的社员。

你问杀了多少地主？我得扳指头算一算。清匪反霸到减租退押，光孙姓家族，大老祖家就死了大公公、二公公、三

公公。还有二老祖家的二大爹和孙乡长孙大恩。三老祖家的大公公，四老祖家的孙光诚，孙百万家的孙维汉。六老祖家的大公公。其它家族，死了赵家强、方少先、朱洪葛、陈仕统、陈仕章、高本伦、李荣胜。还有哪些啰？记不起来了。

总之，在伪政权手头做过事的，与解放军对着干的，有血债的，拉贫雇农主席团下水的，窝藏财产抗拒土地改革的，贩过烟摸过枪的，大家觉得不太顺眼的，一个都没有逃脱。我亲眼看见，就镇压了好几十。马鹿塘、撒营盘、则黑、皎西、皎平，公审大会转着圈儿开，每次都是几千上万人。

老威：马鹿塘乡毙人在哪儿？

余金元：张家坟场。就在我的房子背后。那是张家的祖坟场，清朝、民国一直到解放，坟包密密匝匝。土改时候，在里面镇压了五、六次恶霸地主。

老威：每次崩多少“茶壶”？

余金元：5 颗以上。镇压方少先是在 1950 年。当时从他家里搬来两张八仙桌，迭在一起，足有 3 米高。这姓方的 30 多岁，长得牛高马大，旧社会当过地方民团的团长，连土匪见着都怕。几个解放军把他弄上桌子，虽然五花大绑，可叫他跪，他就是不跪。下面的人吼了几回，他还是要站起来，说要盯着太阳走。死到临头，就由了他。黑压压一大堆人在下面，仰起脑壳，却只能望见他的下巴。有人问他：“方少

先，你打过共产党游击队没有？”他回答：“我晓不得。”又问：“你做过什么？”他回答：“我做过团长。”大声武气的，没有一点虚火。

下面安静得很。一般农民哪见过这阵仗，埋起眼睛不敢看。只听得姓方的又吼一声：“有没有酒？”下面应一声：“有。”

“赏一口嘛。”

“给他酒。”

腿快的人舀来一满碗酒，当兵的一手挎枪，一手从一片人头中接过去，说：“方少先，脑壳埋下来。”

姓方的蹲了下来，伸脖子来就酒碗。

当兵的手短，够不着。就说：“坐下来，慢慢喝完再走。”

姓方的就坐在两张桌子上，当兵的还是够不着。于是和另一个当兵的商量，两个人迭起来，终于将酒喂上去。

姓方的叫了声：“够意思。”就呲出牙齿，轻轻衔住碗边儿，猛一仰血糊糊的脸，哗的泼进嘴巴。

跟着一声破碗响。再跟着一阵排枪。姓方的脑壳烂完了，连胸脯也全是蜂窝眼。他坐不稳，就从两张八仙桌上倒栽下地，半截颈桩插在一个坑里。两秒钟，他弯了一下腿，又啪地蹬直，翻了两转，才不动了。把大家骇得天昏地暗，人群一会儿散开一会儿拢来，婆娘娃娃都惊乍乍地叫。

老威：我都听得受不了。来来，喝口酒。

余金元：酒鬼啰，要死得干脆些。

老威：有死得不干脆的？

余金元：烟鬼孙光诚就怕死。镇压他时，民兵拖着到了井边，喊“跪起”，他却瘫起了。眼睛里全是一片白，拽来扯去都弄不正，就要将就着打了。可枪筒子指着脑壳轰一炮，他却一偏，转身就抱住毙他的那个张天佑。吓得人家哇哇地鬼叫，甩了枪，爬起就跑。但是又跑不动，因为被孙光诚圈住了腰杆。一堆人扑上来，打、踢、枪托子捣，牙齿都整飞出来了，孙光诚也没放手。这个倒霉的张天佑哦，裤子扯脱人才扯脱。原先还以为毙人是好差使，是党和人民的信任，最能体现对剥削阶级的恨，结果被骇得光溜溜地满山跑，全村人都去追。

老威：孙光诚呢？

余金元：换人换枪啰。黑着一张脸上前，大吼：“死都死了，你还要哪样？！”轰隆一炮，人倒地了，咕咕地冒血，却还在叫唤：“呃，咋个打的嘛？！”于是再轰一炮。孙光诚的身板猛一下绷得直直的，接着翻半个滚儿，咽气。

老威：他妈的，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余金元：遇到困难喝口酒，阎王不得勾你走。

老威：喝一口就喝一口。

余金元：转个眼，这些人就死了几十年，记不得提不得！遭孽哦。

老威：你觉得他们该死吗？

余金元：该死也死了，不该死也死了。管逑他，喝。

老威：你还晓得哪些？

余金元：这地方属于撒营盘区，彝汉杂居。彝族那边有龙家、禄家土司。土改时候也毙掉了不少。龙家娶鲁坝的一个姑娘做土司婆，花 60 两银子打了顶凤冠，因为太沉了，只在大婚仪式上戴过一回。解放军清匪反霸，一家家围剿大户，解除武装，没收财产，鸡犬不留。轮到龙家，当家的镇压了，土司婆也逃不脱。毙她的那天大早，我们赶到撒营盘，正碰上解放军拿枪逼她穿上拖地的彝族带裙，戴起 10 来斤的凤冠。

老威：演戏吗？

余金元：凤冠上的银链子叮叮当当的，还真像戏台子中的皇帝娘娘。大家里三层外三层地观看，连树上房上都挂满了人。可当她穿戴齐了，解放军却递过去一把笤帚，命令她当众扫地。土司婆以前都有丫环服侍，哪干过活儿？只见她像个木头人，一扭一扭，带裙与笤帚都在扫地。没一会儿，凤冠就压得她受不了，汗珠子淌成了两条槽。她向解放军打躬作揖："报告大军，请允许拿掉凤冠。"解放军回答："不允许。土司官爱这个漂亮，你就顶着它劳动嘛。"

土司婆没办法，继续扫地 1 个多钟头，一直到早饭时间过，人快晕了，才剥掉那身遭罪的行头，换了平常的穿著。和方少先一样，她也是在两张迭起的八仙桌上被毙掉的，像个女鬼从戏台子栽下来，骇人啰。

老威：唉，人生如戏，老人家喝酒。

余金元：这马鹿塘太穷了，太穷了就恶。现在好些，可同外面相比，还是差劲。年轻人，男的女的，都往外跑，不跑不行啰，跟我年轻时一样。刚解放那阵子，穷是穷，可热情高涨，跟着共产党工作组，组织起来斗地主、富农，分地分财产，有奔头。有一阵子，天天有会开，没衣裳穿没饭吃也天天有会开。枪毙恶霸地主，大家欢喜得跟过年似的，天不见亮就起床，守在火塘边，也不生火，就那么干冷干熬。为啥子，为开公审大会啊。为早早撵到那儿啊。看富人被押上刑场，都拉家带口涌过去。轰隆、轰隆，连着几炮十几跑，那边人还在抽气，这边多少双眼睛已鼓鼓地盯着，又是为啥子？为冲过去、扑过去、蹦过去抢衣裳啊。都想着第一个到死人跟前，将他们的衣裳、裤子、袜子、鞋都剥下来！还有帽子和头帕，叫子弹射烂了也要，浸透了血，甚至粘着皮肉也要，怕啥子，洗一洗、缝一缝、补一补还可以穿。这是白捡的，是村里乡里的大户穿过的，总比自家的破衣烂衫强。

老威：每次毙人，大家都要去剥衣裳吗？

余金元：非要把阶级敌人剥得精光。有的人贪心，一家子跑两三趟，往家里抱衣裳。惹得腿慢的穷棒棒火冒三丈，就在死人旁边打起来，搞得又是泥又是血，很丢人。如果死人的皮能穿，估计也扒下来了。因为有的人，明明眼前已经一丝不挂，还在翻来翻去琢磨。连屁眼也用树枝搅几遍。遭孽啰。

老威：哪个遭孽嘛？

余金元：都遭孽。穷得要饭也遭孽，富到后来被镇压也遭孽。想想嘛，大家有吃有穿，何苦去折腾死人？村里有两三个光棍，冷慌了，抢来衣裳，洗都不洗就往身上笼，结果没裹几天就烂成油渣子，棉花里子起坨坨。狗日的，也不怕叫血腥气冲着。

还有孙营长的侄儿子孙维汉，旧社会算比较威风，可在土改中崩了“茶壶”，光溜溜的，没得人收尸，就被一脚踢进沟里了。哎呀，那个时候，万山老林的野物都吃肥了。

眼一闭啥都晓不得啰。光也罢不光也罢，都填了大坑。衣裳随他抱，行头随他抱，骡马随他牵。婆娘娃娃呢，想送没人要。嘿嘿，身外之物。小同志，喝酒。

老威：喝。

余金元：我们中国有 100 个省吧？

老威：没那么多。

余金元：那就 13 个省。

老威：好像少了点。老人家你醉了。

余金元：该吃晌午饭了。我们吃了款，脑壳要好用些。

老威：要赶路。就不打搅了。

余金元：不急啰。

老威：酒在肚子里还没消化呢。

伪劣的乡镇公路，漏气轮胎一般瘪下去的路面，耽误了我们个把小时

土改受害者孙如勋

前奏

我对老酒鬼余金元的最后印象，是他横着烟竿，鼻子尖直抵相机镜头，似乎要钻进去琢磨个透彻。我本能地一仰身板，还他一口酒气，并拍下那满脸的迷惑。

这高海拔的山窝，四周的峰峦显得矮。我与所有的醉汉一样抱紧双肩，感觉太阳是块冰，不间断地冲人类喷射凉气。我不甘示弱地仰起头，可一出气，眼镜就蒙雾了。老张将面包车从几十米外挪过来，拽我上副座，然后急匆匆地出马鹿塘，奔向下一站。

由于是旋来旋去的下坡，老张的手脚忙得跟打拳似的，

我则乘着酒兴，随他腾云驾雾。这是盛夏八月，山道旁居然走着穿棉袄、扛锄头的乡民，我贴着车窗，挤扁着鼻头嘀咕“奇怪”，老张却答非所问道：“他们去坡上找药呢。”

“什么药？”

“人参、天麻，还有虫草啥的，拿到禄劝去卖给中药材贩子。”

酒劲如波涛一般涌动。身体骤然燥热起来。我心不在焉地哦哦，就开窗去喝口冷风。虽然连打了两个喷嚏，却明显感到太阳有了热度。车又驶出 10 多里路，我们像蛇一样，逐渐蜕皮。筋骨也随着衣裳的减少而舒展了。

一辆挖掘机横在路中，正以它的巨臂猛啃鼓胀的地面，老张骂了句粗话，紧咬着一串大型载重货车的屁股刹车。我已清醒如常，就下去打听情况。原来是豆腐渣工程，这段公路整修才几个月，又出现与上次同样的塌陷。一个卡车司机说：“我刚好尿胀了，就靠边停车，不料竟眼睁睁地盯着路中央凸一个包起来，而且一眨眼就由篮球变成簸箕，再一眨眼，嘿，一个簸箕就变成两个特大奶子，还卜卜冒气。我的尿筋都叫吓缩了，万一像平常那样碾过去，肯定连人带车垮进沟里……”

于是大家异口同声，将修公路的，以及卖水泥、碎石和沥青的爹妈与祖宗都日了数遍。有个络腮胡子说：“这有啥

稀奇？连长江的防洪坝都是豆腐渣工程，98 年发大水，拿了好多解放军去堵漏洞。朱镕基都哭啰。”

另一个小伙子也凑热闹：“我们中国人连导弹都敢造假，外面是钢的，内瓤子是木头削的。最近中央领导去河南视察，才曝的光……”

老张在一旁捂着嘴笑，我却目不转睛地盯着轰轰吼叫的机器，但见铁臂左旋右旋，将抓起来的豆渣浮土扔到坡下。如此恭候了大半个小时，方得到“小车通行”的恩准。

过了这一关，车开得更猛了，转瞬就直逼山脚。在昨天经过的岔路口拐了个 180 度的急弯，又驶向我在去年底来过的通往则黑的老路。在随惯性摇摆之际，我瞟见写着“大松树”的箭头路碑，蓦然感觉亲切。因为此即嫁到大山另一面的地主婆婆董存英的娘家，也不晓得这一片有多少人在土改中死于非命？

下行了一小段，又是爬坡。记得大半年前，才修成这种两边砌条石的“水渠路”，可如今看上去，又显得饱历沧桑，一有会车或超车，就尘头大起。老张在门窗紧闭的车内，脖子前挺，眯缝着眼，仿佛在硝烟弥漫的年代驾驶战车。

渐至山腰，视野豁然开阔。但见对面的群峰之间，也有一条路跟我们平行，车辆犹如三五只瓢虫，在大片裸露的肉红色中间闪烁移动。急弯的标志很多，在拐过一山嘴后，老

张的情绪却陡然高涨，居然哼了半截子山歌。我诧异地转眼，老张信手往窗外一指：“我的家乡。”

“在哪儿？”

“那边。”

那边有圆盖子一般的蓝天和阳光，峰峦在几抹云彩的掩蔽下，像一些缥缈的拳头；还有深不见底的沟壑，仿佛造物主用无形的巨斧自极高处劈下，震裂而成千回百转的地槽。

老张见我一脸茫然，又说：“眼前这扇门板一样直上直下的山峰背后，是升发乡，车过不去，走路得两个多小时。我的家在北增谷，从升发再往里走 1 个小时就到了。”

“那你欢喜个啥？”我沉下脸，头皮一阵发麻。我的下一个采访对象是撒营盘教区的张茂恩牧师，刚好住在升发乡。

“这里的山山水水养人啰。”老张还在发感慨。“可惜我现在很少有时间回北增谷，家搬出来了，爹妈不愿出来，他们是地道的地主思维，生下来就没想过挪窝。”

“怎样才能快一点到升发乡？”我打断他的话头。

“再跑 10 来公里，就是德嘎村，那儿正在新建一座基督教堂。我们把车停在村头我婶子家。就绕山路进去。”老张神色轻松，“赶紧一点，天黑之前能到。”

“路好走吗？”我终于露了怯。

“跟昨天的差不多。彝族人的地方都是老山沟，这坡与

地主的儿子

那坡差不多。”老张还在盘算，“你就住在张牧师家采访，我呢，抽空赶夜路回北增谷看一趟爹妈，明天大早又回来。”

腿肚子不由自主哆嗦，“听天由命吧，”我嘀咕道。

“你算城里人中的这个。”老张翘着大拇指安慰道。“张牧师还给我施过洗呢。你一个作家，这么大老远去找他，肯定会受到热情接待。”

可一记起昨天连滚带爬的狼狈，就觉得没底气。

下午 2 点多，我们在一个 V 字山坳停车。天阴了几分钟，荡妇一样的风就从地槽里呼啦啦地张狂上来。老张死按着衣裳下摆，立着头发去教堂建筑工地打探张牧师的具体行踪，我则在车里整理背包，兼耸肩捶腿，作上路准备。不料没一会儿，老张就笑嘻嘻地回来了：“算你运气好，张牧师正从升发村过来，今晚住德嘎。”

我这个懒虫顿时可耻地大笑。

下面的计划就比较轻松了。我们先沿上次的老路进军则黑，在比邻的住基村采访后，再折回来。“今晚住则黑，找家干净旅馆，把精神养足。”我也打起了如意算盘，“如果能抽空，还能再访张应荣长老和地主婆婆张美芝，追问出张家的长工是否健在。”

车往前，我又在某一高度眺望了更高的轿子雪山。它离太阳很近，彼此的呼吸已在互相触摸。我想起若干年前的诗句：“地说，我要接近天，于是山峦耸起。/人说，我要生活，于是洪水退去。/河流优美地延伸。”

浪漫的情绪刹那间被鼓动起来，可创作上述原始诗句的朦胧派江河却早已迁徙美国。听说是个西方古典音乐迷，采购了许多交响曲光盘在纽约的某一间屋子里放。

我这个曾经的诗人在怀旧当中，感觉下坡路也“优美地流着”，打个盹就在山脚了。外面蓦然人烟滚滚，“又是一个赶街天。”老张道，就抵着几架骡马车减速。车窗前晃动着花花绿绿的彝族妇女，老张悠闲地点燃纸烟，扶着方向盘与她们调笑。偶尔鸣一声喇叭，也显得不太正经。“你的熟人真多啊。”我讽刺道。老张点点头，又摇摇头：“都是村里的乡亲，或者一个教会的。”

突然，有一只手自斜刺里扯住老张的耳朵，要求搭车。

门一开，男女老少就汹涌澎湃地进来，把空间塞满了。初步估计，这辆7人座的小面包，至少填了16个活物。我天生好奇，就回首两次。不料未及细看，那一张张重迭的脸就笑开了花。也不晓得有啥好笑的，我问老张，我是不是花脸？老张说，你不是花脸，你是长眉毛和尚。

似乎永远贫瘠的乡场，计划生育无处不在

满车的彝族话泛滥开去，犹如喳喳鸟叫。我恍如置身异国他乡。就这样拖拖沓沓，与骡马车同步抵达场口，老张众多乡亲的手与我拍肩告别。在皮笑肉不笑中，我看上了一个彝族女子的刺绣围腰，就花50元给她解下来，准备送给刘晓波的老婆。省得她挖苦我在穷山沟里钻，却连一根兽毛也没带出来。

慢腾腾穿过这百米短街。想起孙医生讲过，新加坡的一个国际慈善机构曾经到一个类似的乡场送医送药。他们花钱雇人搭戏台，在台上码了价值几万人民币的西药，在西药的上面扯了鲜艳醒目的大横幅。几位衣冠楚楚、细皮嫩肉的绅士犹如救世主，给川流不息的褴褛乡民发药。“不管有病没病，有效没效都发，”孙医生说，“然后将这些一拥而上抢药的感人场面拍成片子，写成长篇报导，拿到海外去赚人眼泪。他们才不管中国的病根到底在哪儿。听说独裁者李光耀还表彰这些医盲为新加坡争了光呢。”

愤世嫉俗之余，我拍下一面土墙上的政策标语，作为以上“行为艺术”的国内左证：

坚定不移的贯彻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利国利民利己！

午后 3 点左右，我再次到达山区小镇则黑。老张把车停在我倍感亲切的教堂脚下，就忙着去打探大住基村的孙家。我却在太阳里狂伸懒腰，并东张西望，希望能碰上一熟悉面孔。从向阳的“三春饲料经营处”门前，一个 20 来岁的母亲转头招呼我。她依旧灿烂如女孩，可已习惯摇晃背上 1 岁多的娃娃了。我顺便问教堂的人在哪儿？她答在乡下，就只笑不吭声了。

没有功夫吃午饭。老张摸准了情况，就立即折回车头。

我们又一阵风似的甩开一排排门脸，在野地里继续前行。顺平路跑了几公里，就左拐，翻越一座矮山。桃花源般的田园风光浮现了。

在庄稼地之间的机耕道上走走停停，沿途向村民打听大住基 2 队的孙选超。孙医生在纸条上写到他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个上了年纪的人。没料到，当车颠入苞谷林深处的一个院落，并嘎的刹住时，应声而出的却是一个 20 出头的小伙子。

“你就是孙选超？”我使劲擦亮眼睛。

孙选超含笑点头。他的眼睛不用擦也清澈明亮。

“我是孙医生介绍来的。专门了解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孙选超的眼睛蒙上一层雾。

“就是斗地主。你们家不是地主么？”老张补充道。

“哦。”孙选超恍然醒悟，“那要我爹才晓得。”

“你爹多大？”

“50 好几了。”

“不行，土改的时候你爹还没断奶呢。”

“但是他听我公公讲过啰。”

“你公公呢？”

“早死了。”

“你公公的同辈人呢？”

“差不多死光了。即使活着也差不多胡涂了。”

“你的意思是，我这一趟白跑了？”

“孙医生的朋友，不会让你白跑。”孙选超立即站起来，“走吧。”

“去哪儿？”

“找年岁大的人。”

久经沙场的“老面包”又在芭谷林里穿梭开了。在弹簧垫一般的起落中，我从前座转身与孙选超交谈。了解到他接受过孙医生的“火线培训”，已成为这一带小有名气的赤脚医生。“可与我们孙家以前的影响比起来，差远了。”他感叹道。

我这属狗的鼻子耸了耸，似乎嗅出点什么，就从兜里偷偷掏出录音机：“我听孙医生讲，这边的孙姓是从马鹿塘上面迁下来的？”

“对。我们的老家是马鹿塘，在方圆千里也算赫赫有名的家族。自最上面的老祖起，我们这一脉迁到大住基村已有七、八十年。”

“你是多少代？”

“大概十几代。”

“你公公哪年死的？”

“1950 年。”

“就是土改前期了。”

地主家儿媳

“对。他是被镇压的。你往左看，一直看上去，那面坡坎正中有座坟，我公公就埋在里头。我爹说过，老辈子中，除了孙百万老祖，就数公公有本事，可共产党一来，鼓动穷人闹土改，孙姓统统划为地主。公公是与则黑的几个地主一道被枪毙的，不在的时候才 42 岁。”

车很快就深入绝境。我们下地，沿弯弯曲曲的土坎上行几分钟，就进了孙选超的伯伯家。满目狼藉的农家大院内，一农妇丢下晾晒中的烟叶，抬腰招呼我们。孙选超代替主人，将我们安排在堂屋门前坐下，以树上的鲜果招待。不一会儿，真正的主人进院门，放下锄头。一个很害羞的中年人。稍后，我费了相当的口舌，让他明白我的来意。而他始终垂头，搓揉着裤腿边的泥斑，一脸温开水似的苦笑。

录音机记载着彼此机械的问答。整理的大概结果如下：

我和孙选超的爹是亲弟兄，我 1949 年生，他 1948 年生，土改的时候太小了，所以不很清楚。我才 6 个月大，爹爹就被解放军镇压了，如今，不仅他的相貌记不得，连他的大名也险些忘掉，因为妈妈从来不提。几十年来，挨关挨斗挨打是家常便饭，她自身都难保。所以没熬到地主揭帽，她就走了。

一生下来就是贱民，我们受了几十年欺负。没有爹，怕贫下中农的娃娃提起我们的爹。相貌与名字都记不得，却受他的株连，不准上中学。反革命地主子女的日子不是人过的哟。运动一来，家族里面任何人挨斗挨打，都押我们去陪。1958 年，全民大炼钢铁，我们的大爹、大妈双双叫抓到炼钢炉前跪起，膝盖下是碎矿石，血已经止不住了，民兵还拿一根大柴棒抵住压腿。嗷地一声人就死过去，又端水泼。哎呀，上一辈的事，说不得说不得啰。总之，躲过了枪毙，也没被打死打残的，就送去劳改了。我大爹孙如龙，从来威风不倒，可在 58 年被整得要死不活，再判刑劳改。直到改革开放回家，已变成木木的焉老头子了。唉，孙家也没从政也没从军，就是在经商方面出过人才。比如我们的公公孙万昌，在 30 年代就办铜厂，发了大财，人称“金铜官”，又称“孙百万”，受过国民政府的表彰。还买下了大住基坝子一半的的田地。虽

然到孙选超的公公手里，有些破败了，可凭他的能力，肯定能翻梢的。不料折腾没几下，就栽在共产党手里，永远翻不了本。

作为后世，孙姓的来龙去脉，我们也是最近几年才摸出一点点。威老师你看，这是海外的孙家子孙回云南寻根的集体合影，浩浩荡荡几十人，开了会，修了家谱，还要捐钱为孙百万立碑。据说国父孙中山也跟我们家族有血缘关系啰。

在访谈当中，热情的孙选超两次出去，打探他么公公的下落。“这是大住基唯一健在的孙家老辈子。年岁小，辈分大。”他喘吁吁地解释。

时间不早了，第三次，孙家两代人就领着我们，急匆匆地出门，3 分钟就穿过土坎，抵达一更加破烂的院子。依旧铁锁把门。失望之余，我们全都站直身子，透过芭谷林向开阔的坝子眺望。

我是近视眼，望了也白望。可大小两孙都眼尖，手搭凉棚才几秒，就锁定了目标。

连跑带跳，下了几级梯形菜地，又嗖嗖连钻四、五片芭谷林，终于闯入一块阳光灿烂的菜园子。我寻觅已久的访谈对象如满目的莲花白，缓缓从黄土埂里长出来，定型为一个扣着蓝衣蓝帽的白发庄稼汉。

老中小三孙以当地话交流了几分钟，就齐刷刷地转向我。

老孙习惯性地拍拍泥尘，背着手，从菜地来到苞谷林边蹲下。我捏住录音机开始提问。已近 5 点，牛铃的叮当自远处隐约传来，其中还夹杂着模糊的人声。斜阳热辣辣地射击着我们的脸。

而老孙裹着花头巾的老伴，仍然牵着长蛇一般的水管，埋着头，几十年如一日地伺候着庄稼。

正文

孙如勋：同志你，来找我干啥子？

老威：找你款款土地改革。

孙如勋：过去就算了，不敢款啰。

老威：我跑了一两千里路，特地从四川过来了解你们孙家的情况。过去一提到地主，中国的绝大多数群众马上就会想起诗人贺敬之创作的歌剧《白毛女》，里头的黄世仁就是恶霸地主，年关领着狗腿子逼债，逼死了贫农杨白劳，还强奸喜儿，把黑发女变成荒山野岭上的白发鬼，真是无恶不作。其它家喻户晓的恶霸地主有南霸天、刘文彩……

孙如勋：我晓得，电影都演过好多遍。

老威：你觉得如何？

孙如勋：我们是地主家庭，一辈子受气，不敢放屁啰。

老威：土改已过去几十年，你可以说一说实话，这也是对你们孙家的祖先及后世负责。

孙如勋：从来没对外人款过。也晓不得咋个说。

老威：想到哪儿款到哪儿。现在连刘文彩的后人都不服气，张罗着翻案，你就别太多顾虑了。

孙如勋：你从马鹿塘过来，应该晓得孙姓是个大家族。我们的公公孙百万，在世很风光，又办铜厂又办纸厂，在云南境内都出了名。他赚钱买下大住基坝子一半的田地。

老威：你们的公公为什么不往昆明方向发展，反而要在这里面投资买地呢？

孙如勋：当时的大住基田地便宜嘛。气候相对马鹿塘，较温和宜人，水土也适合耕种。你看一眼这周围的绿色就明白了。

老威：有点世外桃源的感觉。

孙如勋：孙百万是个商人，也许他想在这么一个远离政治动荡的桃花源，给子孙留下百代基业。可他那样的大能人能有几个啰。以后的孙家后代，都是自己种自己吃的庄稼汉，从没走出去见过啥大世面。所以在他过世一二十年，也就是解放前两年，孙家已经衰败了。

老威：怎么败的？

孙如勋：要么是抽鸦片烟，要么是赌。我小，不很清楚。

土改受害者孙如勋蹲在地梗上接受采访

伺候了一辈子庄稼的地主夫妻

老威：饿死的骆驼比马大吧。

孙如勋：差远了。则黑这一带，数杨区长家势力大，场面上拉得开。风水轮流转啰，昨天是孙家，今天就该杨家了。当时在大住基坝子内，孙姓有 5 户，长长短短，5 个指头都不一般齐。

老威：什么意思？

孙如勋：有穷的有富的。富的数孙选超的公公家，虽然田地折腾得只剩十几亩，可脑子灵活，能做买卖，为人处世真有点孙百万的味道。可惜生不逢时，连命都丢了。我家算中等，四、五口人种七、八亩地，粮食勉强够吃。

老威：你爹能干吗？

孙如勋：晓不得。他 1942 年就去世了。我 1937 年生，我弟弟 1940 年生，当时都小，没留下啥记忆。我们靠妈妈省吃俭用、辛辛苦苦拉扯大，三、四岁就田间地头干活，跟最普通的农民家庭没有区别。

老威：你妈妈不容易啊。

孙如勋：20 出头守寡，土改时才 31 岁，50 多就不在了。唉，她哪有苦不苦的概念？只要有一口气，能活下去就满足了。

老威：这也算地主吗？

孙如勋：算。比我家更差，一年在两三亩地里忙到头，粮食都不够吃的都划成了地主。只要是孙百万的后人，统统是地主。谁叫我们的祖宗家产万贯，有那么大的名气。

老威：这没啥道理嘛。世事难料，皇帝的后裔也可能沿街要饭。总不能把血统高贵的乞丐划为剥削阶级吧？

孙如勋：土改“称大秤”，一般来说有政策，有条条框框。

啥也没有是雇农，种粮不够吃的是贫农，够吃的就升为中农。定地主有 3 条杠子，土地财产、奴仆、租石，够两条就划富农。可方圆多少里，哪个晓不得孙百万？他的后人哪怕种田累断了腰，饿断了气，也必须定地主。否则群众不依。于是孙选超的公公是恶霸地主，他大爹是不悔改地主，我家是地主，比我们差的孙家定为破落地主。在大住基坝子，只有我们孙姓 5 户全部地主。

老威：过场也没走就直接划阶级？

孙如勋：工作组下村来，发动贫雇农，开诉苦会、斗争会。只要喊不服，就打，就用刑。遭不住啰。比如我家，土地财产和租石都不够秤，就说有奴仆。啥子奴仆？就是爹爹在的时候，雇的两个外姓人。爹爹走了，他们没家没室，没地方可去，就留在我家了。十几年，他们和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分彼此，早就是一家人了。土改一划成份，农民协会带着工作组上门来搞启发，硬把一家人拆散为两个阶级。三番五次让他们诉苦，诉不出来，还批评他们觉悟低。

孙选超的公公，按 3 条杠子也不够秤。可他心高脾气大，在旧社会得罪过村里混着吃百家饭的。解放了，过去拿他没奈何的一个人成了雇农，就到工作组那儿去检举，诬赖他加入过则黑杨区长组织的“西南反共革命军”。

老威：地方武装？

孙如勋：我那时才十三、四岁，糊里胡涂的。只晓得是民团换了个招牌，好像有百把人，都叫解放军给剿灭了。孙选超的公公粘上这个，自然成了反革命恶霸地主，比杀人、放火、强奸妇女还不得了。

老威：他承认了吗？

孙如勋：他叫抓去，关着整了几个月，啥子刑都用遍了。提出来枪毙的时候，只剩一副骨头架子，人站不起来，就被五花大绑吊在一根柱头上。在则黑的河边草坝开的群众大会，来了好几千人。十多个恶霸地主，被斗了整整一天，然后拉到坡上枪毙了。

老威：你当时也在场？

孙如勋：一大早，就叫民兵押去了。

老威：你还是个娃娃嘛。

孙如勋：孙姓 5 户人，除了几岁的留下，其它都必须到场。比我和弟弟更小的还有啰，男女老少，十几二十个，在草坝上跪了两三排。记得那天是半阴半晴的，从早晨拖到下午两点多毙人，我们都跪起的。周围喊了好几轮口号："打倒反革命恶霸地主！""血债要用血来还！""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地主完蛋之时！"

老威：孙选超的公公欠了血债？

孙如勋：没有。同他一块被镇压的地主沾没沾血，就晓

不得了。毙他那瞬间我不敢看，连响了几枪，等我抬起头，周围全是热腾腾的血点点，脑壳打烂成一包糟了。

老威：当着亲属的面枪杀犯人吗？

孙如勋：是。跪了大半天，腿都快断了。不料刚站起来，又被弄去陪杀场。孙姓 5 户拉家带口，围着还在卜卜冒泡的尸体跪成两圈。心里在哭，却不敢出声，不敢流泪。这是我们家族又钢气又聪明的人呀，才 42 岁，竟落得这个下场！

老威：你们当时恨共产党吗？

孙如勋：借 100 个胆子也不敢。毛主席不在了这么多年，我们这种身份的人，都不敢公开议论他老人家的错啰。我们孙家只是诅咒那个公报私仇的人，你成了雇农，翻身了，咋个变疯狗乱咬人呢。这个人果然遭了报应，活到 70 多岁，都儿孙满堂了，还从县城里的四楼莫名其妙地摔下去，不得好死。

老威：如此的童年记忆，太可怕了。

孙如勋：人一死就解脱，没记忆了。剩下来的却活罪难逃。我妈妈是四类分子，到死那一天止，挨了几百次斗争。我和弟弟是地主崽子，也见不得人。可又不能一天到晚躲在家中。土地改革结束那年，也是这样一个丰收在望的季节，苞谷林长得密匝匝的。可我们这些猪狗不如的地主子女，干完活刚要歇口气，就被贫雇农和他们的娃娃撵得连滚带爬。

大住基是块平坝，只要有人像你们刚才那样，站在高坎朝下仔细望，任何地方的动静都逃不过。何况一个村的群众要逮你？

老威：你犯了什么事？

孙如勋：猫天生要逮老鼠，并不因为老鼠犯了事。这个路口也有人，那条地坎也有人，你在苞谷林里穿来穿去，嗖嗖嗖，气都跑脱了，可一露面抬头，人家就叉着腰，或者横着棍子、红缨枪在那儿候着。你转身再逃，另一头也一样。直到你浑身抽筋，累瘫了，就举手投降。

老威：农民还玩这种游戏？

孙如勋：不是游戏，是严肃认真的阶级斗争。无论田间地头，还是村里村外，甚至在家门口，只要你被他们追上或堵住，就要立马跪下去喊：“新中国的主人！”

老威：什么？！

孙如勋：喊“新中国的主人，饶我狗命”啰。

老威：真他妈的翻身了！与希特勒的党卫军对待犹太人的手段一样。

孙如勋：连续不断地喊“主人”，直到人家打你一顿，满意了，放你走。大住基的地主子女都受过这种待遇。有一次，我被鞋底扇了几十个耳巴子，连脸带脖子肿了好多天，喝水都困难。

老威：后来呢？

孙如勋：时间久了，人就麻痹了。

老威：谁麻痹了？

孙如勋：自己麻痹了。整我们的人却回回都有新花样。到了 1958 年，他大爹孙如龙对孙家的处境气不过，私下抱怨了几句，又被揭发出来。在大炼钢铁的采矿现场，全生产队召开他的斗争会。队长命令他跪下向“三面红旗”请罪，他强嘴。人家就说：“敌人威风不倒，就要把他打倒。”于是两口子都叫弄来跪滚烫的碎矿石，还拿大柴棒抵住压腿。他大妈惨叫一声昏过去，泼了几桶水都没醒转；他大爹却鼓着牛眼睛，嘴皮咬得血淌，也忍住不求饶。可到最后，还是松口喷出一条血龙，脑壳嘭的栽下地……

孙如龙被树成“反攻倒算”的典型，判刑劳改，直到 1979 年邓小平为地富分子揭帽以后，才放回来。

老威：孙如龙还在村里吗？

孙如勋：早走了。大住基这边，70 岁以上的孙姓老辈子就剩我啰。这个地主，当得太窝囊，几十年提心吊胆地过。连穿一件伸展衣服，也要被人家揪住批斗。理由是：“贫下中农都没得灯芯绒衣服，你一个狗日的地主又从哪儿剥削来的？”我辩解说：“是劳动所得，不是剥削来的。”他们就打我，要脱我的新衣服，把我气得眼泪都出来了。我也是辛辛

苦苦积攒了几年，才凑够钱买了一件灯芯绒呀！我也有小学文化，读得通报纸，上面明明说地主阶级已经被瓦解了。既然“瓦解了”，凭啥还死盯着我不放？

老威：他们想穿你的衣服？

孙如勋：没有。就是不让地主在任何方面超过贫下中农，包括吃饭、穿衣、住房、上学，甚至笑。不信你就在人多的场合，比如开会，比如评工分，比如集体劳动的时候，笑一场试试看。只要你的嘴张得和别人一样大，声音发得和别人一样响，所有的脑壳都将转过来冲着你。下一步就是咬牙切齿；就是命令你站起来，腰杆弓 90 度；就是念《毛主席语录》：“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

老威：小时候我跟父亲下放农村，也经常见到类似的场景。

孙如勋：是啰是啰。

老威：这时你妈妈还在吗？

孙如勋：文革开始她还在，后来就走了。

老威：没熬到地主揭帽？

孙如勋：早得很。我妹妹嫁在伐木克村，从大住基坝子翻山过去，七、八里路。1969 年夏天，妈妈想念女儿，就向生产队请探亲假。当时正文革，阶级斗争抓得紧，一般群众外出，都要大队一级开《证明》，否则住不了旅馆。而四类分

子请假，比一般群众又要麻烦多了，生产队干部先开会研究，再报大队革命委员会审批。好不容易才准假一天。

你想想，从这儿到伐木克，打来回至少有 16 里路，妈妈她就是跑，也要耗半天多。人家的意思很明确，你一个小脚地主婆探亲，必须当天打来回！

老威：也就是说，不准在自己女儿家过夜。

孙如勋：对。我妈妈捏着假条，哭了一整夜。第二天依然早早就出门了。记得那时各生产队已经联机安装了广播，好及时收听《最高指示》。头遍《东方红》响的时候是 6 点钟。妈妈走了好久，《东方红》才响，可太阳落山还没回来。天黑尽播《新闻》，接倒又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停止广播是 10 点半，之前 5 分钟，生产队长在村头喇叭里喊：“孙如勋！ｘｘｘ回家没有？记住明天早晨汇报。”

当天妈妈没回，第二天也没回。直到第三天下午，妈妈才肿着两只眼泡回家。她说妹妹病了，生离死别一样好劝歹劝，非要拖住多留两天。我晓得惹下了大祸，可不敢给妈妈讲。生产队长已通过喇叭吼了两三次“后果自负”。

天一黑，妈妈换了一件干净衣服，去找生产队长赔罪。没一会儿，广播就通知开全体社员大会，18 岁以上的成人必须参加。我扒拉两口饭，就赶到保管室外的晒谷坝，一盏汽灯挂在屋檐下，刺亮刺亮的。妈妈已叫麻绳捆起了。

那天的斗争会开到深夜 12 点多钟。我立在一边，埋起脑壳。反正都是那些上纲上线的政治套话，一个个口水横飞，指指戳戳。还一轮一轮地喊口号："打倒ｘｘｘ！踏上一只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人民群众开心之日，就是地主婆ｘｘｘ难受之时！"

老威：你的现场感觉怎样？

孙如勋：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因为同见刀见血的土改相比，这只能算毛毛雨。我万万没料到，妈妈却胡涂了。她熬过那么多斗争会，都想得通，这次就不通。

老威：土改时她还年轻，这时她已老了，经不住折腾，也盼不见希望。所以就出了毛病。

孙如勋：她没毛病。她清清醒醒地上吊自杀了。

老威：是么？！

孙如勋：当天夜里，家里人全睡了。她还在洗脸，然后又擦了身子，洗了脚。模模糊糊中，我透过蚊帐，分明看见她躺下了。我还听她叹了一口气，就劝："妈，过都过去了，就莫想那么多。"她还答应了一声："儿啰，以后你可得好好过。"

我觉得蹊跷，可太累，一闭眼就死过去。第二天起床，妈妈已悬在房梁上，眼珠子鼓着。那年她才 50 多岁。

老威：事先没一点预兆吗？

孙如勋：我睡得跟石头似的。以往我老是睡不踏实，做逃跑、挨打、躲躲闪闪、又一次次叫逮着的梦。我老是在梦中惊醒，出一身冷汗。老婆也受我拖累，一惊一炸，还闹着跟我分床。可妈妈要死，我却如一头猪，一动不动就到天亮。

看来，活受罪，真不如死了好。嘿嘿嘿，死了好。干净。

老威：嗯，干净。

我与孙氏地主家族在地头合影

土改积极分子孙宗文

前奏

2006年8月5日傍晚7点，我完成了对大住基村孙氏家族的走访，急匆匆赶回则黑乡。夕照浸润着山川，令赭红色的岩壁显得油腻腻的，我刚开玩笑说，连泥巴都如一块块鲜肉，肠胃就一阵阵抽。老张也感到肚子里在喷火，就一顿狂奔。翻山时遇土坎也不减速，只听得嘣嗵一声巨响，车弹跳着就下坡了。

在则黑街上最大的一家饭馆外刹车，我穿过正厅，直入极其昏暗的厨房。菜架是空的，肉案也是空的。老板和小工都下班了，只剩一个膀大腰圆的老板娘留守。她拦截道："全

卖光了，找也没用。”却低估了一只属狗的鼻子对荤腥的天然敏感。我这个近视眼居然在隐蔽的石缸内侦察出鱼！就扯过老板娘点了两条。一称 3 斤 6 两。老板娘道：“没任何菜叶子，就弄糖醋鱼吧。”我道：“从你的泡菜坛子里捞两把，剁几刀，煮成酸菜鱼。”

十几分钟后，一洗脸盆酸菜鱼气势汹汹地端了出来。乡镇上果然民风泼辣，干海椒大捧，酸菜比手掌宽。我尝了一口汤，脑顶的毛毛汗就激出来了。于是叫上饭。砰砰两声，又冷又硬的两海碗到了跟前。

1959 至 1962 年的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中国人，我刚巧撞上，一出生就浑身浮肿，差点没活头。所以我的吃相比较狰狞，胃他妈的像只章鱼，伸着触须，什么都往里面搂。老张长得精瘦，却与我棋逢对手，两边的脑袋及肩膀如乌云笼罩了鱼盆。没几分钟，盆和碗里的东西就稀里哗啦，消失了大半。夕照红得更透了，将肮脏的屋顶、街道、墙面染得很浪漫，几辆马拉车嘀滴答嗒地经过，在破塑料袋飘飞的污水沟边拉了一滩也很有情调的屎。我到底抬头了，摸起一旁的眼镜戴上。真巧啊，一个圆脸老头背着手，在门口停顿了两三秒，他与我对了一下光，我习惯性地笑，他却没笑。

“你好啊。”我招呼道。接着，鬼使神差地起身。

背包里有一本朋友赠送的《土地改革运动史》，福建人民

出版社2005年出版，作者罗平汉。这是一本以中国官方的观点“正面评介”土改的著作。我摸出来，递给老头。

“哦？你写的？”

我始终暧昧地微笑。待老头放松了警惕，才江湖骗子一般严肃地说：“我是四川的一个作家，专程到这一带调查、研究土地改革。老先生你愿意和我交谈几句吗？”

“你要搜集素材？”

“也不是遍地都是素材。”我的脸板得更凶了，“我在马鹿塘、撒营盘、则黑访谈过许多老人，正面、负面都有。准备将来有选择地写进书里。”

就这样两三板斧，就砍翻了一个衣冠楚楚的乡镇人物。他的面皮逐渐松弛：“请跟我来。”

上个世纪80年代，台湾歌星苏芮有首歌，也叫《请跟我来》。

上行不过10米，一老一少相跟着进了另一饭馆。门脸与上一家相当，可里头的堂子却高多了，四周贴满亮晃晃的瓷砖，还有大红大绿的明星照。更扎眼的是，正中财神爷的左边，还供着毛泽东的乡间风俗画，面皮红彤彤，除了头发，没一丝皱纹，没一丝毛。真是个万寿无疆的慈祥公公。

在一圈能坐10人以上的大圆桌前，老头和我做出促膝谈心的架势。他的儿孙一大堆，此刻都在堂子的尽头。待他将

军似地一声召唤："泡茶！"就一溜烟地全过来了。老大老二等等等等，只需打量一下那些油光水滑的装束，就晓得是乡镇一级的干部或成功人士。递烟的同时，他们企图查验我的身份，我再次以那本《土地改革运动史》来搪塞，并称"更详细的证明材料"在车上。大约是我的态度比政府官员还生硬，他们摸不清是何方神圣，于是留了一包暗示身份的云烟在桌上，便哦哦撤退了。

厨房的油烟阵阵弥漫，我恍若置身大跃进时期的公社食堂。而老头的三角眼眯缝着，面对门窗外越来越浓的暮色发愣。

正文

老威：老人家姓孙，然后是祖宗的宗，文化的文？

孙宗文：对。

老威：好名字。

孙宗文：父母请教书先生取的啰。

老威：我刚刚拜访了大住基村的孙姓家族，你跟他们是同一血脉？

孙宗文：都从马鹿塘迁来的，算一个祖先吧。后来就晓不得咋回事了。

老威：你与孙百万是什么关系？

孙宗文：没有关系。

老威：你住在哪儿？

孙宗文：则黑乡的上村。

老威：我指解放前。

孙宗文：在老虎堆村，离则黑三四里路。

老威：有多少土地？

孙宗文：没有。除了一间烂草房，啥也没有。我家是佃地种，有时也去外村打打短工。所以一土改，我家就划为贫农。

老威：孙姓差不多是地主，你家为啥是贫农呢？

孙宗文：我家与他们扯不上。

老威：请讲讲你们村土改，也就是斗地主的情况。

孙宗文：老虎堆太穷了，每年青黄不接，多数人都出来要饭。所以按上面的政策，以几把尺子“称大秤”，没评出地主，只推选了一户富农。

老威：你们村去过工作组吗？

孙宗文：刚解放，解放军、工作组都去过，也照样访贫问苦，发动群众。男女老少全被组织起来。我 1930 年生，那时 20 出头，就叫发展成了民兵。各村的贫雇农，年龄在十六、七到二、三十的，都当民兵。

老威：民兵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孙宗文：党叫干啥就干啥。运动一环扣一环，这一阶段重点是这个，下一阶段重点是那个。

老威：举个例子。

孙宗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加赔罚，还有土改、土改复查。那几年，我们一直风风火火，瞌睡都不够。先是各村的地主各村斗，后来就交叉斗，集中起来斗。

老威：则黑周围的地主集中在那儿？

孙宗文：先是乡公所，后来人多了，就把小学的教室腾出来关。

老威：民兵打人吗？

孙宗文：我们都是按政策办事。

老威：到底打不打人？

孙宗文：一般不打人。态度老实的，主动交财产交罚款的，一开头就把解放前的罪行一条一条抖出来，向人民缴械投降，没有任何隐瞒的。我们按工作组的指示，绝不动他一根寒毛。

老威：态度老实的有多少？

孙宗文：还是比较多啰。集中反省，一天天不准回家，他们就紧张得屎也拉不出来。审问时，要反复政策攻心，使他们明白蒙混过不了关。再不行就用厉害的话骇两句。

老威：再不行呢？

孙宗文：一般来说就交代了。

老威：如果不交代呢？

孙宗文：那就动点手。

老威：我在这一带走访了一些老人，据他们回忆，当时不仅打人，还普遍使用肉刑。比如大柴棒压腿、跪瓦碴、扎烟头、扎绳子、倒吊、陪杀场等等。你……

孙宗文：我还小。上面的政策压下来，一定要打垮地主。

老威："打垮"的意思就是用刑吗？

孙宗文：有些人是很顽固的，不动点手，根本不会坦白。运动是有期限的，比如一两个月，三五个月，或者大半年，再硬的骨头也必须敲碎，否则就没完成党交给的革命任务。

老威：你恨地主？

孙宗文：我岁数小，政治觉悟不高。政策让恨就恨，必须恨。抵赖的时候就更遭人恨了。

老威：剥去那层阶级斗争的外壳，他们也是一辈子种庄稼的人嘛。

孙宗文：他们剥削啰。

老威：剥削？好嘛，那你儿子开这个饭馆，请了小工和厨师，算不算剥削？

孙宗文：时代不同。都是共产党的天下，毛主席和胡主

席就不同。

老威：我们不争论。老人家的虚岁 77 吧？脑子蛮好使的。

孙宗文：去年生了场大病。好不容易爬起来，身体就差多了。现在你要我摆几十年前的事，就只能是个大概。

老威：土改至今已 54 年，真难为你了。

孙宗文：哪年开哪些会还记得住，小细节就记不住了。

老威：镇压地主的公审大会记得住吗？

孙宗文：从 1950 年起，镇压了好几批，我们当时负责押解犯人，维持秩序。则黑乡毙了伪政府的区长杨心林，乡长张应心，还有十几个恶霸地主。

老威：据说他们死前受过极其残酷的虐待。

孙宗文：他们罪有应得。

老威：你觉得他们该镇压？

孙宗文：他们不该镇压，哪个该镇压？照当时的政策条款……

老威：照现在的法律呢？

孙宗文：当时是当时，现在是现在。

（一辆手扶式拖拉机自门外经过，震耳欲聋的轰鸣掩盖了彼此的谈话。我不禁转移视线，但见街对面的瓦顶上，最后一抹夕光正一点点逝去。电视里的中央与云南地方新闻都

结束了，老头的儿媳妇故意将音量放得很大，我却置若罔闻。于是她又努嘴，暗示男人过来，请我们共进晚餐，边吃边谈。老头似笑非笑地瞟我，可他绝对没料到我的脸皮有多厚。

我站起来，抓起桌上60元1包的云烟敬了老头儿子一支。他一愣，接过去了。我又用火机给他点着，然后道："实在对不起，我挺喜欢你爹的，能不能再耽搁几分钟？"

"不能吃了饭再说？"

"眼下的气氛正好。我怕过了这阵子，你爹的谈兴就没这么浓了。"见对方的强笑在慢慢凝固，我急忙嘿嘿干笑，补充道："没想到老人家以前如此风光。"

"那当然，那当然。"儿子只得打退堂鼓。我灌了一口冷茶水，又回头继续伺候他老子）

老威：通过土地改革，你家得了啥子好处？

孙宗文：我家从老虎堆搬了下来，在则黑上村分了两间瓦房，1亩多地。

老威：你家几口人？

孙宗文：母亲和我。

老威：分谁的地？

孙宗文：张应喜家的。

老威：和则黑伪乡长张应心有关系吗？

孙宗文：他们是家门。不过来往很少。解放前张应喜是老师。

老威：这个教书先生有钱吧？所以划地主。

孙宗文：没啥钱。但有奴仆，有一点土地，一称大秤就够地主。

老威：奴仆？是书童？

孙宗文：他一个人要教很多农村娃娃，太忙了，没时间种家里的地，就雇了长工帮着种。

老威：这也算剥削？

孙宗文：算。

老威：哪教书是不是劳动？

孙宗文：工作组不会问那么多。只要上了硬杠杠，就是地主。

老威：他被斗争过吗？

孙宗文：是地主就要挨斗。不过他是老师，文化高，人缘好，没受啥子罪。

老威：他的学生家长私下关照他？

孙宗文：他太聪明了，晓得这是共产党的江山，胳膊扭不过大腿。大形势大政策都明摆着，于是一开头，他就赶紧坦白，非常彻底，把几十年的肠肠肚肚，包括大家族、小家庭的根底全挖出来。《交代书》也写得深刻，不喊屈，不喊

冤，只要是共产党、工作组，随便咋样都对头。肯定就能过关啰。

老威：真不愧是文人，看得穿。

孙宗文：只能顺着去，不能反着来。过了运动，大家的关系又恢复正常。

老威：也不恨地主了？

孙宗文：只要他们莫犯法、莫造谣、莫破坏，就不恨。

老威：现在恨吗？

孙宗文：现在大家都一样，没有地主。

老威：看你目前的生活水平，已超过地主了。

孙宗文：翻身啰。

老威：翻身之后你的想法是什么？

孙宗文：想法很多，过后都忘了。过去了就过去了，老记着也没意思。至于政治运动，搞对了就对了，搞不对，下一任中央领导自然会出面纠正。老百姓闹得再凶，都不用负啥子具体责任。我这一辈子嘛，歪门邪道不会，见风使舵也差，可认定跟共产党闹革命，始终不变。

老威：老革命的认识的确高我等一筹。

孙宗文：50 年到 53 年，我当了 3 年多土改民兵。由于听话，表现积极，年纪轻轻就入了党。1954 年开始，我担任了 4 年多的则黑乡党支部书记，后来又当过生产队长。

老威：历次政治运动都没受冲击？

孙宗文：上面叫咋整就咋整。官这么小，冲击我干啥？

老威：1979 年，邓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宣布给地富分子摘帽。你对政策的变化有啥感想？

孙宗文：土改没错，摘帽也没错。跟我不相干。

老威：什么与你相干呢？

孙宗文：农民嘛，只有庄稼地啰。

老威：你好像没出过远门。

孙宗文：50 年代，上级派到昆明修了几年铁路。接着又回则黑上村。转眼人老得走不动了，才想起这辈子几乎没挪窝。

老威：嘿嘿，党没叫挪窝就别挪窝吧。

补记

2006 年 10 月中旬，我躲在一个小县城整理写作。迄今为止，我大约访谈过 200 多人，只有上面的谈话令我觉得别扭。听着听着录音，生理性的厌恶竟油然而生。先还以为，是我“一贯的反动立场”作祟，在对历史事件的追踪、记录、还原中，这与“一贯的革命立场”同样，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否则就注定落入老毛“世间一切事物无不打上阶级烙印”的

陷阱中。

可不管怎样，我不会关掉机器。所以，在磁带反复过两次以后，我突然对曾经的土改积极分子孙宗文同情起来。尽管他目前还认为地主们“罪有应得”，“他们不该镇压，哪个该镇压”，但是他已风烛残年，口气颤巍巍的。越到后来，头句话与下句话之间的停顿就越长，可此种空白蕴含着的不是自信或深思熟虑，而是气短、心虚、思维短路，甚至哀叹。

我的气焰却越发嚣张。话锋咄咄逼人，活脱脱一个真理在握的红色警察出演审讯把戏。伪装、逼问、诱供、激将、设陷阱等等，《孙子兵法》36 计用了多少不晓得，但对付一位没见过多大世面的老人还是绰绰有余——我什么时候学会这一套的？难道我这个曾经的政治犯，动脉里却涌动着警察的血？

太烦了。我想出去走走，暂时离开机器里的那个嘿嘿假笑着的冷血的自己。

刚刚下了雨，马上就出太阳。

我站在马路边东张西望，没一个熟人，没地方可去。

几十米外有个旧书摊，我正好可以消磨一点无聊时光。

我花了 10 元人民币买了 3 本太旧的书，其中 1 本是《中国解放区农村妇女翻身运动素描》。1949 年 7 月在上海出版，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编辑，新华书店发行。我大

致翻阅，竟篇篇与土地改革有关。

为了让我和我的读者不那么沉闷，我选录其中共产党官方表彰解放区土改积极分子的一篇报导在这儿，供对照参考。

人民的好闺女

华东新华社

胶东滨北分区藏马县（新设县）农会委员徐茂红，出身贫苦，从小讨饭，当丫头，做童养媳，直到十八岁那年，家乡解放后，才翻了身。因为她积极帮助穷苦兄弟姐妹翻身，被选为区妇会委员，去秋土改复查中，她是全县发动雇贫农团结中农走群众路线的一面旗子。

瞿家屯是个只有三十多户人家的小庄，据村干的报告说："土改已完成了。"但后来发现有讨饭的，区里派她去了解和解决这庄的问题。她到村后，深入贫雇农中，先找到讨饭的刘大娘家里，刘大娘讨饭刚回来，正在温剩饭吃，徐就和她一块吃起来，刘大娘当时惊奇的说："同志，讨饭人吃的都是猪狗不吃的东西，你们工作人员，怎么能吃下去？"徐一边吃，一边叙述她自己当初讨饭的困难情形，晚上和刘大娘

一起睡，刘大娘难为情的指着炕上的破席说："叫同志笑话，要铺无铺的，要盖无盖的，同志怎么能睡呢！"徐茂红便向她诉说自己十三岁那年到诸城讨饭时，铺着雪，盖着天睡，以及给地主当丫头时，在地上盖着簸箕睡觉的苦楚。就在这大黑夜刘大娘也把她一辈子受的委曲哭诉了出来，又把她在翻身中的委曲诉了出来，她原来只分到一斤猪肉，二升粮食，后来地主又骇唬她说："吃一斤猪肉还十斤人肉。"从此谁也不敢提翻身了，刘大娘抱着徐茂红哽咽的说："我的好闺女，想不到天下还有和俺穷苦人作伴的。"第二天刘大娘碰见人便说："咱们有洪福啦！好人来咱村领导翻身了，大家都到俺家听她开导开导吧。"全村十八家贫雇农都来找徐茂红，把这庄的实情说了个明明白白，工作也就从此真正开展了。徐茂红从来不把自己和群众分开看，而群众也从未外看她，大家都亲热的叫她"闺女"或"大姐"，她帮助群众去干活，一起吃睡，不是单纯为了调查或为了"深入"，她觉得凡是受苦的人都和她母亲以及她当丫头时是一样的，因此他们的翻身和她自己的翻身一样迫切。她在工作中经常帮助群众做针线、做饭，一直到刨地捣粪，……

有时她能一天访问三十家贫雇农。很多干部学习她的工作方法，都觉得受不住。但是徐茂红却说："我们一天工作顶多比上群众一天的劳动，群众天天如此，已经多少辈子了，

我们工作嫌累，而老百姓又该怎样办呢？”这种真正的阶级自觉和群众观点，以及朴实细心的工作作风，使她得到群众普遍的爱戴，也使她能在别人无法开展工作的地方打开局面。

一九四八年三月

夜祷

8个多月后重访张应荣，老人就已双目失明，又过1年余，老人竟溘然而逝。这是他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完成对土改积极分子孙宗文的意外拜访，已晚上8点多。夕阳沦落，几抹烂桔子似的晚霞也随之淡化。我在鬼火一般的路灯下，仰头伸了个懒腰，无意中望见早已爬上天际的月亮，竟红透了。出于做过几天诗人的本性，我凝视了半分钟，却从高处的风里嗅着一股甜腻腻的腐败味儿，且越来越浓。我正要将这味儿想象成月亮的烂桔子味儿，就瞟到了斜对面两人高的水泥坎上，露天管道正肆无忌惮地排放生活污水。

我咒骂了一声。胃突然隐隐作痛，我马上意识到是晚餐吃得太急，鱼太辣，饭也太冷硬。老张把车挪过来，问我在哪儿歇脚？我答这年头不愁住，还是先去探望一下大半年不

见的张应荣老人吧。

老张说他也好久没拜访张长老了。于是驾车上行，七拐八拐，就直抵那熟悉而亲切的村间红泥路。靠土墙停好车，我们在红月亮的笼罩中，走向张家大院。还没进门，一个单纯的童音就迎面而来，我不禁站在敞开的门口仔细聆听。老张拍肩示意，我也装哑吧，以食指点一点虚空，再点一点自己的耳朵。老张会意地低语："张长老的重孙子在朗读《圣经》呢。"

我不熟悉《圣经》，不晓得入耳的是哪一章哪一段哪一节，但在一瞬间，被狠狠地震荡了一下。西班牙诗人洛尔加的句子蓦地涌上脑海："从一滴水里，孩子寻找他的声音。"

波纹顿时吹拂我的睫毛，并一圈圈泛滥，淹没了房顶、树枝，水渍眨眼就浸透了云、星星和月亮，似乎整个宇宙都包含在一粒浩大的水珠中。蟋蟀吱吱叫了，洛尔加接着问："声音里又找到了什么？可是一只蟋蟀王？"

我刚要继续洛尔加的追问："张长老在找什么？上帝可是一只蟋蟀王？"阵阵翻腾的肠胃就将出窍的魂魄硬拽回来。我龇牙咧嘴了十几秒，方正色跨入门坎，穿过院坝，踏上两人多高的石阶。朦胧夜色里，阶顶的房屋犹如高高在上的远古戏台，屋檐下灯光昏暗，那还穿着开裆裤的三尺幼童肃然而立，端着厚书，一板一眼地宣读着与他的年纪极不对称的

词句：“雅各布”、“彼得”、“保守”、“神的大爱”、“以苦难，甚至生命去荣耀主”等等。而我这个观众所尊敬的张长老靠坐于戏台正中的躺椅，不时以苍老的“阿门”应和。幼童的阴影犹如上帝的无形被单，轻轻覆盖着他干瘪的躯体；在他的下方，在更矮一点的阴影中，则卧着他长期受风湿病折磨的老伴。

我和老张悄无声息地上完石阶，张长老方从《圣经》里翱游归来。他颤巍巍地起立，双手划动着腥红色的月光问：“哪个？”我赶紧双手接住并回答：“我是老威，大半年前与孙医生一起拜访过你的老威。”

“老威？”张长老的神思还在恍惚。而他的老伴却自阴影里冒出头，边呻吟，边笑，边招呼我“老师”。地下铺着草垫与羊皮，她刚才在那儿蜷缩成一团，已疼得老泪纵横，还跟在丈夫的后面低唤“阿门”。

其实我早就晓得这老两口正日以继夜地靠近天国的阶梯，自去年底采访他们不久，以调查、记录二战中“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而著称的作家班忠义受我的情绪感染，也扛着机器，进来实地拍摄过。我和老班曾碰头，本想就文字与影像记录的差异交换看法，可没几分钟，话题就转到张长老的身体上。老班说，你的运气真好啊，张长老和你一块的时候，精气神都还不错，话说了 3 个多小时，把一生大概讲

完整了。可等到我上门，他们老两口正巧得了场大病，没走，却相当于扒了层皮。张长老的眼睛完全瞎了，他老伴瘫在床上，连说话也没力气。

我吃了一惊，才两三个月，变化这么快？

老班说对。还说尽管如此，张长老还是支撑着，在镜头面前作了见证。虽然同你的文字比较，有不少残缺，但这有可能是最后的见证了。

老班的语调非常阴沉。我立即开玩笑，将后颈窝渐起的寒意缓解下来。老班也默契地笑了。他说幸好有上帝，要不人间的苦难真没法熬。张长老恐怕是不行了，但他的灵魂极其快乐，我看这种不可思议的狂喜将一致持续到他停止呼吸的那一刻。因此他拒绝吃药，拒绝任何医疗，“什么时候接我去，主会安排的。”他对家人说。

老班离开又几个月了，我能够重逢张长老，大约也是主的安排吧？我不禁叹了口气。就紧紧把住老人枯柴棒子一样的手臂，一道坐下。相对无语了好一会儿，老人转头叫重孙子端出两碗杂糖，一碗麻饼，并亲手抓了两大把，塞给我和老张。因肠胃胀痛，我再三谢绝，老人却不依，以两只盲目冲着我说：“你是远客，吃啰吃啰。”不得已，我将一颗杂糖含在口中，老人却侧着耳门，非要听那咔嘭一声碎响，才满意地笑一笑。就这样我连吃半把杂糖，肠胃反而逐渐通泰了。

又有客人来访，老两口再次起立。由于急了些，张长老被躺椅绊了一下，差点栽倒。我不假思索地相劝："眼睛不方便，就别动吧。"立即感觉失言。不料张长老闻之抚掌大乐："瞎掉好！瞎掉好！人的国看了80几年，足够了，瞎掉好一心一意看神的国。"接着，又唤来重孙子，一老一幼手牵手唱起了赞美诗，后来我打听，它的歌名叫做《礼拜散歌》，共有三段，其中有以下歌词：

将来听见主爱呼唤，
命我长离人间时，
生死关头坦然无惧，
欣然应招不犹疑。
愿能永远！愿能永远！
跟随主爱！跟随主爱无尽期……

我呆在一旁，再也说不出任何话。稍后，我想起逝去的亲人们，姐姐、爸爸、舅舅和爷爷。他们都没有得到临终的祝福。姐姐死于车祸，猝不及防，我在千里之外，连遗体告别都没赶上；舅舅死于脑溢血，送医院途中邻居打来电话，我也仅仅赶上了整理遗体；爸爸死于肺癌，拖了将近1年，终结时连一句话也说不出；地主爷爷倒是能讲话，可他作为

土财主的身世，我从来没弄明白。

我还想起自己持续了多年的冤案访谈，我暗暗扳着指头数，已有几位被访者永远出走？杨继年，1946年生，11岁时因盗窃罪名被捕，在狱中加刑3次，总共坐牢34年。出狱前后，一直坚持申诉，写了几百万字的喊冤材料，却不幸死于2002年1月13日深夜的一场火灾，终年56岁。于东山，与我父亲同为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癌症楼”的病友，曾做过国共两党3次俘虏，因此以“派遣特务”的罪名获刑15年，实际坐牢35年。1999年出狱，2002年10月14日因肺癌去世，终年75岁。灯宽法师，俗名陈锦荣，1900年生，6岁在成都郊区崇庆县街子镇的上古寺出家，40年代升任主持。1950年，在共产党发动的土地改革运动中被划为“寺庙大地主”，遭受多种酷刑与多年管制。曾在文革的“破四旧”中被迫还俗，经历九死一生，熬到1978年落实宗教政策，方以84岁的高龄重返已化为废墟的上古寺。2002年先后接受我4次采访，2005年圆寂，终年105岁。刘世昌，1914年生，道路工程师，曾在国共两代政府手中，参与云南境内多处公路、铁路、桥梁、军用飞机场的设计和建设。自1949年到文革结束，却因“历史不清及老婆是彝族土司女儿”等问题，一直倍受迫害。文革中遭数次抄家、关押与批斗，毒打致残。妻子也被侮辱毒打致死。坚持申冤20余年无果。2005年去世，

终年 91 岁。袁相忱，1914 年生，自小受基督教家庭的熏陶，信仰耶稣，青年时期曾在北方农村传教，成长为一个极有影响的牧师。改朝换代时坚持留在中国，因拒绝以“三自爱国”改造教会，强调“耶稣永远是我们的头”而被捕，1955 年定罪“反革命”，获无期徒刑。1979 年假释回家，成为中国地下基督教会最早的领袖之一，曾在 1989 年六四惨案之夜，聚会谴责刽子手，为死难者祷告。2005 年去世，终年 91 岁。张紫葛，1921 年生，著名盲人作家，作品有《心香泪酒祭吴宓》《我给宋美龄当秘书》等。在国共新旧社会里，都做过大学教授。1957 年，以莫须有的“极右反革命”罪名获 15 年徒刑，受尽折磨。1973 年刑满，继续管制 4 年，稍后恢复公职。2006 年 9 月去世，终年 85 岁。何家栋，1924 年生，著名老革命、出版家和传记作家，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轰动一时的《把一切献给党》《赵一曼》《我的一家》《刘志丹》等革命文学的执笔人。建国之初始，就因澄不清的历史问题和多次误入政治白虎堂，倍受打击迫害。“挨整 30 年，下放 14 年”，晚年与共产信仰分道扬镳，成为众多自由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2006 年 10 月去世，终年 82 岁。

众多死者从我的手指尖淌过，我的文字里尚有他们的余温。不管是不是我的血亲，不管在临终前受没受到祝福，此刻我都愿意跟随张长老，为他们，也为我自己祷告。如果在

藏传或汉传的佛庙，我也愿意跟随另一个法师，为他们，也为我自己超度。我也愿意在清真寺，以及任何山川大地，任何与至高的造物主接近的地方，为他们，也为我自己大声呼喊。我活在他们当中，天哪，因为这么多人含着冤屈死了，所以我暂时还活在这不公平的人世上。

我年轻时就热爱的短命诗人狄兰．托马斯此刻进入到心里：

那里他们得到了安息，在慈爱的土地上
最黑暗的死亡判决，盲目的，没有得到祝福
却被人们找到，让他们不能安息

我在低矮寂静的屋子里祈祷，靠着这褪了色的床
中午，黑夜，早晨到来之前的每一分钟
死去的人组成了河流……

一个不幸的世界像雪一样落在他们身上……

我触摸着张长老正日益衰落的躯壳，我明白他在盼着上帝替自己脱下这躯壳，犹如脱下一件涂满了苦难符号的外衣。纯灵魂的上升多么轻盈多么喜乐啊，浊世的煎熬到底快结出

甜美的果子。

过分专注于精神，我却忽略了现实中的老张一直躲在旁边打电话。约 9 点钟，他突然站起来对我说："不早了，我们告辞吧。"

我醒悟似的点头道："还要接着拜访地主婆婆张美芝呢。"

老张却说："恐怕来不及了，我们得马上回头，赶到德嘎村。"

"明日一早去不行吗？"我迟疑道。

"不行。刚才我已经联系了。"老张断然道。"张茂恩牧师正在德嘎准备圣餐，他太忙了，你要采访他，就得先候着，随时准备见缝插针。"

张长老也在旁边催促："去吧去吧，赶紧去为主做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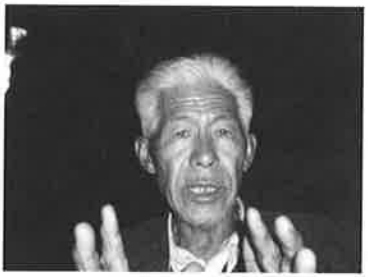
与两个老人匆匆道别，恐怕是最后的道别，我们又上路了。夜色寂静，红月亮正在变白，车灯开出的路如河流嗖嗖退却，转瞬间，灯火稀落的则黑乡就沉入残梦之中。

我忍不住打起盹来，轰轰隆隆中，我梦见车子冲至公路的尽头，就突然腾空了。轮胎还在滚动，在拳头般的星星之间，在星星般的火把之间。我回到了少年，回到为乡村百岁老人送葬的行列中。那是文革后期，被视为封建迷信的丧葬仪式在偏远的山区老家死灰复燃，所以尽管入葬者是地主，

全生产队两三百号人仍倾巢出动。鸡叫三遍放上路鞭炮，灵幡引路，12个壮汉抬起棺木上山，后面弯弯曲曲一长串人马。我和妹妹牵着地主爷爷的腰帕，在晃动的火把下，吭哧吭哧地爬坡，浑身累出了汗水，让山谷里的风一吹，又冰凉冰凉的。在天明前，百岁老人葬在叫做“龙脊”的梁子中央，在场的每个人都往墓坑内丢一把土……

那夜的繁星与顺着山势盘旋的火把长蛇阵贴得很近，犹如一张青铜镜的内外。而此刻，光阴在梦里回荡了几遍，就哐当一声落到实处。我醒过来，车已颠簸在盘山道了。窗外的流星一颗接一颗坠入深壑，老张说，再拐一个弯就是德嘎。

土改受害者张茂恩



前奏

2006年8月5日深夜10点半，我们的车灯射亮了德嘎村不起眼的指示牌，随即刹车减速。掉头驶离正道，顺着陡峭的碎石小路下山。每隔10来秒，车窗外就要划过一颗流星，估计车抵山脚，至少有30多颗流星殒落。所以在一农家院墙前停车小便时，我不禁感叹道："真他妈的有眼福，可惜不是天文学家。"

一同小便的现实主义老张却不明白我的眼福指的什么。他提起裤子，在此起彼伏的狗叫中猛敲院门。一个包着彝族头帕的筒状妇女自门缝露面了，老张唤一句"婶婶"，一条黑

狗却挤出来，亲热无比地钻他的裤裆。在狗的上方，人类以彝汉两种语言快速交际罢，就暂时分手。

在黑黝黝的山影中，老张和我连跳几级陡坎，穿过一片梯田和荆棘，才下至碎石路的最底部。照灰白的路影子往上走，流水的潺潺，蟋蟀的吱吱，时隐时现的拖长了的狗吠，以及风声，草声，树叶摇晃和夜鸟的飞翔声，甚至还有乌云擦拭星月的某种回声，组成了一支从旷古传承至今的乐队，环绕左右。许久没有走过乡村夜路了，我再次感叹自己有耳福，却没法说出来。

不断与稀稀落落的坟头擦身而过，设想在人生的道上稍有偏差，就提前走进去了。可还没来得及悲观，就听见风中飘起孩子的歌声。老张说快到了，并把头上两块顶天立地的巨石指给我看，孩子们就在那石头脚下有一搭没一搭地唱着。我说真奇怪啊，这么晚了，他们还不睡觉。老张说村里有活动啰，娃娃也跟着过节。

登上村口，浓厚的马粪味儿扑面而来。一棵枝丫苍劲的大树下，许多人秃鹫般蹲在凹凸不平的石头间抽烟与交谈，由于是彝语，我半句也不懂，只得紧随老张，小心翼翼地过场。眼睛乜斜四周，感觉错落的白牙齿自夜色中隐现，并牵动一阵阵嘿嘿的笑声，我与老张也不由自主地嘿嘿。

我们上坡下坎，时而房顶时而墙根时而在庄稼地与土墙

中间。寨子中央遇一坡道，仅 1 尺多宽，还右边高左边低，潺潺水流自上而下。我们只好提着裤腿，垫着蹄子作羚羊状的跳跃。我眼力不济，一脚踩入水中，如果不是被老张一把叼住肩头，真就“顺流直下”了。

如此狼狈地抵达寨后一座黄泥院落，门大敞着，不断有人进进出出。迎门是厨房，深处灶火熊熊，令在黯夜里摸索了许久的我们倍感亲切。老张更如游子归来，约几秒钟，就有七、八个人与他神秘拉扯，彼此的耳语透出压抑着的兴奋。我立在露天院坝里犹豫，刚望了一眼由暗转明的天，一个提着暖水瓶的彝家妇女就来扯我袖口，示意跟她上台阶。

正屋门坎骑放着矮桌，一盏起码 30 余年没见的毛泽东时代的老式汽灯在桌面嗤嗤放光。灯影形成一个巨大的透明蛋，中央的蛋核亮到极致，刀子般扎眼，四周却一派朦胧，若有若无的波纹循环、扩散，罩住了台阶上下的密集人影。

我霎时回到挑灯夜战的年月，为了不误农时，生产队一级的社员会议都在晚上开。包括政策会、动员会、传达中央文件会、评工分会、派工会、斗争四类分子会、分粮会等等，可谓五花八门。到了文革后期，会把大家弄得疲惫不堪，不少人就忍不住在会场打瞌睡。眼下的聚会却与过去貌合神离。老张在路上讲过了，它不是一个村子的集体祷告，而是方圆几百里的撒营盘教区的圣餐会，每月一次，轮流在各个村庄

举行。散布在其它地方的基督教神职人员（执事和长老）全部要提前赶来，从教区牧师手里领受圣餐及教务，回去给普通教徒们分发与传达。

我不禁低下现代文人的傲慢头颅，冒着光束，冒着光束背面的那个声音上阶。在屋檐右面找个背光的旮旯落座，茶水和两三只土碗立即递到跟前，定睛一认，碗里堆着软糖、杂糖、黑瓜子和大麻籽。此刻我挤在彝族群众当中，彼此膝盖靠膝盖，烟草及口腔的辛辣热气交流着。老张游魂一般不期而至，在阶下赞许地拍拍我的腿，又离开了。我目送他的影子至对面墙根，蓦然发现乌云四散，弯月的一边钩住树稍，另一边还钩住几丝乌云的裙带。

这天，这云，这变幻多端又亘古未变的星月，还有这底下的老旧屋檐，屋檐遮蔽的互相依偎的老旧人类，以及火盆、茶水和食物。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即使知道，也无从说起。我不懂彝语，这个族群的一切都不懂，我一个汉族人挤在这儿，跟挤在非洲丛林或印第安部落没啥两样。据说哑语世界通用，那表示“孤寂”的手势该如何打呢？

汽灯背后的彝语还在持续。

它在描述神的旨意吗？

没人插话，没人应和，那唯一的男低音还在持续。一个小时过去了。又半个小时过去了。我有些沉不住气，就起身

神秘的夜，我的镜头不敢惊扰任何一张虔诚的脸

恍若梦中的乡村基督徒聚会

下院坝转悠。我举相机按了好几下，连续的闪光惊起不少低垂的头。我赶紧退避，躲出院门查看冒昧的杰作，却含混如旧梦，真和若干年前生产队开会斗地主的情景相似。

转过身，刚巧与老张碰个满怀，于是相约出院门小便。正贴住墙根掏家伙呢，一位满头飞雪的老者出现了——他就是我此行的寻访对象张茂恩牧师，撒营盘教区级别最高的神职人员。

趁 3 人一齐撒尿，我迫不及待地作了简短自述，老张也跟着敲边鼓。接下来，我们在墙外快速交谈。张牧师直截了当地询问采访动机，本来“土改”二字已涌上喉头，又临时拐了弯儿，变成“记录基督教在这儿的苦难历史，你，还有你家族所作的见证”。

哪怕忙得喘不过气，一个虔诚的神职人员也无法回绝这种请求。张牧师露出谦和的笑容，“晚了一点。”他说。

“再晚也等。”我说。

“不必太辛苦。”他说。“你的伙伴晓得我歇脚的人家，我们改在明天早晨 6 点正见面，如何？”

聚会还没散我们就离开了，回到老张婶婶家已是凌晨 1 点 50 分。灶台的大铁锅烧了热水，我们匆匆烫了个脚，就掌着煤油灯上楼睡觉。床铺虽简陋，却是一人一个坑。绷紧的弦突然松了，倦意就如洪水滔滔，我蹬掉鞋子，竟和衣而卧。隐隐有牛铃叮当入梦，可当我再度睁眼时，额前的窗户纸已透白了。

我与老张同时起床，下楼向他家婶婶致罢谢意。拢桶边

舀一瓢冷水，劈头盖脑浇下，人就异常清醒了。昨晚的钻裆黑狗替主人送客半里远，至坟地边折回。对面山峰的两端，残月将坠，朝霞初升。我们沿昨晚老路，疾步穿插，终于正点抵达一篱笆围绕的农家。

上了十来级石阶，我们在岩洞似的厨房里与张牧师正式会见了。此刻为2006年8月6日早晨6点零2分，几乎一宿未眠的张牧师及其助手张长老刚做完最后一盆圣餐，即指甲盖大的未发酵面饼，象征着耶稣供众人分享的肉。

我们围着一地坑余烬落座。40多岁的张长老算新生力量，所以很谦卑地退到烟火浸染了多年的幽暗墙角。访谈开始了，清新的舞台晨光自门外打进来，作为主角的张牧师闭目沉思了片刻，银发非常夺目。

正文

老威：请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信主？

张茂恩：在娘肚里吧。

老威：哦？

张茂恩：至今为止，我们家族三四代人，信主已有92年。

老威：有确切的记载吗？

张茂恩：我大哥张润恩如果活着，应该92岁。我父亲就

是在我大哥出生的 1915 年，领着全家接受了福音。

老威：我从相关资料了解到，自 19 世纪后期基督教传入中国，到 20 世纪初逐渐形成第一个信教高峰，王明道、倪柝声、宋尚节等第一代本土传道人方应运而生……

张茂恩：在整个云南乃至西南，我们家信主都算早，但是普渡河那边的干彝族信主还要早。当时河两岸的马帮经常往来通商，福音就是从河外的九龙、转龙、兴苴等场口的干彝那儿带到德嘎，再由德嘎传往山里的升发、则黑、马鹿塘和靠外面的撒老乌。

老威：则黑的张长老就是在撒老乌念的西南神学院。张茂恩：张应荣家跟我家一样，是三代长老。而传教士张尔昌建西南神学院已在抗战年间了。此前的二三十年代，莫提撒营盘，就是禄劝境内，世俗社会连初中也办不起，可教会不仅有能力办初中，办各种读经班，还成立了高等学院，培养了很多批人材，为神学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到我出生的 1939 年，周围早已普遍信主了。父母兄弟姐妹，还有父母的父母，近亲和远房的老祖老公公，本村外村，本族外族，无论贫富，全信主。还没学会说话，我就熟悉《赞美诗》，我读的第一本书就是《圣经》。山沟沟里的彝族村子，文盲太多了，可提起《圣经》的某一节某一段，都能背。从小就会的东西，忘不了啰。

老威：福音如此普及，教会的钱从哪儿来呢？西方传教士手里？

张茂恩：信主的人讲奉献，有能力就多出，没能力就少出。比如我们家，在旧社会还算富裕，那么父亲作为与传教士张尔昌一道坐过堂的长老，就是一个榜样。每年在撒老乌举行的短期和长期的福音培训班，人头不少，伙食都由我们家奉献。

老威：这笔开支可不小。

张茂恩：当时我才 3、4 岁，就习惯了家里人天不见亮就起床祷告，然后吆喝着驮满粮食、猪肉的大队骡马，从德嘎运往撒老乌方向。那年月只有山间小道，一去一回要耗三四天。有时候，我还牵住大人的衣角，跟好远，才被哄回来。

老威：你有一个虔诚的好父亲。

张茂恩：我们家世世代代务农，没有哪一辈人不辛苦。到父亲手里，粮食不太值钱了，吃不完，也不兴买卖。于是就转向搞畜牧，养牛养马养肥猪，特别是养鸭和养蜂，比较赚钱。撒营盘这一带，抽鸦片的风气很盛，街子的规模小，除了大烟，其它都不赚钱。所以家里人时常吆着大群鸭子，走一路放一路，十天半月看能不能到达普渡河外的大街子，像九龙、转龙那样热闹的街子，才可以买个好价。肥猪也同样朝河外运，而一年两次收割的上等蜂蜜，得雇专门的脚夫

清晨 6 点多，做罢圣餐的张牧师和小一辈的张长老在访谈现场

背到昆明卖。

老威：这么多？你们家办养蜂场吗？

张茂恩：大约有 50 窝蜂子，很难伺候，可挣钱不少。

老威：按现在的说法，你们家算养殖专业户。

张茂恩：又要传福音，又要多种经营，所以父亲很累。在我 4 岁的时候，他就去世了。他的兄弟，我们的爷爷继任德嘎的长老……

老威：你们把父亲的兄弟叫爷爷？

张茂恩：对。你们汉族的爷爷，彝族就叫老爹。曾祖父

以上统喊老祖。40 年代那一段，是基督教在撒营盘一带的黄金时期，分好几个堂，有 6 对专业传道人。总堂设在撒老乌，德嘎是第二支堂，在升发、普福、则黑、马鹿塘、大松树、皎西、皎平都有支堂。我的爷爷 1943 年任第二支堂长老，一直到解放了，教会活动被中止。

我大哥和我，都属兔，但他长我两轮，24 岁。我还没有出世，他就到马鹿塘上面的普福做上门女婿。他是教会初中毕业，聪明，又有文化，加之岳父也是普福那边的长老，所以在神和人的世界都兢兢业业，做得出色。

老威：出色到哪种程度？

张茂恩：他做过普福的乡长、征兵干部。手中的权利为福音传播提供了很多便利，所以高等学院在撒老乌一建立，他就出任教务长，亲自物色教员，培养和选拔人材，并为专业传道人发薪水。自家还每年出 3 石粮食供养传道人。

老威：你大哥具有现代思维。

张茂恩：传教士都夸他是上帝一流的仆人。撒营盘，包括禄劝甚至整个云南，都有种大烟抽大烟的历史，富人穷人都好那一口，再加上彝族人喜欢赌博，这两大致命恶习造成盗匪猖獗，社会动荡，历届政权都十分头痛。大哥认为，只有福音能使人自觉到原罪，从而戒除烟和赌，彻底净化社会风气。

老威：你大哥这种充满普世情怀的基督徒，在任何政府里都应该大有前途。

张茂恩：可他 36 岁就去世了。

老威：得病？

张茂恩：被镇压了。

老威：哪一年？

张茂恩：1951 年，我 12 岁。

老威：那就是土地改革当中。你们家族肯定都是地主。

张茂恩：是啰。

老威：则黑的张长老仅仅因为信主就叫划成地主，他是我所晓得的世界上最穷的地主。土地财产没有，罚款没钱，民兵没奈何，将他放在西南神学院的一床没有被面的铺盖也没收了。

张茂恩：我们家土地不多，经济收入还是多的。一划阶级、称大秤，大哥全家地主；我和母亲、二哥是一家，地主。1953 年土改复查降为富农，才把抢去的房子还回来两间，分了一点点地种。嫁到皎西的姐姐，全家地主；爷爷是基督教长老，更是反革命地主。捕的捕，关的关，没捕没关的也从自己家里被赶出来，随便找个猪圈让你住进去。所有的一切都收缴去了，见你身上穿的衣裳厚了点，也要硬剥一两层下来。那叫啥日子，畜生不如啊。畜生还有圈，下了力还要给

粮给草，可我们没住没吃，还天天挨斗。躲贫雇农就如耗子躲猫，在田间地头被逮着了，轻点的罚你替人家干活，完了让滚蛋，哪怕你已饿得前胸贴后背，也没你一口吃的。重的就一顿暴打，或者倒吊起来，还押着去陪斗。我爷爷叫斗争了几百次，打得太狠，捱到1958年，又加上饿，就得痨病死了。

我二哥比我又长一轮，他的耳朵不灵，可对主的信心很足。土改中弄得家破人亡，几乎都活不下去了，他还天天跪着祷告。贫雇农见了，就告到工作组那儿。打他，要他承认信主就是罪恶，就是反革命，他不吭声，反而继续祷告。于是手脚绑起来，吊个几天几夜，可只要放下地，他立即祷告，求神宽恕人的罪。他的痨病，还有各种杂病，都终身未愈，可还跑遍这儿的山山水水，为贫苦的、长期病痛的人做祷告。

从13岁遭遇土改到宗教信仰放开之前，我挨打挨关挨饿的次数也不少，特别是文革后期，因为秘密传福音蹲监狱多次，被扒了几层皮，没死掉，得感谢神的保守。1979到2003，我当了24年长老，随后又成为撒营盘教区的牧师，虽然是我们家族唯一的牧师，可与二哥同样，都得痨病，药不知吃了多少，均不见起色。二哥72岁走的，有十几年了，我今年68，神肯定有他的安排吧。

老威：在不同的社会环境里，你也算延续了你大哥的血

脉。

张茂恩：这是我们家族永远的疼痛。感谢神，他走得很有尊严。

老威：请讲讲他是怎么走的，给后世留下一个见证。

张茂恩：一解放，他和他的老岳父就关起来了，受尽酷刑。他在旧政府手里当过官，但口碑非常好，尽管工作组深入到村子里，反复动员，开头也没人出面控诉。1950 年清匪反霸，周围这些村子都毙了好多批地主，风声紧得很，都没轮到他。1951 年升级，关进撒营盘，稍后又进了禄劝县的监狱。普福这边的贫雇农干部才跳脚，要求人民政府清算他。

老威：什么罪名？

张茂恩：晓不得。有人透风出来，家里全懵了。但当时见不着人，也没申辩的地方。

老威：总有个“犯罪细节”吧。

张茂恩：胡编啰。漏洞百出不要紧。甚至没啥细节也不要紧。人关了那么久，肯定要治罪。后来才听人说，上面派的工作组还提出了疑问，贫雇农主席团答不出，面子下不来，就强着脖子吼。人家还好意劝告：“如果证据不足，构不成血债，就不用镇压了。”可地方上说，这会伤害群众的积极性。

老威：杀人的积极性吗？

张茂恩：积极性又不需要文化，只要喊得最凶，打人最

狠，闭起眼睛乱咬就能当干部。

老威：这就是所谓阶级立场？我不太懂。

张茂恩：嗯，你太年轻，不晓得人不如牲口是啥子滋味！想打就打，想杀就杀，运动一搞起来，再煽几把，平常老实巴交的农民也会鼓眼睛、舞拳头。说到底，杀人不需要理由，给你找个理由算抬举你。开会前没打算枪毙你，会开到中途要拉你出去，砰的一声，也没有人吃惊。工作组是外乡人，再调查也摸不透底细，毛主席说走群众路线，工作组最后敢不听地方群众的呼声？

老威：开头不是没人出面吗？

张茂恩：阶级觉悟一提高，人心人性混乱，工作组要控制局面都难。这地面，几乎人人都有过抽鸦片和赌博的恶习，除了信主，很难戒。我几岁时，就晓得撒营盘好多村子不种粮食，全种鸦片，孩子们在罂粟丛中钻来钻去逮猫猫。所以解放前夕，穷富的位子经常颠来倒去，有可能下午你还是地主，晚上就变成雇农，因为土地房屋加老婆都输掉了。共产党禁止抽烟、赌博，禁止信主，哪农民除了种地，干啥去？搞运动啰。把多余的精力放到斗争上，放到打人杀人分财产上。只要划成贫雇农，你就不是烟鬼，不是一屁股赌债的无赖了，你就顺着工作组递过来的杆子向上爬，把受穷受气、借债要饭、典妻当子，甚至路死路埋的根源统统归罪于剥削，

太多的往事，太多的悲怆，愿太多的冤魂安息于天国

归罪于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一个人人都看不起的混蛋，也许转眼就成共产党的依靠，根正苗红，高高在上，子子孙孙吃穿不愁，连开会打死地主也不用负责。这不比鸦片和赌博更来劲？

老威：真是人民翻身做主人了。

张茂恩：土改政策是死的，运用政策的人是活的，随便杀人也是解放啊。所以大哥晓得自己活不成，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时代，也像这样，乱得不成体统。

老威：你大哥遭杀害时，你在现场吗？

张茂恩：大哥被关起来后，莫说家里人，连他的老婆、孩子也晓不得下落。直到已判定死，家里人才提前两天得到通知。要把大哥从禄劝监狱提出来，先弄到撒营盘，再弄到升发乡，轮转着开斗争大会，最后才押回普福当地去公审镇压。家里人要见最后一面，就只能半夜起身，走二三十里山路，赶到撒营盘到升发中间的一个小街子，先候着。那晚上我们都没睡，围在一块哭，又不敢大声。母亲杀了一只鸡，煮了一小点米饭，还不到三更天，就和二哥、姐姐一道出门了。我还小，留着看家。

老威：你能够记事了吧。

张茂恩：我 12 岁了，记忆很深。母亲他们第二天擦黑才归家，我还问："大哥吃了鸡？"母亲点点头，两眼通红。后来，母亲和二哥经常讲到这次生离死别。他们在必经的垭口候了两三个钟头，大哥才押到。抱着哭了一阵，他们就哀求民兵松开麻绳，让大哥吃顿好饭。大哥啃了鸡肉，喝了汤，对母亲说："儿子要走了，母亲你不能动摇，要好好地信。耶稣上了十字架，已为我们赎了在尘世的罪。儿子今天是个罪人，这是该的。儿子在监牢的这些天，兜里一直揣着《圣经》，一直在心里祷告，一直劝那里面的人信，可心里明白自己难逃一死。本地方的那些人，与我无仇无怨，却指控我欠了两笔血债。这是冤案，儿子晓不得，也不认。但是我不申

辩了，因为是无用的。他们一再要求我回去，其实我也想回普福，揣着《圣经》，永远留在我传过福音的普福。母亲，人都有生死，你不要因为儿子灰心，无论如何要信啊！”

大哥就那样揣着《圣经》上路了。在升发斗争完，才回普福开公审大会。要镇压的那天大早，民兵还通知我大嫂：“喂，今天我们要打掉你男人，家里有啥子好吃的东西，给他送一点。”

我大嫂也跟母亲一样，杀一只鸡，煮一小点米饭，大哥也吃了。夫妻最后告别。大嫂哭，大哥还劝她。意思是我走了，你要听“领导”的话，顺着来。随便哪个议论啥子，都不要往心里去。因为“领导”是一清二楚的。“领导”就是上帝，大哥怕连累大嫂，没把话挑明，可大嫂懂得，就不哭了。

接下来他就不在了。

老威：没有亲人在现场？

张茂恩：没有。

老威：什么时候料理的后事？

张茂恩：这是阶级斗争，我们不敢，人家也不准认领尸体。开完会，几个民兵就把大哥拖到大路上打掉，尸体就随便丢进一条小溪沟，在坎坎两边撬两撬，土就塌下去草草掩埋了。家里人被看管得紧，根本不敢靠近那儿。直到 10 个月

以后，上面来了批准收尸的正式通知，两边家里人才聚拢，找几块木板，拼了只匣匣赶去。那情景真是惨不忍睹，溪水从山上下来，已经把皮面的土冲刷得差不多了，大哥像块大树疙瘩卡在当中，脑袋、脚、还有身上的好几处衣角都暴露着。这儿离村边的路很近，大概已惊吓了不少人。难怪他们要允许重新掩埋阶级敌人！

二哥、母亲、大嫂一齐下水清理尸骨，多半泡烂了，有的肉看起还好，手一碰就粉了。没办法，只能把骨头一块一块淘干净，装入木匣匣，待一会儿葬入看好的坟地。

正当大家悲伤至极点，神迹居然出现了，母亲在大哥的衣兜里翻出一本《圣经》！两公分厚，比巴掌小，就是大哥走前反复提到的那本。你想想，沟底泡 10 个月，肉和衣服都烂了，《圣经》还完好无缺！大家立即在坎上、水里祷告。不是那种很正式的祷告，而是在心中默默感谢神恩始终陪伴大哥。他的肉身虽腐，灵魂却已入天国安息，这给偷生的我们增添了无限信心。

老威：那本《圣经》是什么样子呢？

张茂恩：竖排的手抄本，用牛筋绳绑紧。当然纸页已粘成一沓，分不开。字迹也模糊了，还浸透了血。

老威：尽管如此，这本《圣经》的价值还是无法估量。它将作为一个蒙难的物证，进入现代中国人的信仰史。

张茂恩：可惜几十年来政治运动多如牛毛，我们保命都有难度，更无法保存这种“罪证”了。直到文革，母亲终于下狠心烧了它。

老威：阿门，愿它在天国继续伴随你不朽的大哥。

张茂恩：阿门。分发圣餐的时间已到了，我们出去吧。

日祷

我没找到创始人张尔昌的痕迹，只好望着“撒老乌福音圣堂”的灿烂徽记发呆

现在是2006年8月6日早上8点半，朝阳怒放，令晦暗如洞穴的厨房亮堂起来。一阵阵圣歌飘入，还伴随着隐隐约约的鸟叫，霎时就冲淡了笼罩住我们的悲剧氛围。一位大嫂泡上了方便面，我们匆匆吃罢，就跟着双拳捶腰的张牧师出门，融入到瓦顶重迭的山村。牛铃当当，马蹄哒哒，人畜在同一条践踏如泥的鸡肠道上遭遇多次，即使是德高望重的张牧师，也只能侧身紧靠庄稼地边的篱笆，两掌朝外，让圆滚滚的可爱牲口先行。我反手从背包挖相机，要抓拍点东西，不料一条马尾巴凌空而起，呼的甩了个圈儿，我急忙扭头，正好挨了火辣辣的一嘴巴，只好掩面扶眼镜，放弃非份之想。

而脚底也险象丛生，人蹄得一下接一下垫起，避开重心不太稳的畜蹄。最可恶的是粪便，前头拉后面踩，搞得热火朝天，我的裤腿以下都一塌糊涂。

几分钟的路，我们走了十几分钟。赶马或赶牛的汉子们，在扬鞭的同时，还不忘向张牧师点头致敬。在一个稍微宽敞的岔道口，我刹步整理鞋面，刚擦两三下，让鞋鼻子从稀屎里绽露，老张就回头催促。还以农民特有的方式安慰道："一会儿就晒干了，干的好整，跺两脚就干干净净。"

我闻之一愣，舌尖突然涌起一股甜滋滋的回味。眼前的场景像过期彩色胶片一样缓缓褪色，我中年人的躯体也缩小成儿童，而我去世的父亲在胶片里刚巧是我这把年纪。全家人跟他下放到一个叫"柏梓"的农村中学，校园与四周的村庄混淆一体，篮球场在农忙季节就变为打谷或晒麦场，教室在寒暑假也可以是猪圈或牛圈。大人们正经历文化大革命，学校的走资派、保皇狗、反动学术权威（也包括我父亲）隔三差五挨斗，有时也将他们与农村的地主、富农弄一块，浩浩荡荡十几二十个"土洋结合"的牛鬼蛇神，游校、游田坎、开大会，都显得极有声势。学校几百人，贫下中农上千人，夹杂着搞运动，时间眨眼就过去好多天。所以那阵儿最流行的口号是："人民群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份子难受之时。"

父亲作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天天认罪，已喘不过

气了，还在晚上给我补课。我对牛屎，还有其它牲口的屎印象深刻，不仅源于儿时的社会环境，而且源于一篇课文。其大意是面对一泡刚出炉的鲜牛屎，下乡知识青年四处寻铲子，可没料到一位贫下中农女孩二话不说，弓下腰，双手捧起稀屎就往集体粪坑里跑。“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个知识青年通过狠挖资产阶级思想根源，精神面貌彻底改变，见着地上的粪便也用手了。”学校的高音喇叭广播了这篇范文，还点评道，“到底是粪便臭，还是剥削阶级的思想臭？到底谁的内心美，谁的内心丑？相信同志们从一堆牛粪中，能得出答案。”

记忆深处的破喇叭回荡了几秒钟，还是被当下的圣歌一点点屏蔽了。白得耀眼的教堂就在我们头顶，嘎嘎电流贯穿在歌声里。我想，仅从喇叭的质量看，这几十年似乎没进步多少。但肩负着社会改造重任的牛屎却归朴返真，与多种粪便一道，成为这个彝族村庄人人都看见、人人却看不见的日常风景。

眨眼间，太阳又上窜一大截。水汽在蒸发，蝉子叫也刚猛起来。我舔了舔干裂的嘴唇，进了昨晚有些魔幻的黄泥大院，浪漫的外壳一下子剥掉了，眼前一派熙熙攘攘的世俗图景。我拿出相机，镜头内全是人，男女老少，每个角落都是衣衫褴褛的人，都是被信仰点燃的笑。我有意将镜头抬高，

使之越过短墙或屋檐，可天空透白，已经布满了太阳的钢刺。

撒营盘附近的撒老乌村，始建于20世纪40年代初的西南神学院旧址

张牧师的白发闪烁了几下，就消失在正屋里。我晓得他作为方圆数百里的撒营盘教区的唯一牧师，要把圣餐分发给来自几十个村子的支堂长老和执事，可得忙一阵子。老张陪我留在露天院坝里，我问他为啥不跟张牧师进屋？他压低声音回答："我还不够格。"我不以为然道："不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吗……"话尚未落音，老张就将指头横在嘴唇间。

真像演戏，松弛的肌肉一下子又绷紧了。台阶上下的人们停止了走动和交谈，全都支起耳朵，聆听房子内部的声音。

又是彝语，与我年轻的时候听诗人艾略特的英语朗诵差不多，一句不懂，只能凭鼻子去嗅那语义之外的气味，那被肢解的血肉浸润舌根的气味，还有一波接一波的弹音。

持续时间不太长，房子里外的人就一道“阿门”了。生活又恢复了它熙熙攘攘的原貌。老张大声笑道：“等我们的事情一完，我也可以回村子领圣餐。”

我疑惑道：“你不能在这儿领吗？”

老张解释道：“长老和执事在总堂牧师手里领，再回去发给支堂的一般基督徒。月月如此，不会乱的。”

由于语言交流的障碍，我只能拎着相机在人堆里晃悠，遇感兴趣的人脸，就喀嚓一下。靠院门的两面墙根，垃圾与杂物混合堆放，猪圈和鸡圈也没有分界，而人类挤在中间，臭味虽不相投，色彩上倒还和谐。我拍了 4 个老太太冲着阳光排排坐，其中一个，刚才下台阶颤巍巍的，我抓拍了她紧张的脸部。密布的沟壑里，两只眼球浑浊如泥，却相当锐利。接近正午了，苍蝇越来越密。记忆中，我是第一次遭遇如此多如此勇猛的苍蝇，人稍微一站，就没头没脸地扑上来。我周围都是基督徒，修养好，根本不把这种下贱的军团当回事，他们或立或坐，每人身体上起码有几十只，甚至一个加强连队。他们谈话、笑、拉手、拍肩，苍蝇们也随之起落、盘旋，似乎也属于他们情绪的一部分。除非某几只苍蝇高度近视，

在谈兴正浓之际向口鼻眼俯冲，他们才漫不经心地抬手，抹一把面孔，或者在脸前扇两下。我亲眼见有人在两三分钟内，从鼻孔、嘴角，还有舌头上，抠出些活物来，然后遗憾地捻两捻，扔地下。

我是一个外来人，是整个村子唯一赶苍蝇的傻子。我老是站不住，到后来，拍照也有困难了。因为稍微停顿，手背和秃瓢就成了苍蝇的停机坪，这些裸露的地方咋会这么敏感，那么细的蝇腿、蝇须一碰，就痒得不行。没办法，我揣了相机，在人堆里穿插着兜圈子，将苍蝇逗得恼怒又兴奋，嗡嗡地跟着撵，我往上瞅了一眼，在波纹般眨动的光线里，至少有一个飞行大队。

张牧师从正屋门坎冲我招手，我进门，室内气温要低些，苍蝇相对就少些。张牧师给我挨个介绍各村的长老和执事们，他们的汉话不利落，却一直点头微笑，并将昨晚就塞过的糖果与瓜子再塞我一遍，仿佛我是个天生嘴馋的顽童。我一一认清他们被至高的火种所点燃的面容，跟云贵高原遍布的红泥真没区别，除此之外，我能了解他们多少？

转眼间，院坝里摆开 4 张红饭桌，这让我又一次重温了旧梦。自小到大，我在四川乡下吃过不少各种名目（以婚丧为主）的筵席，可在圣餐会期间，与如此众多的乡村基督徒一道共进午宴，却是初次。除了云南人习惯矮桌矮凳，四川

人习惯高桌高凳，一开始，我的确没觉得两省乡间的风俗有何不同，从古至今，中国各省都保留了逢年过节杀猪宰羊、大盘大碗的老传统。

厨师和房东大嫂进屋多次，点头哈腰，请张牧师及众贵宾入席。大伙起立又落座，落座又起立，反复谦让，“请啰，请啰”不绝于耳。我这个既要混饭又疏于礼仪的文人，跟着谦谦君子们起落了两次，就极不自然地僵在原地，无所适从。幸而张牧师及时牵住我的手腕，主角亮相一般出门坎，下台阶，于是大家才依次坐下。我扫了一眼，4 张大红桌都满了，按每桌 8 至 10 人算，也该有 38 位吃客。另外还有数量相当的两轮吃客在院墙周围候着。

上菜了，猪羊鸡鸭、豆腐花生，照炒炖烧凉拌等样式登场，至少有 10 来种，一下子就把桌面布满。日已登顶，饥焰如焚，不料苍蝇比人类更没耐性，亡命徒一般成群降落，争夺起我们的口中食。若在往日，我早就赶在苍蝇发起轮番冲锋之前运力执箸，冲最厚实的那块去了。可今天当着张牧师和满桌长老，我暗暗发誓，绝不先动筷子。眼瞅着那只翘出汤面的鸡腿刹那间粘上了 10 余只苍蝇，我心潮难平地垂下头。

区别于所有世俗筵席的时刻终于来临，全场突然之间静默了。本来应该是碗碟交错、你请我请的大热闹，却反而很深地静默了。只剩下苍蝇军团的嗡嗡，由含混到清晰，终于

连成了一大片。我情不自禁地仰头，屋檐之上是山峰，山峰之上是日神，遥不可及。而在日神和我们中间，是苍蝇的活动屏障，它们还在飞过来，降落；飞过来，降落。

午宴有好几轮，所以她们还得等待

领完圣餐之后的午宴，苍蝇们在四周唱着赞美歌

张牧师从矮桌边起立，眺望远方，开始祈祷。由于我们坐得低，他就显得特别高。此时的日神，笔直笔直的，用它那光线的细脚，踩住他那银白如雪的头发。所以我相信，他的祈祷能够震颤阳光，直达天庭。

老实说，我依然一句不懂，可又觉得每一句都那样美丽。我听过不少彝族的民谣，前不久，我在云南大理的酒吧里碰见一个法国人，他刚从四川大凉山过来，用他那非常精良的录音设备，采集了两三个光盘的彝族古歌。其中有闹的，类似火把节的集体狂欢；也有静的，游魂一般，极其孤寂。后来这种孤寂进入我当夜的梦里，周围都是黑黝黝、光秃秃的环形山，那单线条的歌声就在里面回荡，每个音符都滴着蚯蚓般滑腻腻的泪。

醒来时我的双脚冰凉。这就是我对彝族下意识的了解，他们都是从阴暗、潮湿的山里来，从站不稳人的陡坡上来，半神半鬼半人。可在此时此刻，一个彝族牧师的投影罩住我的头顶，他的声音浑厚，在天地间都引起了共鸣。这种祷告的音节，令我想到的不是传统，也不是现在的信主的彝族，而是黑人、印第安人或大西洋岛国的土著人敬神的旋律。

连苍蝇都感动了，神圣了。张牧师的祈祷分三段，上一段与下一段中间，约有十来秒的间隙。而令人厌恶之极的蝇群，此时如个头最小的唱诗班的孩子，成千上万，甚至上亿

个遍布苍穹的孩子，紧追在张牧师波澜壮阔的赞颂后面。当主祷的声音一停，蝇群的嗡嗡立即起来，波涛般越涌越高，形成天籁的混声合唱，填满了世间的每一个空隙。

张牧师还在祈祷。

苍蝇还在嗡嗡。

我抬眼直视日神，苍蝇笼罩下来。不知有多少只歇在我的眼皮、鼻翼和嘴唇上，透过睫毛，我触及到它们的腿与翅膀。天空是一个反扣着的蚁穴，刺满了嗡嗡的针孔，赞美造物主的针孔。我不禁吟道：

你们这群天堂的蚂蚁，
从粪便里脱胎换骨，
一波又一波，嗡嗡嗡，
引导我们向至高的地方迁徙……

当张牧师道完“阿门”坐下，集体的圣歌就唱响了。这次是人类与苍蝇，与鸟，与其它益虫及害虫的合唱，我也跟着哼哼。然后悄无声息地用餐。为了向上帝祷告，汤里牺牲了几十只苍蝇，大伙动筷子将它们打捞上岸，便吃起来。

饱经沧桑的基督徒，可惜我们彼此“语言不通”

等待布道的乡民们

不断有热菜添上桌，但我没吃多少就饱了。旁边的张牧师和邻桌的老张都边吃边张大嘴巴，笑得挺开心。我想，他们与周围的彝族兄弟一样，已习惯了信主的长久快乐，而我

呢，是否只配享有怀疑论者转瞬即逝的快乐？

下午 1 点多钟，我们离开这个乡村伊甸园，去另外一个更老的伊甸园——位于撒老乌的西南神学院旧址。

沿途很顺，两点过就拢撒营盘镇，然后从一条岔道上规模比德嘎稍大的撒老乌村。车子在村中的水泥路穿插了一截，遭遇了好几辆黑烟弥漫的手扶式拖拉机，最终停靠在一畜粪遍地的空坝里。

接下来是贴着红土墙根七拐八拐，被我赞美过的猪、狗、苍蝇无处不在，其一如既往的超常热情令我们不断跳跃，不断小跑，终于一溜烟扎入郁郁葱葱的苞谷地。于地坎边刹步，孤岛般的西南神学院在对面浮现了。在两座深绿色浅丘的正中缺口，散落了两三幢寻常房屋，灰瓦白墙，跟川西平原的朴素农舍并无二致，却与云南乡村普遍的红泥石墙对比鲜明。

回顾第一次路过撒营盘，曾沿着孙医生的食指恋恋不舍地眺望，几十年前就埋骨于此的澳大利亚传教士张尔昌夫妻，还有张长老、张牧师等系列脸谱就走马灯一般转动在眼前。心跳加快，本来可以绕个半圆，从同一水平面的正规小路散步过去，我却率先直下直上，自此端达彼端，经历一巨大锅底。老张连连呐喊无效，只得与我一样气喘吁吁地撵路。

我到底走进基督教在中国西南的一个重要的早期发祥地，不仅外观，它的内部也没任何堂皇的结构与装饰。学院正门和一般民居的门差不多，作为主要建筑的“撒老乌福音圣堂”连个牌匾也没有，那几个字嵌入半个黄太阳图案，一并涂画在二楼眼睛般分布的窗户正中。不断有信徒自小小的门洞进去，我们也加入了。圣堂内倒十分宽敞，砖木结构，有特别大的窗户、黑板、红十字架，还有讲坛与一排排漆成草绿色的长板凳。如果不是头顶的楼板太灰暗老旧，这儿就是能容纳几百人的大课教室了。

稀稀拉拉的村民，犹如提前进教室的勤奋学生，安静地等候着。我却张大眼睛寻找曾经辉煌一时的西南神学院的痕迹。我拎着相机屋前屋后、满院子转，甚至还爬上了依山而建的红泥后墙，也没寻出它的创始人张尔昌夫妻的墓或碑。有几块砖也好啊，可是没有。什么也没有。

每一个房间都进入或窥视过了，灰尘、蜘蛛、苍蝇、粪便，还有一只用铁链子拴住的凶猛黑狗。二楼的木板早就朽了，我小心翼翼地往前探了五六步，就听山崩地裂一声响。老张吼了声：“快回头！”下面院坝已出现一滩看热闹的信徒。

在另一间较小的空教室，我为在黑板和十字架旁剃头的一对信徒拍了照。可怜的老张尾巴一般紧随，担心还闯出什么祸来。直到我惘然若失地蹲在石阶边，盯着一串串从四周

村子赶来的乡民发愣。

在过去的西南神学院，如今的撒老乌村福音堂周围，我拦住好几个人问："你知道张尔昌吗？你知道西南神学院吗？"

这些虔诚的基督徒，有的点头，并指指脚底："这就是啰。"有的却摇头，听不懂一个外乡人在嘀咕什么。

告别了，在中国大地上几经风雨的天上的国

许多乡村信徒并不知道这是西南神学院的旧址

土改受害者孙大川、陈秀英

热衷于修家谱的土改受害者孙大川

前奏

2006 年 8 月 6 日下午 4 点多钟，我们风尘仆仆地从撒老乌赶回禄劝县城。老张不愧为模范基督徒，他兜了几圈，七探八问，才将我送到指定的一家旅馆。我当即付了几天的包车钱，共计 400 元人民币，并连连道谢。本来已相当便宜，老张却特别不好意思，就陪我进门，扯开喉咙喊了好一阵，直到惊动了一位衣着相当正统的妇女同志，她边打毛线边打量我们：“找哪个？”

“马鹿塘孙家的老辈子啰。”老张陪着笑，“这位作家专门来找他。”

“有单位证明吗？”妇女同志一脸警惕。

“我出过许多书，这张脸就是证明。”没办法，我只能自吹一把，以气势压人了。

妇女同志果然一捏就软。“孙如策在电话里也没讲清楚啰。”她干笑着解释罢，就领我们进了开着小窗的“旅客登记处”。里面乱糟糟的，桌椅、床铺和破沙发上都堆满棉絮、床单，我一时不知道该在哪儿落屁股。正左顾右盼，一个戴着鸭嘴帽和白框眼镜的老头出现了，小城退休干部的装束，一笑，满口假牙。我的开场白带着调侃：“你们可真是一个有地位的家庭。”

谁知老头的话匣子马上就打开了，从云南境内的孙姓祖宗哪儿来哪儿去哪儿落户起头，一直讲到如何垫家底，如何发达，如何名扬四海，乃至祭祖宗修家谱，将春秋时代的孙武孙膑、三国的孙权、民国的孙中山统统纳入了家门，颇有天下孙者一家亲的气象。我洗耳恭听了 20 来分钟，终于截断他的话头，问及土地改革。老头愕然，并抬手搭住长长的寿耳，冲向我的嘴：“啥子？”

“孙家在土改中的遭遇。”我提高声量道，“我已采访过好几位，你的辈分高，有文化，肯定比他们更讲得透。”

“都过去啰。”老头沉吟道，“现在提起来不合适啰。”

我抹了一把口鼻的尘土，清清喉咙，也打开话匣子。从

为黄世仁、刘文彩翻案一直往下说，口沫四溅，还从包里掏出《土地改革运动史》作为左证。老头眉间紧锁的愁云方才散去，他最后还疑虑地问一句："真的可以说？"

我这个反革命如革命者一样坚定不移地逼视着企图隐瞒历史的老地主。访谈正式开始。过了一会儿，我觉得身边少了点东西，转眼一瞅，老张不知何时消失了。

正文

老威：说吧。

孙大川：我的脑子很乱。

老威：说吧。

孙大川：我的脑子真的很乱。

老威：老人家莫着急。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我不催你。

孙大川：整个禄劝县境，孙姓的影响很大，光马鹿塘一个乡，就有300多户。其中又数我们这一支最著名。

老威：我这一路下来，听了不少有关你们孙家的故事。

孙大川：我们的祖籍是南京罗安，大约在明朝朱元璋手里，我们的祖先作为军人，被皇帝派来攻打云南。然后驻扎下来，镇守边陲，就再也回不了家乡。以后，又经历了许多变迁和繁衍，我们这一支孙姓在曲靖的秦寨沟小衡山落户，

至今，小衡山还有我们的祖坟。大约过了 6 年，虫灾严重起来，搞得颗粒无收，加之兵荒马乱，所以老祖们只好再次拉家带口背井离乡。到底走了多少时间、多少个县市已无证可考。最后听一个姓杨的客商报信，称马鹿塘条件好，又山高皇帝远，开荒没人管。于是就全部过来了。

当时，马鹿塘还叫新火山，地势虽然高，可万山老林，土地肥得出油，开春刀耕火种，随便撒下一毡帽（相当于一升）荞子，秋天就能收获一石。我们孙姓，还有其它姓，就在这儿扎下根来，安身立命，繁衍后代。据家谱记载，率领孙姓在马鹿塘落脚的老祖叫孙准和孙浩，顺着下来的辈分，是兴、开、万、济、大，然后才是如。孙姓以农业为基础，以畜牧业求发展，经几辈人的辛劳，从彝族土司手里买了不少土地。在马鹿塘之外许多地方，也遍布孙家子弟了。开明老祖时期辉煌了一段，办了 4 个铜厂 4 个纸厂；接着是孙万昌老祖，抵达了顶峰。那时的交通不发达，马鹿塘产的铜，经常要用 100 匹以上的骡马驮到昆明，交割给国民政府。

老威：这么说，刀耕火种起家的孙姓，这时已演变成民族资本家了。

孙大川：只限于孙万昌老祖这一脉。因为他脑子灵活，懂得就地取材，多种经营。比如造纸的竹子，就是山上砍下来的。国民政府还送了一个匾，派人来悬挂在堂屋正中，表

彰他对社会的贡献。一解放，家里人就赶快取下来烧了。

老威：孙百万的名声在禄劝县境很大。

孙大川：他又叫“金铜官”，在云南省志上都有记载。

老威：据我了解，到了解放前夕，你们孙家已经衰败了。

孙大川：可饿死的骆驼比马大，土改时划阶级，在整个撒营盘区内的孙姓，成分高低各占一半吧。

老威：请讲讲你自己在土改中的经历。

孙大川：我家是孙百万的直系后裔，所以共产党一来，大部分被镇压了。我父亲有 6 弟兄，都不在了。我三大爹是减租退押阶段被杀的，罚款交不出，命就保不住。三大爹的大儿子也叫杀了。我是四弟兄里的老小，当时还在昆明做生意，没料到一回马鹿塘探亲，就没走得脱。

老威：为什么？

孙大川：家里已相当紧张了。大哥曾做过保长，一解放就不在了；二哥孙大尧，才 26 岁，也被当成反革命镇压掉；二大妈家的五哥孙大恩，是马鹿塘的乡长，大概 40 多岁吧，自然该杀；还有孙营长的侄儿孙维汉，在国民党部队里任过排长，也叫杀了。

老威：人命关天，总该公布罪状吧。

孙大川：先把人集中关押，当时赊角、新槽、马鹿塘为一个乡，就把这几个地方的地主、富农弄一块，有四五十人。

天天审天天打天天用刑，你熬不过去，一认罪，就符合枪毙条件了。唉，那年头，其实认罪不认罪都是走过场，如果有3个以上的贫雇农站出来揭发，你就死定了。

老威：不通过法律吗？

孙大川：有临时法庭。工作组在上面，有时候是南下干部，有时候是本地干部，最高的级别就是区长了。下面坐一排贫雇农主席团，胳膊上还绑着红布条，满脸杀气腾腾的。成百上千的人一呼口号，打倒、枪毙、铲除之类，情绪就调动起来了，口水、石块、棍棒都朝阶级敌人飞过去。这时才由贫雇农主席团举拳头，往往都是一致同意杀，再将脸转向工作组。只要上面点点头或挥挥手，一个五花大绑的倒霉鬼就报销了。

老威：当时你在场吗？

孙大川：我都在场，不过没有挨斗。我1947年在皎西上中学时，就接触到地下党，以后又参加国民党孙营长的部队。孙营长后来起义，倒向郑伯克的游击队，我也就跟着成了共产党的人。马鹿塘闹土改，本来我赖在昆明的单位，也许就没啥子事啰。可母亲带信来，责备我没回家尽孝，受旧教育的人，这罪名可大了，于是回家，亲身经历了家破人亡。

老威：你也算革命干部吧？对你的家属没有优待吗？

孙大川：连我都自身难保啰。

老威：能不能讲具体点？

孙大川：过去了就过去了，共产党提倡向前看嘛。

老威：可是，

孙大川：没得啥子可是，一辈子命运就这样了。

（我被呛住了，谈话陷入僵局。幸好这时陈秀英老婆婆进门，点着虾米腰接上了话茬）

陈秀英：小同志你不了解，老头子胆小，他 1930 生，今年 76 岁，还天天读报学档，生怕一不留神犯错误，又挨整。我 1933 年生，嫁到马鹿塘孙家才 14 岁，没过几天好日子就撞上土改啰。夫家遭殃，娘家也遭殃，连个退路也绝了。

老威：你娘家在哪儿？

陈秀英：在马鹿塘上面的草海子，跟孙家也算门当户对，土改划为地主。我妈妈在旧社会就去世了，家里剩我爹爹，还有我们子妹两个。一解放，工作组进村，访贫问苦，动员穷得没底的人站出来，在大会上揭发富人。草海子所有富庶一点的人家，都没跑得脱。我哥哥是在减租退押阶段判刑劳改的，那时 22 岁，结果 54 岁才放回来。

老威：什么罪名？

陈秀英：有两个贫雇农检举他杀人。

土改受害者陈秀英

老威：杀了谁？

陈秀英：我大嫂的堂舅老公，姓田。我妈去世后，我哥18 岁，正在乡里的小学教书。姓田的成天在外游手好闲，我哥看在亲戚的份上，就把他弄到学校来打杂工。没想到这家伙作风不太正，利用背柴的机会，动一个家门的姐姐的心思。我哥发现了，就批评他，因为身为教书先生，要给学生和家长一个严于律己的榜样。可能是言语重了点，姓田的想不通，就吊脖子自杀了。这事远乡近邻都晓得，解放前就结案了，可万万没料到解放后又被翻出来，作为地主阶级谋杀贫雇农的一个例子。我哥被公审公判，先是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改成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刑满后强迫留在昆明市第一监狱，转为工人，54 岁回家时已成光棍一条了。

老威：你大嫂死了吗？

陈秀英：改嫁了。她守了几年，有一回去探监，大哥就对她说，我可能这辈子回不来啰，你这么年轻，还是另找个人家好好过日子。

老威：你大哥是个好人啊。

陈秀英：死掉的好人多啰。

老威：判他这么重的罪，不经过调查取证吗？

陈秀英：小同志你今年 30 多岁吧？

老威：40 好几了。

陈秀英：所以你不明白那是个啥子世道！划成地主富农了，就是案板上的肉，任砍任切。根红苗正的贫雇农检举你个臭地主，还敢狡辩？当场打死你！

我哥送劳改，民兵又来折磨我大嫂。吊几天几夜，还跪瓦碴，顶烧红的铁十字。田地、房子、财产全拿走，还不甘心，要挖浮财。交不出来了还要罚款。真是生不如死啰。我爹风闻我大嫂被整成那样，估计自己一把老骨头，熬不过去，就在半夜自杀了。

老威：什么？

陈秀英：也吊脖子了。当时，地主吊脖子很普遍，不值得大惊小怪。光草海子一个村，就有七、八个地主吊脖子。

老威：熬不到头了？

陈秀英：打、吊、用大杠子压腿，你嗷的一声昏死过去，

又水泼，醒过来又整。还想方设法消遣人，逼你围着海子跑，或者从这面山跑到那面山，跑不动就用竹杆追着打，像赶牲口一样。旧时代的妇女，都缠裹脚，三寸金莲，平常出院子门都少，这时候却一跑几里十几里。大群年轻力壮的汉子一路跟着，摔了筋头，大家就哈哈笑，再抽你几杆子，爬起来跑几步，又摔了，大家又笑。你越鼻青脸肿，人家越高兴。我三婶就是被活活累死在半路的。

大形势摆着，你没处躲，有工作组撑腰，日子也看不到头。动不动就枪毙人，地主的胆子早骇破了。与其最后受尽折磨而死，不如吊脖子来得痛快。我六公公家，大妈和大哥吊在同一棵树上，大妈 70 多岁了，弓腰驼背的，大哥也有 50 多岁，母子俩就那样脸对脸、头抵头地去了阴间。草海子的晚上很冷，大清早人们发现他们，眼还睁着，脸上的泪冻成了冰槽槽。于是去拿锄头，嘿唑嘿唑地刨坑，十几个人忙了一上午，估摸着够躺两个死人了，才挥一刀，割断绳子，让母子俩扑通一声落下去。有人说他们在坑里竟然直挺挺地站住了，一个民兵用锄头一勾，才倒下，可脑袋还双双卡在坑沿，又一勾，才在坑底摆平了。

还有三对地主夫妻吊了脖子，有陈姓，也有外姓。都脸对脸、头抵头，吊在同一棵树上。

老威：这情景够震撼！这就是中国人的爱情故事啊。

陈秀英：不是故事，是真的！男人熬不下去了，想死，又觉得自己死了，把婆娘丢在人间咋办啰？孤苦伶仃，挨了斗挨了整回来，连个擦身子的人也没有；痛得叫唤，连个递水的也没有。就哭，就把脑壳去撞墙，就喊："婆娘啰婆娘！"女人一听就清楚了，男人你好自私，没活头就要先死！我成了地主婆，又改不了嫁，为啥不一块死了干净啰？于是抱着哭啊哭啊，又不敢大声，怕民兵听见，就你咬我的肩膀，我咬你的手杆，将牙齿印往肉里压。找一根长绳子，在树叉顶绕几圈，绳子这头挽一个套，那头挽一个套，再搬一条长板凳，一起站上面，一起把脑壳伸进套中。你盯我，我盯你，身子冻僵了，泪流干了，还看不够啰。再一起踢板凳，一起……埋人倒省事啰，脚底下刨个坑，人成双成对掉下来，也不用棺材也不用寿衣，甚至坟包都不用起，土弄平了就完事。

（话至此，陈秀英婆婆已泣不成声。孙大川老汉忙插断话头，连道"提不得"，并声明马鹿塘与草海子不属于一个乡，马鹿塘的土改就要温柔得多。我指出，马鹿塘已去过了，而且采访了谁谁谁，连贫雇农剥死人衣服的细节都了如指掌。老头神色愕然，随即也点头证明，这一切不是虚构）

孙大川：我二哥被镇压，不仅衣服，连鞋子、帽子都叫

人脱了。光溜溜、血糊糊就入土了，家里不敢出面管啊。老母亲63岁，在减租退押时也关押了，因为她吃斋念佛，是乡里出了名的善人，所以工作组指示要专政，下面的群众明里打几下，暗地都不忍心出狠手。

老威：那时候还讲人情吗？

孙大川：山沟沟里的农民，没见世面，本来都淳良，可搞土改，把阶级斗争意识一灌输，就凶起来了。可老母亲，连叫化子饿死了，棺材板她都出，哪个能冲她凶啰？即使做个凶的样子给工作组看，转眼也就放她一马了。由于没吃大的苦头，她92岁才去世。我们也算尽了孝道。

你这辈人，已想象不出当时有多黑暗。城里许多像我这样参加过革命的人，一听说家里划地主，统统吓得不敢回去，就是在单位上，也得夹着尾巴做人。我回去了，心想总可以为家庭承担一点，但土改一划成分，我过去的革命经历都不认了。

老威：以后认了吗？

孙大川：也没认。因为孙旭原来是国民党的营长，虽然投奔了共产党郑伯克的游击队，但历史问题始终没交代清楚。在50年代的三反五反中，他就受到冲击；57年反右，他又成了反革命右派，直到邓小平上台才平了反。我参加的是由孙旭部队改编的游击中队，所以也跟着倒霉。后来他们上头有

个说法了，我才把要求平反的申请递上去，云南省信访处批示：“应予平反。”从县上发回到乡里，被党委书记丁绍文给扣押了，所以我离休干部的待遇一直没享受到。

右派诗人流沙河

前奏

往穷山沟奔波两趟，胸口堵得急，于是琢磨着改变路线改变心情。

2006 年 8 月 22 日黄昏，我在云南丽江车站送走执意要去北京闯荡的女友，万念俱灰了几分钟，光棍汉的豪情又习惯性地回荡于胸。真的，老天爷算照顾我，派来不少好女人，可最终都感到缺乏安全感，要一脚踢开我这条流浪狗。

基督徒余杰和胖子王怡给我开的处方是，挽死女人的胳膊一起信上帝、进天堂；而刘晓波同志说，老廖，铆足劲儿找个蓝眼睛！看来你只适合跟蓝眼睛过。

可眼下，先独自瞎胡混，至少该去哪儿就去哪儿，不用绞尽脑汁找理由、陪笑脸了。

想起在成都的右派诗人流沙河，觉得温暖，从 1982 年我

进《星星诗刊》做见习编辑始，我们的师生关系一直持续着。印象中，沙河老师渊博如海，细致如海底握针，恐怕世上还没有一段他不知道的中国历史。

我读过沙河老师一些写旧社会的文章，晓得他也是地主家的狗崽子。掐指一算，土地改革伊始，他大约弱冠年纪，该经历了。

我找到了瓜娃子进城的正当理由，我对那个以吃喝玩乐而闻名的温柔乡既厌倦又难于割舍，每次回去，都要寻一个“正当理由”。

穿过灯红酒绿的丽江古城，我跨入暂住了一年多的院门，嘻嘻哈哈的乡音扑面。原来是十几个男女老乡在屋檐下铺开两张矮桌，正把“斗地主”玩得热火朝天。这种以成都为发源地的扑克赌博游戏，目前已风靡全国。我本想从桌旁悄悄绕进屋，却碰巧被抬头插牌的一位黄毛女孩瞅见，就顺口叫唤：“快来斗地主，好耍哦！”我笑答不会，女孩就以更大的声量喊：“你是不是成都人哦？连斗地主都不会！”

在此起彼伏的嘲笑中，我被迫应战：“我斗的是另一种地主，你们也不会。”

是的，彼地主非此地主，众乡亲消化历史的胃口举世公认，前两年号称“哪里有成都人哪里有麻将”，近两年却改成“哪里有成都人哪里就有斗地主”。

乘飞机返乡只需几十分钟，可机票不打折，要1000来元，令人肉疼。于是次日大早，我来到昨日送别的车站，寻了一辆野的坐进去。这是5人座的国产夏利车，司机满脸横肉。照规矩，我敲定100元的路费，就默不着声地等了一个半小

时，待 4 位旅客齐了，车才吭吭哧哧地发动。我这辈子与破车有不解之缘，这回也不例外，跑了几十米，尿骚混杂的油烟就弥漫起来。旅客们捂着鼻子埋怨，司机却更愤愤不平，骂世风日下，车停在旅馆院里，也有不止 3 个王八蛋起夜乱冲尿。

然而，尿骚油烟在往后 7 个小时的旅途中就没散过，有时看不见烟，味儿却在，并且还加了一种激发人想象的烂香蕉味儿。丽江号称中国最美的旅游胜地，我们仿佛从一根巨大的香蕉芯朝外钻，刚达城郊，就遭遇了和最美的内瓤对照鲜明的煤场、石灰场及污秽四溢的小镇。接着是无休无止的爬坡下坎，从丽江到四川的攀枝花这段路，堪称世界急弯之最，司机在我旁边，甩方向盘犹如疯子推磨，脸部横肉直抖，身子也连带着左右倾斜。不大一会儿，就把我整迷糊了，我梦见自己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乱跑，脑袋也没了屁股也没了。

咚的一响，我被撞醒，原来是急刹车。后车门急不可待地弹开，两个姑娘连滚带爬翻至路边，肩背一耸一伏地呕吐。那反刍的间歇，情不自禁的喔喔，一下子将我的感觉给刺激起来，胃液如喷泉，一起一落地射击舌根。我捂住双唇，咬紧牙关，可满腔的酸辣糊糊还是溢出嘴角，染透了指缝。

自车窗探头呼吸新鲜空气，山高水低路漫长，四处是矿坑。那些峰那些梁，犹如千万匹死狗堆积而成。装在塑料垃圾袋里的乌云，以及从乌云间绽露的皱巴巴的太阳。唉，罢了，不看了。我灌了几口矿泉水，继续闭眼，车在地狱里继续盘旋。

我记得两位姑娘又吐了 6 次，终于披头散发，厉鬼一般

瘫在后座。没心肝的司机却怪弄脏了他的车，还说："与其活受罪，还不如多出几滴血坐飞机。"这理所当然招来合力声讨，姑娘们说："你早点开口，我们就不坐了。"我说："如此破车还拿来装人，可见你是个要钱不要命的角色。"司机气疯了，直叫"乌鸦嘴！乌鸦嘴！"还连呸好几口。

下午 3 点多锺，我们从山梁落底，进入大峡谷中的攀枝花市西区。这是上世纪 70 年代才兴建的著名钢铁城，原名渡口，为祖国三线建设的重要项目。日影昏沉，天空如锅盖罩住钢架一般裸露的山体，以及依山傍水的楼房和平房。一群群光膀子男人自窗外闪过，更远处有三五个光腿女人。车沿着公路飞驰，金沙江在公路下咆哮，对岸耸立着无数炼钢炉，像或跪或站或手挽手的超级巨人。矿渣和其它废料如瀑布，自斜坡倾泻而下，直达河床。由于日积月累，好几处河床都变窄了，弯了。这是个可怕的城市，每一角落都弥漫着浓烟和粉尘，偶尔下几滴雨，也像苦力出的汗水一样粘稠。从西区到火车站所在的东区，蜿蜒蜒蜒几十公里，可司机欺生，却在东西区之间的汽车客运站停靠，威胁说：要么加钱，要么下车。

热浪袭人，两位姑娘不愿同恶棍纠缠，就另外打出租走了；丢下我和重庆籍的商人要讨公道。若干光膀子从小车及马路对面钻出来，替横肉司机打帮腔，被逼无奈，我只好让商人坚守阵地，我去找公话报了警。横肉司机见势不妙，就冲着我俩奸笑，并答应马上送我们去赶火车。

本以为他改邪归正了，却没料到车才沿江跑出三四公里，就在三岔口脱离正道，右拐上坡了。后排商人立马惊呼："你

要把我们拉哪儿去？！”司机狞笑不答；商人又叫：“你要找地方黑吃黑宰嗦？！”

司机猛轰油门，牙关咬得嘎嘎响，我顿时懵了，商人已从后排伸手扯司机的肩膀。我见状，血涌脑门，竟双手去夺方向盘。车子在山道上划起了之字，如匪警片里的镜头。事急矣，我全身都扑上前，手劲奇大。眼看车要往崖壁撞，却嘭地刹住了。

我与商人是外地手机卡，遭屏蔽，不通。光天化日，又不便先动拳脚，于是只能与匪类僵持。约过半个钟头，来了一辆救命警车，我拦住。警察下来听双方诉明缘由，厉声呵斥司机，并命令他立即折回客运站。在站内的处理结果是，由司机出 20 元人民币，另打一车开路。

虽然耽误了两班车，我和商人到底挽回了面子。可临分手，商人却说：“如果车撞了崖，事就大了，哥子，以后莫这么莽撞哟！”

黄昏时分，我登上了攀枝花去成都的列车，浑身酸痛地栽倒卧铺，脑子一片空白。第二天中午，抵达成都火车南站。我暗暗诅咒，这辈子再也不去攀枝花，除非那地方来一场特级地震。

2006 年 8 月 24 日下午，我穿过被毒日头烤得熟透了的大半个城区，在仿古建筑大慈寺对面的四川省作家协会宿舍楼内，挥汗如雨地敲响了那扇熟悉的门。迎客的照例先是吴梦华师母，瘦得跟豇豆一般的历史老人流沙河正穿背心，摇蒲扇，蜷缩在客厅的木椅里看书。

落坐看茶罢，沙河老师照例先挑起话头，询问我的近况，

我照例拘谨作答。暖流涌上心头，此情此景重复了多少年多少回了？我在《证词》里，曾记载过自己出狱不久登门拜访先生的事实——他问我近来做什么，我曰“在家写作”；“还写诗？”他二目如电。我摇摇头，他却自以为然地点头道：“我晓得我晓得，你再也写不出过去那种想象力发达的诗了！像你我这样受过命运重创的人，内心的刀痕至死也抹不平，那你就放弃诗人去做一个历史的证人吧。你的口舌笨，上苍却给了你一支比众人有天赋的笔，并且知道你不会撒谎。他让你坠入炼狱，让你目睹并忍受种种可怕的煎熬。那么多人同你一块蒙难，而只有你有机会爬出来并神志清醒地回忆、记录一切。有时候，经历绝望也是一种福分呀！你要老老实实地写，如果将来有一天，你的作品能够被当作证词或数据，存在档案馆里，供人们查阅，引证，就很不错了。作伪证者必遭天谴！”

终于轮到学生追访老师了，可以说，这十几年来，我没有忘记他的教诲。

正文

流沙河：你的《中国冤案录》做到第几本了？

老威：第三本。这一本是土地改革专集。

流沙河：土地改革？这倒很有意思。

老威：我往偏僻山区跑了两趟，抢救性地走访了一批七、八十岁的老人，其中有地主，也有贫下中农……

流沙河：我纠正一下，“贫下中农”这个名词是文革前

才出现的，土改的时候还没这么叫。你要写，就一定搞准确，莫给别有用心的人留下攻击自己的口实。

老威：我一着急，就漏出口误了。虽然我在面对面采访时，那些老人也习惯说“贫下中农”，可我相信那也是过于久远的年代或政治运动的错位留下的口误。后来通过查数据，了解到“贫下中农”这个特定名词的确是上个世纪60年代从“贫农下中农”演化而来。

流沙河：对头。土改时，只有贫农、雇农、佃农、中农、地主、富农等等叫法。

老威：也有“贫雇农”的联称，表示在同一战线上。工作组在当地依靠的主要是“贫雇农主席团”。

流沙河：土改至今已56年，普通老百姓的记忆早就模糊，还以为土改仅仅是分土地呢。其实土地重新分配是最简单不过，丈量丈量，哪家哪家该多少就完事了。而这之前的“四大运动”才是重头戏。

老威：清匪、反霸、减租、退押。

流沙河：你听我慢慢道来。所谓的匪，不光是大家印象中的抢人的土匪，拿川西平原来说，凡是在旧社会参加过“游干班”的都统统是匪。

老威：这是个啥子机构？

流沙河：游干班的全称叫“游击干部训练班”，是国民党垮台前夕举办的，完全是走过场。你想想，一个星期就是一期，能学到啥子军事知识？莫提游击训练了，恐怕连枪都没放过一发。可共产党来了，不管那么多……

老威：这个“游干班”开办了多久？

流沙河：就两三个月吧。但是受过“培训”的人却相当多。成都市周边各县，城头的、乡坝头的，都有。大家以为是吃公家大锅饭，就争着往里面钻，特别是无职无业、吃饭穿衣没得着落的，都稀里胡涂去染了一水。袍哥也在里头搅，文盲也在里头搅，裹在人堆中听它一回两回大报告，眨两回眼睛就喊毕业，轮到下一期。

老威：毕业了干啥？

流沙河：名义上的“游击干部”嘛。回到各县各乡，基本上没任何动作，即使开展了“组织活动”，拉了几个人两杆枪的，也没打过半天游击。可是共产党一清匪，根本不问青红皂白，只要参加过“游干班”，哪怕没有枪，没有行动，也必杀，罪名就叫“搞暴乱”。

老威：暴乱过吗？

流沙河：一盘散沙，哪暴乱得起来？所以改朝换代，好多人注定死得稀里胡涂。

老威：接下来呢？

流沙河：第二要清的，则是当地的土匪。在解放前，川西平原的各县各乡，多少都有一点土匪，这些土匪曾经纠集起来，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就是打胡宗南的队伍。按说胡宗南队伍是蒋介石的精锐，地方武装不大惹得起，可土匪都是昏虫，不管那一套，一听说胡宗南有最好的枪，积极性就高涨，他们分散成好多股，一截一截断倒打，很亡命。对于土匪来说，打仗的目的就是抢枪抢炮，只要对方吃了败仗，把武器搁下就不追了。

老威：这是哪年的事？

流沙河：都临近解放了。但是土匪们没文化没头脑，从不读书看报，除了屁股下的地盘，不晓得世界是圆是方，更不晓得共产党快把中国吃完了。他们还在认老皇历，以为炮火好才有底气，腰杆子硬。这下可倒了邪霉，在川西平原各县各乡，只要抓住土匪，查出有枪，马上就枪毙。也不审判，也不管你打没打过人。

还有一些土匪，刚遭遇解放军就缴械投降，或者接受了招安。当时被几句好话哄回家，以为好好种地，不偷不抢了，从前的事就一笔勾销。可地方一开展清匪运动，同样抓出来枪毙。

老威：按理说，土匪抢国民党的抢，是帮共产党的忙。

流沙河：已解放了，就不管了。况且土匪中的部分人，胡宗南和解放军都打过。这跟肖霍诺夫的小说《静静的顿河》里头生性彪悍的哥萨克一样，又打沙皇军又打红军，完全是一群胡涂虫。在川西平原闹得最凶的，一个是崇庆县，上了千的土匪把城围起来，最后攻进去，县长都叫打死了。二个是成都郊区的石板滩。从龙潭寺插过去，石板滩离成都本来很近，可在旧社会，莫得啥子交通，那地方就显得很偏背，袍哥的势力非常大，简直就像从省会割据出去的一个角落。当然，石板滩的袍哥也参与了打胡宗南，并乘着对方败逃，鼓噪着抢了一些枪。发了洋财，几爷子就狂妄了，见到解放军来了，也打。袍哥都是文盲，不晓得天下已经姓共，只一个心眼显示自己武器好，不怕死，居然把解放军给打败了。解放军打不赢袍哥，岂不是闹笑话？痛木了，于是就调来正规军一个团，将脏兮兮的石板滩围得水泄不通。参加打仗的

袍哥都死完了，没死的也搜出来，杀完。

老威：血流成河啰。。

流沙河：我给你说嘛，其中有一个就是我的表兄，叫黄一鸣（音译），是黄隐他们的本家，黄隐该把黄一鸣喊伯父。我这个表兄，家住石板滩，是个懒虫，读书不得行，连中学都毕不了业，于是就去操袍哥。结果，打胡宗南也有他，打解放军也有他。

老威：早个几十年，或许他就参加红军了，贺龙的队伍头好多这种人。

流沙河：四大运动中的清匪是咋个回事，我讲清楚了，接到是反霸。注意了，不是一般人望文生义中的恶霸，而是“地主阶级当权派”，这 7 个字，是毛泽东下的定义。有了这个最高权威的政治定义，就不管你恶不恶、霸不霸了。因为地主阶级当权派里，也有不少不恶不霸，也有不少好做善事，在人民群众中有口皆碑的。一撞上反霸，就不管它三七二十一，抓出来，全杀。

老威：县长、区长、乡长、保长、民团团长、保安队长，还有与官府走得近的富户，也包括部分村长和甲长。

流沙河：对头。还包括县政府的职员，区乡政府的干部，一句话，旧政权里的公务员。

老威：按现在的标准，政府公务员非常普遍，也不算当权派嘛。

流沙河：那个时候的公务员，还不如现在，经常涨工资，旱涝保收。但是那个时候，公务员里绝对没有共产党所依靠的无产者，因为薪水少得可怜，一个无产者去当了公务员，

全家老小根本无法养活。那么，唯有士绅阶层对读书做官有兴趣，也肯拿钱出来支持、补贴自家的子弟去走仕途，图个耀祖光宗的名声。可共产党不认这个传统，反霸，就是要在中国的土地上，铲除士绅阶层。

反霸的另一个任务，就是铲除袍哥。因为共产党晓得，袍哥比国民党军人更可怕。国民党军人，特别是高级将领，多少都有点文化，懂得大势已去，识时务者为俊杰，该起义，起义，该逃跑，逃跑。而袍哥不会。袍哥的坚定第一源于旧道德的约束，他们崇拜关公，讲究忠义；第二与他们的文化太低，不了解外界情况有关。所以，反霸运动中，袍哥大爷，不管作没作恶，必杀；袍哥中的五排，属于红旗管事、黑旗管事，也必杀。所谓红旗管事，就是负责袍哥组织的对外接待，即迎来送往；而黑旗管事，则负责组织内部的纪律。除了这类似的必杀的骨干，么排的袍哥，那些喜欢在乡里提劲打靶、出风头的，只要有革命群众出面检举："狗日的，哪一回哪一回，在街上打过穷人！"或者："勾结哪个哪个，拉过人命一条！"也马上抓出来枪毙。这与他是不是地主、有没有财产无关。

老威：实在不够杀头条件的，就判刑劳改。

流沙河：对头。

老威：接下来该减租了。

流沙河：所谓减租，不过是从四几年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沿袭过来的一种说法，其实根本不叫"减"，而是将人家按契约该交给你的地租直接宰了，不管欠你多少，都一刀宰。转眼之间，田地的主人就收不到一颗粮食，你啥子都莫得不说，

人家还跟你算帐，诉你的苦，斗争你。

所以，当时的皇城坝，也就是现在的人民南路毛泽东招手像的下面，尽是变卖家产的地摊子，昔日体面的士绅阶级啊，如今搞得饭都吃不起。减租是中央下达的命令，借你地主一百个胆子，都不敢去向农民要。反攻倒算的罪名哪个担得起嘛。

租减了，才轮到退押。咋个回事呢？解放前，凡是积攒了一点钱的农民，都习惯从地主手里佃田来种，称之为“佃农”。这是一种传统的土地租赁关系，事先要按田地的厚薄、期限的长短，通过双方协商，交一定数量的押金，或者叫保证金。如果将来租赁期满，佃农不愿再佃，或者地主要收回佃田，押金就要全部退回，这都在契约上写得清清楚楚。

老威：跟现在许多租赁、劳务合同差不多嘛。

流沙河：是嘛。可退押成了运动，就没字面上这么简单了。派驻的工作队，以及农民协会要给你算账：哪一年哪一年，某人佃你的田地，给的押金是多少，目前根据物价历年的涨幅，你应该退押多少。

老威：物价涨幅有没有指数？

流沙河：莫得任何标准，随便他把押金翻几个滚儿就几个滚儿，你必须退。变卖家产、砸锅卖铁也要退。并且每一场运动都有统一部署，要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连大军阀熊克武都将他成都布后街 2 号的公馆贱卖给了共产党。

老威：也就是后来的四川省文联？

流沙河：对头，你我都在里面上过班。嘿，那个时候，不仅熊克武，起了义的刘文辉，也将他在成都市区的房产统

2007年春，流沙河（右）在成都大慈寺茶园

统贱卖，拿到乡下去退押。土地越多退得越多。讲到这儿你就明白了，四大运动是一环扣一环的，其目的，就是从肉体、经济、精神将士绅阶级，也就是地主阶级一步步整垮、榨干。如果这样搞了，你还有喘息的余地，比如大家认为，你还放得有外债，还在某个没人晓得的旮旯埋得有金条，就立马关起来审问，又打又吊，各种土法上马的刑罚都端上来。我晓得有个地主，招架不住了，就掉起下巴乱说：几十年前、几十里外的那个村那户亲戚，曾经借去我多少多少银元。于是农民协会背起枪，率领一大帮革命农民连夜赶路，上门找到那户亲戚，拿枪指着叫把多少多少银元交出来。吓得人家磕头作揖，不敢说不，只求宽限一天，好拿家中稍微值钱的东西去成都皇城坝火速变卖，抵天上飞来的阎王债。

老威：简直是明火执仗的抢劫。

流沙河：毛泽东说的，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不择手段。你要特别注意，清匪、反霸、减

租、退押全部搞完，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该榨干的榨干，该洗劫的洗劫，所谓的“土改障碍”就扫清了。剩下来的分土地是技术活儿，简单得很，重新丈量一番，哪家哪家，多少多少。

老威：据我采访得知，四大运动还要加上一项罚款。数目由工作队和贫雇农主席团定，没有任何道理，就凭一种感觉，罚 50、100、300、500，拿不出来就朝死里整，或者就一枪崩了。当时在云南山区，一匹骡子才卖 50 元钱。

流沙河：说得对头，这叫退押过后的赔罚，也就是强制性的惩罚。比如在解放前，佃农为了搞好与地主的关系，逢年过节送点小礼；茄子或者南瓜刚出，就摘点尝个鲜；新米出来也送新米；酒米蒸了醪糟，也拿几碗去，等等等等。把多少年的这种鸡毛蒜皮累加起来，全部要地主赔，而且按现在的高价钱赔。紧接着是罚，你地主过去把农民剥削得那么惨，那今天光赔过不了关，还要加倍罚。

老威：拿不出来呢？

流沙河：既然赔罚你，就是估计你经过了四大运动，该退的都退了，可油水还榨得不够干。因为有的地主除了田产，在别处还有买卖。实在榨不出了呢？你屋里的家具，包括柜子、桌子、板凳、床，甚至锅碗瓢盆都搜起走。另外就是要成心杀你，故意喊一个你永远承担不起的赔罚数目，赔不出来罚不出来，就名正言顺地杀。并且宣布罪名：某某如何压迫农民，如何对抗政府，拒绝赔罚。

至此，伟大的土地改革就已接近尾声了。

老威：多长的时间？

流沙河：四大运动加起来，大约有一年多吧。

老威：据相关资料，共产党的土地改革从1946年底或1947年初就在解放区正式开始了。如果把红军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算进来，就更早。可以说，他们起家就是靠土改。

流沙河：对头，我还搜集到一篇写1947年晋西北解放区土改的文章，开明士绅刘象坤被活活打死，他的儿子为了划清界限，竟拿刺刀捅父亲的尸体；而帮过共产党许多忙的、上了《毛选》的著名开明人士刘少白也遭到残酷批斗，他的亲兄弟被农民拿铁丝穿鼻子，逼着他的亲儿子像赶牛一样，在后头用鞭子抽。搞得最惨的是东北，革命作家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歌颂的就是东北的死了太多人的土改。当时东北的情况复杂，局势很不稳定，作为解放区最高军事长官的林彪，晓得共产党要扎根，就要坚决、迅速杀光地主阶级，农民分土地才没有后顾之忧。

老威：真杀完了？

流沙河：差不多。农民也放心大胆分得了土地。这是几千年来没有过的事，共产党就有话说：你们既然在党的领导下夺回了土地，那就要踊跃参加解放军，上前线打国民党，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属于自己的胜利果实。这下子，农民子弟就只能一批又一批去当炮灰。

老威：内战也需要炮灰。

流沙河：如果这也算解放区土改之所以残酷的“合理解释”，那么，当你已经夺取政权，肃清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甚至把土匪都铲平了之后，还要大开杀戒，就绝对毫无道理。

老威：沙河老师，在你的老家金堂县，死于土改的地主

有多少？

流沙河：多得很，多得很。包括我的父亲。太多了，乃至于在文革前夕，我下放回去的时候，好几万人的县城里面，只剩 100 多个地主分子。当然，历次政治运动，还有 3 年大饥荒，也死了不少。

老威：理论家胡平的文章，《谁来写〈中国地富调查〉》里引证了一些资料，认为在土改中杀了 200 万以上的地主，而且是保守的估计。

流沙河：台湾诗人余光中在 50 年代撰文，写他的故乡“新坟无数”。

但是，我要比较客观地说两句，加一个“如果”——如果不是北朝鲜，不是狗日的金日成乱搞，去打南朝鲜，挑起那么大的战争，四川的土地改革恐怕不会那么残忍。为什么呢？因为毛泽东要听斯大林的指挥，叫中共出兵，你敢说不去？前方在跟美帝国主义打仗，败了好几盘，四川作为后方，要巩固，就要杀人，杀他们认为的敌对分子。

老威：地主也不是拿枪的敌人嘛。

流沙河：不管拿不拿枪。他们认为这些人有政治经验，有文化，并且在运动中受到了致命打击，时刻梦想变天——他们要将这种“可能性”消灭在未发生之时。

老威：老电影《铁道卫士》就是根据这种“可能性”来拍摄的。

流沙河：金堂县军阶最高的一个军人，也姓余，叫余锦源，但不属于我们这一支。《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上面，还有“余锦源”这个名字。他是国民党的军长，奉命参加淮海

战役，在国共两党的决战中，打得很勇敢。最后遭包围，弹尽粮绝，被迫率整个军起义。然后呢，共产党找他谈话：如果愿意留在军队继续工作，我们欢迎；若不愿意，我们就送你回家。此时余锦源心灰意冷，就选择回金堂。共产党还给了他一笔钱。

经历淮海、平津、辽沈三大战役，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余锦源作为打过硬仗的被俘将军，早就晓得大势已去，天下是共产党的，于是回家乡后，闭门谢客，断绝了与外界的所有往来，以为这样就可以避祸了。

余锦源家住城厢镇，育有六子，把他六个儿子的名字拼拢，就是“中华民族万岁”。比如余中祥、余华祥、余民祥、余族祥……

老威：很有意思。

流沙河：地道的爱国将领嘛，抗日战争中也跟日本人打过硬仗，深得蒋介石的信任，所以还有一定名望。

老威：据我所知，不少类似他的人，解放后都进政协了。

流沙河：你听我说。解放初期，局势还没完全稳定，金堂本地的一部分袍哥，受原来国民政府警探系统中的谍查——谍查就是货真价实的特务——的指使……

老威：袍哥咋会同特务搅在一块呢？

流沙河：国民党撤走，留了些地下组织，包括谍查，分东西南北站。其中谍查北站的站长，属金堂籍，叫赖合山。他的父亲本是民国 20 年叫政府打垮了的大土匪，可儿子不是土匪，算走了正道。这个赖合山，一方面是谍查，另一个身份却是袍哥，他回到金堂老家，秘密联络了当地几十个袍哥

兄弟，拼凑了一个所谓的“川西义勇军”，发誓要跟共产党对倒打。结果心虚，一仗都没有打，只成群结伙地上山躲了一阵，就阴一个阳一个下山，作鸟兽散。可在躲的时候，几爷子异想天开，喊着要公开扯起旗帜，并且发表宣言。那推举谁当头儿呢？余锦源嘛！方圆好多里就数他的名声大嘛！

老威：这跟余锦源没得关系啰。

流沙河：吹牛皮的，余锦源根本不晓得。可后来轮到清匪反霸，才清匪阶段，就把余锦源抓出去枪毙了。

老威：真是活天冤枉！人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流沙河：嘿，黑字落在白纸上，他们那个《义勇军宣言》里明明写着，头儿是余锦源，你还说得脱啊？几十号人全部杀，连跟着跑腿的都杀，头儿还不杀？

老威：后来平反没有？

流沙河：平啥子反？那年头错杀的多嘛，你听我说。在解放前，我们金堂县政府历来管辖着 3 个警察中队，其实就是地方保安。到了解放，3 个警察中队长都率部起义，坚决拥护共产党。当时共产党对他们非常好，不仅享受到了起义待遇，还让他们做剿匪治安的副队长，协助解放军。3 个人受到政策感召，就主动帮人民政府做了许多工作，各自都上金堂山里，现身说法，劝降土匪：你们看嘛，像我这样的国民政府的官儿，都没得事，还当上了解放军的剿匪委员，你们就更没得事了。还是安心下山回家，过正常日子。

土匪们都是 3 个队长的熟人，担惊受怕多日，就放心跟他们下山投降。他们先后劝下来了好几股土匪，一个也没跑得脱。而他们 3 人，有一个立了特别大的功，替共产党骗回

几个大土匪头子，才没杀，其余两个，在后来的清匪运动中，都杀了。记得那个叫彭泽东的中队长绑赴刑场的时候，被解放军按在地下，枪都比到后脑勺了，还回头来闹：狗日的骗我们嗦？！当初是咋个许的愿哦？！解放军把他的脸揪转去，他又揪转来：当初咋个说的？！狗日骗子!!

周围的群众都惊呆了。唉，人家的确是老老实实起的义，没干一点对不住共产党的事。

老威：这就是所谓的清匪。

流沙河：对头。

老威：那，沙河老师，你的父亲是咋个遭的？

流沙河：很久以前了。金堂县国民政府机构中，分设民政、社会、建设、军事等几个科，其中民政科的人员和事情都特别多，而军事科，连科长带科员只有两个人，它的职能相当于后来共产党体系内的县人民武装部，管招兵。我的父亲是军事科的科长，属于毛泽东划的“地主阶级当权派”，就被当作恶霸镇压了。军事科的科长、科员都被镇压了。

老威：你家是大地主？

流沙河：比较小的地主。还没等到划成分，我父亲就在清匪反霸阶段死去了。金堂县分上五区和下五区，我的家在上五区，还好些；下五区搞得厉害多了，不仅保长杀光，连甲长（相当于现在的居民委员会主任）都杀。如果把上五区好多没杀的地主拿到下五区，肯定该杀。

老威：为啥子？

流沙河：上五区是中心，在政治、文化、经济上都比下五区发达。这也是土改的一个规律，大城市，如成都，执行

政策要比县份上宽松；而县份又比区乡好些；最残酷的是农村，农民整农民（多数地主说穿了就是生活稍稍改善了的农民），不要命。不过农村也要分发达与不发达，江南一带或沿海地区说不定就比大山沟里杀的人要少，因为贫富悬殊太大，把广东的中农弄到你采访过的云南，就是不可饶恕的恶霸地主了。

老威：你的意思是，政策标准还要根据地区差异，灵活掌握，可左可右？

流沙河：多数时候是宁左勿右。有句成语叫“穷凶极恶”，也就是说人要是啥子都莫得了（成为毛泽东归纳的“上无片瓦，下无插锥之地”的无产者），就会走极端。土地改革开了一个穷凶极恶的头，从此，政治运动一环扣一环，合作化、三反五反、工商业改造、镇反、反胡风、反右、大跃进、庐山会议、三年大饥荒、社教、四清、文化大革命，直到六四，直到六四后的好多事件，中国都在走极端，在以国家的名义、民族的名义搞穷凶极恶的革命试验，极端犯罪试验。

土改中的好些搞法，还令我想起了李自成，例如赔罚。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打进了北京，把明朝的官员弄拢来办学习班，逼他们拿出私藏的银子。官员们回答没有，李自成的兵就用铁箍套住他们的脑壳，然后一边审问，一边朝铁箍里打铁尖，你不说，就一根一根地加，直到箍爆你的头。这个办法相当有效，好几百个官员的钱财全被挤光完。

老威：难怪毛泽东那么欣赏李自成。

流沙河：幸好我 1950 年就参加工作，进了成都的报社，才 19 岁。虽然以后也经历了一些磨难，可好歹活到今天，都

75 岁了。文革中间，我下放在金堂老家北街的木器社，劳动了 12 年，当时木器社有 20 多个木匠，如今连我在内就剩 4 人；还有 50 年代中期，我进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 3 期学习，同寝室 5 人，3 个左派，两个右派，如今也死得只剩我一个右派。

老威：你的年龄最小？

流沙河：有一个比我还小。我的身体最弱，最多病，算熬得了。

老威：我采访过的好几个地主都 80 岁以上。

流沙河：他们也熬得，估计也熬不过两年了，所以你要抓紧。

老威：看运气吧。

流沙河：我已经无所谓啥子运气，已经太熬得，太熬得了。

用脑子里的摄像机记录苦难

2006年8月24日黄昏，流沙河先生结束了和我的交谈，并慈祥留饭。站起身来，我牵拉几下汗渍贴肉的衣裤，顺势瞟了一眼已摆上餐桌的饭菜，都是极其小的锅，极其小的碗和碟。自忖是灾荒年过来的饿死鬼投胎，一口能装下这一屋三口的量，就借故推辞了。临出门，吴梦华师母还追着解释："晓得你能吃，我特地多煮了大半锅饭，菜也多炒了，还有你沙河老师亲自打回来的水豆豉！"

我笑道："吃相不雅，就下回嘛。"跟着就下楼出街。夕阳已经下去了，可火烧云缠绕着高高低低的楼群，燃得正旺。我奔走在地面，感到火苗子忽闪忽闪，一股股从脚板心窜起来，终于通过躯干直攻脑门。豆粒般的汗珠滚滚而坠，我恍惚记得电视新闻说过，这是四川盆地最热的夏天，地狱山城重庆的气温高达摄氏四十几度，并已持续了几十日。

登上公共汽车，刚好有座，我在摇摇晃晃中打了个盹，路灯就亮了。人生就如此转瞬即逝，我似乎回到了小时候，也在公共汽车里摇晃，可那些窄条条街道、灰蒙蒙房顶，都不见了踪影。还在无边际地怀旧呢，一个摩登女郎就立在了我的面前，高跟鞋、超短裙、与奶兜混淆一体的低领背心。我忍不住自下往上看了个饱，没办法，在穷山沟跑多了，那受得这等诱惑。

据说人一旦产生不良念头，体内会散发出一种野兽的气

味，摩登女郎耸了耸鼻翼，大约是嗅到了。可不仅没避开，反而垂头对我似笑非笑，进而埋下腰，完全没必要地提了两次鞋跟，奶子几乎喂拢我的嘴壳。勾得人一路浑身赤红，想入非非，如喝醉了酒。

虽然她用足了肢体语言，但我最终没有跟着下车。我晓得她是个发廊小姐，当路灯大亮，就该上班了。“遍地都是发廊，她也不容易呵。”怜悯之情油然而生，“话说回来，我也不容易。”

骚劲一下去，浑身却更加燥热，偏偏诗人蒋骥又在一条尿巷子里请吃烧烤。我下车快走几十米，习惯性抹了把额头，就见在一片烟熏火燎的街沿上，深陷于人肉围墙的不起眼的蒋氏夫妇正狂挥四手。肥头肥脑的李亚东和瘦头瘦脑的张心武都到了，他们是流亡在海外的美学家高尔泰的硕士，满腹经纶，却与我等社会闲杂厮混了多年。

蒋骥点了若干品种的肉和菜，特别是 3 毛钱 1 串的五花肉，像一捆吱吱作响的柴火摆上桌。我们整得呲牙咧嘴、怒火中烧，可身患寒湿痼疾的张心武还嫌不够，又要了 56 度的大瓶二锅头，几个人匀着喝。没一会儿，我就有点头重脚轻，为了不至于翻倒，我开始唠唠叨叨。我说：张心武啊，你还记不记得两年前冬天？张心武说：不对，应该是深秋，你和宋玉办完离婚手续不久。我说：管他妈的冬还是秋，反正很冷了，我们几个还经常约起喝街边茶。有一回，你在半夜 2 点给我打了一卦，是“剥”。你就叫了声不用翻《易经》，你的床快塌了。张心武说：剥卦是下面 5 个阴爻，上面 1 个阳爻，相当于一张床板的两头各垫了 5 匹砖，活摇活甩的，人

一睡就塌。我说：果然不到一个星期，警察就上门了。之前半小时，我刚接到老哥子黄河清从西班牙打来的长途，称独立笔会出大事了，刘晓波、余杰、张祖桦被抓，可能所有的国内理事都跑不脱，你快溜吧。蒋骥插话说：你形容警察抓人比打雷还猛。我说：对对。所以我又一次从猫眼看见外头围了大堆人，脑壳就麻了。老子不仅不开门，而且还反锁了一把。我拿了银行卡、u 盘与《身份证》，冲到厨房翻窗子。我先探个头，然后身体扁着出去，再立起来。我顺着抽油烟机的烟筒，抓住捆在上面的一根铁丝，收了几下腹，好不容易才把住水泥檐口。在最后翻上顶楼平台的那一瞬，我的右手差点滑脱，右脚也差点没勾得住，也就是说，我差点从 7 楼栽下去……李亚东插话说：是啊，差点就脑浆迸流了。你还跑到我家来一趟，让我通知王胖子溜。我说：那夜的雾特别大，隔两三米就看不清东西。是我哥和妹，还有妹夫开的车，拉着我往绵阳逃。高速公路关闭了，我们走的老公路，平时一两个小时的路程，那夜走了五六个小时。快天亮了，我躲在一个阴暗角落迷糊了一会儿，又继续逃。我上了火车，差不多一天一夜，却不晓得自己仓皇流窜之际，刘晓波等人已经释放回家了……大伙哈哈大笑，骂我是个傻屄，我点头承认。李亚东举杯说：来来，为两年前的傻屄老廖压压惊。我说：这一惊，把老子的人生观都改变了。万一被摔死，真划不来。我跟一个无赖政权较了那么多年的劲，牢也坐了，两个好老婆也弄没了，结果连自由的臭屁也没嗅着，做梦都在逃跑。蒋骥说：还没跑得脱，又在昆明火车站被抓了。我说：是啊，原来是为采访法轮功的事，我都忘了，就抵赖到

底。没想到这次与独立笔会无关，也没想到盘问两个多小时就放了。可放了又咋样？我他妈打死不回成都，不回那曾经越窗而逃的家了。张心武，你狗日的打的好卦，那床已经永远塌了，我这次回来，只想着卖房。李亚东说：哪你以后咋办？我说：继续流窜，这就是命。张心武说：当然是命，你不流窜，怎么会在云南碰见孙医生？不碰见孙医生，怎么会卷入土地改革，一趟趟去老山沟寻找地主？我愣住了，不禁在心里喊：上帝啊，孙医生是谁？地主跟我有何相干？这一系列来势汹汹的变化难道就是神迹？我拒绝接受你的安排，我爱阿霞，我爱宋玉，我爱金琴，我爱所有因缺乏安全或归宿感而离开我的女人，我本来可以呆在家里，年复一年；我本来可以有另外一种生活……但是莫名的骚动，但是自由！自由！自由！我怎么在生而不自由的地方服下了自由的毒药？我的屈辱感怎么会如此之深？我怎么会翻来覆去地唱“地下的日子人不如狗”？是的，地主们，地主后代的我们，真不如狗。

蒋骥见我表情有些异样，忙举杯说：喝酒喝酒。李亚东说：蒋骥，你不是刚买了两万多的摄像机吗？怎么不把老廖的这一段拍成电影？弄不好还挺卖座。蒋骥说：好多事情不能重复，不能表演，要不就成戏子了。李亚东说：老廖难道不是地道的戏子吗？我说：就形象而言，张心武倒适合演电影，脑袋黑得像驴蛋，身板瘦得像木乃伊，大热天，还穿一件绿军装。张心武说：这不是一般的中国军装，这是缅甸的保安制服，我花 30 元钱从旧货市场买的。蒋骥说：你最好动员你的老婆儿子都穿上这一套制服，我们的电影就能开拍了。

正说笑间，陈墨来了，大家都拱手相迎。陈墨致歉说：今天刚好是探监日，所以来晚了。李亚东说：好久不见，老兄瘦了，却还精神。陈墨说：每个月都要去龙泉驿探监，跑瘦了。我说：你老婆的情况如何？陈墨说：李明达的精神还过得去，都60几岁的人，又有心脏病，在监狱里也不可能干重活。夫妻见面，她还安慰我，说犯到公安一处手上，就算撞鬼了。我说：对对，千万想开些，特别是身体不能透支。接着从背包里掏出一本刚收到不久的《中国冤案录》第二卷，翻出《民刊〈野草〉主编陈墨》给他看。我说：本来是上下两篇，结果弄成一篇了，只有等再版时改过来。陈墨叹息一声：这个文字记录就算留给后人，谢谢。就将书收藏妥当了。我说：我是去年初采访你的，转眼又是一年半。陈墨说：李明达已关了两年，还有5年，我只有稳稳当当地等她出来。着急的时候，甚至想自杀的时候都过去了，我不后悔。我说：你办《野草》，我们这些文人都在上面登过文章，可东窗事发，你的家连连被抄，你老婆更是受累入狱，而我们最多说说写写一番，帮不上实际的忙，惭愧惭愧。陈墨说：你当年坐牢不也一样吗？就莫客气。况且我也是你的《中国冤案录》中的一位，不被忘掉就不错了。

接着我们讨论了记录在当下的意义。我建议陈墨坚持写《探监日记》，认为这比绝大多数中国作家的虚构作品有意思。蒋骥表示同意，并引申说：纪实和运用镜头一样，都是行业性的基本功。李亚东说：老廖，不是有人在拍你的纪录片吗？我说：先是一个台湾姑娘，拥护民进党的，断断续续跟了我大半年，拍的带子有一大堆，结果在采访90岁的家庭

教会牧师袁相忱时遭遇警察，被吓回去了；后来遇上班忠义，调查与记录二战中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的代表人物，几个月里拍了我几次，又打住了，因为他觉得我成天嬉皮笑脸，“赖狗扶不上墙”。蒋骥说：的确，你与你的书对不上号，你的书似乎是用镜头在写，可你又不习惯别人把镜头对准你。

这个时代真变了，连蒋骥这样的抒情诗人都操起了摄像机，而我这样比他大一轮的诗人，却蜕变成访谈者。我力图在文字里复原场景与对话，我的脑袋里至始至终架着一台摄像机。特别是寻访土改受害者，我希望在文字里不要遗漏什么，当我面对一张沟壑纵横的脸，面对一段由口齿不清的嘴巴吐露的惨绝人寰的往事，我经常想，如果眼下有一台摄像机就好了，就可以松一口气了。我还怂恿班忠义带着摄像机进山沟去重访，老班回来说：他妈的老威，什么都是第一遍好，第二遍，特别是让老头老太冲着机器，就差远了，很多东西都记不起来。我说：记起来又咋样？还不是镜头里一张老脸从头讲到尾，观众能看得下去吗？老班说：除非镜头穿过那张脸，让时间退回到 1950 年——没有补充的材料，只能让人演，那就不是纪录片了。

是的，我有些自鸣得意，因为现实里的机器只能拍此时此刻的人和事，而脑子里的机器却能穿透此时此刻，将镜头一直延伸、一直延伸到对方的灵魂深处，被泯灭掉的历史碎片会一块块拼接拢来，重新嵌合成一种称之为“见证”的惨不忍睹的东西。二战以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犹太作家威塞尔就是这么干的，他搜集了许多遗物、遗言，做了许多寻访，就是为了将若干单个的碎片拼接拢来，用“脑子

里的摄像机”重现纳粹的罪恶，犹太民族的殉难。他甚至搜集到不少死孩子的诗歌，其中一位只活了 4 岁的女孩这样写道：墙角的小花，明天我还能看见你的微笑吗？

还有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也堪称在没有摄像机的时代，运用“脑子里的摄像机”记录种族苦难的高手。而今天，录音录像手段已经进入千家万户，证人证言也成为一种法律常识，在中国得到前所未有的普及。可绝大部分中国作家，包括若干以猛攻诺贝尔文学奖而著称的作家诗人们，还在虚构，还在魔幻，还在比赛编故事的手艺，可就是不会运用镜头的基本功，准确、清楚、实在地描述一个人，一群人、一个地方的现在和过去。

李亚东说：我也对现在的小说没多大兴趣，可还在四川师大教当代文学，最近又接了一个修文学史的很痛苦的活儿，怎么办？张心武说：如果将来老廖当了校长，你肯定失业。李亚东说：他连考四次大学都淘汰了，还当校长？所以，我也对他的“大脑摄像机”的高论深表怀疑。张心武说：老廖的理论，小学老师都教过，记叙文嘛。陈墨说：就是嘛，狗日现在的作家连记叙文都忘了咋个写。蒋骥说：老廖当校长，底层人民就有希望了，数学系全是民工，中文系全是三陪小姐，你不会把铁人王进喜弄去当音乐系主任吧？我反唇相讥：我让你当摄影系主任，如果民工和三陪小姐约会上床，你就躲在床底下拍。

夜已深，可暑热依然不退。烧烤早吃得差不多了，可我们还是霸着位子吹牛。在成都呆久了，受吊儿郎当之市井风气的熏染，再严肃的话题，一进行长了，就没个正经。我想，

朋友要处得久，只能这样吧。李亚东说的话令我有点点感伤：老廖在的时候，我们至少个把星期要集体吃喝一次；老廖走了，我们恐怕几个月半年碰不着一回。

蒋骥那龟儿子说：老廖有他的地主，我们不用牵挂他。

我只好说：对头，李亚东是有信仰的人，只要每天与上帝碰面就足够了。

在自己家里坐牢

在自己家里坐牢的前高级知识分子，现法轮功信徒

在我的土地改革系列文字中，一直缺少“工作组”这一环，所以，当沙河老师无意间提起洪钟的名字，并称此人当过自己家乡某个地方的土改工作队付队长时，我不禁一阵暗喜。记得在上世纪 80 年代，我刚刚进《星星诗刊》做见习编辑，就偶尔在布后街 2 号（原为大军阀熊克武的老宅，后挂牌为四川省文联）连环套一般的院落里，看见一个戴着厚镜片的瘦老头，碰谁都点头微笑。“我们办公室的洪伯伯，”当时在省文联做临时工的妹妹小飞悄悄对我说，“才高八斗的老革命哦。”

那会儿我正处于青春叛逆期，敢和沙河老师当众争论，就更不把坐冷板凳的老古董们放在眼里，所以时过境迁，对洪钟的印象早就含混了。回家一问小飞，才晓得他是文联系统大名鼎鼎的左派，“《星星诗刊》是毛主席点了名的右派

窝子，所以白航、曾婆婆、沙河老师他们从来不跟他交往，碰面都不打招呼。”小飞说，“嘉嘉和他隔着桌子办公，也很少说话。”

“他还记得你么？”我问，心头却打着算盘。

“他的记忆力惊人，当然记得我。”小飞说，“并且也记得廖亦武这个名字。”

“是么？”我有点莫名惊诧。

“文化界都晓得你那个《大屠杀》案子，洪钟天天看报看文件，漏不脱的。”

“我的案子没上报纸嘛。”。

“还有 84 年清除精神污染，你发表在《星星诗刊》的一组诗算个重点，上了省委宣传部的内部通报，当时的下发文件就是洪钟让我打字并复印的，还再三叮嘱不可外泄。你忘了嗦？我一个十几岁的小丫头，在那种东西里突然发现自己哥哥的名字，都吓哭了。我可是冒着丢工作的危险替你偷了一份。”

“过了 20 几年，谁还清楚。”我怀着一丝侥幸。

“洪钟就是吃这碗饭的，”小飞说。“不信你去文联打听。”

由于历史原因，我在四川省文联有不少熟人，因此很快就将洪钟的底牌摸了个大概。他的共产主义理想植根于青年时代，并且在旧社会即涉足左翼文坛，为“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的理事，发表过不少鼓吹革命的狂热诗文。全国刚刚解放，他即以老地下党的资格和文人的身份参加了

土地改革，先后在成都郊县华阳之大面铺乡、流沙河故里金堂县辖内之土桥沟乡担任工作队队长。并数次充当镇压“恶霸地主”之临时法庭的审判长。由于工作出色，还被树为典型，多次凸现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上下集宣传大片——《伟大的土地改革》中。洪钟虽然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里也受到过冲击，但左倾的初衷不改，乃至在四川文化界树敌不少。他也暗里明里受到若干排挤，最后被安插在清水衙门四川省民间文学研究会坐冷板凳，离休了，还因为过于坚持组织原则而搞不好邻里关系。

一位老师对我说：“别看他高度近视，敌我界限可清楚了。”

一位朋友干脆说：“他不会接受你的采访，老廖。你一没有盖了公章的《介绍信》，二没在正式的新闻文化单位，三嘛，反革命采访老革命，弄不妥叫识破了，会惹大麻烦。”

“可不可以拐个弯儿，找找熟人？”

“那就试一把？”朋友坏笑着说，“你干妈曾婆婆的千金嘉嘉过去是他的下属，幸许可以引见一回。不过屁放在前头，洪钟可从来不接受私人采访。”

“即使不接受，”我咬牙发狠，“这过程我都得写出来。”

2006 年 8 月 26 日午后，烈日如一匹疯狗，在高处冲着人类狂吠，我从公共汽车一下地面，就觉得耳门汪汪汪直响。在已扩建多次的《四川日报》社街对面，昔日的小街小巷早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众多百年庭院的旧址上，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如重重迭迭的废气集装箱，搞得人整日神思恍惚，

辨不清来龙去脉。我就这样在旧貌换新颜的布后街 2 号周围梦游了两三个来回，才挥汗如雨地找准省作协宿舍。问嘉嘉在否？门卫答：在誓死保卫她的妈。

我一时不解这种幽默，就继续在街面寻另一栋作协宿舍楼。转眼五六年没来了，不料那楼的前后左右都叫更为气派的暴发户楼群包抄，如一匹癞狗，只将窄窄的肛门朝外留着。我钻入肛门洞，沿晦暗不明的肠道拐上 2 楼，敲门，应声探头的正是嘉嘉。

我被让进这个已相识 20 多年的大家庭，如今里面又包含了嘉嘉和玲玲两姐妹的两个三口小家庭，所以有点人满为患。“哦哟，大热天，全家人在这儿团圆嗦！”我开了句玩笑。

嘉嘉递过一把折扇，苦笑说：“没得办法，只有在这儿团圆。”

我正要问为啥，我干妈曾婆婆那久违的尖嗓子突然响了起来：“小廖！么娃子！到老娘这儿来！”

我立马凑拢过去，外表嬉皮笑脸，内里却有些酸楚。自 1982 年进《星星诗刊》，我就与老人家最为投缘，一老一少整日形影不离，混吃混喝。甚至在电影院也大呼小叫，屡屡激起公愤。我与流沙河辩论诗歌，也只有她像个老儿童，始终点着虾米腰站我一边：“我觉得小廖还是有一定道理哦。”

我坐牢之前的青春文学岁月，相当部分与《星星诗刊》和曾婆婆的家有关。老两口都是品质纯正的右派，历次运动中均属挨整物件，却从来不识时务。当年我在她家出入时，沙河老师几乎日日散步过来找游伯伯，两人要么喝茶聊天，要么相对无言，或者各自捧一本书在看。我曾悄悄问曾婆婆：

“咋个看书都要在一堆？”婆婆露了个鬼脸，回答：“这叫氛围，懂不懂？”

后来发生六四，世道和人心一夜间就变了。我经历了家破人亡，再也没有了诗意；而《星星诗刊》的右派老人们也逐渐退场，白航、陈犀、流沙河、游伯伯，还有这个曾婆婆，都定格在因过期而褪色的电影胶片里。再后来，陈犀死了，游伯伯死了，有一天我偶尔在一份小报上读到主编白航的一首小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养鸟，养猫，还养狗，就是不想与一种叫人的东西在一起。”

游伯伯去世没几天，我捧着大把梅花去看病中的曾婆婆，她还望着墙上的遗像笑，她说：“昨晚上你游伯伯托个梦给我，说总算找到一个干净的地方，要我去看。”

好像没过多久，她就练上了法轮功，虾米腰弓得更厉害，可精神头却重新足起来。那时法轮功还没成邪教，成都市街头巷尾，到处有老头老婆婆在打堆。有一次我登门，她也拿出一本《转法轮》叫“必须读”；还叫明天凌晨 5 点多锺，到新南门大桥和她碰头——我没去是因为睡眠习惯。这辈子，除了小时候及坐牢期间，我几乎没在上午 11 点前起过床。

“我练功快 10 年了，没吃一颗药，没得病，连咳嗽气喘都没得。”曾婆婆笑着说，算是开场白。“么儿你呢？身体如何？你妈妈身体如何？”

“小廖的身体你都看到了嘛。”嘉嘉抢过话头，直截了当冲我说：“我妈走火入魔了，小廖，千万不能给她电话！你妈的电话也不要给！任何人的联系方式都不要给！如果你给了，她就会一天到晚地打，还会有人找上门去宣传。法轮功

的是非对错暂且不论，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下，这将给对方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她自己已经够麻烦了，差1岁就80的人，风都吹得倒，警察还隔三差五地登门。她倒是硬得起，你要抓就抓，老娘在监狱里也要练。可我们做子女的咋个办？”

“各有各的活法嘛，”我说，“何必要扯在一起？”

“对头，按道理是父母有父母的活法，子女有子女的活法，况且我们也成家立业了。可政府不这样看嘛。警察找她无效，就要来找我们嘛。有点点风吹草动，就把我弄进派出所，态度还恶劣，一口一个你妈如何如何了，如果如何如何了，政府就要把你们如何如何。”

“中国也算进入法制轨道了，平白无故，他们能把人如何如何？”我说。

“是不能随便如何如何，可搞得你不舒服，搞得你没法正常生活。”嘉嘉叹了口气。“你看，这个家里片刻不能缺人，我和玲玲一不在，法轮功就阴一个阳一个溜进来。有一次，我出去办点事，回来打开门，突然惊呆了。沙发上、床上、地上全坐满了人，而我妈在中间打着盘腿，正入定呢。我气惨了，让所有人马上出去，我妈还那样盯住我，还在微微的笑。法轮功的文化层次普遍低，街坊上的、郊县农村的老头儿老婆婆，箩筐大的字认不得几个，相比较，我妈是高级编辑，文化和阅历都不浅，所以自然成了重要骨干。警察压不服，我们也说不服她。为了少跟官方打交道，也为了警察不住进家里来，我们只能轮流值班，看住她。”

嘉嘉是80年代诗人出身，情感丰富。我注意到，那双困

在皱纹里的大眼睛布满了血丝。而在她说话时，充耳不闻的曾婆婆靠在沙发上，安详的目光满含怜悯。

“不管咋样，”我委婉地说，“她总算有信仰，活得也算充实。人老了嘛，都会出问题，不是这方面，就是那方面。”

“是啊，如果爸爸还活着，她也不至于去信法轮功。”在一旁做家务的玲玲突然插话。“管她的，警察找就找嘛，我没有嘉嘉那么着急。”

“我劝了她好多次，”嘉嘉递给我一瓣西瓜，又继续说，“一个人阴悄悄在家练就行了，作协院子里都晓得，也没得哪个去告密。可她不理，非要串联，好像过去的政治亏还没吃够。太自私了！你不考虑自己，也要考虑儿女、孙儿孙女的处境嘛。”

“除了练功，她干了啥子出格的事？”我问。

“她一听楼道有脚步声，就开门给人塞传单。都是熟面孔，人家转过脑壳又来找我，嘉嘉，把你妈管好，不要到处惹事了。搞得我连忙道歉，唉。”

现在我明白这家人的尴尬处境了，原来曾婆婆在自己家里坐牢，而无辜的下一代也被拖入漩涡里，一时半会儿，谁都解不了套。我将嘴巴凑拢婆婆的耳门，喊着和她闲聊，我使劲浑身解数，想让时光倒流。那 20 多年前的诗歌时期，虽然短暂，却有一种不知险恶为何物的傻乎乎的浪漫。

周围没一点笑声，而婆婆却笑得很响，还是那不管不顾的老儿童劲儿。她问我是不是又把媳妇耍脱了，还骂我没良心。我连忙解释有良心，是媳妇把我一脚蹬了。婆婆又问：

没乱来嘛？我说：哪个王八蛋乱来了！婆婆说：你的诗好文章好，顶个屁用，做人重要的是品行端正。我说：是是，老毛讲过了，一个人做点坏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坏事，不做一件好事。婆婆笑得揩眼泪说：狗日大魔头毛泽东，就没做过一件好事；还有江泽民，也没做过好事。嘉嘉说：那你就做件好事，让大家省省心。婆婆耳背，却边笑边对我夸嘉嘉和玲玲孝顺，并且还趾高气扬地将两条光腿杆举起来，放在茶几上弹一弹的。

接着，婆婆又问了我妈、我妹、我哥的情况，叮嘱要互相爱护；还问到我的中学同学，诗人杨然的情况。每当此时，嘉嘉就冲我狂使眼色，其它人的表情也非常紧张。我会意，只好敷衍作答，或顾左右而言他。

本来该给老人家留个电话的，但没有机会，只好放弃了。我犹如一个小心翼翼的探监者，尽挑些无关痛痒的话头，东拉西扯。这家人对我很有耐心，无论之间发生了什么，她们遗传的善良心性不会变。

我到底记得该干啥，我提起了洪钟。嘉嘉摇头说：我不能给你作这个引见。我问为啥子。嘉嘉说：老头左倾，以前我们虽在同一个单位，却连话都很少说。我说：想想办法嘛，比如通过他的儿女？嘉嘉说：儿女们也跟他谈不拢。我沈吟说：你是怕担责任吧。嘉嘉承认：都是熟人，我不可能帮你隐瞒身份。我被噎住了，半晌才说：难道采访个洪钟比进皇宫还不易？嘉嘉说：对于官方媒体，比如报纸、电台、电视台来说，采访 100 个洪钟也不是问题。你在底层呆久了，不

了解类似的老革命，他们特别看重你的来路正不正。

我的脑袋里突然闪了一下，有办法了！却忍住没说。为了不拂逆她的善意，我点头说：过气的老顽固，又没啥子娱乐性，来路正的媒体也不会去找他。嘉嘉说：对对，这年头也没人看革命套话。我说：曾婆婆倒是从来没得套话，可惜你不答应我采访她。嘉嘉说：好了好了，大热天的，莫提这一壶。我们几年不见面，你突然撞进来，又不是专门来看我妈的。唉，时代的步伐加快，连我们小廖都讲究效率了。还有事吧？现在就与我妈告个别？

我羞得满脸通红，却乘势站了起来。曾婆婆一直弹着光脚趾头，嘴里还哼着什么歌，见我起身，以为要上厕所，就连忙缩腿，指引方位。玲玲凑拢来大声说：小廖要走了！曾婆婆愕然了一两秒钟，理解地点了点头，旋即抓住我的胳膊说：好嘛，老娘送你。嘉嘉急忙阻拦：小廖独来独往惯了，不需要人送。我也说：莫送了，老人家自己保重吧。曾婆婆这才松开我，笑着说：她们怕我下楼梯摔跤子，其实我自己心里有数。

门终于在身后关闭了，转瞬之间，世界归于死寂。我缓缓下楼梯，在拐角处，又驻脚回头了分把锺。这样，就这样，门里边的一切从此与我无关了。

楼道尽头是热浪席卷的大街，车辆交错穿流，疯狗般的烈日依然冲着人类狂吠。我挥了一把浊汗，耳畔蓦然响起据说是革命导师列宁在狱中唱过的俄罗斯民歌——

太阳上山又下山

俄罗斯永远受熬煎
狱卒不分昼与夜
晃动在铁栅的后与前

高兴监视你就监视
反正人逃不过狼犬
我虽然天生渴望光明
却挣不破这无边的黑暗……

土改工作队队长洪钟

前奏

从曾婆婆家出来，我再次路过十几米开外的布后街2号，就钻进去故地重游。昔日雕梁画栋之深宅大院，如今已变成十来层的水泥楼，朝外的楼面遮着巨幅广告。在底楼大厅的吧台内，管收发的焉巴老头摇着蒲扇，乜了我一眼，问找哪个单位？我顺口说：《戏剧与人生》。他说：莫得了，几年前就垮逑了。我又说：《当代文坛》。他说：差不多垮逑了。我说：啥子叫“差不多垮逑了”？他说：每期才印几百本，不等于垮逑了？你该不是跑来买版面哦？我吃了一惊：啥子意思嘛？他说：《当代文坛》办了20几年，在文学评论界还是有影响嘛，现在为了解决生存危机，面向大学卖版面，刊登博士和硕士论文。我连忙点头：与时俱进，与时俱进，就要上楼梯。老头撵上来喝问：到底找哪个？我答：《星星诗刊》。老头嘀咕说：没有垮。可编辑部没得人。

我不理睬，就一层层上。可每一层楼道都黑古隆冬，我走马观花了一遍，发觉省作家协会下属各部门、各协会、各杂志编辑部的招牌几乎还在，可都关门闭户。我试着敲了几下门，毫无反应。爬至6楼，我找到占据了几间办公室的《星星诗刊》，只有数据室的门开着，我喊了两声，没人应。7楼是《四川文学》和巴金文学院，楼的那一端，有影影绰绰的生命迹象，但我已失去探索的兴趣。

上世纪80年代人声鼎沸的文艺衙门，如今咋个沦为一座空楼？感叹之余，我记起流沙河曾讲过，在90年代以前，文艺被捧得高，省市两级宣传部的官员，一个星期至少要来文联和作协一次，或视察，或指导工作，或开座谈会，弄得左派文人情绪持续高涨，小报告也打得勤；可转眼信息时代来临，我党的意识形态重心扭向报纸、电视，其次是出版，昔日卖弄风骚的文联和作协，地位一落千丈，犹如人老珠黄的二奶，半年一年盼不见一个官员来，大家披肝沥胆的小报告没处递，积极性受挫折，就只领工资，懒得上班了。

洪钟离休得早，还算保持了晚节，我想。就抓紧给在一家著名报纸工作的铁哥们打电话，一拍即合后，约定次日一起去寻洪钟。

2006年8月27日上午10点，我和朋友在布后街2号门口碰头，然后颇有底气地找到附近的省作协宿舍，敲响了洪家在底楼的门。迎住我们的是一位衣着朴素的中年人，我的朋友问：洪老在吗？我们是某某报社的，要采访他。

中年人满含笑意地给我们沏茶。我说：不用了，时间比较紧。

中年人说：我是洪老的女婿，临时在这儿看家。爸爸已经住院几个月了。

我急忙问：啥子病？要紧么？

中年人说：前列腺。年纪大了都会有这种病，前一段开了刀，就一直住院疗养。

我的朋友故意说：我们会不会打搅洪老？如果不方便……

中年人爽快地说：你们去吧，这两天他的精神还可以。接着推开洪钟的书房，从一尘不染的办公桌上抽出一支圆珠笔，写道：华西医院第三住院大楼12楼（高干病房）40床。

我们连声道谢。中年人却摇头说：本来我该带你们去，可家里走不开。

自从父亲2002年患癌症去世，我已有几年没来过医院。在我被数次污损的记忆词典里，眼前这块声名远播的地方跟屠宰场也差不多，区别只是见血和不见血。可不知为什么，这地方却比10年前扩张了好几倍，老远望去，新的住院部大楼直耸云霄，像逼近天堂的飞碟工厂。

我们是打的过去的。由于塞车，十几分钟的路绕了半个钟头，并且越接近医院越堵，最后我们干脆下车步行。忘了进的是哪道门，即将消失的狭窄老街显得兵荒马乱，到处是残垣断壁；而医院的围墙内也在大兴土木，吊车和打桩机此起彼落，整得热火朝天。沿途都是水果摊、小卖部和廉价礼品店，叫卖声震耳欲聋，直到快抵拢大楼，才逐渐减弱、消逝。

我们进入了中国最大的疾病超市之一，人流滔滔，形色

惶惶。好在标志显眼，我们就在熙熙攘攘中顺藤摸瓜，乘电梯直上 12 楼，不料竟一脚踏入一个与外界隔绝的超现实空间。出奇不意的静穆！被过滤的天光从甬道两端透进来，拉长与缩短着影影绰绰的梭巡的白衣天使。在如此和煦如春的特权罐头里，我们两条害人虫，鬼鬼祟祟地比照门牌，很容易就逮着了已 87 岁高龄的革命前辈洪钟。

电影里常见的宽敞病房，整块的落地玻璃，悬在轨车下的输液瓶，还有真假鲜花、真假果篮，与我父亲当年住过的肮脏的癌病房有天壤之别。50 多岁的白发陪护将老爷子从卫生间搀出来，上床半卧着，我们一脸恭敬地趋前问安。由于没戴假牙，洪老满腔空洞地询问我们的来历，我的朋友一板一眼作答，并掏出《工作证》及《采访证》供其查验。洪老的表情越渐放松，笑起来，两条长寿眉直打颤。

我乘机以报纸要做土地改革专题为由，掏出了录音机和笔记本。洪老让陪护将床头摇高一些，仪态轻松地应答我的提问，该切入的切入，该回避的回避，该强调的强调，该简略的简略，政策、分寸、火候都拿捏得恰到好处，真不愧经历了那么多年革命风雨的洗礼。

正文

老威：洪老你好，能够接受采访么？

洪钟：问题不大。

老威：你对土地改革应该了如指掌吧，比如清匪、反霸、减租、退押？

洪钟：对对，亲身经历过。

老威：听说你在金堂县蹲过点？

洪钟：在金堂县土桥沟，那是最偏远的一个乡，与乐至和中江县接近。我是1952年去的。

老威：那么成都周围的土改要晚一些。

洪钟：要晚些。此前，我先在华阳的大面铺参加第一期土改，大概搞了半年，1951年的九、十月间到1952年的一、二月。当时土改第一工作团的团长是川西区党委秘书长郝德青，他好像56年还做过匈牙利大使，去了不久，就碰上匈牙利事变。这个人，老报社的人恐怕都知道。

老威：你当时的职务？

洪钟：先在大面铺做副队长，正队长是从老解放区来的，年代太久远，他的名字已记不得了。随后就到金堂县土桥沟做了正队长。派驻金堂的是第四工作团，团长是安法孝（音译），川西区党委组织部长，你们可能不晓得这个人？

老威：我们还是太年轻了一点，嘿嘿。

洪钟：土改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下去访贫问苦，摸清情况，地主、富农有哪些，地方上的恶霸势力分几坨，弄清楚了，下一阶段才是清匪反霸……

老威：访贫问苦的时间有多长？

洪钟：就1个多月。因为总的时间才大半年。土改之前我在川西文联，党组织为了锻炼锻炼我，就抽调去了。

老威：从各个机关抽文化人去参加土改，当时也算普遍现象吧。我曾在《万象》上读到一篇写作家废名的文章，他也被调到安徽农村蹲点了。

洪钟：主要还是抽调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四川文学》有个作家叫茜子，也参加土改了。

老威：我听说过茜子，好像是个右派。

洪钟：有人批评他的作品歪曲现实，可我在《四川文学》的时候，还是用他的长处。写过《吕梁英雄传》的西戎同志从《四川日报》调到省文联来做领导，也赞同我用他的长处，指明他“要跟群众好好结合”。可到了 1957 年，风向一下子过左，他被划为右派，下放农村，接着弄去劳改了。直至文革结束，才回到文联。文联和作协分家，又留在作协。西戎同志去世，我们，还有李缨同志，联名发了唁电。茜子还下过海，不习惯，又回来了，找个农村旮旯儿住，就不晓得下文了。最近，听说他死了。

老威：哦。

洪钟：哦。

老威：回过头来说土改？

洪钟：好，说土改。摸清了底，就清匪反霸。川西平原土匪不少，他们既抢人，又勾结恶霸，盘根错节，欺压百姓。所以一清匪，自然就牵出地方恶势力，牵出大地主。过去他们总的靠山是国民党反动派，现在靠山叫打倒了，底下的脚脚爪爪都露了出来。人民政府要主持公道，把封建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

老威：在你蹲点的地方清了多少土匪？

洪钟：华阳县不多，只有几个，恶霸也只有几个，都枪毙了。我临时出任法庭庭长，在本地开的公审大会。

老威：你当时多大年纪？

洪钟：我 1919 年生，当时才 20 多岁（老威注——口误，应该是 30 出头）。

老威：真是年轻有为的庭长啊。

洪钟：刚解放嘛，都年轻，又没有专门学法律的，我也不学法律……

老威：临时法庭是咋个组成的？

洪钟：土改工作队队长，还有两个队员，其它就是农民中的积极分子。

老威：相当于现在的陪审团。

洪钟：对对，农民就是陪审团。你不把掌握地方命脉的土匪、恶霸、哥老会头子清了，农民就站不起来。但是枪毙人要报土改总团批准。

老威：总团是县级？

洪钟：不，哦，是县上。主要负责是郝德青，川西区党委秘书长，又做过匈牙利大使。这是清匪反霸的大致情况，接着减租退押……嗯，地主收的地租太高，不合理，弄得农民粮食不够吃，我们就要把压在贫农、下中农头上的过分的租子给减掉。

老威：你经手过的比较著名的案件有哪些？

洪钟：著名案件？唉，记不得了，都记不得了。

老威：再想想看。

洪钟：哦，华阳大面铺有地方一霸，叫林凤章，开糖果铺的。虽然他的职业是开铺子，却一贯欺负贫苦农民。大家都反感他，所以土改就弄来枪毙了。金堂土桥沟的土匪比较多，也枪毙了一些，时间久了，名字就记不得了。都是土匪、

躺在高干病房内接受采访的土改工作队队长洪钟

恶霸互相勾结，必须杀。

老威：能不能更具体一点？因为有活生生的事件、案件穿插在其中，现在的读者才容易看得懂。否则，莫提我们这些人，就是年龄还大点的，也摸不着火门。那时候都没有生出来嘛。

洪钟：在大面铺阶段，我是副队长，正队长是老区来的，我突然想起了，叫崔玉杰，80 年代在成都市当过啥子部长，已故去了。土改划成分还是有标准的，根据少奇同志在全国土地改革会议上定的一些条条。哎呀，都记不得了，你可以去翻一下嘛，对，翻一下土地改革的基本法。

老威：啥子时候出的？

洪钟：1950 年就出了。工作队每人手头都有个本本。记不清楚了。少奇同志的大致意思为消灭封建剥削阶级，中立富农，孤立和打击少数顽固的地主。但不是把地主扫地出门，还是要给适当的土地、房屋，给适当的补助，让人活下去。只是原来的土地、房子分给贫农下中农了，他们种的、住的就没那么好了。

老威：一些数据显示，在土改中还是采取了某些过激行为。

洪钟：也有可能。这要看下面的队长如何掌握。

老威：你所在的地方过不过激？

洪钟：想不起了，好像没啥过激。比如将贫农下中农，甚至上中农的利益伤害了，当然就过激了，可我们连富农的利益都在适当保护。只是打击恶霸地主没有手软。

老威：没有手软？是的，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他们肯定不甘心，那你们采取了啥子办法？

洪钟：大的形势摆在那儿，他们也莫法。

老威：你们有些啥子斗争方式？

洪钟：恶霸地主枪毙在前头，他们遭吓倒了。

老威：威慑力量？

洪钟：是嘛，威胁力量。

老威：恶霸是咋个定义的？

洪钟：横行乡里，欺负老百姓嘛。

老威：包不包括旧政府官员？

洪钟：也有乡长、保长，更大的官好像没得。

老威：有点像四川方言电影《抓壮丁》里的……

洪钟：陈戈演的王保长，压制贫农下中农嘛。

老威：保长一级的都镇压么？

洪钟：也不一定。看他如何悔过，也要给出路。

老威：除掉镇压的，余下的地主咋个处理？

洪钟：原来的好地、好房子、大院子收了，就把贫农下中农差一点的，比如茅草房换给他，根据人口多少，也适量分地，给出路嘛。叫人活不下去不是共产党的政策。

老威：据相关数据，1947 年，土地改革就在解放区开始了，那时是为了广泛争取农民群众的支持，大量招募兵员，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最终解放全中国。可到了 50 年代初，国民党跑了，中国已经解放了，还有啥子必要搞土改呢？

洪钟：嘿，封建主义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嘛。农民吃不饱肚子，政权就不稳。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也把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土地、财产没收了。

老威：可从地主的角度看，土地、财产都是几辈人辛苦挣来的。

洪钟：是巧取豪夺得来的。共产党不允许不劳而获。

老威：几乎与大陆同时，台湾也进行了土地改革，可采取的是由政府出钱向地主赎买，然后再分给农民。

洪钟：孙中山搞的就是土地赎买，好像法国大革命也差不多，资产阶级革命嘛。我们的性质不一样，可要留基本的生产数据，让地主能活下去。

老威：台湾与大陆，两套土改，你觉得哪种合理些？

洪钟：当然我们要彻底些。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要铲

除剥削，铲除恶势力，重建新民主主义的土地政策，让人民翻身作主。我们不允许恶霸地主，包括伪乡镇长、保长来破坏，一旦发现，就抓起来镇压。

老威：据我了解，当时川西平原有若干股袍哥势力，那些人见识浅，没文化，根本不晓得外界的事。也许你指控他破坏了啥子，他却不晓得你在说啥子。

洪钟：对嘛。

老威：洪老举一个搞破坏的例子嘛。

洪钟：就是背着工作队威胁农民，不准起来闹。按郝德青的定义，恶霸就是地主阶级当权派。

老威：你说谁定的义？

洪钟：郝德青。说不准还是少奇同志在《土地改革法》里定的，属于国民党的地方统治者。乡长、保长，甚至甲长开始都威胁过农民。

老威：1979 年，中共中央宣布为地主、富农揭帽，此后我也陆续读到一些土改亲历者对土改本身的反思文章。洪老觉得有没有这个必要呢？

洪钟：我反思了，觉得没啥子嘛。不能脱离历史背景，当时建立新民主主义新秩序十分必要。即使工作上有失误，打击面扩大了，也是难免的。哪能完全公平合理呢？

老威：有没有左的倾向？

洪钟：极少数。个别。

老威：举一个例子。

洪钟：1953 年我从乡下回到文联，曾有一个自称活不下去的人来找我，哭诉受了冤枉，还跪下给我磕头。我说不要

这样，我给华阳县委书记写封信，你去找他解决。

老威：他受了啥子冤枉？

洪钟：也是个袍哥大爷，号称“拦门大爷”，有点恶霸性质。我为他写了信，可县里咋个解决的，就不晓得了。

老威：我听说洪老作为土改的突出典型，还上了一部纪录片？

洪钟：对嘛，叫《伟大的土地改革》，是北京电影制片厂派了一个王德成，还有助手，带着录像机，先到大面铺来找我，商量哪些要拍，在哪儿拍，咋个拍。

老威：细节咋个的？

洪钟：我们当时开镇压恶霸地主的公审大会，虽然我不懂法律，可准备要杀的人，都是上面（郝德青）批准了的，由我这个审判长来宣布。电影里就有这个场面，还有我加夜班的场面。

老威：你够辛苦的。

洪钟：是比较辛苦。

老威：为啥要将你树为典型？

洪钟：郝得青看上我了。老地下党员，文化水平也比较高。我解放前是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理事，写了不少文章，揭露国民党的腐败，鼓吹革命和改革。那时剧作家陈白尘还在编《华西晚报》，我也在当《华西日报》的编辑，又写又编，很有影响。我的党内关系在川北地下党书记王绪武手头，他是我的蓬溪老乡，做过四川省委组织部的副部长，曾专门为我写过 1939 年入党的证明材料。

老威：哦。那个土改片子拍了你多长时间？

在融洽的氛围里也讲了一段土改旧事的陪护

洪钟：华阳和金堂的土改现场都拍了，还采访了。

老威：怎么采访的？

洪钟：王德成问开啥子会，政策怎样执行，等等。

老威：你如何回答的？

洪钟：我说我们完全遵照少奇同志的《土地改革法》来进行，有人的有些怀疑，就用不着了，因为我们是不折不扣的执行者。

老威：还问啥子？

洪钟：也问了是不是过左之类。

老威：这之类的问题我们今天还在接着问。

洪钟：嘿嘿，我今天也没觉得过左。没错杀过、多杀过人嘛。

老威：我查阅过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费正清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里面对土改中被镇压的地主人数作了个粗略统计，大概是200至400万。你认为这符合实际吗？

洪钟：费正清我晓得，抗战期间美国驻华使馆的工作人员，可他的这个统计我没看过。

老威：你认为土改中杀了多少地主？

洪钟：不清楚。一个乡才三两个，不多嘛。

老威：经你的手，有送去劳改的么？

洪钟：有。

老威：何种情况？

洪钟：恶霸嘛，送劳改农场。数目也不太多，充其量一个乡三两个。

（陪护插话：我来讲一个土改的故事。

老威：好嘛，你是哪儿的人？啥子成分？

陪护：我是乐至县的，家庭出身贫农。解放前，我的老家是个土匪窝子，许多户人都藏有枪。大概在1950年，刚成立不久的人民政府派工作组下来征粮，大家都抵到不交，可工作组是带着任务下来的，也不会让步，召集群众开了几次会，都不见效果。

老威：群众的觉悟这么低？

陪护：才解放，都对共产党不了解。本地的情况也复杂，民中有匪，匪中有民，哪个都说不清楚。连乡公所也是既接

待共产党，又暗通袍哥、土匪。有一回，土匪从山上下来一百多，要把工作组征粮队一锅端，可当时，征粮队分散下村，只剩一个人在乡上留守。这个人是解放军的侦察排长，相当凶，竟靠着地势，与土匪周旋对打了两个多钟头，撂倒了十来个，直到随身的 100 多发子弹拼光了，才转身就跑。土匪听见脚步声，就乌呀呀的一大片，跟着追，还辟哩啪啦地放枪。幸好天黑，侦察排长好歹穿过树林子，跑了两百多米，躲进了乡公所。土匪立刻把乡公所围了，里三层外三层，吆喝着搜。可是把旮旯晃晃全翻遍了，就是不见影子。土匪气疯了，吼着要点房子，乡公所的一个人吓住了，就暗中点水。土匪根据他歪嘴巴的方位，撞入一间屋，里头就一张桌子、两条板凳、一张床。土匪拿枪筒子和刺刀，将天上地下都戳了个透，还是没人。土匪又吼，那个点水的就指了指床。农村的床又大又沈，床档非常厚，十几个土匪，费尽吃奶的劲儿，翻了个底朝天，终于逮住壁虎一般死死扒在床背的侦察排长。

老威：真了不起。

陪护：侦察排长被土匪杀害了，尸体叫扔在树林子里。惹得解放军来剿匪报仇，一百多土匪全报销了，还继续追查点水的人。乡公所的人你推我，我推你，最后解放军说，全部不是好东西，就把所里十几个人统统枪毙。

老威：乡长也枪毙了？

陪护：嘿，还想两头吃糖，结果从乡长到烧饭的，一个都没滑脱。

老威：那个侦察排长叫啥名字？

陪护：沈福山，牺牲时才 20 多岁。乐至县城一个坡坡上，还立了烈士纪念牌，他的事迹，老一辈人都晓得。那阵我才七、八岁，可沈福山的故事已听了好多年。

老威：唉，竟然有那么多坏蛋为他垫背！沈排长的命也太值钱了！）

洪钟：他讲的是土改以前的征粮阶段，那阵我在军管会文艺处，晓得有一些老区来的干部被派下去催粮。

老威：小时候，我就学习过丁佑君烈士的光辉事迹。

洪钟：对对。丁佑君也是到西昌邛海边上征粮，遭遇土匪恶霸，惨遭杀害的。她原来是个追求进步的女学生，好像还是共青团员，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征粮工作队，结果没满 20 岁就牺牲了。西昌邛海至今还立着她的碑。还有乐山五通桥，她的老家，也立着她的碑。

老威：洪老参加过征粮么？

洪钟：没有。1950 年初征的粮，我是 1951 年九、十月间调去搞土改的。

老威：为啥要征粮呢？

洪钟：刚解放，一下子那么多解放大军入川，军粮十分短缺，可川西平原的多数地方，恶霸地主与土匪勾结，囤积粮食。他们不拿出来，就要派工作组下去征粮，以供军需。我还记得原国民党省党部委员、原四川大学校长黄济儒逃去台湾后，还造谣说：四川老乡啊，共产党抢粮，要把你们饿死啊。嘿嘿嘿。

老威：哦，原来在正式的清匪反霸之前，还剿了一次匪。

洪钟：有匪就要剿，有霸就要反，不限于一次两次。只有地主阶级当权派彻底倒了，障碍扫清了，才有条件搞土地改革。

老威：那土改中的赔罚又是咋回事？

洪钟：这是从经济上整垮地主阶级的一项主要手段。有的地主虽然有罪，但是不够杀的条件，那工作队就要支持农民找他们算帐，你过去占了大家的便宜，得了大家的好处，今天不仅要全部吐出来，而且要罚你好多钱，好多谷子。

老威：赔罚和一般意义的罚款不同么？

洪钟：不同。解放前，你地主在经济上、政治上都欠了农民的债，统统要喊你赔，赔够了，才是罚。

老威：有没有个大致的比例？

洪钟：看具体情况而定。看你地主拥有多少封建土地、封建财产而定。

老威：是不是赔和罚都没有规定的比例？

洪钟：各个地方不一样。总之，土地、房屋、财产，你有多少我就罚多少。记得著名作家沙汀同志曾问我：在土改中打垮地主阶级最凶最有效的手段是啥子？我一时回答不出，就随口猜：恐怕是镇压反革命、镇压恶霸地主。沙汀同志摇头说：真正打垮地主阶级经济的，就是赔罚。

老威：一点点把他们挤干，让他们生不如死。

洪钟：没那么严重。只是逼你把好地、好房子、埋藏起来的金银财宝老实交出来。

老威：我看过一本写土改的书，里面说有的地主交不出赔罚的钱，就上吊自杀了。

洪钟：可能也有，但那是极个别现象。

老威：你认为一般都能交够赔罚？

洪钟：能嘛。

老威：要叫一个人把财产白白交出来，还是很艰难哦。

洪钟：是很艰难嘛，很痛嘛，等于割他的肉。嘿嘿。

老威：那他不交咋办呢？

洪钟：有别的办法嘛。抓住他另外的破坏活动，狠狠地惩罚。关一下啊，或者一个村子的贫农下中农，开大会斗啊。开展说理，主要还是说理，说理不得行，再动手，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老威：如果对这个地主交钱的能力估计过高呢？

洪钟：恐怕要作适当的纠正，可一般还是实事求是的。所以沙汀同志说，要靠赔罚来打垮地主阶级经济。

老威：洪老的觉悟这么高，可能跟自己的家庭出身有关吧？

洪钟：我是四川蓬溪县城的，从小很贫苦。父亲是个中医，也在当时的征收局做过小职员。我初中毕业时，父亲死了，断了经济来源，只好辍学，当了县上的小学教师。红军时代，我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共青团组织。可在1933年国民党清共时，还让人告了密。我被捕了，当地的士绅很不满，觉得我品学兼优，不可能是“少共”，就一起保我出来。不久，遇上梁漱溟的学生祝超然下来搞乡村教育，我又做了他的学生。后来他回省城，晓得我在家乡没啥出息，就来信叫我去成都的教育科学馆，在他手下做干事，整日抄抄写写。因为投稿，又到了《华西日报》，认识了剧作家陈白尘等著名文化

人。1939 年，地下党组织马识途通过熟人关系找到我，恢复了我的组织关系。当时我在进步人士中比较有名，引起国民党省党部特务的注意，准备抓我，所以组织上就安排我到西康省。刘文辉的儿子是我们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团长，他介绍我与他父亲认识。后来我晓得，地下党与延安联系的电台就设刘家背后的山洞里，刘文辉掩护了许多地下党。我一直在雅安呆到 1950 年初，党组织才电报叫我返成都，去军管会文艺处。稍后文艺处改成文联，我的关系就一直在文联了，其间调过重庆，在作协重庆分会当编辑。

我是搞文学理论的，为人厚道，不乱整人，而且反对乱来，所以 1958 年的成都会议以后，我还被搞成“反党分子”。

老威：你也会成反党分子？

洪钟：我当时在重庆，毛带着李井泉、还有上海的左派市委书记一道来，把重庆市委书记划为右派，我受株连，也就成了反党分子，降职降薪，下放到长江边上的长寿湖农场改造。1961 年，沙汀同志当省文联领导，才把我调了回来，还是当编辑。文革中我是保皇派，受过冲击，家里被抄走了许多东西，包括珍贵文稿。邓小平复出，我的所谓问题才澄清、纠正了。反正这辈子就这么过来，没得二话，就是组织上咋个叫我就咋个干吧。

老威：洪老的确是货真价实的老革命啊。

迷信职业者龙金涛

前奏

总算完成对87岁的土改工作队队长洪钟的病室拜访，我吐了一口长气，逃跑一般窜出医院。掩护我“作案”的报社朋友说：老廖啊老廖，我到底认清你的本来面目了。我说：咋个嘛，难道平时就不是老子的本来面目？朋友说：有两种职业适合你，一是警察，一是人贩子。我愣了一下：你的意思是，我骗洪老有失厚道？没办法呀，哥们儿，目前这混饭的伎俩也是多年跟警察或人贩子打交道学来的。朋友说：可人家还眼巴巴等着刚才的采访见报呢。我苦笑说：洪老也自以为说了两句实话嘛，既是实话，就不一定会马上见报。

闲散了两天，妹妹小飞就催促我回盐亭老家看看，在刚刚重修过的祖坟前祭拜一下父亲和姐姐。她说：你长年晃荡在外，就多烧几柱香，让他们保佑你路上平安吧。我点头称是，可心里却说：他们的照片就在我的行囊里，虽然阴阳陌路，却一直结伴而行。

2006年8月30日下午，我与妹妹、妹夫一起，从成都驱车前往川北小县盐亭。先走通绵阳的高速公路，然后走比较宽敞的国道，不知不觉就到了。而在童年记忆里，起码要颠簸大半天才会到。

停好车，找一家清真馆子吃罢饭，斜阳就嵌在对面山口

了。于是依妹妹的提议，在旅馆歇脚。夏夜无所事事，三人出街瞎逛，不大一会儿，妹妹就邂逅了一个小学同学，热情相邀去某某休闲场所。妹妹点头，我却摇头，拉拉扯扯地客套一两分钟，只得各行其便了。

独自继续走，像在任何一个陌生地方一样漫无目的。这就是我的故乡？据母亲说，我的出生地离县城不足几里，叫海门寺，她曾在那儿教过小学，挨过批斗，被大跃进时期的群众评为“小脚女人”，意思是跟不上一日千里的时代步伐；稍后大饥荒降临，两岁的我饿得浑身浮肿，差点死掉，为了救活儿子，她被迫退职；再后就是文革，父亲叫整成黑帮，全家的生活来源一度中断，她找乡下亲戚收了一点布票，偷偷拿到黑市去卖，却被管理人员抓了“现行”，关押好几天，还弄到县川剧团戏台上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

我当时就在二楼的观众席，刚念小学，老师就带大家去参加对敌斗争大会。我没料到自己母亲也在一长串牛鬼蛇神中间，我都傻了。可老师和同学还在耳边说：没想到廖某某妈妈还是个投机倒把犯。

而今，几十年过去，除了内心的耻辱刻痕，外部的一切都变了——蜿蜒的老城墙只剩一块横竖不足 10 米的土墩子，鸡肠结子一般的十字街还是那么逼仄，可木瓦房换成了水泥楼。水泥楼背后是更高的水泥楼，并且往山坡和弥江对岸扩展着。我想，中国所有的小县城都面目雷同，盐亭的非同凡响在于，癌症的发病率和在外做官率都遥遥领先。

恍恍惚惚就绕城一圈，一看时间，不到 1 小时，于是又绕，却隐约感觉身后有眼睛。我母亲挨过斗的川剧团已改成

包括录像、台球、唱歌、喝茶的综合娱乐场所，我假借买门票，蓦然回首，却乜着一个和自己年纪相若的胖子。

乍一对光，双方都愣住了。你是，你是，二毛？胖子说。

我也说：你是，你是，却不见下文。

胖子扑了过来，把住我的胳膊高声叫：我是三娃呀！

三娃？我在童年记忆库里疾速搜索。三娃？在中国民间，这称呼与二毛一样，成千上万。

记不得了？我们还一起背过《老三篇》，还在北门县医院那头，拦住人家下夜班的护士，喊背《毛主席语录》！

这事我记得，却忘掉了一块做事的人。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反把住胖子的胳膊：哦哟三娃！变肥了，简直认不出来！

你也肥了！我跟了两三条街，都不敢认。

是是，几十年没见了，还不肥？

是是，几十岁了，肯定肥，肯定肥。

随即，我被三娃拖起就走，街两边的水泥楼顿时凭添几分乡土气息。三娃说：老盐亭就东西南北四条街，你家是盐中，县委长板坡的笔塔下面；我家在东街的拐角。

我纠正说：我家住教师进修学校，文革后，我爸爸才回的盐中。

三娃说：对对，西面是文化教育单位，东面都是平民窟。可现在，东街建了个大超市，过了桥，还有嫘祖庙。晓不晓得，嫘祖可是黄帝的娘娘，蚕丝就是她发明的，我们盐亭的历史了不得哦。

我嘟哝说：从小只听说城隍庙，哪有啥子嫘祖庙？

三娃说：城隍庙到处都有，嫘祖庙只有盐亭有。

不便同还没搞清大名的人斗嘴，我连忙点头称是。

不过十几分钟，我就被三娃请入东街一居民小区的二楼。很宽敞的三居室，很富态的三娃老婆及 9 岁孩子都见过了，最后，本文的主角方从卧室露面，三娃说：这是我父亲，75 岁了。又转头对老人家说：这是盐亭中学李老师的二公子，从成都过来。

老人家说：稀客稀客。

我说：不稀不稀。我父亲葬回老家，以后就要经常路过县城了。

老人家说：李老师的学问大哟，他的后人也不会差。请问贵公子在哪儿发财？

我说：没发财，我靠写文章为生。

老人家说：啥子文章？

我说：土地改革。随即灵机一动：老人家的成分是？

老人家抹了抹山羊胡子，哈哈笑了：你肯定猜不出来。

正文

老威：老人家笑得挺神秘的。

龙金涛：人老了，皱纹多了，牙齿脱了，自然就神秘。那天这口气上不来，就更神秘了。

老威：老人家的眉毛长，耳垂子长，肯定长寿。

龙金涛：75 岁了，已经长寿过了。脸皮子朝下垮，耳垂子自然就拉长了。

老威：嘿嘿，这么好玩的老人家，解放前是干啥子的？

龙金涛：让你猜嘛。

老威；不会是贫农、雇农、下中农？

龙金涛：从我爷爷那辈开始，就很少下田。

老威：地主？

龙金涛：地主也要下田嘛。

老威：恶霸地主？

龙金涛：恶霸地主早就杀光逑了。

老威：哦，我想起了，父亲死的那年，我在冯河乡场上拜访过风水先生罗天王，他家世代看风水，土改时就被划为“迷信职业者”……

龙金涛：大方向猜对了，还差一点点。

老威：你是算命先生？

龙金涛：我是城隍庙的判官。

老威：嘿嘿，我去过鬼城丰都，那阎王殿里的判官、无常、鸡脚神、勾命鬼全是泥胎的。

龙金涛：我，还有我爸，都是肉胎的判官，所以土改中被定为“迷信职业”。

老威：请老人家详细道来。

龙金涛：一般来说，中国每个城市都有城隍庙，解放前，我曾跟我爸去过成都府，晓得四四方方一个城里就有四个城隍庙，级别还不同。东大街的成都府，北门外的成都县，东校场的华阳县，还有大墙后街，都设城隍庙，香火旺得很。我们盐亭的城隍庙原来就在县委山上的笔塔周围，顺着那一溜长阪坡，很大的一片古代建筑，后来一年坼一点，1958 年大炼钢铁，剩下的那一点，可能有百把平方米，还垒起了炼

钢炉，将旁边孤零零的城隍老爷熏得鼻子眼睛都分辨不清。

老威：这叫人与鬼抢地盘。

龙金涛：新社会取缔了庙会，城隍庙是风水宝地，还竖着千年镇宅宝塔，自然就改造成了县委县政府。离我老家龙家桥不远……

老威：我晓得龙家桥，从北门出去一里多路，文革之前，路两边都是制造农具的铁匠铺。我记得岩壁间还有一尊顶天立地的释迦牟尼佛像。

龙金涛：城隍庙、佛像都毁掉了，解放后破旧立新，的确毁了不少老东西。新东西全是这两年建的，好几处嫘祖庙，说是比老东西还要老个几千年，可手一摸，颜色就嚓嚓的掉。

老威：嘿嘿。

龙金涛：嘿嘿，我爷爷那代，就跟老传统粘上边了。他先是种地，因为生得膀大腰圆，遇到天旱，他就被村里人推选出来耍水龙，乡上耍得有些名气了，就进城关镇耍。

老威：水龙与火龙不一样？

龙金涛：火龙是春节与端午耍的，周围的人双手抱着烟花筒子，对着一路舞过来的彩龙直冲，舞龙的人要抵挡和躲避火苗子，就只有让龙头龙腰龙尾上天入地，大起大落。而水龙是枝枝藤藤扎的，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在街两边围着水龙，哗啦哗啦地泼水，嘴巴还念念有词："龙王爷菩萨，龙王爷菩萨。"锣鼓也敲得震天响。几岁的时候，我就好多次看见爷爷耍龙头，只穿个裤衩，舞得起劲。龙头往高一抛，又跳起来接，卵蛋都漏出来啰，大家还喝彩。狗日的，都是十几米深的井里头扯起来的水，一桶一盆地猛泼，大太阳底下，

也把爷爷他们冷得哆嗦。

后来我爷爷死了，我父亲的身板没那么结实，龙舞不起，又不愿种地，就到城隍庙去混。具体咋个做了判官的，我不太清楚了，总之我父亲有一样绝招，就是一旦把眼睛鼓起，就长时间一眨不眨。

老威：好像做判官的都有这个绝招，我也能几分钟不眨眼。

龙金涛：我父亲先是在百米之外的树上挂一条死耗子，瞪着眼睛死看；过一段时间，把死耗子拿掉，只留一支腿，再瞪眼死看；再过一段时间，就只留耗子脚。这还不算，我父亲恨自己眨眼时，甚至用火柴棍棍撑眼皮，泪水直淌也不取，我妈心疼，埋怨了几句，他就狂鼓几下，眼珠子差点爆了出来。

老威：我模糊记得哪本古书上，写一个神箭手，就是这样炼成百步穿杨绝技的。

龙金涛：我父亲虽然不射箭，可眼神很有杀气，方圆好多里，没人敢和他对着看，所以赢得了“鼓眼判官”的绰号。

老威：好耍好耍。

龙金涛：你们年轻人可能不晓得，在旧社会，城隍庙相当于阴间的政府，与阳间的各级衙门倒很配套。阳间衙门里的官，阴曹地府也有，只是称呼上有点点差异。城隍老爷，又叫“辅德大王”，比县官，或现在的县委书记名气响得多，到了中元节……

老威：7 月半的鬼节么？

龙金涛：阴历 7 月的上半个月都是中元节，又叫鬼节，

而拢了 7 月半，就要收鬼了。

老威：做鬼倒安逸，假期比阳间的春节还长。

龙金涛：这半个月，成千上万，甚至上亿的鬼都从阴曹地府里大摇大摆地涌出来，跟洪水差不多，淹没了我们周围的每个旮旯，你随手抓一把，说不定都能卡住一个鬼的脖子。

老威：我为啥就没见过真正的鬼呢？

龙金涛：鬼和风一样，无形无象，无香无臭。风也看不见啊，可吹久了，人就会感冒，浑身发软；鬼一旦附体，人就会恍恍惚惚，干些自己都莫名其妙的事。

老威：你一说，我的后颈窝开始凉了。

龙金涛：所以，过去中元节一到，家家户户都要出动，或去坟前，或去野外，至少也该在房前屋后，给死去的亲人烧烧纸钱，最好分成一迭一迭，并在封皮上写明亲人的名字。他和她在冥空中收钱就容易些。

新社会移风易俗，有个二三十年，纸钱都不能公开烧，封建迷信嘛。乃至于现在的人除了“7 月半，鬼乱窜；鬼乱窜，烧纸钱”就不晓得其它。其实中元节的内容很多，可以自家设香案拜祭，将死者生前喜欢的吃的、穿的、戴的都陈列出来；如果经济条件允许，也可以请和尚或者道士来念个几天经，做个几天道场，超度亡灵。城隍庙几乎天天赶集，占星、看相、算命、测字、跑滩郎中，甚至挑牙虫、拔火罐、卖狗皮膏药的，样样俱全。盂兰盆会是为善男信女们集体做道场的地方，更是人山人海，大家都举着写有死去亲人名字的帖子，往判官手头递。

老威：你在忙啥呢？

龙金涛：整个中元节期间，我都跟在父亲后头打杂，骨头都要忙散架。直到阴历 7 月 14，阎王殿宣布中元节快过完了，城隍大老爷才亲自从庙里出巡，通知在阳间耍得正安逸的众鬼魂回去。

这盘的阵仗才是最凶的。前头好几架浓烟滚滚的手推车开道，紧随的是一群阎王殿的差狗子，将几尺长的鞭子在路上打得叭叭响……

老威：这有啥子讲究？

龙金涛：手推车上装的湿柴火，只管冒烟，一驱世间浊气，二是让游荡得太远太偏的自由鬼们能望见，好一溜烟地奔回来。否则 7 月半一过，地狱几重门全关闭，孤魂野鬼们就只有等到来年中元节才回得来了。

老威：那几尺长的鞭子算啥子？抽回来晚了的鬼屁股么？

龙金涛：打鬼也打人。见城隍老爷出巡不揭帽的，不把裹脑壳的白帕子藏起来的，都要挨鞭子。跟着才是 5 个职务最低的开路阴官举起铁叉子上场，然后是鸡脚神，下巴挂着一条又细又长的舌头，锁新鬼的铁链子摇得哗哗响，它的跟班黑白无常鬼打着雨伞，戴着文革中那种牛鬼蛇神的高帽子，上面还有醒目大字：过来。拿你。吓得好多迷信老婆婆，当街就跪下去磕头。

高潮还是我父亲登场，他走在城隍老爷的八抬大轿前头，头戴乌纱，身穿官袍，手执《生死薄》和两尺长的特制毛笔，迈 5 步，停两步，架子大得很。四周群众顿时山呼海啸：鼓眼判官来啰！鼓眼判官来啰！不少人就窜过来窜过去，在他

的鼓眼跟前比划，扇扇子、晃树枝；有更胆大的，还揪鼻子、扯眼皮。街坊上的地痞老远望见我父亲快拢了，就摩拳擦掌地打赌，一门心思要搞得判官眨眼睛，可每回都失败。有一年，地痞们下的赌注大，急了，就先有一个人上来喷水，不行，又换一个人撒沙子，父亲他疼得泪水直淌，脸颊都冲出两条沟了，可就是不眨眼。不仅不眨眼，还鼓得更凶。地痞毛了，就举起袖筒，里面一只黑猫忽地扑出来，要抓判官的眼珠子，不料我父亲手起毛笔落，黑猫哇呜一声惨叫，被挡出几丈远。

老威：你父亲还有功夫嘛。

龙金涛：城隍出巡收鬼大半天，他的眼珠子就要鼓大半天，这还不叫功夫？县城的正街偏巷，男女老少全出动，比过春节还打挤。所以我父亲为了不扫大家的兴头，随你地痞咋个乱来，都忍着。所以他的名声一度把城隍老爷都盖过了，节完了，地痞来道歉，袍哥也上门和他交朋友。我父亲还会鼓起眼睛笑，因为经常有小娃娃跑来抱腿，或者牵着他的官袍跟倒走，这时父亲就扯起嘴角做表情，笑得凶神恶煞的。

老威：难道判官把城隍爷的风光都抢了？

龙金涛：城隍坐的八抬大轿，似笑非笑，显得很有涵养。有时，城隍娘娘也并排坐在轿里面，接受大家的礼拜。

老威：也不发号施令么？

龙金涛：身子是用泥巴塑的，脑壳是用木头雕的，所以不用发号施令。

老威：有没有活人扮演的城隍呢？

龙金涛：也有过，可多数时候是一动不动的现成东西。

老威：在整个出巡队伍里，你父亲的表演难度算最高吧？

龙金涛：偶尔会有几个人，夹杂在城隍的轿子后面，光着膀子，点七星灯。也就是胸脯并排挂 3 盏灯，一边胳膊挂一盏灯，除此还在头上与背上挂灯。

老威：这不是自虐狂么？

龙金涛：有的皮肉都燃得吱吱响，糊味儿要飘出好远。过后，酒杯大、甚至茶碗大的伤口很不容易治好。这是为了还愿消灾而表诚心、发重誓的。

老威：如此看来，中元节一趟，你家里收入颇丰啰？

龙金涛：血汗钱嘛，够一家几口开支几个月的，比种庄稼强多了，并且受人尊敬。鼓眼判官出了名，平时也四处有人请，红事图个喜庆，去吼两嗓子川戏高腔；白事去超度一下亡魂，能挣几个钱算几个钱。城隍庙里的活动经常有，都要撑场面。忙不过来了，父亲就喊我当跟班，可不眨眼的功夫学不了，也没时间学。

老威：没料到放鬼抓鬼有这么多名堂！

龙金涛：当然啰。

老威：既然阴历 7 月 14 城隍就收了鬼，那为啥“7 月半，鬼乱窜”呢？

龙金涛：人都不听话，何况鬼了。所以第二天还要烧纸钱送贪耍的鬼，多磕头，多作揖。夜晚降临，许个愿，放盏河灯，人鬼之间才暂时挽了个疙瘩。

老威：嘿嘿，我的朋友刘霞还为放河灯写了首诗呢：每年的阴历七月十五//河上布满河灯//却招不回你的灵魂……

龙金涛：放河灯是送鬼，不是招鬼。实在送不走，还有 7

月 30 的地藏王菩萨出巡，规模与城隍老爷出巡差不多，我父亲又要登场一次。

老威：哦哟，旧社会太有趣了，可惜我们新社会的人回不去。

龙金涛：是嘛，在旧社会，不讲忠孝仁义，不讲行业规矩，根本就混不走。我父亲就特别讲义气，帮过许多人。

老威：判官帮人？咋个帮？旧书里写着：在《生死薄》里找出熟人的名字，再拿判官笔勾一勾，开后门让你多活几年、十几年。

龙金涛：《聊斋》里的掌故，我父亲做不到。你可晓得盐亭北街的某某？号称三代名医，前几年还开中药铺子，这两年全家搬到绵阳去了。某某的爷爷在一九四几年，瘟得很，跑滩十多年，还在街边边卖狗皮膏药。快 40 岁的人，老婆都娶不上。毛主席说，穷则思变，我觉得指的就是某某的爷爷，脑壳越饿越灵活。有回夜半三更，城隍庙有鬼出动，嘎吱嘎吱推了几辆大鸡公交车，还打着白灯笼，晃来晃去过了几条街，把个打更的骇得丢下铜锣就跑。你猜他们到哪儿？原来是城隍老爷病了，要找医生。终于，鬼差们出了东城门，在墙角角的叫花子窝外停车，大声武气喊某某爷爷的名字。众要饭全吓得钻草，只有某某爷爷站起身回答："我在这儿。"于是领头的鬼差打了个拱手说："神医在上，我家城隍老爷视察阴曹地府，操劳过度，卧病在床。特命小官来劳您老人家大驾出诊，必有厚谢。"某某爷爷也拱手还礼："阴世父母官贵体欠安，小民自当效力，何需酬谢。"接着就一屁股坐上鸡公交车，被鬼差推着去了。弄得众要饭一头雾水，再不敢

睡觉，就聚在一块唧唧匝匝的议论：“这狗日的倒霉透顶，鬼居然上门来请，多半回不来了。”

可天刚蒙蒙亮，外头鸡公交车又嘎吱响，某某爷爷硬是回来了！还扣着端公帽，上下一身崭新的寿衣！众要饭急忙扯住问，可某某爷爷累坏了，只说了句“城隍老爷感染风寒，吃我一帖药，不要紧”，倒头便睡。

老威：哪有这等事？多半是在弄局骗人。

龙金涛：讲完再理论嘛——某某爷爷一觉睡到中午，才爬起来讲他如何如何给城隍老爷看病、开方子、煎药，还说药是城隍娘娘喂的，城隍有 5 个子女等等。有个淘气的小叫化问：“真城隍到底是啥子模样？跟城隍庙里的泥巴塑像相比，哪个威武些？”某某爷爷说：“肯定是真城隍威武啰。光身材就有 4 个人迭起那么高，所以两条腿杆放在底楼，招我上 2 楼说话，脑壳还要埋着。鸡叫了三遍，城隍就喊给赏，我再三推辞，可不要不行。城隍让吴二爷给我换了身新衣服，配了一个白布搭子，里头塞了 10 锭白银，5 锭黄金，城隍娘娘又牵了匹狗来送我。我回禀娘娘：民医无家无室，用不着狗。娘娘笑嘻嘻地说：不出明年，这匹哮天犬就可以为先生守家护院了。”

众要饭听得入神，急问白银、黄金和狗在何处？某某爷爷从屁股下拖出白布搭子，一翻，却是白黄两串冥纸元宝，一张很大的门神图背面，画着张牙舞爪的恶狗……

老威：呵呵，这个江湖郎中，想钱想疯了。

龙金涛：旧社会的人厚道，没多少花花肠子，所以不到一两天，某某爷爷的神话就在县城里外传遍了。大家都说：

“鬼都医得好，何况人呢。”可也有几个像你这样爱动脑筋的，打上门揪住某某爷爷说：“鬼都敢骗，人就更敢骗了！”两边都来了助拳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拉拉扯扯，口水乱溅，终于卷成一堆，打将起来，还闹着要上衙门求个公断。

刚巧我父亲路过，老人家爱管闲事，就扎进中心拉架。大家嚷嚷：“哦哟，鼓眼判官，城隍老爷的心腹嘛！你夜夜住庙里，晓不晓得城隍出庙请医生的怪事？”我父亲本要说弄鬼骗人，可见某某爷爷倒在人堆里，高一声矮一声地呻唤，就动了恻忍之心。念及此人无论咋样，还是想治病救人，靠医术吃饭。我今天戳破鬼局，他明日断了生计，倒毙街头，罪过就大了。于是拍胸脯说：“我鼓眼判官拿脑壳担保，城隍老爷请他医过病！”

大家闻言色变，跟着一片唏嘘，某某爷爷当场给我父亲磕了三个响头。至此，“鬼郎中”的绰号才借着鼓眼判官的脑壳担保，在方圆百里传开，跑来看病的人踩破了门坎。某某爷爷挣了钱，方娶妻生子，买狗护院，发达了。

老威：按现在的说法，这个鬼广告打得成功嘛。

龙金涛：可俗话说，鬼话连篇遭报应。某某家族发达了没得几年，就碰着解放，划成了恶霸地主。50 年清匪反霸，某某爷爷还没满 50 岁就被枪毙了。

老威：按土改的定义，所谓恶霸应该是地主阶级当权派，一个靠鬼起家的中医与当权派不沾边嘛。

龙金涛：既是郎中，三教九流的病都要看，所以某某爷爷借机结识了不少达官贵人，当然也有袍哥地痞。我不太清楚啥子事情牵扯到他，可就是没得事情，他也跑不脱，打富

济贫是共产党的宗旨啰。我们家没得多少钱，我父亲都没跑得脱。

老威：如果把阴阳两界并排看，县城隍庙与县政府同级，那么你父亲也算是阴间的地主阶级当权派，城隍老爷更是该枪毙几十次的恶霸。

龙金涛：见笑见笑。旧社会，盐亭县境有几十座庙，到了文革，破旧立新，都捣毁了。现在重新修，庙的颜色都不对头，菩萨的质量远不如原来的好。我父亲呢，官衔是判官，其实就是苦力，给人民群众带来欢乐的苦力嘛。弄一回庙会，要出几身汗，人快虚脱了，眼珠子要痛 10 来天，哪说得上剥削？并且，我们家没余钱，从没计划要买院置地。到了土改，新歌新词，颂扬共产党、毛主席，大家有了新的奔头，烧香拜佛那一套就被取代了。我们这些在城隍庙找吃的判官、无常、鸡脚神、勾命鬼统统失了业。回龙家桥，在本乡本土参加土改，划地主、富农够不着，划贫农、下中农又不对头，就成了“迷信职业”，属于政府的改造物件。也分一点田地，待遇比地富分子要好些，没挨那么多打，可开斗争会，四类分子的学习汇报会还是在一堆。

老威：土改那年你多大？

龙金涛：没满 20 岁，但做判官的跟班已有几年。

老威：你父亲的命运不算太坏吧？

龙金涛：清匪反霸毙了那么多人，他都没事；减租退押也同我们家没啥关系，除了戏装，我父亲从来没租过任何东西；按理说，罚款也跟我们家不沾边，没土地、没放债嘛，你工作组，你贫农协会，要开会算剥削帐，莫提民国，你就

是把唐宋元明清，就是把盘古大王开天地全部算进来，血也喷不到我们家。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一点不假……

老威：你父亲叫人暗算了？

龙金涛：鼓眼判官人缘好，没人暗算他，怪只怪他名声太大。有一年中元节，三台县那边出高价请他去。他就兴高采烈地去，兴高采烈地回，钱挣了，三教九流的朋友又结交了不少。

老威：这与土改没啥关系吧？

龙金涛：是没关系。可是到了1951年腊月，哪一天记不得了，家里突然闯进来一二十个人，不分青红皂白，就动手抄家。床、柜子、桌子、缸子被砸得稀巴烂，连灶台也用锄头挖垮了，顶上的瓦也掀了，还哼哧哼哧掘地三尺。

老威：是些啥子人？

龙金涛：有几个是本村的民兵，还有贫农协会的主任。可多数是外乡人，一听口音，才晓得是三台人，还带着枪。

老威：后来呢？

龙金涛：后来他们拽出一个人，要我父亲认。那人被麻绳捆着，脸都打变形了。我父亲回忆了半天，才想起他是自己那年在三台城隍庙演判官时，认识的一位乡绅。

老威：也是恶霸地主？

龙金涛：对。

老威：我听说过这种事。在土改中，因为赔罚数额太大，地主给不起，农民就又打又吊，还上各种土刑具。地主熬不过，只能乱说乱咬。前几天，一位土改工作队长还告诉我，真正能打垮地主阶级经济的，就是赔罚。

龙金涛：我父亲起码四、五年没遇见这位乡绅了，眼下突然出现，岂不是邪门？果然那乡绅咚地冲我父亲跪倒，连叫："判官大哥，救小弟一命！"我父亲急忙去扶，正要问啥子事，腰杆上却挨了种种一枪托："狗日的装疯迷窍嗦？"

我父亲痛得趴下了，但还不服气地吼："随便打人违反政策！"

民兵全围上来，你一拳我一脚："打倒封建主义就是政策！"不大一会儿，我父亲也和那乡绅一样，叫麻绳捆了，浑身是伤。我父亲的鼓眼瞪着乡绅吼："到底为了啥？你让我死个明白！"乡绅磕头出血说："事到如今，你就把那100块银元交出来嘛。"

我父亲懵了："100块银元？在哪儿？"

乡绅说："那年中元节，你到三台城隍庙演判官，我欣赏你，跟了你几条街。后来我们烧香八拜，结为兄弟，我送了你3个银元，另外还背着婆娘，将100个银元的家当交你暂存，并叮嘱不要告诉任何人。"

我父亲气得七窍生烟："我是与你结拜过，我是收过你3块银元。可那100块银元却是子虚乌有！我鼓眼判官从来没见过100块银元！"

三台民兵一听我父亲说没见过银元，立马破口大骂乡绅："你还敢骗工作组，害得我们跑这么远，草鞋都磨穿了几双！听到了嘛？人家不承认，狗日的到底把钱藏哪儿了？钱贵还是命贵哦？"

乡绅嚎啕大哭："兄弟你就交出来嘛！我也是熬不住啰！如果有第二条活路，都不会带人上你的门！"

我父亲捶胸大叫："老天爷，我今天就是冤枉死了，也没见过你的钱！你再倒霉，也不能昧良心，否则见了阎王，还要遭千刀万剐！"

可能是我父亲的嗓门太响，周围的民兵全被惹毛了："你吼啥子？鼓啥子眼睛？你在咒哪个？现在是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做主人，你还一口一个冤枉，一口一个阎王。杂种！封建脑壳！不把100块银元交公，脱不倒手！"

我父亲急得一口接一口抽气，又一声接一声吼"冤枉"，突然，一股血哇哧喷将出来，随即昏了过去。

民兵们骂装死狗，舀水来泼；见还不醒，就寻了一根木棒，将父亲的手脚捆在上面，像抬牲畜一般弄走了。

老威：这一去，啥时候回来的？

龙金涛：这一去，就没有活着回来。

老威：咋个死的？

龙金涛：第二天中午，民兵就通知家里人去贫农协会领尸体。我母亲，还有我们三弟兄将父亲抬到弥江边，一点点擦洗血迹，心里那个痛，那个冤屈，就莫提了。可在那样的年代，不像宋朝、明朝，有包公，有海瑞，还找得着击鼓鸣冤的公堂……

老威：可也有大致的土改政策，你父亲不是剥削阶级啊。你们找工作组讨说法没有？

龙金涛：工作组可是皇帝的钦差，我们没这个胆量。把父亲洗干净了，换身新寿衣，天黑前就入棺，第三天就抬上山去埋了。

老威：你父亲身上有几处伤？

龙金涛：数不清，也没得心情数啰。腰杆乌完了，从腋窝往下，全是软塌塌的。按说人死几个钟头，肢体就会僵硬，可是我父亲的肋骨、脊骨都碎了，一张人皮里头，就没有好的零件，所以直不起来。最叫人不忍心看的，是眼睛，爆出来，比鸡蛋还大。不晓得哪个下的狠手。我母亲曾扯住本村的民兵哭叫："本乡本土，无怨无仇哦！"那些民兵都不敢看她，还连连解释："关我们啥子事嘛，是三台那边下的手！他们一心要挤钱出来，屁眼儿黑！"我说："屁眼儿再黑，也有政策嘛。"他们说："政策就是挤地主的钱啰，工作组又不在场，哪个敢拦他们？"

老威：这样就算了？

龙金涛：还想搬起石头砸天么？

老威：可叹可叹。

龙金涛：又过去几个月，可能运动要收尾了，工作组才把我母亲叫去，承认工作上有些失误，还赔偿一个银元。我母亲不服，工作组的同志就说："也是无风不起浪吧，谁叫你男人稀里胡涂去跟三台的那个恶霸地主拜把子？虽然没有证据证明你男人转移了100块银元的赃款，可人家死死咬定，你们也洗刷不清啊。如果我们不讲政策，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会笼统地把你男人定为恶霸地主的走狗。既然三台那边都镇压掉，盐亭这边死了不也算了？"

老威：你母亲咋个说？

龙金涛：无话可说。拿着一个银元就回家了。

他们死后永不分离

2006 年 8 月 30 日大早，妹妹、妹夫和我，匆匆购得香蜡、纸钱、鞭炮等物，向北驱车几十分钟，就抵达了位于盐亭县黑坪镇冯河乡的李家坪老家。盐亭属于贫瘠的丘陵地带，小时候爬坡下坎，经常往返这段路，一个单边就要耗大半天，所以觉得人生长得没有道理；而眼下，小车转瞬就偏离公路，进入田间地头的土路，再过一座小石桥，提早加档，冲上短而陡的烂泥坡，就直抵每个人迟早都得躺进去的坟墓旁。

妹夫连按喇叭，没人应，于是都下车。左边是新修的祖坟，占地面积宽，显得很有气势；右边却是老宅，一座上百年的四合院，已拆掉了大半，剩下的因年久失修，满目颓败。妹妹从缺口进到浅草凄凄的院坝，发觉堂屋短阶旁的石狮子还干净，就冲狮头落下屁股，高叫：桂英！桂英！桂英是我们的堂姐，在右耳房内陪我的老地主爷爷几十年，直到爷爷死了，房子也千疮百孔了，还住在里面。

一个白发婆婆从右厢房钻出来，我定睛一认，是德成家

二妈。妹妹很亲切地打招呼。二妈说：桂英去绵阳了，她么女生娃儿，要耽搁一段时间。我说：就你一个人守院子么？二妈说：还有鸡嘛，还有猪和狗嘛，还有你们家祖坟嘛。妹妹急忙道谢，并掏了100元人民币递上去。

我却不管不顾地掰开右耳房的铁门扣，一脚迈了进去。灶台、案板、水缸，还有通往猪圈的后门，跟我小时候见过的一样，没挪地方。粮柜和楼梯也没挪地方，我顺梯子爬上阁楼，从前爷爷就住在上面。1967年，我9岁，在家破人亡中，随已当知青的哥哥大毛流窜至此。晚上没睡处，爷爷就安排我跟他挤。老人家一身枯骨就不提了，可怕的是臭虫和跳蚤，整得我彻夜未眠。三更天还起床下楼，对着皎洁的月光，脱了汗衫举起来，竟全是密密麻麻的血点子。正在懊恼呢，爷爷像个鬼，荡过来将我拽回阁楼，点亮煤油灯，在焦黄的老蚊帐内捉拿臭虫。四只蚊帐角都埋伏着小指头粗的臭虫王，爷爷逮住他们，犹豫片刻，又放了回去，还亲切地叫唤它们的名字，说啥子“臭老三，你咬我就可以了，莫咬我孙娃儿啰，他的肉嫩”……

瓦顶缝隙漏下来的光柱子很密，我埋着腰，像丛林深处的野兽，在嗅着多年前在这儿留下的气味。我能听到自己寒毛炸开的劈啪响。我说：爷爷，老地主，孙儿我故地重游了。听说你在旧社会挺有能耐的，一年三百多天，大多数时候都光着脚板，种庄稼是一把远近闻名的好手。耕冬水田时，牛都累了，吐着白沫不走了，你还不累，还奔到前头去替牛拉犁。就这样，你前半生赌命，好不容易挣够了几十亩田地，还包括一个祖上留下的四合院、两头耕牛、五头大肥猪、几

十只鸡鸭，却上了共产党的土改政策线，被乡亲们一致推举为地主。而在几年前，同样的乡亲们，也一致推举你为保长。幸好没作啥子孽，好歹保住了脑壳。

你的教师儿子生前有过非常残缺的讲述，你孙儿曾据此记载：

……几口粮柜全敞开，平日舍不得吃的大米、白面舀空了；跟着，陈谷子、麦种、苞谷、豌豆统统装口袋扛走，两千多斤窖藏红苕也刨了出来。那天，李家坪的穷人像过节，密密麻麻地在爷爷家里进进出出，想拿啥就拿啥。开头，工作组长还捏着笔记本登记抄走的东西，后来，人太多太乱，就登记不过来了。

到了晚上，上百号人只有一两盏马灯，阴影中，连锅碗瓢盆都失踪了。当然，政策过场要走，在大家掘地三尺，挖出一盒金银首饰和两匹阴丹兰布时，工作组长就当众宣布没收。奶奶因窝藏这些东西，被游乡批斗。她的几个堂侄辈还用麻绳捆了她。

80 年代末，我随父回了趟老家，在祖坟前拍了照。爷爷刚去世，而奶奶近 30 年前死于大饥荒。据说当时饿得摇摇晃晃的人们仍不忘阶级斗争，涌进老地主家搜粮食，灶前当柴禾的玉米芯子被捡了起来，一把一把搓碎填嘴里；连泡菜坛子也倒空，没菜，就把咸水你一勺我一勺地喝了。

奶奶死前从床上滚爬到堂屋门前，坐在门坎上，一个劲地掉泪。田分了，这座祖辈留下的院子又搬进来了五户人。占了东西南北十几间屋，只把东南角的耳房留给爷爷奶奶。爸爸说，土改时他正在县城教书，老家有人带信来说“出事

了”，他压根就没敢回去看看，他怕人告状，与剥削阶级家庭划不清界限。

风头过了，爸爸才悄悄回了趟李家坪，给爷爷一些钱，让他们度过难关。被抄家之后，昔日的地主家空荡荡的，连桌椅都没一张完整的。

爷爷奶奶育有 4 儿 4 女，3 个儿子死于非命，4 个女儿均为文盲，一生都耗在大山沟里。只有我父亲远走他乡求学，成为李家坪唯一的旧时代大学生，却是新时代被改造来改造去的“臭老九”。

我和母亲都不喜欢爷爷。母亲说，爷爷的土和脏让她受不了，一年四季，眼屎、眼泪、清鼻涕从未断过。母亲还说，大饥荒的时候，爷爷就像只黄鼠狼，在山上窜来窜去地打洞，十天半月不归屋，见啥都往嘴巴里捞，从不管奶奶有没有吃食。所以把奶奶饿死了。

而爷爷这个老地主留给我最令人发指的印象就是吝啬。乃至多年以后，我还写道：

老鼠和菜花蛇将房梁上的陈年腊肉啃得伤痕累累，却从不取下来喂人；核桃、花生藏在柜里七、八年，都叫虫蛀成空壳了，还舍不得吃。一套衣裤，从夏天穿到冬天，极少见他换下来洗过。小时候，我在那颓败的地主院子住了两天，身上痒得厉害，想换洗衣服，却没有肥皂。最后是堂姐从树上打了几片皂角替代。

爷爷从不坐车，快 80 岁了，还走几十里山路到父亲的县城中学来。遇上太阳天，他就边走边牵开大裤裆捉拿虱子，

一不留心，裤子就掉下脚背。我实在想不通，世上竟有如此艰苦朴素的地主。

爷爷死于 1988 年初，临走前我们全家都赶回这老宅，扶他起来，在祖坟前合影。老人家嗓门还挺大，冲我父亲吼着要吃糖。姐姐飞飞急忙把白糖口袋献上，他竟一把接一把抓起朝嘴里填。两斤多白糖吞完没一会儿，我们 84 岁的爷爷，窝囊一生的老地主就咽气，并躺进了几十年前的旧社会就打造完工的布满虫眼的棺材。

紧接着，我姐姐飞飞也因车祸逝于同年 5 月，仅 37 岁。

惋叹数声，我缩手缩脚地下楼，从岁月丛林返回院坝，见妹妹小飞正给妹夫王鲁介绍四合院的来历。她说：堂屋的左边，曾住着王三婆，爷爷的嫂嫂，苦大仇深的五保户，养了十几只猫，一到冬天，这些猫儿猫女就钻进被窝为她供暖。王三婆是爷爷的死对头，两个老人像两个门神，经常一边坐一个骂架，偶尔还发生抓扯，可三婆对我们却相当好，总把好吃的留着，等我们回来。王三婆的背后，是德泰一家，德泰是爸爸的堂弟兄，独眼龙，土改积极分子，后来当了生产队长，凶得很，负责监管爷爷那种四类分子。左厢房是李义大爸和开玉大妈，人很和善，爱卫生，爸爸每次回来，都住他们家。右厢房德成是我们二爸，村里出了名的老实人。可现在呢，除了你刚才看见的二妈，这院里的上两辈人都死光了，桂英这辈人也死了大半，剩下的都搬走了。

我笑问：他们都是土改那年搬进来的贫雇农啊，如今在哪儿呢？小飞指着瓦顶高处笑答：都在坡坡上埋着嘛。王鲁

催促说：莫耽搁时间了，快去上坟吧。

10 米之外就是刚竣工的新墓，条石围了齐人高的一圈，犹如阴阳之间的隔墙，墙里安息着我们的曾祖父李春城、祖父李树凡、祖母李刘氏、父亲李德奎和姐姐廖飞飞。与众不同的是，墓前立了新旧两块碑，旧碑是父亲生前重修祖坟时造的；新碑却为父亲单立，上面刻着盐亭县中学致一位普通教师的悼文。

按古老的礼仪，我上香、作揖、烧纸钱。小飞比我虔诚，还跪下磕了头。可不知为啥，我暗自感到忐忑不安。这墓修得太阔气了，包括石梯、堡坎、墓前空地及墓体墓碑，占地十来平方米，比父亲他老人家生前任何时期的卧室都大；而在文革结束前，我们全家 6 口，也就十几平方米的住房面积。

况且，与旁边老宅的新旧对照也过于强烈了。

但是我不能说什么，大毛和小飞都是按风水先生的指点办的，三兄妹比起来，我大约对死后的事最淡漠。父亲一辈子教书育人，在盐亭县境的教育界很有影响，可我这个儿子，几乎没听他讲过课，更丢脸的是，作为鼎鼎大名的教书匠的后代，我连考 4 次大学都落榜，第 5 次免试上武汉大学作家班，还被开除。所以，父亲自小就缺乏对我的信任感，与二毛的交流远远不及与飞飞、大毛多，哪怕我成了所谓的诗人，他还是担心、失望超过信任。直到有一天，我坐牢去了，父亲彻夜未眠，据说第二天就买了收音机，从此养成偷听敌台的习惯；直到有一天，他在敌台里，突然听到他这辈子最尊敬的作家刘宾雁正专题评论他儿子的作品，并称他儿子是“了不起的中国人”，才一下子愣住了。我记得那天回家，瞅见父

亲居然捧着《中国底层访谈录》，边读边拿笔在划杠杠，跟批改作业差不多。

由于政治运动，我的家庭多次四分五裂，我几岁就因文革失学，当上流浪儿。我的文化基础是高小毕业就上山下乡的大毛打下的，所以读初中了，还不会打标点符号。我习作文，省略号要点两三排，老师质问，我回答还有很多话很多话没写。而父亲呢，那个老资格的语文教师呢，好像从没审阅过我无边无际的省略号，他的注意力永远是学生，哪怕下放到穷山沟底的柏梓中学，在我家打转的学生也永远最多。四面墙壁，一面靠窗，半面摞书，其它就顶天立地迭放着箱子和口袋。都是农村孩子，从几十上百里过来住校上学，粮食搁在集体宿舍不放心，就存放在我家了。早中晚 3 餐，几十个学生要进出 6 次，因为是各自将苞谷碴、红苕等粗粮（也有少数学生掺入少许白米）放进各自的钵里，再拿到学生食堂去掺水蒸，所以我家就成了大伙的储藏室兼饭厅，除了钻入蚊帐，缩进被窝，不存在丝毫的私人空间。由于一切都透明化，我曾一度不明白我们四子妹是咋个生下来的。唉，如此舍己为人的臭老九，却应验了杂种毛泽东的一句话：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

盐亭为中国培养了好些中高级官僚、商人和技术人员，其中肯定有我父亲的汗马功劳。事隔多年我才体会到，父亲的教育基点还是孔夫子的“有教无类”。孔夫子也没有私生活，稍微有点出轨的想法，马上就受到弟子的非议和质问。难怪，有文艺天赋的母亲经常大叫“日子没法过”。母亲说：我跟你爸爸，就像电影和川戏，资本家和土地主，搞不拢。

退休之后，父亲来成都，替大毛守了十几年的牙科诊所。刚好我出狱离婚，光棍一条返乡，白吃老人家好几年的饭，还穷凶极恶，嫌饭菜不好吃，惹得老人家时常拍案而起，全忘记了当年对学生的那份耐烦。直到2001年底，沈嗣不起，换了五、六家医院，终于确诊为晚期肺癌。

劳改犯的身板硬扎，我自然充当起贴身护理，背、扶、洗澡，忙得不可开交。父亲到底切身体会到无用儿子的有用之处，我则首次目睹并搓揉父亲的裸体，他本能地遮遮掩掩，后来次数多了，就麻木了。父亲的最后一站，是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住院部11楼，也就是癌症楼。出了电梯是走廊，在那一头，是梅花形状的病区，每朵花瓣都是病室，躺着两到三个等死的人。父亲拖了大半年，算久了。

开头还有大把时间留给我们父子俩，父亲说了几次：二毛，我给你讲讲老家，讲讲我和你妈的经历吧。我却说：不急，等几天嘛。或者说：刚打完吊针，休息一会儿。或者又说：再休息一会儿。父亲深深地叹口气，说：这一生快划句号了，我除了教书，别无所能，因此我的墓碑就刻“盐亭中学教师李德奎”几个字足够。

我急忙说：爸，你想哪儿去了。目光却有些躲闪。不料才过20几天，癌细胞就扩散到呼吸道，父亲的喘息一阵紧似一阵，再也说不出话来！他眼睁睁地瞪我，还抓住我的手，可当我会意地埋头，将耳朵凑拢他的嘴边，却只有含混的卜卜声。

就这样，我永远失去了全面了解自己父亲及家族的机会！而我竟是一个靠文字，靠倾听，靠挖掘他人经历讨生活的家

伙！父亲活了 80 岁，去世这年我 44 岁，可父子俩私下交谈的时间加起来有没有两天，一天，或者大半天？特别是目前，我正在拚力还原土地改革的真相，而父亲作为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本应该是我的第一个访谈对象啊。

接下来就是长达几十天的苟延残喘。每时每刻，那些价格奇贵却毫无用处的化疗药物都伴随着父亲，吊针要打十几个钟头，手背肿了，插不进针了，就改手臂；手臂不行，就改大腿；大腿再不行，就改脚背。父亲终于减肥了，硬梆梆的大肚子瘪了下去，可查房的女主任说：要输脂肪乳加强营养，支持化疗。还没等家属反应过来，一日两大瓶黏液又挂上床尾了。

穿白大褂的屠夫呀，哪怕是大象也会让你们折腾完蛋！没过几天，脂肪乳也输不进去了，护士连扎七、八下，针头都弹了回来，她吓坏了，急忙跑去叫女主任。两人又在病房里瞎搞了半天，针头终于进去。可吊瓶里的液体却进不去，不但进不去，还倒灌，胶皮管刹那就变红了。

我实在怒不可遏，一把扯掉管子，屋里屋外地叫骂开了。可连喊痛都没力气的父亲还冲我摇头，还在为人师表。门外，死者一个接一个，每当太平车从电梯出头，吱吱的穿过走廊，深入到梅花病区的某一瓣时，我都立即关门。特别是夜半，家属猝然爆发的哭泣像无数钢针，不，像比钢针更尖更细的看不见的指甲，深深抠入每个人的皮肤、内脏和记忆。

我真想将父亲的耳朵堵上。

我真想将父亲所有的感觉器官堵上。

如果手里有中止世间痛苦的毒酒，我愿意亲自给父亲灌

下。

但是，喘息、呻吟、哭叫、歇斯底里与麻木还得继续，地球的转动还得继续。

楼外的大街，车辆川流不息，路灯犹如波涛汹涌的江河，由近而远地涌往夜幕后的天国。天国中央的神啊，你可知晓，我们隔壁病房的中年人已于昨日黄昏到你那儿去了。他不堪癌细胞和高价无效治疗的双重折磨，就腾空而起，走了快捷方式——他从 11 楼俯冲到底，嘭的摔成一块浆汁四溅的肉饼。不同楼层的脑袋三三两两地探出去，还以为是楼顶的花盆掉下去了呢。

2002 年 10 月 7 日凌晨，父亲停止呼吸。一个年轻医生装模作样地做了几下胸搏击，算是抢救过了。此前约 1 个小时，主治医生查房，用小电筒射了病人的瞳孔，还指着我问：他是谁？父亲似乎微笑了一下，伸出两根指头。见医生不解其意，我就说：我是二毛，爸爸还没胡涂。

他一生中极少胡涂。约 5 个小时前，门外有人哭，刚打完杜冷丁的他还示意我去看个究竟。原来是 3 个下岗的兄妹，因缺钱而抱头痛哭。他们为了延缓绝症父亲的死期，花光了全部 10 来万的积蓄，再也交不出后续费用了。可毙命在即的父亲还以点头、摇头来表示想活——即使一天半天，即使不成人样，也想活。可多活一天半天，需要大把钞票啊。

父亲，你操心太多，管闲事太多了，世道却没有因为你而好一点或坏一点。安息吧，永远退休吧，让良心经常被狗吃掉的儿子我，为你抹下眼皮，为你顶上假牙——你在阳间继承了老地主的香火，艰苦朴素，老吃剩饭剩菜，散发着馊

味的东西也舍不得倒，但愿你在阴间提高生活质量，多尝点好东西。

转眼快 4 年了，小飞埋怨说，二毛你还发啥子呆？赶快烧纸嘛。爸和姐跟前多烧点，爷爷、奶奶、祖祖全要烧到，莫偏心眼，弄得他们在阴间呕气哈。

我点头称是，将纸钱烧得热火朝天。大个子王鲁牵着十几米长的鞭炮，在墓前空地摆了个蟒蛇阵。坡上田间的乡亲们陆陆续续往这儿赶来。我却在继续想，姐姐那么善良，为什么死在父亲的前头？老天或上帝真是公平的吗？

寻思不出答案。只记得父亲曾经说过：姐姐与他最亲，命运却跟他最像。

还记得姐姐十几岁参加工作，去深山老林的平武县伐木厂，因出众的美丽，数次出演样板戏的主角。她曾与一位解放军连长倾心相爱，却由于出生地主家庭，政审不合格而告终。后来的丈夫与她各方面都不般配，可时代弄人，只好听天由命地过下去。

她的两个女儿没受过完整的教育，父亲总觉得欠了姐姐的。特别是她死后，骨灰一直无法入土。父亲说：父女俩一道走更合适。

鞭炮炸响了，小飞捂着耳朵跳到一旁。父亲、姐姐，你们此刻还在遗憾吗？

蓦然，《梵高传》里的结尾句子蹦出我的脑海，那也是梵高和他的知音弟弟泰奥合葬时的碑文——

他们死后永不分离

土改受害者张进谦

1 远征军发报员

前奏

客居的窗前，风呜呜地吹，雪也下了好几天。据当地人说，古城大理好多年没这么冷过，屏障般的苍山全白了。

寒流正一点点浸入心中，我咳嗽两声，神色麻木地写着、写着。突然之间一切变小了，已在天国的父亲从眼前的照片上走下来，代替我坐在椅子上，一篇篇地批改学生作业；而我却缩回旁边的地毯，抹着鼻涕，拿一支铅笔在纸上戳来戳去。我不禁躬下腰去问那个小我：你几岁呀？小我懵懂地摇摇头。是啊，摇几回头就 20 几岁，小我成了现代派诗人，长头发大胡子，坐在桌边写雄心勃勃的长篇史诗——父母远在长江中上游的成都，我却迁居长江中下游的涪陵，新婚老婆阿霞已入梦了。接着 30 出头，我坐牢去，在号子里还捏着自

制的竹签笔写《犯人的祖国》，死刑犯的铁镣在四周叮当响。然后出狱了，在姐姐夭折的那条路上认识18岁的宋玉，买房娶妻罢，我光头光脚，坐在桌边写访谈录。这一来，十几年又过去了，访谈录还在写，宋玉却离开了。宋玉之后的金琴来了又去了，我卖掉成都那个7楼的家，在云南漂了两三年，惶惶然不知天命为何物。除了写着、写着我还能做什么呢？

继续咳嗽两声，记起后天就是2007年除夕，而这篇80岁老人的采访是去年9月份做的，转眼又搁了5个多月。那几天阴雨绵绵，老人不断追问：何时能让他看到纸上的东西？我却语气迟疑。在没动笔之前，我不能不迟疑，可一迟疑，老人竟汗水满头，又是留饭，又是掏腰包要给代笔费。在那个破落小院的屋檐下，我们拉拉扯扯了好久，我才松口说：尽快。

眨眼年过完了，大年十五也过完了，我还在咳嗽。高烧几次，都死抗过来，迷迷糊糊中看《西藏渡亡经》的盘片，灵魂果真逃离肉体，从窗子缝嘘地钻出去，再回头贴着玻璃瞅屋里。我的寒毛都倒竖起来，可真要死还得等一些年呢。体力恢复了，我先得爬起来，还这个叫张进谦的急性子老头的文债。他家住长江第一湾边上的石鼓镇，80出头，每天还坚持赌博和长跑。

最先牵线的是一位摄影家，30多岁，始终戴着礼帽。他看了《中国底层访谈录》，就说要给我介绍人物。隔了几天，他果然拿来一个电话号码，我照着打过去，未及寒暄，对方就先声夺人，猛掏我的底牌。可惜我没有底牌，也不急着出牌，就将这事儿拖了两个月。直到秋天降临，阵阵寒意中，

人的心态趋向平和、冷淡，我才约了一位热衷地理的朋友，从丽江古城乘小面包车，去几十里开外探访。

穿过新城区平庸的街道，面包车开始爬坡，之字形的盘山道旁，不断有山民和随身的鸡鸭上下。约一个多钟头才翻过山顶，气温陡降，风铲着地皮卷上来，云和树枝如疯婆娘的头发，被揪扯着，若干个瞬间，我们感觉车喘息着，挣扎不动了，而且还大有撤退之势。司机在我旁边，卡卡换档，獠牙都呲了出来。

我把脑袋缩进衣领，脚底的气流却将裤裆鼓成了圆球。背后的朋友从三个农妇的头帕间挤上前来开玩笑：还是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暖和。

我点头称是。司机乘机介绍说：过了这最高的风口，就是某某寺庙，在那儿可以俯视群峰脚底的长江第一湾。我问：不要门票吧？我们可不是游客。司机摇头微笑：随进随出，不要门票。我们当地人路过，都要进去烧香，求菩萨保佑平安。我可以负责地保证，这是丽江地面最灵验的佛寺。我说：这次就不去了，等下回吧。司机说：你们不信宗教？那就照张像嘛。这么高这么有气势的风景，太难得了。我说：我又不是摄影家，天色灰暗如此，拍不出好玩意儿。司机沉下脸说：随便你们，算我白费口水。

没一会儿，车子就不由分说地停靠在寺庙大门前。一探头，我发现周围已有大小数辆车。我的朋友在正规的报社当过记者，这方面反应快些，就招呼我说：大家都下，我们呆在车上也没意思，进去看看嘛。

显然这是新增的一处旅游景点，水泥垒起来的庙门如古

装电影中的山洞，不伦不类。庙外风大，且一览无余，游客们就只能缩着脖子往洞内涌。我们也随大流，在里面逛了两圈，晃眼睛的雕梁画栋，油漆未干呢，实在没什么观赏价值。我咕哝说：这块地势凌云而起，像一只悬空的秃鹫脑袋，可这庙偏偏修在秃鹫脖子上，活活将鬼斧神工的自然杰作给破坏了。朋友说：你我都不是风水先生，就别妄加评论了。

由于带着情绪，浏览中的碑和匾都过目即忘，不留一丝痕迹。遇观音殿，朋友进去磕头，不料刚埋下身子，就闻当的一声锣响，两位黄衣和尚齐刷刷念“阿弥陀佛”，请施主入布帘隔出的里间说话。朋友面软，先鬼使神差地随他去了；我自忖有点主见，连忙抽身，却叫扯住了袖口。翻脸显然不吉利，罢罢。

掀帘入内，仅见一桌两凳。我与和尚分主客落座，彼此对视，竟都是秃瓢，都戴眼镜，感觉滑稽，我不禁失笑，和尚也跟着笑，满口“善哉”“佛缘”“阿弥陀佛”，接着询问了我的年纪，猜测我至少是某公司的老总。我谦虚说：写字的，写字的。和尚就说：原来是个鹏程万里的大记者！我要每天早晚为你念经，保佑你名利双收。我受宠若惊，推辞说：已经混到头，就不用了。和尚说：还早呢，观你的面相，在政坛上还大有作为，你我既然有缘，我就辛苦一点，为你多多念经加持。佛法无边哦。接着，《随喜功德簿》就从抽屉底捧上了台面，和尚左手执册，右手执笔，眉头微皱，目光任重道远地逼视过来：施主捐功德几何？转折太快了，我愕然以对。和尚凝然重复说：为重塑观音菩萨的金身，施主捐多少功德？几万？几千？还是几百？我的脑袋嗡然一响，可

面皮还是挤出了笑纹，和尚见状，又欲擒故纵地加了一句：随你的心。

绕过山头，紧靠长江第一湾的石鼓镇遥遥可见

我的心是一文钱都不想出，正沈吟间，和尚又说：出1000元，你的名字就可以上《万世功德碑》，流芳百代了。我急忙点头，感激涕零地从腰包里掏出50元人民币奉上，做贼似的站起来说：名字就不用写了，阿弥陀佛！

我憋着不看和尚那悲悯的眼神，逃出百把米，才回头，与我的朋友相视贼笑，并不约而同地鸟儿问答：捐款几何？50。就算门票了？对对。

继续上路，弯曲如弓的长江第一湾尽收眼底，站在那弓背边照张像，差不多是一般游客此行的最终目的。20几分钟后，车抵石鼓镇，我顺便问起张进谦老人的府第，没料到司机居然晓得，于是车子偏离正街，在粪便四溢的陋巷三拐四

拐，就直抵一半新半旧的土墙院落。

付罢车钱，扣浅蓝鸭舌帽的张老夫人就将我们迎入门坎，并告之，老张已恭候多时，不耐烦，就去街面打听了。老夫人瘪着嘴，笑得羞涩而慈祥，令我等晚辈不好意思，就穿过杂乱的院坝，朝正屋檐下的小凳，规规矩矩地落下屁股。树枝间有鸟叫，脚边晾着几簸箕核桃，我从背包里翻出录音机和笔记本，突然感到特别静，石鼓镇背后是山，很远的风从缺口过来，到达院墙内就凝固了。

直至张进谦老人进来，黑呢帽，大耳垂，声若洪钟。我惊醒一般笑了。

时为 9 月 12 日午时，秋雨飘飘。

正文

老威：对不起，我早就应该来拜访你了。

张进谦：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从 8 月份我们接上头开始，到现在，人都快等断气了。刚才我还到长江第一湾的停车场，转了好几圈，逮住司机就问：看没看见一个外省的光头？都说不晓得，当然不晓得，世上的光头多了。

老威：老人家真是个急性子。

张进谦：我 1926 年生，整 80，没几天活头了。我等得，阎王爷可等不得，所以要尽快找个人，把这一肚皮的经历写出来，给钱都可以。听说现在出书要贴钱……

老威：嘿嘿，把我当成枪手了。

张进谦：以前叫作家，如今就是枪手嘛，你出个价。

老威：老人家有点英雄气短了。我是听说你受了很多磨难，豪爽的性子依旧不改，才自愿找上门的。我不为任何人当树碑立传的枪手。

张进谦：你说，我为什么 17 岁就参加抗日？

老威：还是按时间顺序，从头说吧。

张进谦：哪儿是头？

老威：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张进谦：我父亲是老地下党员，1927 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他的身份暴露，就翻你刚才来的那座山，到丽江县政府去自首。当时国民党的县长叫周果。

老威：他没被杀头？

张进谦：没有。我很小的时候，他还做过一任区长；抗战胜利到 1949 年解放，他一直都是石鼓的乡长，所以在土地改革前，就被当作恶霸镇压了。

老威：那你家是大地主了。

张进谦：我家早先是佃农，自己没地，佃地种，还得给人家交租子。到了父亲这辈，家境就逐渐变得富裕，接近小康了。我生于国民革命军北伐那年，4 岁就在我外公家念私塾，儒学的基础扎实，到老都受用。眼下我还天天在二楼的书房里温习《四书》《五经》，练书法。

老威：难怪，你说话的口吻像知识分子。

张进谦：我母亲有文化，她两个弟弟，其中一个还是燕京大学博士。那时，外公常在我耳边念叨，读书要“三更灯火五更鸡”，可我一个几岁孩子，哪儿懂？老打磕睡。我脑壳上至今还有一个疤，就是读书打瞌睡，被外公的烟锅子敲的。

头敲破了没得药，就刮烟油糊起。我忘不了《大学》里有这么一句：诗曰，诗曰……

老威：诗曰个啥子？

张进谦：还跟小时候一样，着急就卡壳。稍大一点，就诗曰着进了学堂。10 岁，高小没毕业，我就考初中。当时云南省内只有 3 所中学，我考入了丽江城头的省第三中学，也算所谓的天之骄子了。

1943 年，我刚满 17 岁，就进了中央军校，即中央军事委员会住滇干训团大理分团，是专门速成抗日干部的机构。1 年后毕业，分配到远征军第二军，开拔到芒市前线。由于怕家人担忧，我只告诉多病的母亲去下关了。

老威：你们当时的长官是谁？

张进谦：战区总司令是宋希濂，也就是我们干训团的教育长；第二军军长是王凌云，通讯营营长叫马奎。我在营部见了马营长，他说：你学的无线电？那就去无线电连 7 班报到吧。就这样，我就成了前沿部队里的 1 名小小报务员。

老威：你随军去过缅甸吗？

张进谦：中日军队在中缅边境多次拉锯战，可无线电连跟着军部，在芒市留守。芒市出去 30 多公里，有座三台山，是日本鬼子重兵把守的据点，我军久攻不克，上去了几个师，都差不多拼光了。于是 11 集团军开会，调整部署。第二军军长王凌云是土匪出身，此时红着两眼站了起来，立下军令状。他说：给我 1 个月时间，还有多少多少吨炸药，拿不下三台山，我和弟兄们都死在阵地上！

老威：这个土匪军长真厉害！

张进谦：许多土匪比共产党还爱国，况且王凌云不是普通的山大王，他从前在河南，杀富济贫，与日本人打了很多硬仗，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后来被蒋介石招安，委任他军长，他却只当师长，条件是不整编他的手下。这是支特殊的双枪部队，几乎人人都带步枪和烟枪，可战斗力却第一强。

接受拜访的张进谦老人

凭借战功当了军长的王凌云领了任务，立马来到第 9 师。这是他的本钱，跟黑社会一样，9 师的官兵都不叫他军座，而喊“大哥”。下面的师长、旅长、团长、营长，也统统喊“哥”。于是一声令下，全体兄弟伙集合，听大哥训话：弟兄们，我已领下解放三台山的军令状，时间是 1 个月；我却只给你们 24 天，拿不下来，大哥我带头去死！所以，给我将日本鬼子在三台山的 6 个碉堡围起来，硬拼不行，咱就在他机枪射不着的地方，学老鼠刨地洞！四面八方往里挖，弄到底了就填炸药，给他娘连锅端了！

下面齐声叫好，跟响雷似的。大哥又问：还有什么困难？需不需要宽限两天？9师师长代表大家回答：不需要宽限，只需要每人每天加发2两上等鸦片烟！下面哈哈大笑，大哥说：行，就这么办！他娘的，你们有了大烟还吃饭吗？

当天夜里，这支大烟军就进入了阵地，人人都光着身子，你抽烟我打洞，我抽烟你打洞，轮番上，裤衩顾不着穿，饭顾不着吃。拢了22天头上，大清早，9师前沿就发来一个急电，营长亲自命令我翻译出来，两个字：就绪。通讯员立马呈军部，军长王凌云也立马回电，交我发送，他说：小鬼，有没有把握3分钟打出去？那时发报还是用手摇发电机，有人在旁边摇得呜呜响，我却翻开密电码，照着拼凑“点火”两个字，然后打出去。这是千钧一发的时刻，刚过1分零4秒，对方的信号就响了，是“嘀嘀嘀，嘀嘀嗒嘀”，照电码拼拢来就是“sl”，表示收到。我叫声通了，军长就拍着我的头说：好，小鬼，我这个中将亲自为你请功！为什么敢放心呢？因为集团军总部还有电台在监听我们之间的通讯。

老威：后来呢？

张进谦：好几吨炸药埋在地洞里，一点火，山摇地动，鬼子的6个碉堡一家伙冲上了天。哦呀，山包包都平了……

老威：炸死了多少日本兵？

张进谦：11个。

老威：什么？6个碉堡才11个？

张进谦：旧尸体成堆，新鲜带血的尸体只有11个。原来守三台山的有两个师团，经过几个月的消耗，鬼子死了几千人，已经山穷水尽，我军却死掉了几万。

老威：早知如此，就不必费这么大的劲儿。

张进谦：你这个年纪的人，不晓得日本鬼子有多可恶！受伤被俘，我方人员出于人道主义，将他背起来，准备送医院抢救，可他一苏醒，就拔出匕首，捅死背他的人，然后自杀，以此效忠天皇。另外，芒市的好多傣族姑娘也惨遭他们蹂躏，所以大家对日本人恨得咬牙切齿，部队抓了俘虏，也懒得送战俘营，当场交给傣族寨子，男女老幼都围上来砸石头，打个半死，再用刀砍成几截。

老威：可叹可叹。

张进谦：没啥可叹的，其它地方我不晓得，入侵芒市的日本人，没有一个活口。哎呀，现在才敢说国民党抗日，以前哪敢说哟，反革命的帽子就给你戴起。抗战结束，我们从弹痕累累的惠通桥过去，只见那些山尖尖上，插满了松毛片片，望不到头，一根片片下面就埋着一个烈士。可至今也不见谁为他们写上一笔。

老威：早就听说过惠通桥，有空我一定去看看。

张进谦：日本投降了，部队里见官升一级，我因为立了功，提拔成少尉。本来前途无量的，可我觉得抗日的心愿已了，该回家了。

老威：老人家算得上性情中人。

张进谦：回想 1943 年，腾冲和龙陵先后失守，我们几个同乡的热血青年，嚷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竟步行了好几天，从丽江走到大理的三塔寺。军校临时设在里面，大门两边，醒目的黑字对联：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横批：杀敌救国。

老威：可谓报国有门了。

张进谦：对，我们二话没说就进去报名考试。我有一小点英文基础，就进了通讯班，学习有线电和无线电，还有各种战时通讯课程。可如今呢，外敌已除，母亲病重，我就应该回乡尽孝。旧时代的人嘛，脑子挺简单的，没收了汉奸的金子，让我们拿，也坚决不要。问要什么？我答要回家读旧学。当时带着两把枪、400 发子弹、罗斯福呢的西服汗肩、英国产的毛呢大衣，还有美国产的靴子，才从芒市出来 30 华里，就撞上检查哨。四处都架着机枪，不由分辨，我就被脱得一丝不挂，枪弹、衣服、靴子全部没收。我强了两句嘴，他们又把所有的证件及路费也扣下，真跟抢人差不多。嘿，幸好我不贪财，没拿黄金，否则编一个罪名，当场就毙掉灭口了。

1946 年的腊月 13，我母亲病逝，令人心灰意冷。1947 年，国民政府抽壮丁，我家 4 弟兄，只好由我重操旧业，去丽江团管区当门户兵。1948 年初，闹金圆券风波，政局不稳，本地兵全部叫撵出部队。我正不知何去何从，地下党组织找上门来，由中学同学引荐，我加入了滇西工委领导下的民青，即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由于是无线电方面的专业人才，1949 年 12 月份，我又被地下党“边纵”（即滇桂黔边游击纵队）接纳，成为第 7 支队司令部的电台台长。

老威：你从国军变共军了？

张进谦：时局动荡，人人都变来变去，人生谁说得准？1950 年，第 7 支队到大理迎接解放大军，可没想到，在一阵锣鼓喧天之后，整风开始了。第 7 支队被谢富治等人诬陷为“土匪武装”，许多人都受牵连，蒙受了长达几十年的不白之

冤。

老威：你也是冤主之一？

张进谦：说来话长了。因为没过多久，老家就闹土改，我家成了恶霸地主家庭。风声传来，我想赖在革命队伍里也不行了。

2 未婚妻自尽

插记

现在是2006年9月12日午后3点锺，老人突然打住滔滔不绝而又混沌不堪的话头，要用午餐了。我们被盛情邀请，尾随他进厨房，两老两少围住矮桌，谦让一番，就狼吞虎咽起来。两份热菜都是肥猪肉，一份凉菜是素的，老人却嚼得油腥子乱溅，还将菜碗敲得当当响，连冲我们说：整，整，莫客气。我的朋友属都市白领胃口，从来不沾肥肉，可稍微

反应迟钝，一大夹肥肉就颤巍巍地降落至碗中，搞得他变脸变色，如丧考妣。他这这这了好一阵，企图将负担转嫁给我，可我的碗里早已硕果累累，只能坚决推辞。老人生气了：嫌我老倌弄的菜不好吃？我陪笑道：那里那里，香得很哦。就连肉带饭，扒了一大口，也嚼得油腥子乱溅。我的朋友无奈，只得学我的江湖嘴脸，埋头就扒，眉眼挤在了一处，可吞咽时，浑身哆嗦，打摆子一般。老人哈哈笑：这是我自己喂的猪！在劳改队时，我连生猪肉都敢吃！我捏着筷子抱拳道：老英雄，佩服佩服。

是的，我不能不佩服，按现在流行的健康吃法，这扎扎油响的东西哪能进嘴（我的朋友终于吃吐了）？可老人却 3 碗饭 1 碗肉，从容下肚，几乎不碰素菜。妈的，我也劳改过，晓得肉的金贵，可为啥就整不了这么多？况且前辈他比我大 30 好几呐。

用罢大肉餐，我的朋友扭头就出门，声称去考察“长江第一湾”，我却明白他已整出毛病，急需找药店解决问题。我与老人回到屋檐下，欲继续交谈，老人却道：慢着，我还要敲 8 个核桃吃。我猛吃一惊，下意识地捂住撑得鼓鼓的肚皮。

老人慢悠悠地解释：核桃补脑，多吃，不得老年痴呆症。现在，我浑身上下，老皮子一张，不值钱了，只剩这脑壳头的记忆，还值一点点钱。来来，你也吃点，虽然年轻，预防痴呆嘛。

的确，这院子里摊着满满 8 簸箕核桃，够老两口吃一年的。

正文

张进谦：由于谢富治随便一句“边纵是土匪党、地主党”，我们就叫整编掉，稍后，许多人被劳改，还有不少人死在劳改队。你要记住 1950 年 3 月 18 号，第 7 支队的司令员和政委去昆明迎接解放大军归来，拉回两车整风学习材料，进门劈头就说：同志们，我们过去白苦了。到晚上召集会议，才把边纵被打成土匪的过程简单说了，大家都哭成一片。我是出了名的张大炮，当场就放炮弹：我们是土匪，那周恩来就是土匪头子，是他在负责华南局的时候，派庄前（音译）、朱家壁等人到滇桂黔来组织的边纵嘛。如今发展成 8 个支队，十几万人，周恩来就是大土匪头子啰。

司令员制止了我的“出格话”，接着就布置司令部的移交，连灯泡也不能少一个。支队领导统统交兵权、下地方。黄平（司令）去保山当专员，区根（副司令）到丽江当专员，杨永兴（政委）在大理当专员。本来我该“识时务者为俊杰”，乘机在滇西 48 个县内选一个去处，可一来我留恋这身军装，二来边纵并入 14 军后，急需通讯人才。

老威：急需到什么程度呢？

张进谦：解放前，云南境内有不少传教士，他们都是帝国主义派来兜售精神鸦片的特务，随身带着与国外联系的电台。一解放，各地传教士一个不剩地被撵回去，电台没收。这样，以前军师一级才有的电台，如今每个团都分得了。报务员不够，培养又来不及，不小心我也成了老师，栽培了不少土报务员，在稍后的剿匪中发挥了厉害的作用。

老威：你也算对党国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老同志。

张进谦：当然啰，我不管国共两党谁坐江山，从抗日的大局出发，我已上书中央军委胡锦涛主席，强烈要求本人的军龄应从 1943 年算起。

老威：有结果吗？

张进谦：没结果。

老威：边纵之后，你的具体单位是？

张进谦：1950 年 3 月 22 号，大军进大理县城，边纵的电台移交 14 军，就成了 14 军的电台。我被留下来，受通讯科长何凯的领导，稍后进了通讯营电讯队。1951 年 1 月 13 号调入驻丽江的 42 师，耽搁两天，就去了维西电台。

老威：此时你还没受到家庭背景的影响？

张进谦：何凯是个老红军，人很和善，他曾对我说：小鬼，还是抽空回家看看，找个老婆嘛。我回答：按家乡风俗，我 18 岁就该结婚了，可毛主席教导，万里长征才走完第一步。我要继续干革命呢。

老威：你真这么想？

张进谦：土地改革眼看就要全面铺开，我哪敢回去！只能打定主意，死赖在部队，才有一线生机。我甚至要求进藏，条件越艰苦，离家乡越远，越安全。就这样战战兢兢地混了 1 年多，拢维西时才松了一口气。

老威：维西在现在的迪庆州吧。

张进谦：从丽江出去 200 多公里，虽然也没跑多远，但总算不在家门口打转了。况且我的对象也在维西，当时她混入了革命队伍，任保和镇的妇女主任。

老威：那她的家庭出身一定很好。

张进谦：大地主。

老威：不可能吧？

见证过往日惨痛的老墙被数度涂抹上新标语

张进谦：云南的土改要晚些，1951 年前后在大理试点，1952 年才扩大到全省。

老威：所以维西地区还没划阶级？

张进谦：对。暂时还没动静。

老威：你就趁机搞物件了。

张进谦：那是我 3 岁的时候，父亲给订的娃娃亲，是我舅舅家的姑娘。

老威：算近亲联姻？

张进谦：旧社会讲究门当户对，我父亲是乡长，在石鼓找不着合适的亲家嘛。本来 18 岁就该成亲，可撞上抗战从军，就耽搁下来；退伍回乡后呢，母亲又去世，按旧制守孝 3 年，

还没缓过劲，就解放了。

老威：你和女方经常见面吗？

张进谦：一个在石鼓，一个在维西，见不着面。不过双方家长一直有走动，过年和中秋节，父亲要送礼，舅舅要还礼。

老威：所谓“礼尚往来”了。

张进谦：自 3 岁始，我家每次都赶 4 只牲口，还打一些银首饰带去。那时不通公路，都是翻山越岭，即使顺利，也要走好几天。

老威：不得了哦。

张进谦：到解放为止，双方往还的礼银得用箩筐抬。特别是兵荒马乱的年月，石鼓至维西，途中要经过两三处土匪窝子，都是人多势大，杀人不眨眼，官府拿着没奈何，比《水浒》里的强盗更厉害。古代都是大刀片片，跳出来呐喊几声，你还可以扭头就逃，跑不脱再拿钱保命；而现代全部操着炮火，几百米外，蒙头懵脑就射来，要想过路，临头才掏买路钱就晚了。

老威：咋办？

张进谦：派人通关，或者双方出动人马保哨嘛。我父亲是乡长，舅舅在当地也不是等闲之辈，都提前好多天，找黑白通吃的那种人，去一处一处，与土匪接洽打点，长此以往，这又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我至今记得，舅舅带着一二十匹快马，在我家一住两三天，院子小了，父亲就安排内外都摆上酒席，几十号人大吃大喝、大吹大擂，场面极壮观。

老威：真能折腾。

张进谦：1950年以后，就折腾不动了，两边都成了地主。刚刚改朝换代，还没咋样，我和我的二兄弟在革命队伍里，二弟还是战斗英雄……

老威：你们家算革命军属。

张进谦：可我总做恶梦，逃跑、毙人、被斩尽杀绝之类，吓醒后，满脑壳汗水，腿肚子直抽筋。大理的土改试点我也经历过了，那可是家破人亡啊。所以一拢维西，见我的未婚妻居然还当着保和镇的妇女主任，就莫名其妙地烦躁不安。我进门管不顾地将她扯到墙角，板起脸说：你马上去把这个官给我辞掉！请长假，回一趟石鼓。现在我的父母都不在了，你去见……

老威：你父亲已经被杀了？

张进谦：是，我隔一会儿再讲。我要我未婚妻去拜过家里剩下的唯一长辈，祖父的妾，也就是二祖母。照旧制，得到她的最后首肯，我们就可以在维西成婚，惶惶不可终日之际，繁琐的礼数也没必要讲究了。但我未婚妻不仅不理解，还以为我疯了。她说虽然自己是个乡巴佬官，也是大家选出来的，要负责任，不能说不干就不干。她还说你们革命队伍里，也有组织纪律，也不能这么随便吧？况且结婚是终身大事，哪能草率……

我截断她的话，气得直哆嗦：眼看就要土改了，你可莫后悔！她说：啥子后悔？难道你要悔婚？我说：不是我要悔婚，而是共产党让你我结不成婚！她的眼睛一下子瞪圆：这么严重？我都快哭了：在大理乡下，我们就住地主家！财产全部没收，还游街示众，开斗争会，农民一拥而上，把地主

打得满地爬，脑壳肿得比西瓜大。她说：行得端，走得正，没作孽，凭啥子遭罪呢？我说：就凭你家是地主，是剥削阶级。她问啥子叫剥削阶级？哎呀，跟一个妇道人家没法讲！我的牛劲上来，就吼了句：你到底去不去石鼓？！把舅舅他们都惊动了，跑出屋来劝：快成两口子了，啥子不可以好好商量？好好商量？眼看火烧眉毛了，咋个商量！没有 100 张嘴啊，有 100 张嘴也扯不清啊。我不禁万念俱灰：罢了罢了，我今天就与你解除婚约，以后再也不要来找我！你人长得漂亮，就赶快寻个穷点的心眼好点的过，图个平安吧。她叫了声：你把我当成啥子人了？！就大哭起来。我捶胸跺脚：嚎啥子嘛，你我地主配地主，到头来死无葬身之地哟！舅舅一听这个话，轰的炸了：莫以为你是部队上的人，就可以昧良心！转身就提了根棍子。我未婚妻急忙栏住，将我推出门去。

哎呀，那个时候，风也大雨也大，我像喝醉了，偏偏倒倒在保和镇走了几个来回，才摸回单位驻地。可没有料到，身边的同事里竟然有特务，随时将我的形迹向组织告密。过了几个月，组织上找谈话，指责我没站稳阶级立场，我还蒙在鼓里。可接着，我的问题被反映到丽江 42 师师部，矛盾一下子就转化了。

老威：隔离审查？

张进谦：先通知我“上调学习”，然后荷枪实弹，将我一家伙送拢大理，关进“随校”当学员。

老威：啥子叫随校？

张进谦：即随军学校。编制是 5 个大队，辖 25 个中队，每个中队两三百人。我编在 5 大队 2 中队，打眼一看，里头

啥子人都有：国民党旧军官，起义的，被俘的，还要追查历史问题的；共产党这边，各种问题没交代清楚的；类似我这种，自己成分就不好，还划不清阶级路线的；犯生活作风、组织纪律问题的；贪污的、乱搞的。密密麻麻，1000 多号人。

土改时被劳苦大众瓜分掉的张家老屋

老威：你老人家落入社会跳蚤堆里，反而不孤独了。

张进谦：哪有功夫孤独哟，一天到晚劳动改造，累得跟龟孙子似的，脑壳碰着枕头就打鼾。

老威：不写交待材料？

张进谦：连政治学习都是做样子。我们在漾濞县山里伐木头、放木头，累得吐血也要干。大家还盼着能开会学习、写交代呢。如此折腾到 1951 年的 12 月，一天，中队长找我谈话：张进谦，你在随校的表现很好，劳动改造之余，还办

墙报，算个合格的青年团员。可是，你的家庭成分太高了，部队也不便留你。我说：我对部队有感情，难道将功赎罪都不行吗？他说：还是考虑回家吧。我说不。第二天，我就跑去找14军的参谋长，原边纵副司令员朱家壁，他说：你还不算“分子”嘛。就打了个电话，并叫他的警卫员带我去干部管理处。这样，我又继续留在随校改造，直至1952年6月8号，保卫科换人，一个姓王的干部唤我去，当场宣布组织决定：资遣回家，不保留军籍。也就相当于开除。

老威：没人替你说情了。

张进谦：我又去找了一趟朱家壁，他都落泪了，我还开玩笑：迟早会有这一天，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但是我向参谋长保证：想不通也得想通，想不通也不当反革命！

老威：这一来，你的军旅生涯就永远结束了。

张进谦：绷得紧紧的神经猛地松弛，我办了手续，脱了军装，出入随校大门也不用请假了。我在大理街头晃荡了半天，大口大口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仰起脸看跑得飞快的云，突然觉得人生太悲哀了。我在大理这么久，一天到晚都琢磨着立功赎罪，改造改造，经常匆忙得脸都忘了洗，还从来没有抬起头，好好看看天，看看云和太阳。

老威：这个时刻，你想不想你的未婚妻？

张进谦：此刻她已家破人亡——这是我后来才晓得的。包括舅舅在内的长辈，几乎被杀光了；她这一辈，目前还剩一个九十几岁的老婆婆，叫李茹秀，也劳改过，释放后就一直住在维西攀天角乡，已又聋又瞎，不过算想得开的。她有两个儿子，李龙李虎，你有兴趣吗？我可以介绍你去找。

老威：你的未婚妻还活着吗？

张进谦：自杀了。

老威：哦？！

张进谦：1955 年端午节死的。

老威：服毒还是上吊？

张进谦：不清楚，可能是跳水吧。

老威：怎么可能不清楚？你们一直没联系吗？

张进谦：我一回家就沈入土改的漩涡，搞得晕头转向，哪儿顾得上哟。

老威：没捎过信？

张进谦：我拢石鼓不久，她家兄弟就来了一次。从 1953 到 1955，连续 3 年，她家兄弟都来，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催我将她接过门，可是，可是，我没条件哦。

老威：大家条件都不好，将就着过嘛。

张进谦：又是地主，父亲又被杀；房子叫没收，几兄弟挤一块，又没个住处；我家又是阶级斗争的活靶子，随时挨斗——如果新添一个人，日子更没法过。1955 年，我 30 岁，她也 29 岁了，难道不想睡一个床？一个老姑娘，一年年与兄弟同屋檐同灶台，也惹人耻笑。记得我还去了一趟维西，脖子伸长了几回，最终还是缩回来，躲着不敢见她。唉，那次她兄弟没来，托人捎的信，说在端午节自杀的。搞得我锥心的痛。他妈的，共产党啊共产党，欠了我家好几条人命。

3 土改刑场

插记

不知不觉天已擦黑，老人家意犹未尽，就提议挑灯夜话。我的朋友乜了一眼黑古隆冬的里屋 不待我开腔，即拼力推辞。我晓得他的心理，一是怕污垢及微小动物上身，二是怕老屋旮旯里的鬼上身。我这两年在穷山沟钻惯了，皮糙肉厚，倒不在乎，可实在太累，想睡个好觉。另外，我的录音磁带也不够，老人的能说会道、东拉西扯、以及海阔天空的想象均出乎我的意料。

于是在亮灯之际，我坚决地站起来。老人急刹车一般打住话头，竟孩童似地扯住我的袖口。一股酸楚涌入心头，想说什么，却感到语言的无奈、虚伪和虚妄。硬着心肠迈出院门，冷雨淅淅沥沥下开了。陋巷深深，三二路灯如鬼火，老人抢在前面引路，有一次差点滑倒，可还强撑着，扶墙冲我们笑道：踩着了一泡牛屎，要发财、要发财哦。

我迎合道：我刚刚踩着了猪屎，不晓得发不发财？老人道：也发财，不过没踩牛屎发得大。于是一老一少乐坏了。

我的朋友不满道：还不快点，当心找不着回丽江的车。

出巷口来到一团漆黑的正街，老人挺立路中阻拦往来车辆，嗓门奇大，甚至盖过了喇叭。我对朋友感叹：如果你我有幸活到80岁，还剩如此干劲，就算老天爷的特别恩赐了。在寒风冷雨里瑟瑟发抖的朋友却不搭话茬，只是嘀咕：一雨成冬啊，一雨成冬啊。

终于截下一辆回丽江的破面包车，80块钱成交。我隔着车窗和老人拉手，如情侣似的，老人居然跟着车跑了一段路。我想起我父亲，除了临终，他受的苦远没他多，可寿命却没他长。两个老人之间有何联系呢？为什么在这瞬间，两幅面影重迭在一块？

黯夜行车，并且是环形山道，本来极危险。偏偏司机是个急性子，把方向盘打得风掣斗转，我们犹如在地狱里颠簸。上至山顶看脚底，万丈深渊中，偶尔有车灯闪烁，似飘荡在另一个世界的萤火虫。我想，从对面山上望过来，也是这么渺小么？那我们就算萤火虫肚子里的一点点东西？

赶回灯红酒绿的丽江已是深夜10点半，可古城中心的四方街仍然闹热，四周的店铺和酒吧都开着。特别是所谓酒吧一条街，游客跟下饺子一样，隔着丈把宽的水沟对歌。有导游站在高处比划指挥：呀嗦呀嗦呀呀嗦！不晓得这是藏语还是纳西话，总之到过丽江的人都会。我记起拉丁美洲梦游村的故事，那地方白日万籁俱寂，一拢黄昏，人与动物都伸着懒腰苏醒。开始洗漱、用早餐，然后打扮、串门、赶集。午夜，人类的活动达到沸点，狂饮滥嫖、打架斗殴。接着，呈曲线下降，至黎明时分，人与动物再次伸懒腰，歪歪倒倒回

家睡觉。

土改前的我家

我虽然极困，还是以预防感冒为由，在 38 号地下音乐沙龙灌了不少青稞酒。这东西 56 度，柔软而透明，却性如烈火。我被放翻了，据旁观者证实，我吹了箫，还扯破喉咙狂吼数十声，吓坏众酒客，并引得纳西邻居报警。

我却失忆至次日天亮，饮水数碗，还将脑袋浸入水桶。青面獠牙地再次踏上寻访征途，朋友不放心，跟了来。在车上我又合眼打盹，抵山顶，冷风一激，精神忽的恢复了。

朋友埋怨：一把年纪了，还跟荡妇似的，老威，我看你哪天会死得很难看。

我哈哈一笑：我的终极理想，就是路倒路埋，死得难看，你也看不着。

朋友说：上帝看得着，阿门。

我又哈哈一笑：那土改中冤死了几百万人，他看得着吗？他感到悲伤吗？他试图改变这个血光冲天、人妖颠倒的世道吗？

朋友说：有结果的，肯定会有结果的。

是的，结果就是石鼓——这个发生过若干惨痛往事的中国普通小镇又拢了。我们付费下车，穿陋巷跨入张进谦老人的院落。据说他天不见亮就起身，吃了牛奶鸡蛋，就衣冠整齐地坐在屋檐底下打腹稿。

我又等得不耐烦了，他说，把街子里外兜了两三圈。

我说：现在才 9 点嘛，我们有大把的时间。

正文

张进谦：已经说到哪儿了？

老威：你被资遣回家。

张进谦：1952 年的 6 月，我丧家狗一样回到石鼓，却正撞上土改。当时父母过去了，二弟在部队服役，家里就三弟兄。我是老大，第一件事就是找了根结实的扁担，吭哧吭哧往苞谷地里担粪，200 多斤 1 挑，从早搞到黑。第三天扁担就断了，我又将两根扁担捆成一根，继续蛮干。开玩笑，经过战火考验的小伙子，回到地方干农活，一个起码顶三个。就这样，苞谷疯长，拢秋天就是大丰收，几亩地，产量 3000 多斤。那些棒子哦，黄橙橙的，一根苞谷杆生两三个，大的小胳膊一样粗一样长……

老威：你家是地主，田地还没收吗？

张进谦：嘿，大家就眼鼓鼓地盯着，候着你丰收呢。辛辛苦苦从地里收回来的苞谷，3000 多斤，还没来得及挂梁上，就叫农民协会拿去了。我们拦不住，也不敢拦，磕头求饶，才返还 400 斤过冬的口粮。接下来，我家的牲口被没收，到了 1953 年，在石鼓街上的 4 处房子也被查封没收，二亩五的好水田叫贫雇农换走，把离家至少 2 公里的一亩六江心田给我们，一年中，只能种枯水一季，水一涨一淹，就啥子都搞不成了。

老威：你家田地并不多，怎么划地主的？

张进谦：一直到快解放，我家还在佃田种，这叫乱搞嘛，按土地标准，应该是佃农嘛。

老威：可按你昨天的说法，你家还算大户，你父亲是乡长，属于地主阶级当权派。

张进谦：我父亲原来是共产党，蒋介石叛变革命，他身份暴露，没得法了，才去丽江县衙自首保命。国民党都既往不咎，让父亲取保，继续做他的乡官，可共产党来了，六亲不认，管得你根子上是红是白，逮住就枪毙。那是 1949 年，区委派武装工作队下来清匪，打头的还是石鼓籍的区委书记。石鼓，以及附近几个乡的旧政府官员、有影响的大户，几乎全镇压掉，财产也被查抄。所以在土改中，我家被查抄过多次，到土改复查，就干脆全盘没收。1980 年代我平反后，曾去公安局和法院查当时的档案，啥子都没有，我父亲的名字都没有！杀头猪还有人证明呢，怎么杀个人连痕迹也不留？一定是仇家搞的鬼。

老威：据我所知，每过几年，政府方面认为不重要的档案都要被销毁一批，否则，档案室装不下。你想想，土改至今 56 年，以后又经历了多少次运动？无辜死掉的人要堆好几匹大山了！如果每个死者的档案都要保存的话，政府的日常工作就要受影响。

张进谦：你倒是会打官腔。

老威：见笑见笑。

张进谦：当时丽江的专员兼县长，叫和安宝（音译），出了名的杀人大王。他原来是国民党三青团，读联大的时候，摇身一变成了共产党。他有个同学叫梁邦彦，晓得他的底细，他就设局，派两个武装民兵去把姓梁的抓来，比了一个砍头的动作，就拉出去毙了。1980 年代姓梁的平反，一晃 20 多年了，他的儿子还在上告。

这个和安宝，亲自压阵镇压我父亲，跟阎王爷下凡差不多。

老威：当时你在场？

张进谦：正巧在家。那阵石鼓乱得很，山里头有土匪，不晓得外面的形势，动不动就要和共产党对倒干。稍微有钱有势的大户，或暗通土匪，或关门闭户，筑起土围子持枪自保。所以工作队下来多次，群众都发动不起来，工作无法开展。由于早年的地下党经历，我父亲觉得与党有血缘，就接受了区委书记的“统战”，为新生政权作个榜样，去游说别人交枪。石鼓有个陆暄，与我家是亲戚，按辈份，我父亲是他侄儿，我们喊他“亲佬”。陆暄在地方上很有势力，长工短工不少，土围子也坚实，一般的土匪惹他不起。父亲就上门做

工作，讲外面的大势，江山已经姓共等等。陆暄听说我父亲已从国民党的乡长变为共产党的区委委员，就动心了，开门交出长短枪十几条，接受了“统战”。

不料风云变幻，没过几天，陆暄和我父亲，叔侄两个竟同赴刑场！

老威：开了公审大会？

张进谦：会倒没开，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叔侄两个都插了亡命标，游遍了石鼓街子。现在七八十岁的人肯定记得我父亲张荣森，好人啊。死到临头，人就软柿子一般，一碰即瘫在地下。倒是那陆暄是个硬汉，冲着我父亲大声喊：我说不交枪，你偏要动员我交！现在他们就用我们的枪杀我们！

老威：你父亲如何作答？

张进谦：人都昏了，完全失去知觉。是几个民兵架起，拖到刑场的，炮火响了好久，还不准大家靠近。等天黑我们去收尸，父亲腿杆朝天栽土坡下，绳子还没松，背心的窟窿比斗碗大。

哦，这儿还有个插曲：那陆暄有个儿子是共产党，一直都在部队里，后来还参加了抗美援朝，任志愿军某部的宣教科长。他这个儿子文化高，经历过东北解放区的土改，晓得共产党的东西有多烫。有一年，专门偷跑回来，劝他父亲将土地、房产处理掉，该送的送，该贱卖的贱卖，本钱能收则收，不能收则拉倒，租子更莫提了。总之，要从富人变穷人，越快越好。陆暄听不进去，反问道：送了，贱卖了，不收租子了，我家靠啥子讨生活？他儿子说：不是隔三差五要赶街吗？家里人就乘街子热闹，去卖点小零碎嘛，熬个一年半载

就见分晓。陆暄气得七窍生烟，抓起桌上的茶杯就砸：见你狗屁的分晓！我一没偷二没抢，辛苦了大半辈子，人累得跟鬼样，才积攒起这点家产，你却让我当败家子！他儿子说：当败家子换个好人缘嘛，共产党依靠的就是败家子，你现在看不起的遭孽人，将来吃香的喝辣的，还看不起你呢。陆暄连叫滚蛋，还喊冤道：这份家业又带不进棺材，以后还不都属于你们，我挣断脊梁骨为了哪个哟！可他儿子却说：我不要你一分一厘！我违反纪律跑回来，也算尽了孝心。你不听，可没得后悔药吃！陆暄喊破了天：绝不失悔！他儿子抬脚就出门：从此我与这个家一刀两断，无论以后发生啥子，天塌地陷，再不回首。

老威：这个儿子还算天良未泯，如果此次回乡的实情被组织揭穿了，他的下场或许跟你差不多。

张进谦：他果然说到做到，几十年没回石鼓。现在人都老了，不晓得他心里咋个想。我呢，没他这么孤绝，父亲死的那年底，跑去丽江投奔急需无线电人才的边纵，晃了两年，没料想又叫踢回来。

老威：狗崽子的烙印一旦打上，就拿不掉了。

张进谦：对头，夹起尾巴过日子。1952 年最冷的一天，乡上派我们吆起牲口，去丽江县政府驮救济物资，都是从大城市的官僚、资本家手里拿过来的好东西，丝棉被、海府绒大衣、英国的毛毯、女人的三角裤、大皮鞋、高跟鞋、马靴等等，弄回来天黑尽了，就暂时堆在我们家。如果不是当过远征军，莫提普通乡巴佬，就连我也不认得这么多细软货。那晚上，我家 3 弟兄垫起毛毯，裹起大衣，滚在十几床丝棉

被里头，半夜叫热醒两三盘。我抹着汗水说：管他妈的，就算当一晚上真正的地主。

我曾住在二楼，我父母住下面。现在早就不住人了，轮到老鼠在里面传宗接代了

老威：老人家还贪图享受嘛。

张进谦：猪狗都贪图享受，何况人哦。第二天，土改工作组组长王伯光来到我家，叫人把东西全搬走，才蹲下来问：你咋个成了地主？这个王伯光，算我在边纵的战友，曾当过第7支队31团团长，经常来司令部电台，与我混得很熟。

老威：你这个熟人会帮你的忙吧？

张进谦：人家是丽江派下来复查的，因为石鼓的地富实在划得太多。一条鸡肠子街，有20几家地主，富农就更多，而且都是过了几辈人的土著。可大批外地务工人员，初来乍到，撞上解放，竟清一色划贫雇农，整起本地人不要命。我向王伯光详细反映了情况，认为外来人根基浅，应该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在本地人中再搞一次货真价实的土改。王伯光沈吟半晌才说：如今既成事实，很难推翻。我说：共产党要讲实事求是。她反问：你认为的实事求是，就要全盘否定石鼓的土改？我叹气说：啥子复查，还不是和稀泥巴！算了吧，你以后莫来找我了。

老威：老人家性子太直，要吃亏哟。

张进谦：是嘛，我被树成了典型。你记住1953年2月28号！天黑了，王伯光突然推开门，进来就宣布：张进谦，你巧言善辩，阻挠土改复查，民愤太大，政府决定要判你的刑。我早就有预感，就顶撞说：啥子民愤太大？我父亲和我，为地方做了多少善事？连石鼓小学堂里的桌子板凳，都是我们家捐的。你具体指出来，哪个人对我有民愤？她避而不答，又说：你莫那么激动，政府也没把你一棒子打死。明天我吩咐下去，绳子捆松点，判完了刑，示个众，你就可以回家了。

不要紧张，不会劳改的。

老威：事前透风，没搞突然袭击，你这个战友还算有点人情味。

张进谦：狗屁！我当场就骂，共产党狗屁，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嘛。改朝换代，要冤枉死人，不奇怪嘛，我父亲已经冤枉死掉，我就马上成为你们案板上的肉，乱刀宰了，也不奇怪。

老威：你真这么说了？

张进谦：不得人心哦，我当然要骂狗屁、狗屁、狗屁。王伯光说：今天到此为止，明天收敛一点，张进谦，莫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老威：那个时代，从人家的角度，算对你仁至义尽了。

张进谦：1953 年 3 月 1 日大早，一伙民兵涌进屋，将我被五花大绑，押往会场，一直批斗到下午 2 点多锺。好几千人的群众大会，附近几个乡都参加了。

老威：阶级敌人不止你一个吧？

张进谦：亮相的还有三四个，与我一样五花大绑，可没有判刑。我最重，也就 1 年劳改，假释劳动。罪名是行为乖张，破坏土改复查，这是台上的工作组与贫雇农主席团合议的结果。另外啥都没听清，因为绳子捆得相当紧，民兵还拿枪托子砸腿杆，除了痛，就顾不到其它了。

老威：你还是挺过来了。

张进谦：差点就死逑！因为会才结束，就有大兴（音译）乡的贫雇农来借我。

老威：借你？

张进谦：大家传我能言善辩，狗日的就要借我去“说理斗争”。那年头，有啥子理可说？况且我在石鼓，他们在大兴，互相不搭界。我的腿肚子直打哆嗦，我算一条好汉了，为啥还哆嗦？因为一旦被“借走”，肯定回不来。

老威：为啥子？

张进谦：在土改中，地主经常叫群众活活打死，还不如一只苍蝇。如果在本地碍于情面，不便下狠手，就借你到外地。“说理斗争”一开场，大伙全部上，棍子、石头、铁棒，几分钟就报销一个人，还编排一个“畏罪自杀”的名目。有时候，连编排都嫌费脑筋，上面过问了，就由贫雇农搭伙作个“手脚太重点、分寸不够点”的口头检讨，搪塞过关。

老威：你的熟人里有没有被借去打死的？

张进谦：有哎！有哎！我的亲家何苇，本来拉石坝（音译）的人，就是被借到鲁瓦村去活活敲死的，还把他挂在树上，说吊了脖子。

老威：你的亲家？

张进谦：我的干儿子的爹，浑身上下都砍的口子，脑壳叫石头砸烂大半个，还说他自杀。所以我运气好，大兴乡要借我，被看管我的一个雇农拦住，还拔出刀子说：不借！又咋样？要杀就在这儿杀。

老威：这个雇农为啥帮地主？

张进谦：他的后妈嫁了一个穷人，生下他，在旧社会经常受欺负。有一回，他的脑壳被当地一个富家子弟砸开瓢，我替他出头，打上门去，讨回了汤药和营养费。这叫种瓜得瓜，外人当然不晓得其中的缘故。

老威：你相当于逃命回家。

张进谦：接着就是假释劳动，有专人管理。早晚要报告，去任何地方要报告，斧头、砍刀、铡刀、菜刀交组长保管，天天借，当面用完当面还。总之，笼子里的老虎，被拔了牙，还被当作老虎。假释期过了，监督改造的待遇却一直持续到1957年，反右开始，我又成了活靶子。

4 一个耳光判8年

插记

眼下正好中午12点，老人疲倦了，嘴巴在动，眼睛却眯缝起来。我提议歇一会儿，老人就将帽檐拉下来打盹。我起立伸个懒腰，见张夫人自厨房露头，就跟过去，欲乘机聊几句。不料这个没见过世面的老太太竟躬着背，躲到灶台后面。我只得撤退。

百无聊赖，就背手望天，乌云很厚，三二只乌鸦落在院

墙头，偏头梳理着羽毛。看样子，老两口平时也没啥天伦之乐，怎么过呢？正如此想，老人就醒了，并转头招呼我跟他上楼。

2 楼有 3 个大房间，中间堆杂物，左间紧锁，我从窗缝瞅见，里头停放着两口特大棺材。而右间最大最气派，是老人的书房，却没见几本书。可书法作品不少，且有相当功力。老人说他每天鸡叫就起床，掌灯练字，至少将《四书》《五经》抄上好几页。有时写着写着，时光就倒流了，仿佛回到儿时，老外公立在身后，叭哒着烟杆，指点这儿指点那儿。可一转头，脖子凉飕飕的，老外公却不见了。唉，我方才如梦醒悟，自己都 80 岁了，几十年前的人和事肯定不在。我连忙安慰道：记忆中的东西在与不在，全是某种感觉，说不定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还要可靠些。老人连说对对，看来我遇到知音了，等采访完了我送你一幅字。

下楼时又碰到张夫人，这个乡村婆婆的脸突然红了。她给客人上完茶水，就埋着眼睛退下去，而她丈夫却嘿嘿笑着：不管她，我们继续吧。

正文

张进谦：1957 年 7 月初，反右运动开始，我又被揪出来……

老威：农村也反右？

张进谦：石鼓街上抓了两个地主，我和我老表。我老表是个胆小鬼，做过枪支和大烟生意。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兵荒马乱的时候，这石鼓乡，好多人都贩过枪支和大烟。人家

都不认帐，可我老表经不住诈，政府再一交代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他就把抗战时期的陈谷子烂糠全抖落出来。嘿嘿，这一下，公安局正好逮捕，弄去劳改。我还是历史问题，辩不过，才指出“破坏生产”的现实问题，比如54年放水淹秧田。我反驳：当时雨水太大，大家的秧田都遭淹了，肯定是要把田里的水放掉，秧苗才得活。又比如56年倒卖粮食。我反驳：我家连年填不饱肚皮，去年碰上长江没涨水，江心田才大丰收。国家的粮我没少交，剩下的赶街卖点，换两斤盐巴，也叫“倒卖”？

泥巴腿杆打不赢嘴仗，就将我绑到小学门口跪起，曝晒几个钟头，才请来一伙小学教师。尽管口干舌燥，我依然先发制人：各位老师，看热闹还是讲道理？教书匠们回答：自然讲道理。我说：你们是外来人，了解过土生土长的石鼓张进谦的历史吗？你们能讲出啥子道理？马列主义？还是唯物辩证法？满场全哑了，我又说：既然啥子都没搞清楚，各位老师就评评理，他们凭啥子斗争我？凭啥子把我弄到大太阳底下跪起？几个民兵气狠了，转头就把我吊了三天三夜，打得我直着喉咙喊：想下手，就一买卖敲死算逑，莫零敲碎打！

就这样断断续续整拢9月13号，我被逮捕了。

老威：啥子罪名？

张进谦：莫须有。当时我完全绝望，都在盘算着偷越国境了。不料13号早晨，我正挑水，乡党支部书记就带人来捆。我质问犯了哪一条？书记笑嘻嘻地说：没人说你犯了哪一条，这是运动，懂不懂？过场总要走。我说：公安局没来，你们这样是非法。他说：是啊，讲理讲不赢你！如果抓错了，今

晚就释放好不好？

我在乡政府关了 28 天，中间区委书记来了一次，在过道里吼：咋搞的，小刘？张进谦关了十七八天，连材料都没报上来？

老威：小刘是谁？

张进谦：乡书记嘛。当时形势摆起的，我是地主，还嘴巴劲大，群众要求杀杀我的威风。

老威：也得有个名目哦。

张进谦：破坏生产，态度恶劣，从严惩处，判刑 8 年。

老威：这么简单？

张进谦：原来准备劳教一下，扣个屎盆子，臭到底就完事。可是在法堂上，我扇了法官一耳光，劳教就立刻升为劳改 8 年了。

老威：一个耳光判 8 年刑？

张进谦：打拐了，打拐了。没任何依据，法官劈头大骂我“历史反革命”，我一时忍不住，巴掌就刮过去了，还反骂他“大汉奸汪精卫的孝子贤孙”。他捂着脸说：张进谦，你太嚣张！加入了国民党，还不承认是历史反革命？我说：我参加的是抗日的国民党，又不是打内战的国民党，何罪之有？

老威：既是法庭，法官与被告应该隔开，至少有一定距离，你咋个能打到他？

张进谦：哪有法庭？就在石鼓街子最宽的地方，找了家铺面，里头安一张条桌。法官是丽江县法院派来的，叫和玉光（音译），坐在那边，耀武扬威的模样；我是犯人，站在这边，伸手都能摸着他的鼻子。

老威：检察官和书记员呢？

张进谦：当时不兴这些。就一个人，连记录，带起诉，带判刑，包干。群众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起，看稀奇，街面都扎断了。

老威；够搞笑的。

张进谦：法官后来讲，本想吓唬吓唬就收场，是我逼着他判的。从盘古王开天地到而今，没得犯人敢打审判官！所以他当场刷刷刷，几分钟就手写了一张《判决书》。

这一去，差点就没回得了家乡

老威：厉害厉害。

张进谦：厉害个逑！他这个水平，我当几个法官都绰绰有余。当天晚上，我就在膝盖上摊开纸，写《上诉书》，在丽江县看守所，我又在膝盖上，写了 46 页纸的《申诉书》。昏官哟昏官，不得好死！果不其然，第二年他也栽进监狱！后来死在监狱里，不晓得犯了啥子错误？嘿嘿，整过我的人如

今没剩一个，都冲到老子前头见阎王去了。

老威：有这股豪气在，老人家能活 100 岁。

张进谦：还差两个月，我就结婚了，这一来，只好锁住门，将准备结婚的 485 元银子揣起，劳改去。

老威：你的未婚妻不是自杀了吗？

张进谦：我又说了一门亲事，眨眼又告吹了。现在的这个老伴，是 1973 年刑满留场时，才接过门的。

老威：当时你都 47 岁了。

张进谦：唉，互相不嫌弃，将就过嘛。

老威：接着呢？

张进谦：在看守所呆了两天，就去了大研农场。里头还关着不少地主、土匪、伪政府人员，说起土改，都认为保住脑壳已经不容易了，所以很知足，干活很积极。11 月，我又调到永胜县的米厘铜厂——人间地狱哟！2000 来号犯人干活，120 号牲口运输，那个路，又是水又是沙，犯人一天穿烂一双草鞋。不，那草鞋早晨发，中午就磨穿了，只有光脚，光身子，脸可以不要，裤子也可以不要，上头刨矿，下面的鸡巴也甩来甩去。18 个钟头，耗子一般在矿洞里外钻，浑身湿漉漉的，腰杆都累断了。可是，吃不饱，永远吃不饱！妈那个屄，大跃进，牛皮吹得越鼓，死的人就越多。犯人主食苞谷、碎米、没去皮的荞面，油饼……

老威：还有油饼吃？

张进谦：榨花生油剩下的，一个饼有小筛子大，农民拿来喂牲口，监狱拿来喂犯人，还当作美味佳肴，不是经常吃得着。再熬一大锅汤，人都可以挽起裤腿下去捞……

老威：捞啥子？

张进谦：捞菜叶叶和油星星嘛。

老威：这么惨？外头还在大跃进哦，公共食堂里，大锅饭整得欢哦。

张进谦：1958 年的春节，大年三十，永生难忘。2000 多犯人在山坡坡上等倒过年，大厨房烟雾腾腾，几百斤苞谷煮熟了，油炸洋芋满地丢，饭团子随便你捏来吃，猪杀了，肉切了，码在砧板上，正说要下锅……上面突然来了命令：不准吃！组长监督收筷子，肉不下锅了，不准吃！全体犯人都哭啊！出的是牛马力，过年见不着亲人，还不准吃啊！狗屁共产党，狗屁人道主义！连大组长都忍不住：肉不下锅了，其它随便吃，违抗命令，杀头算我的！

老威：哪一级的命令？

张进谦：听说是中央的命令，狗屁。他们喊“大跃进”，我喊“大要命”。干活 18 个钟头，今天不完明天加班，还不给吃饱，说几句不满的话，还要挨斗。

老威：你这种性子，在劳改队肯定经常挨斗。

张进谦：天天在死人，还不叫“大要命”？在一次批斗会上，我就这样说。你们还乱打我，有本事就拿枪出来，朝脑门心一炮。哼，毙人要经过法院批，你们没这个胆子。

老威：你不怕加刑？

张进谦：我已经被加了 5 年刑。

老威：就为了把“大跃进”说成“大要命”？

张进谦：不，是中队长找我谈话，骂我“上诉就是不认罪”，我说他不懂法；他说你为什么死不认罪？我一下子气昏

了，抬手就给他一耳光……

老威：嘿嘿，第一巴掌 8 年，第二巴掌 5 年。

张进谦：打拐了，打拐了。

老威：两次都打拐了？

张进谦：第一巴掌不打，我就结婚了，也许现在儿子长得比我高；第二巴掌不打……唉，莫提了，鬼晓得会咋样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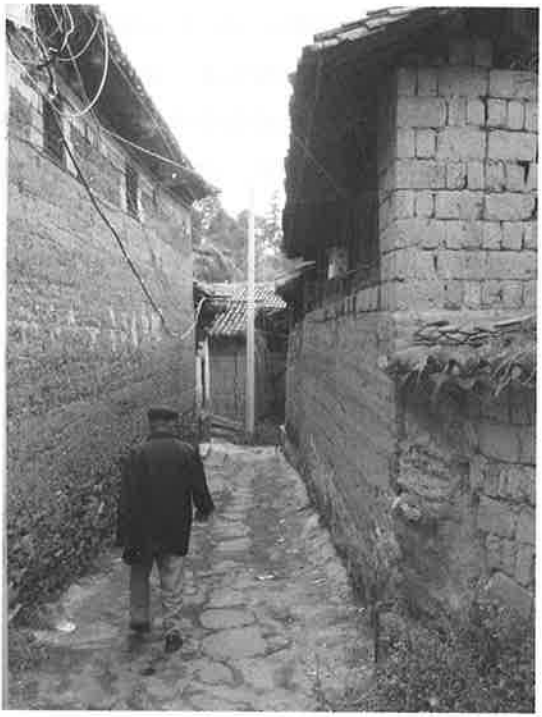
老威：请你讲讲加刑那天的情景。

张进谦：1958 年的 6 月 30 号，不，57 年的 10 月间，不，唉，岁数大了，记忆有些模糊了。晚上，永胜县法院派人来宣布，喊一个名字，加刑几年；再喊一个名字，又加刑几年，材料都懒得念了，就是某某加刑几年，某某加刑几年……我晓得自己要加刑，所以比较麻木，还在一边嘀咕：哟，今晚还闹热。可好多人都受不了，哭成一片。和我同时栽进来的那个坦白从宽的地主老表，脸都嚎歪了，他说：这辈子莫想回石鼓啰！惹得我呵呵地笑：做梦哦？这身牛肉干巴还要带回家？

老威：牛肉干巴是云南特产，挂在横梁上，叫凉风吹得干干的，很好吃。

张进谦：犯人个个都像牛肉干巴，一条一条，饿鬼样子，在风中飘来荡去。大腿上那层皮，跟裤脚差不多，手一牵就起来半尺高。人贱不如狗，狗饿还可以吃屎，还可以满坡乱刨乱啃，人咋搞？关起来，只有等死。不想等死，逃跑？一枪崩了你，死得就更不如狗了。太多的人没活出来，我算幸运了，当过兵，身体底子打得扎实。还有些现金，400 多块，用得只剩 80 多块，就从老彝族手里买腊肉，心太黑了，18 块钱才买了 9

两。没得火，没得锅，就约了一个平时合得来的，叫郭正洪，比我大 1 岁，现在住剑川县城。约他一起，躲到背人的旮旯里，将生腊肉一人割半截，嘎吱嘎吱啃。那是在梁上挂了 1 年以上的老猪肉，粘满了灰，又咸，又杀喉咙，啃一大口，猛嚼几下，油腥味就往脑门子窜，眼皮乱眨，跟孙猴子一样。你相不相信，我们不仅把腊油咽了，连石板硬的皮，也一点一点嚼烂，咽了。那皮子上的毛哦，半寸多长，也咽了。



判了刑，还从这儿押出去游街

老威：简直是野兽。

张进谦：还像野兽一样舔爪子呢。满手的油，舔了十来分钟。老郭的胃口要弱些，舔着舔着就突然呛住了，他使劲憋，憋，没憋住，就一口倒灌出来。他赶紧拿双手捂，没捂住，就抵倒下巴接。几秒钟接了一大捧，那温热温热的化猪油嘀嗒嘀嗒地漏下指缝，好可惜啊，我赶忙冲到他的手底去接，也接了大半捧。好可惜啊。我说：老郭，你还是先歇口气，再慢慢将这猪肉浆浆重新吞了。老郭喘着气说：福薄命贱哟。我说：肠胃太久没油腥润滑，就是脆的，当心哪天一干重活，就拉断了。莫着急，慢慢来。老郭不吭气，大概歇了 20 几分钟，才像猫一样，哧哧舔掌中的宝贝，还不停地皱眉毛，打臭嗝，进去一点又出来一点。还好，进去的到底比出来的多。

老威：莫讲了，到此为止。难怪老人家对肥猪肉情有独锺。

张进谦：58 年的 6 月 30 号加刑，7 月 1 号就把我弄进监洞，在严管下背铜矿沙。中队长和指导员轮番督阵，手上掐着表，限时限量，来算定额。每趟背 50 公斤，来回小跑近 20 分钟，1 个班要折腾 52 趟，背 2600 公斤，才收工。他妈的，人又不是机器，没多久，我就累得不想活了，因为肚子饿，一跑眼前就冒火星星。有个深夜，乘管教干部没来，我夹上从家里带来的棉衣和皮衣，躲进堡荒洞睡觉。

老威：堡荒洞？

张进谦：就是矿石已挖完的废洞子，一匹山肚子里，四处都有迷宫一样的堡荒洞。我躺在里面，又冷又饿，睡不着。

突然外头喊：吃宵夜啰！我马上跳起来，抓了碗冲出去，迎头就碰到犯人大组长杨向成（音译）。这个狗杂种，当贫雇农主席团的时候，因公报私仇，冤杀了两个人，被追查出来，判了10年刑。可进监狱后，由于出身好，还是封为犯人头，吃香喝辣，整犯人比政府干部还狠。谁要是完不成任务，就被他吊在监洞门口的铁杆上，除非死了，才放下来。

老威：活生生一个阎王爷。

张进谦：他管打饭，喊我让开点，意思是不给我吃。我毛了，反正熬下去也是死，老子今天就为民除害。我右手拖了根铁棍，左手将碗抵拢他的鼻子说：对不起，我要你的命。吓得他一抖，竟给我打了一满碗。

老威：碰上一个要吃不要命的。

张进谦：饭下肚，我又回监洞睡觉，偷听到洞外犯人议论纷纷，没一会儿，又来两个干部。我心想：今晚过不去了，看来要遭收拾。果然，跟着就听见杨股长大声叫：张进谦，出来！

我慢慢吞吞地起身，顺洞壁梭出去。妈的，人生最后一碗饭也吃了，就弄死一个够本，弄死两个就赚！盘算妥当了，我一亮相就大喊：要剐要杀随你们！杨向成吊死犯人，你们为啥子不管？还叫这种人当大组长？监洞里的犯人一天比一天少，哪里去了？埋尸的原来一组，现在都加成两组了，20个强劳力专门埋尸哦！与其累死饿死，我不如先把杨向成敲死，因为他不让我吃！哪怕多喝一口汤，也叫延续生命，延续不了生命，我就要抓他垫背！

杨股长听得莫名其妙：你说啥子哦，张进谦？我是来通

知你，明天调丽江，大衣带起，所有的行头带起。你还吃不吃？去厨房整个饱嘛。

老威：嘿嘿，像在演革命烈士英勇就义的戏，我都虚惊了一场。

张进谦：干部发话，我就去厨房打了满满一盆饭，端给同组的吃，大家边扒边掉泪。犯人遭孽啊，两个人一个铺，一床被子，饿得打晃，还超强负荷，没活出来几个哟。我运气，搞过无线电，脑壳灵光，就有人推荐我去丽江的长水铜厂开机器。

老威：我搞过社会底层访谈，你算是沦落到监狱的底层了。

张进谦：是嘛，犯人们也有低层高层。云南省委书记的儿子，57 年大鸣大放过了头，成了右派。一关进来，就耍死皮……

老威：他的官老子没保他？

张进谦：法官把他还给他老子，他老子却大义灭亲，非得判刑 3 年。嘿嘿，他在劳改队装瘫痪，屁股漏半边出来，不仅不劳动，干部还得陪笑脸服侍。看来官官相护，哪个地方都一样嘛。

老威：你到底明白了？

张进谦：明白啥？没有哪个官护着，我两个耳光就打出 13 年，不，加上留场劳动，将近 20 年。

5 饱死鬼

插记

讲讲歇歇，又拢下午 2 点多，老人起身张罗午饭。昨日的大肉宴犹在齿间回味，令我和我的朋友都不同程度地紧张。

我的朋友嗫嚅道：我我，我吃素。老人瞪眼道：又不是和尚，吃啥子素哟。就跨下阶沿，一意孤行地进了厨房。我明白人上七八十岁，思维差不多就返老还童，不依不行的；可没料到我的朋友也作出儿童的逃跑举动，幸而被我一举擒拿。

伪笑着入席，见在昨日两份肥肉的基础上，又添一大盆炖猪脚。老人得意地注解：天不亮，我就打起电筒去了屠宰场，等着杀猪，等着把猪脚杆砍下来。我提在手里，脚叉叉还在动。想想看，这些脚刚才还在地下走来走去，现在就要

走进我们的肚皮了。我急忙点头称是，顺便舀了半碗颜色极深的汤，一尝，及其咸，就放下了。

老人却说：喝啥子汤哟，啃肉啃肉。就给客人各夹一根半尺长短的猪脚。我的朋友再次措手不及，好在猪脚肉比肥肉容易对付，大家都整得没头没脸，一时间，满席无语。过后，我又乘胜进军，再下一脚，赢得老人的啧啧赞许。而我的朋友每隔几分钟，就抬起脑壳，长嘘一口，打一个油嗝。

餐毕，我细细打量一番厨房，矮灶矮柜矮桌矮凳，还有牵挂着蜘蛛网的矮屋顶。真有点在暗无天日中吃牢饭的错觉。

返回正屋继续工作，我的朋友又借机出门。我还以为他跟昨日一样找药店去了，却不晓得几天之后，我们要爆发一场有关肥肉的争论。我的朋友属蛇，文革前夕出生，他居然声称在娘肚子里就反感肥肉，并且从小到大，不仅不吃肥肉，还见着都恶心。我却认为如此夸大其辞，很没意思。我考证道：文革期间物资匮乏，买肉买油全凭票证，每人每月只配给半斤肉半斤油，当时全国人民都向往肥肉，死盯着肥肉，爹亲娘亲不如肉亲，肥肉又更比瘦肉亲，因为解馋啊。你的家庭不可能例外吧？我的朋友嚷道：为什么不能例外？记得3岁的时候，肥肉一进嘴我就要吐出来。我露出惯常的痞子嘴脸：你家不是高干吧？饮食这么健康？我的朋友赌气道：我家是农民。我说：那就是韩国农民，只吃狗不吃猪。我的朋友气坏了：我看你跟张进谦真有点像，很霸道，很不可理喻，是不是坐过共产党牢房的人都一种德性？

是吗？我一下愣住了。

当然是！朋友喊道，并且永远改不了。

正文

张进谦：我又讲到哪儿了？

老威：我查查记录。哦，讲到从米厘铜矿调出去。

张进谦：终于逃出一座人间地狱！我太激动了，因为这身牛肉干巴可以带回家乡的地盘了。从米厘到丽江，本来两天路程，押送我的干部牵来一匹马，吩咐我骑。我摇头说：晓不晓得，骑牲口是需要精神头的？像我这种饿得快散架的人，莫提马，就是小毛驴颠几下，也坠地了；如果再被蹄子踩两回，就彻底散架。干部伸手捏了捏，的确皮包骨，就叹了口气：你要咋样？我打个拱手说：拜托二位驮上我这一小卷行李，骑马先行，犯人我在后面跟着。干部说：那太慢了。我说：没得法，我一天走多少算多少，早晚会拢丽江，你们的马腿子快，就莫候我。干部迟疑片刻，点了头。

老威：他们不担心你逃跑？

张进谦：哪跑得脱哟。米厘铜矿的警卫，几乎都是彝族，平定过好多次暴乱，个个都是神枪手。隔着千把米一枪射过来，绝对把你的脑壳打得稀烂。他们也只打脑壳，不打其它部位。

老威：你咋个晓得？

张进谦：有逃跑的嘛，警卫的快马一出动，一顿饭工夫不到，血糊糊的死人就倒拖转来了。况且，我那个鬼样，你

矗立在石鼓门户之上的红军长征渡江纪念雕塑。60年饿死那么多人，张进谦说，先烈们会大吃一惊。

拿枪逼我跑，我也不跑——怕断气啰。

于是那天早晨，一出监狱大门，干部就骑马走了。我背着政府发的荞面粑粑，还有昨晚的剩饭，慢慢在后头跟。我呼吸了几口自由的空气，没有铜矿粉尘的空气，感觉甜腻腻的，有点不习惯。我想，哪怕走再远的路，哪怕走不动就爬，也比在监洞背矿沙舒服。

老威：当然啰，至少有点盼头嘛。

张进谦：我走走歇歇，当天还是过了金沙江。上一个坡，下一个坡，荞面粑粑和剩饭就全下肚皮，那可是两天的口粮哦，却像几把沙子丢入无底洞，喳喳响了三五分钟，就没任何反应了。人没油荤不行嘛，嚼铁也能消化。

天不早了，干部在金沙江过去的坡脚下候着我，见我有气无力，就说：你在这路边的彝族家吃口饭，再赶过来，我

们先去金关（音译）转运站。

我一边答应一边进屋子，打声招呼就在火塘边落座，老彝胞递了 2 量重的饭坨给我，收两毛钱。几口完事后，我从背兜里抽出家乡带来的铁烟杆拨火，老彝胞眼珠子一亮，就接过去又瞧又摸，还问我卖不卖？我说：你还很识货嘛，这是正宗的石鼓老烟杆，是远近闻名的杨铁匠老倌拿一整块铁打出来的。看看这烟锅，硬生生地扳弯，所以浑然一体，几辈人都用不坏。老彝胞说：我晓得一般的铁匠造不出来，你出个价钱吧。我说：这是我祖传的东西，当年价值几何不晓得，可现在 20 块钱还值吧？老彝胞倒还爽快，连说：值值。可 20 块钱也不是小数目，我家里拿不出来。我说：那就算了。老彝族说：烟杆吃不得，你带着也没啥用，不如便宜卖给我咋样？我全部家当就 3 块 6 毛，再给你搭一个新口缸，值 2 块 4 毛，前两天我赶街时才买的。

唉，罢了罢了，一个劳改犯要啥子祖传烟杆！老彝胞再狡诈，也算识货。于是成交。老彝胞过意不去，要再给我一麻袋洋芋；我说背不动，他就又给我两碗炒面。

老威：收获不小嘛。

张进谦：两碗炒面，不多嘛。在路上，我边走边吃，一会儿就耗掉大半。不知不觉又下一个坡，碰着一个合作社，门还没关，我就进去，里面有一男一女。我劈头问：有啥子能进嘴的？女的乜我一眼，回答：有纸烟，有水果糖、红糖，照规定，每个过路客供应半斤。我想都没想，就从荷包里掏出 10 块钱：给我来包大重九，剩的钱都买水果糖。

老威：呵，大款呀。

张进谦：在劳改队，现金都放在干部那儿，要用才取，每次 5 块。现在我身上揣着将近 60 块，所以一见吃手就痒痒。我先接过大重九，抽出一根，点燃就猛抽一口……

老威：香不香？

张进谦：香个屁，我差点翻下地。饿狠了的人哪抽得起烟哟，我跌在门坎上，晕了十几分钟，清口水牵起线地流。缓过劲来，我赶紧把烟丢了。

老威：你还饿？粑粑、剩饭、饭坨子、炒面，才一天不到嘛。

张进谦：挨饿太久了，肚皮里没油荤太久了，啥子东西都不顶事，进了嘴，颠几步就没了。不怕你笑，走了快 10 个钟头，我屎尿都没解一泡。

老威：只进不出？我晓得有种牛虱，一旦叮住牛皮就不松口，亡命狂吸，直到热血快把肚子撑爆，才突然坠地。也有来不及松口的牛虱，肚子真叫撑爆了。

张进谦：我不是牛虱。干部一路打过招呼，沿途都晓得我是犯人，所以人家也不和我多理论，就卖了两斤红糖两斤水果糖。出了门，正一把把剥水果糖吃，两个赶脚的就扯住我吆喝：你就是那个犯人？咋个才拢这儿？原来是干部派来接我的。我问：到金关还有多远？脚夫答：15 华里。天都快黑了，还不走快点。我抬起脚给他们看：都是血泡！磨烂完了！因为是回丽江，我才靠精神支撑走到现在。脚夫强不过，就软哄我：你喜欢糖嘛，前头三四里，还有一个合作社，我们拢了又买。

那年月，每堵墙内都无声无息，张进谦说，人们已经没力气说话，甚至放屁。

老威：当真又买？

张进谦：肯定买，见吃就买。我抱起几斤水果糖还在问：金关有没有肉吃？挑夫答没有。我说那就走慢点。他说不行。我就死猪一般躺倒在路中。

如此走走停停，捱拢金关已夜深。没料到，在转运站居然遇到我的一个表叔，我们四目相对，他冲我又是点头又是摇头。我明白点头的意思是晓得了，会关照的；摇头的意思是我也在劳改，你就莫打招呼了。果然，他打来热水让我烫脚。正在挑潦泡呢，就听见他在喊：报告股长，伙房还剩了半盆心肺汤，是不是给刚到的犯人吃点？股长答：好嘛，整饱了明天早早上路。

哎哟，小半年没尝肉啰，我一下子来了精神，刷刷刷，

如猪拱槽，半脸盆心肺汤几分钟就光了，那肚皮是看着鼓起来，跟两三个月的孕妇似的。我表叔在旁边守起，还悄悄问：再给你弄一碗火腿饭来？我揉了半天肚皮才说：早点提啰，我就少喝汤嘛。表叔说：我问了 3 遍，你没听见？我说：只有满屋子的汤响。

老威：吃成这样，睡得着？

张进谦：照睡，照睡。夜里梦见四处找厕所，却找不着。好不容易寻了一个背静的地方，掏出家伙要尿，可一抬眼，周围全站着妇女。只得缩回去。总之，一泡尿憋拢天亮，也没醒，可见我那阵的肾功能有多厉害。

第二天出了转运站的炮楼，干部与哨兵交割完毕，照旧骑马先行。满脚板潦泡，我呲牙咧嘴走了几百米，才勉强适应了。水一放，腹内又咕咕叫，这张嘴巴真是越吃越馋，不到 1 个小时，又痨得吞清口水。终于捱拢长岭子，记起表叔说这个地方火腿好，就眼睛滴溜溜乱瞟，一下寻着了路边饭铺，自然进去落座。火腿和腊肉刚煮熟出锅，4 角钱 1 盘，大米饭 4 分钱 1 碗。我摸 10 块钱出来，吩咐老板娘切 4 盘火腿加腊肉，3 盘肥 1 盘瘦。那肥的能照见人影子，刀一下去就四处喷油，我却等不及了，老板娘切一块，我就两根指头夹一块，送嘴里，马马虎虎嚼三两下，便咯噔吞了。哎呀呀，不晓得的人还以为是吃萝卜。

老威：相当于喝油了。

张进谦：我没喝油。不过煮肉的汤我全要了，倒出来，又是半盆。我把两碗大米饭掺进去，加一撮盐，搅匀了，脑壳埋起就扒拉。大概抬头伸脖子三四回，汤饭就统统下肚。

老板娘同情劳改犯，汤没另加钱。

老威：你整了 4 盘肉、两碗饭、半盆汤？

张进谦：是啰。从米厘出来这一路，我已吃了不少东西，可一张肉皮子始终松垮垮的，像一件衣服挂在骨头架子上，太阳晒就透心热，太阳不晒就透心凉。只有这盘，松垮垮的肉皮子见涨，一会儿就绷紧了，和骨头粘在一起了。我坐在那儿，觉得脑壳都灌满了汤，因为从下至上都在膨胀，连眼珠子也朝外顶。老板娘还问吃不吃？我想说：人快撑死逮了！还吃！可手杆却鬼使神差地拉过背篓，牵开饭口袋，示意往里面倒。

老威：倒啥子？

张进谦：我又要了 4 份肉、两碗饭，我害怕过了这一站就没得吃。结果，孕妇一样慢慢走，爬坡下河，才过十几华里，又遇着一家饭铺。当然要进去啰，两份肉、1 碗饭、1 豌豆花。自从劳改，我就没有一口一口吃过东西，这次是一口一口地细嚼慢咽。肉和饭好歹完了，可是豆花却进不了嘴，因为舌根子后面全塞得满满的，口水都进不去了。

老威：活生生一只寻死的大牛虱！

张进谦：如果不是一路吃糖，我就撑死了，糖能消化肉和饭。可我的背篓里，还装着十来份肉、几斤饭。说来奇怪，我又走了一天，却连屎尿都没屙。你还笑？不相信？身体饿久了，麻木了，就跟旱了两三年的秧田，全是密密匝匝的大裂口，突然之间天漏了，下雨了。你想，要多厉害的雨，才能将秧田浸透？

老威：一般犯人就没这么幸运了。

张进谦：1958年的春节开始限制牢饭，接着是59、60、61，62年的前半截都还在饿饭。

老威：饿死了多少犯人？

张进谦：米厘、长水、牙马谷等5个铜厂，还有7个农场，加起来饿死了4万多。

老威：你咋个晓得？

张进谦：米厘和长水我都呆过，咋不晓得？3年时间，犯人减少了接近一半。所以我被饿简单了，背起两口袋肉和饭，一见吃的，就还要买。干部又派脚夫来接了我一两回，帮我拿东西。因为天气热，上午沤在口袋底下的饭臭了，只能抠起来丢掉。脚夫说：口袋不能扎紧，否则到天黑全部臭。我心疼得眼泪都快出来了，不禁记起带着485块结婚银子入狱，才劳改1年，就加刑5年，银子只剩几十块，这一趟捱完，估计就真正人财两空了。

不过呢，也就伤感了几分钟。再爬坡下坎，又是十几华里，碰着一家老彝胞，烧着火塘。唉，我一歇气，就觉得肚皮有了松动，于是拿出两个口缸，一缸热肉一缸热饭，又吃一盘。

老威：看你这么不断填鸭，我的气都紧。

张进谦：吃了好上路嘛。嘿嘿，你说巧不巧，没走几步，突然瞅见我家表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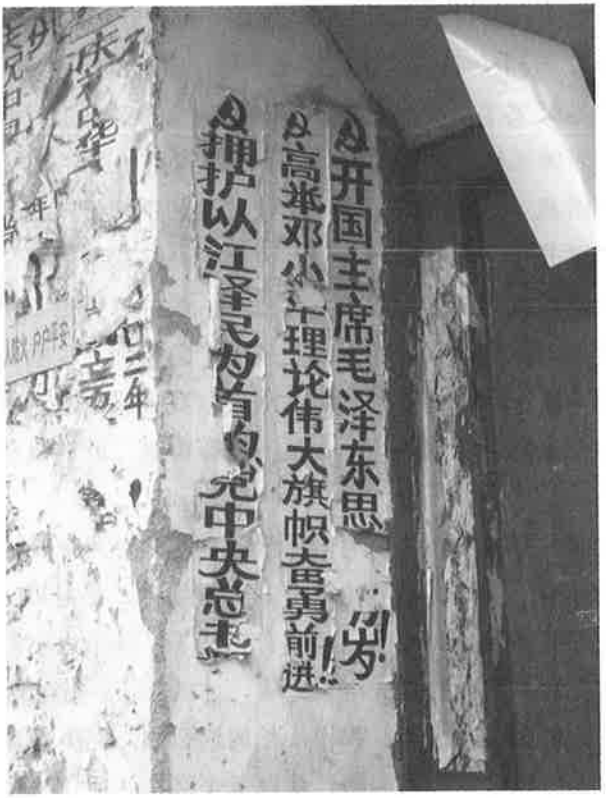
老威：表叔过去了，又来表婶。

张进谦：是啰，她正在路边卖包子。我抵拢跟前，她再三揉眼睛，才把我认出来。她说：那么壮实一条汉，咋变得跟鬼样？鼻子一酸，泪水就牵起线流。我安慰了几句，就拣

了 4 个包子，要付钱照顾生意；她却一把推开，数了数蒸笼内，还剩 27 个，就连着垫底纱布一卷，全部倒给我。本想推让，看她又哭了，我只得说：好，好，全部都带上，全部都吃了。表婶还掏出荷包，将卖包子的零钱点了点，总共 2 块多，都给我。这咋要得！我连忙逮住她的手腕子：我虽然在劳改，可并不穷，我的钱很多！表婶说：这次碰了面，下次能不能碰面就难说了！娃娃，你受苦，表婶以后也不能到丽江去看你，这点点钱，不算钱，只图个念想吧。哎哟，我收下那把零票子，心如刀割！心在滴血！我一路默念，将来出狱一定要去看看表叔表婶，可他们没等得到，就在饥荒年间饿死了。

老威：唉，中国人！有时命贱如草，有时又命贵如金。

张进谦：继续走。没办法，只能继续走。那是第三天中午，我突然感到，脚步比以前要有劲些了，身子也不怎么打晃了。折回来接我的脚夫也说：咦，才两三天，你咋个就胖了呢？看来东西没白胀。我说：长肉这么快，莫不是浮肿？就拿指头在肚皮上东戳西戳，却打了个寒战，便意来了。我在坡草中屙了很大两泡屎，畅快到极点。大半年了，我都是几天屙一次，用尽吃奶的力气，也没啥出来的。吃那么少，那么差，活儿那么重，还有啥子没消化干净？有时候蹲下去，放个屁就起身。



村党支部门口的标语。张进谦问：唱高调能填饱肚子吗？

老威：晓得了晓得了。涉及到屎尿嘛，就莫讲太细腻。

张进谦：好嘛，又继续走。离丽江不很远的坡脚，又遇见一个合作社，我当然又进去，买了两斤红糖两斤水果糖，还有糕点……

老威：你还买？

张进谦：背篓里已经有 4 斤红糖 4 斤水果糖 11 盘火腿肉两口袋大米饭，外加表婶送的 27 个肉和糖包子，要冒尖尖了。可是我见不得吃的，没得办法。我把背篓摇了摇，让售货员将一大坨糖和糕点包了好几层，摞在上面，再小心翼翼地上背起身。脚夫提议两三个人匀着背，我坚决不肯。

嘿，哪晓得，都抵拢丽江专区看守所大门口了，还遇着一个亲戚在摆糕点摊子！卖口口酥、面包、麻花等等。他使劲冲我招手，我却摆手说：你不要给我了，我都背不动了。他不依，硬塞了一包糕点过来。我就这样背着抱着，喊了报告，跟干部跨进看守所。

老威：监房里的犯人没抢你的东西？

张进谦：根本就没带进去。里头的干部问：张进谦，你乱买这么多吃的干啥？我答：饿怕了，更怕来丽江捞不着吃。干部说：你要去长水开炼铜机器，有气无力可不中用，所以领导研究决定，你就在这儿休养十来天，有你吃的！我问：肉呢？他答：也不缺。

老威：你摇身变成高级犯人了。

张进谦：暂时的。还破格允许我在丽江城内探了几回亲。每到一户亲戚家，我都宣布：现在外头是定人定量供应，你们千万莫给我弄啥子吃的，我还要把吃不掉的送你们啰。

老威：都送掉了？

张进谦：除了大米饭坏掉一部分，其它统统给亲戚。在那个即将吃不饱穿不暖的年月，一个犯人居然给城市居民送凭票供应的美味佳肴，简直跟神话一样。

6 地窖或狗洞

插记

下午 4 点过，老人又疲倦了，这次没原地打盹，而是提议出门逛逛。我欣然接受。于是老人压低帽檐，倒背手，大步流星前行，我和朋友亦步亦趋随后。沿臭气弥漫的陋巷朝上，每遇比较老旧的人与物，老人必定停步，向我们简述此情此景的来历。同中国许多待开发的旅游小镇一样，依山傍水的石鼓出过不少由地方性逐渐升格为世界性的名人，囊括政治、军事、文化、民俗、古今。比如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土著学者范义田，曾在 1946 年撰写了一副春联：山连云岭几千迭，家在长江第一湾。至此这块弹丸之地就有了如雷的名份，勾得一波波游客闻声而至，像被导游牵着鼻子的狗，山水之间跑一趟，照照像，买买所谓的土特产，即了愿归去。

可我的采访物件却不这么看，他沈迷其间，自认为承接了石鼓的精神香火，所以一再强调我此行的重要。我点头称是，如小学生，不时拿出笔，在手板心里记点什么，令老人很是得意，竟在乱七八糟的石阶间，如微服私访的老干部，

向上上下下的挑担农民问这问那。当然，系列地主旧居也参观了，3 米多高的旧戏台也参观了，在我看来，这才是石鼓仅存的人文景观，比山丘脚底公园中心的“石鼓”，以及那该死的“红军长征渡江纪念碑”有更深的内涵。老人说，他自小就受老滇戏的熏陶，也曾在那人人向往的旧戏台上，排演抗日救国的新戏。可而今，新和旧都成了过眼烟云。

我们还拜访了两处极为颓败的空宅，老人介绍说是张家的祖屋，并如电视片主持人，回旋于院中，对两个观众解释每间屋子的变迁。他说，父亲被枪杀前住正房，我和两个弟弟住上面的屋子。他固执地请求客人贴近观赏，我只得小心翼翼地用棍子拨开杂草和杂物，站上一堆日晒雨淋的朽木，从外登高平视 2 楼深处——褪色的窗棂窗花，废弃的家具和蜘蛛网，的确让人平添些许感慨。

以此为背景，我替老人照像若干。还顺便问土改后的房主是谁？老人很不屑：自然都是穷光蛋，有共产党撑腰，就白捡这么大的房子住。我又问现在呢？老人仍旧不屑：几辈人了，早搬家了。他妈的，白吃白住，又不懂维修，哪怕宫殿也要塌嘛。

化了几十分钟，逛了大半个石鼓。天色还不算太晚，于是赶回原地继续工作。老人的精神头似乎更足了。

正文

张进谦：人啊，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得意忘形，否则就要栽跟斗，瘟神毛主席说过：爬得越高，摔得越狠。

老威：老人家为何发此感慨？

张进谦：我在丽江看守所吃了十几天的饱饭，人完全还阳了。站在黄皮寡瘦的犯人堆里，硬是像书上描写的恶霸地主，腰杆挺挺的，说话气也粗。当时正在大量抓人，丽江专区 13 个县的右派、反革命都朝看守所送，啥子教师、职员、基层干部、不悔改的地主、乘大鸣大放翻案的牛鬼蛇神等等，形形色色。早晨才走一大批，将监房腾空，下午巷道里又在喊：晚上煮 600 多人的饭！睡觉都要打楔子，起夜屙尿，原来的铺位就找不着了。所以，如我这般“技术人才”，不便久留。

老威：你不是还没学炼铜机器吗？

张进谦：我是远征军军部的报务员，炼铜机器算老几？拢长水铜厂后，我马上到现场，见 12 架鼓风机安装妥当了，可炉子还在加班加点地砌。师傅问：你以前开过机器没有？我说：其它机器开过，就这机器没开过。师傅说：我马上要走，你好好瞧着，我先解说，然后示范。这是 60 几马力的电动机，油箱加满，开关一动，它就转了；这是煤气炉，从上面这个大包加煤炭，一定加足，炭足，产生的煤气才足，矿石才炼得化……

老威：我听得云里雾里。

张进谦：机器在跟前，你就一目了然。师傅从头至尾示范一遍，我就会了。嘿嘿，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难道活的制服不了死的？等到正式投入生产，我就成了师傅，要管 12 台炉子，一天到晚忙得屎尿都顾不得屙。你看这手杆上的疤，就是煤气过于大，电动机皮带打滑，一颗螺丝钉飞起来

打着的。万一打中脑门，人就报销了。

老威：那整个铜厂，你老人家的技术含金量最高啰？

张进谦：我是权威，要指点每台炉子的掌火师傅；那些师傅的下面，有 7 人。开炉的时候，3 人持 5 尺多长的火钳夹后火，将“和尚头”弄出来，敲碎了，再投炉重炼。所谓“和尚头”，就是铜与炭不分解，越烧越黑，严重了，铜水流不出来。曾经出过 1200 公斤的“和尚头”，把炉底都捅穿了，丽江没得法，只好运昆明冶炼。

总之，只要炉子开得顺，出铜多，啥子都好说。得了红旗，每人奖 3 斤烤烟。他妈的，要流多少吨汗水，才得 3 斤烤烟哦！我们都睡在炉子后头，两三人一个床铺，轮班倒。特别是我，责任重大，经常三天三夜，寸步不离岗。遭孽哟，我们越苦，人家越甜，长水的铜亮堂堂的，含金重，1 吨要卖 1200 元钱；不像白化（音译）的铜，看着如绿茵茵的牛屎，不含金。所以这边犯人开炉，那边干部兴奋，奖金多多嘛。

老威：真不愧为劳改模范。

张进谦：长水的大队长，原来是米厘的厂长，他见着我就说：张进谦，你这个敢打中队长的捣蛋鬼，到了新环境，汲取教训哟！再努把力，我想法提前释放你。

老威：有盼头了。

张进谦：是啰，我也抓住他的话把不放：说话得算数哦。他拍了拍我的肩：肯定算数！

老威：混得不错嘛。

张进谦：这是我劳改生涯的黄金时期，不靠混，靠出苦力。转眼到了 1959 年，监狱要特赦一批犯人，那天开大会，

检察院和法院都来人，领导一个个讲话后，就宣布特赦名单。我尖起耳朵听，足足几十个名字，就是没有张进谦。如挨闷棍，我懵了几分钟，就冲去找大队长：堂堂党的干部，咋个说话不算数？他让我小声点，我偏不小声，没做啥子见不得人的事！这下可惹祸了，大队长骂我旧病复发，当场给我戴脚镣。

第二天，我想不通，就不开机器，12 台炉子只得统统停起。这还了得！领导命令我的助手顶替我，将我调到汝南化矿区。迎头碰上大队教导员段凤先，他咬牙切齿地说：张进谦，你没见过我吧？我可早就晓得你这个监狱名人。

老威：眨眼间，命运就急转直下。

张进谦：这个狗日的段凤先，叫人在监房背后的靠山半坡，专门挖一个地窖，长宽高都不足 1 米，对，高只有 43 公分。我永远记得 1959 年的 11 月 16 号，脚镣反铐的我，被两个犯人架起，往地窖里塞。正面进不了洞，就侧着肩膀，等上半身入了，再收腿。

老威：在里面怎么转身呢？

张进谦：不转身，像蚕一样蜷着。

老威：我想起练瑜珈的印度人，一点一点把自己缩进小箱子。

张进谦：相当于活埋啊。脑壳夹在裤裆里，顶上是哨房，哨兵一走动，就嗤嗤掉土。冷得钻心，痛得钻心，痒得钻心，

我关过的地窖位于监房背后的半山坡，张进谦说，比这面院墙还高

都得忍着，因为动静稍微大，土就成块掉。没任何支架，耗子一般随便打个洞，万一塌了，人也不用朝外拖，将门一堵就万事大吉。

老威：吃喝拉撒咋办呢？

张进谦：落屁股的地方，掏了一个碗口粗的沟，风呼呼倒灌进来，有时屙多了，连尿也倒灌进来。筛糠那个抖，土铐子嵌入肉里那个痛，死又死不了，哪怕被活埋，也是慢慢憋死。人到了这地步，猪狗不如，耗子臭虫不如，还在乎屎

尿？吃喝还不简单？外头将地窖拉个缝，摆个碗，你就把脑壳栽下去舔嘛，牲口都这样吃东西，还客气啥？！

老威：你熬了多少天？

张进谦：44 天。12 月 30 号出洞，腰都抬不起。

老威：这个狱吏真是疯了。

张进谦：开头我还以为，只是煞煞我的嚣张气焰；稍后一琢磨，不对啊，我以前打干部也没关专用地窖啊。果然，我一出洞，麻绳就代替了脚镣背烤，五花大绑，跟赴刑场一样。我虚起眼睛朝脚底看，整个矿区 600 多犯人全部集中，在院子里等着，周围立起几个排的解放军，阵势不小。

老威：要干啥？开批斗大会？

张进谦：制造冤案！这个段凤先，不晓得哪根筋错乱，居然构思了一个“以张进谦为首的暴动集团”！黑材料已整了一大摞，我被押着，从犯人中间穿过去，到队部认罪。材料也不看，也不读，直接就抓住我的右手大拇指，按印泥，再一页页按手印。我大吼：姓段的，我与你无怨无仇，为啥要往死里整我？！

段凤先冷笑一声，转身就出屋，当众宣读我的一条条罪状。随后，气也没让歇，就给我换上 3 扣大脚镣，由一个班的解放军押解，转往丽江专区看守所。

老威：又回老地方。

张进谦：今非昔比啰。上次是即将开机器，这次是即将判死刑。

老威：坐囚车吗？

张进谦：还是走路，拖着脚镣翻了两座山，上五台山，

下五台山，整整 12 个小时，才拢丽江坝子。收监时手脚都烂完了，像个站立的骷髅轰地垮了下来。可是，我晓得这次非同小可，匆匆吃完饭，就连声报告所长，要了 50 页纸。所长姓安，算个好人，他叫人把我的背铐改成前铐，整整一夜，外加半个白天，我写了 46 页的申冤材料。记起这些年的一场场一幕幕，我恨不得撞死啊。可是我不能死，至少不能“畏罪自杀”，让段凤先得逞。

老威：你在看守所一直是死刑犯待遇？

张进谦：一年多的脚镣手铐，他妈的。但是饭反而管饱，也算因祸得福。外头饿死好多人哦。

老威：检察院和法院来提审过？

张进谦：没有。1960 年的 6 月 30 号，刚开早饭，来了两个干部，提我出去。年轻的那位，居然摸出一把小枪，命令我坦白。我毛了，就说：老子抗日玩枪的时候，你还在吃奶呢。老子已经是这个待遇了，你开枪嘛，我还得感谢你。老的那位急忙劝住，宣布说：张进谦，据我们多方面调查，你一共犯有 63 条罪，你来按个手印，认了，我们就可以根据党的政策，从宽处理。我说：把这些纸收起来，我半条罪也没有。他说再考虑一下。我说：该考虑的是你们，是段凤先。除非你们将我的大拇指砍下来，否则手印没有，命有。

老威：一个人犯 63 条罪？真是旷古奇闻。

张进谦：63 条蛇，条条都咬人，哪有自己把自己给毒死的？果然，又捱了半年，到 12 月 30 号，那两个干部再来审我，63 条就变成 3 条了。我问：还有 60 条罪呢？他们说：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 3 条，我们经

过了反复核实，你不认帐绝对过不了关。我说：还是半条也没有。你们不信，我愿立字为据。于是我要了张纸，刷刷写道：我相信党，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我一不逃跑，二不自杀，等待着调查研究，澄清事实真相，愿再次接受党的考验。

老威：命都差点没了，还给我党写《决心书》啊。

张进谦：《决心书》还是管用啰。61 年春节过后，一下子来了好几个干部，段凤先也大驾光临，又把我弄回长水汝南化矿区。

老威：终于完事了？

张进谦：完不了，完不了，段凤先这条疯狗，照旧把我塞进地窖。那晚黑，跟演电影一样，总共才 600 多号犯人，就有 120 多个拖着脚镣，大院里唏哩哗啦，像赶一队大马帮。解放军和警犭都不够，牵起线从其它地方调。有个犯人说：张进谦，你这个暴动主犯倒因祸得福，去丽江吃饱饭，我们才惨哦，只剩一口气吊起，还喊劳动。

犯人饿死多了，矿区撑不住，慌忙派一架马车，连夜去永胜拉枸杞，再连夜加枸杞炖草乌，每人连汤带水一大碗。我也得了一口缸。

老威：监狱都乱成一锅粥了，阶级斗争还搞吗？

张进谦：第二天，又弄我出去挨批斗，还是剩的 3 条罪，逼我认，反驳就喊打。众犯都不愿动，只有一个少年犯，提着木棒子劈头盖脑一顿，段凤先很解气，鼓起掌来。可我的脑门却被木棒上的铁钉扎出洞，血卜卜几下，就把脸遮了。

灵魂出窍的瞬间，脑子里突然闪出土改前，自家院子里的树，还有鸟窝。

我趁机晕倒装死，血在地上流了一滩。死人啰！死人啰！众犯炸了营，段凤先也慌了手脚，传来犯人医生杨文灿当场检查。老杨扒开我眼皮瞅瞅，连唤几声“张进谦”，就站起来：报告教导员，张进谦确实昏死了！其它干部都袖手旁观，只听得段凤先大吼：快背出去抢救！你负责！否则杀你的头！

老杨立即背我到卫生室，边包扎止血，边往窗外瞅，做抢救的样子。他问：张进谦，你没昏嘛？我晓得。我眯缝着眼答：自从劳改，我挨了上百次毒打，撑不起啰。只有昏。老杨说：那就继续昏，脸上的血也莫洗，队上的干部全在外面，就是要让他们参观参观革命的人道主义！

我死狗一样躺了几个钟头，才听得老杨报告：是否将张进谦送监房？段凤先答：还是地窖。老杨说：那里面太冷，

要死人哦。旁边的值班解放军插话：这儿有炭，给他烧个小火盆。

老威：这个解放军还不错，心慈手软的。

张进谦：人心是肉长的啊，只有那段凤先的心子是特殊材料造的。半夜的声音传得特别远，我在地窖头竟然清清楚楚听得干部在吵架，还拍桌子打板凳。有个叫杜荣春（音译）的年轻干事说：这个会不开了！要开你开，你的官大腰杆粗，我负责不起！段凤先说：上级指令我们两个主办，你不负责也不行。杜荣春说：事情还没查清楚，就镣起 120 多号人，全中国都闻所未闻。你说咋个交差？段凤先说：有意见你就提出来。杜荣春说：那好，脚镣全部解了，人放了，推倒重新调查研究。段凤先说：其它可以，张进谦不行，他的 3 条罪还是成立的。杜荣春说：莫提 3 条，就 1 条都是死！人命关天，这不是你我定得了的。

老威：你和那镣起的 120 多号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张进谦：不清楚啊。我既没看过材料，他们中的大多数我也不认识。可能是人饿慌了，集体停工要吃的吧？段凤先就全部当作暴乱分子，上脚镣、关禁闭、加刑期。我还在看守所，就被弄成“总司令”了。

老威：顶破天，你就算违反监规嘛，这个姓段的脑子肯定有问题。

张进谦：对嘛，如果我真死在一个疯子手下，就太划不来了。

7 差点没命了

插记

天黑前赶回丽江，饱饱地吃，美美地睡。第二日斗志松懈了些，11 点才拢石鼓张家。老人已在门外翘首以盼，一见我们，竟扑上来勾肩搭背，邀约一起去长江第一湾公园——他每天都在里面跑好几圈呢。

对岸山势低缓，顺势大拐弯的水面至近而远地放射，如一把慢慢打开的折扇。作为折扇柄的公园外侧江边，泊了许多机动橡皮船。这是个新开发的旅游项目，还没见外来游客，倒有不少当地人拾阶而上，与老人打招呼。后者矜持地点头，又转而低声对我们介绍：这是谁，他的父亲或爷爷是谁，土改时候是贫雇农或地主，是否枪毙、坐牢或入党、升官，几年前死了或瘫了，等等。然后很得意地埋头自我打量：没任何毛病，搞不明白，都死好多盘了，还是没整出毛病。

街面上传来喇叭声，我们举眼一望，原来抵达了一串豪华大巴。好几百中外混合游客突然涌入，四处乱窜，令这个

洋不洋土不土的小镇凭空喧闹起来。假古董贩子大张双臂，满嘴哈罗哈罗，将大屁股洋人朝摊边引；接着，卖土特产和瓜果的男女村民也学假古董贩子的样，满嘴赫罗赫罗，争夺更大屁股的洋人。如此倾城的崇洋媚外，竟激怒了我这爱国情绪浓烈的采访物件，他手舞脚蹈地冲着人群叫：搞啥子鸡巴？没见过老外啰？老子跟老外打交道的时候，你们还在妈肚子里转筋呢。

扫兴之余，又参观了河岔上的铁索桥，桥边立着记述当年红军英勇渡江的石碑，与头顶山壁的渡江纪念碑，以及军民鱼水情的粗壮塑像遥相呼应。老人以一个军人的严肃，指出了石碑间一两处涂改历史的谬误，正要引申下去，铺天盖地的游客在导游的正确率领下，接踵而至。

逃回家中，抹脸擦汗，一杯粗茶下肚，空气方静穆下来。我摸出录音机和笔记本，开场之前，老人却吐了句我不太明白的哲理：过去？现在？你说哪阵儿好？

我干笑一声，没话。

正文

张进谦：由于“暴动罪”定不了案，转眼我又被押回丽江专区看守所，仍然脚镣背铐。虽然已经三出三进，可还仔细搜了身，裤带也上交。所里大小 8 个监房，我都蹲过了。

老威：待遇是否好些了？

张进谦：老实说，没有饿肚皮，可挨打的次数太多了。有个老家石鼓的看守，三天两头值班，都将我提出去，命令

跪倒，皮带棍棒，甩得跟刮风一般，我被整得叮呤咣啷满地滚。你可能觉得奇怪，人又不是铁坨坨，如此敲打咋个不得内伤？嘿，我有绝招，就是每次遭整后，立马喝“回笼汤”……

老威：回笼汤？

张进谦：就是自己，也包括别人的小便。双手背铐着，不方便，只能鼻青脸肿地求人帮忙解裤子、掏鸡鸡，冲着口缸尿。有时鸡鸡被踢肿了，尿不出，或尿的份量不够，就再磕头作揖，讨要他人的小便。一般来说，犯人都同病相怜，一点“举鸡之劳”何足挂齿。唉，如果按上百口缸一桶尿计算，我这辈子起码喝了上百桶尿吧。

老威：太夸张了一点嘛。

张进谦：1961 年 5 月 3 进看守所，6 月前后又出来，调回长水铜厂 4 队，随后又是 7 队，泰安 9 队，我断断续续戴了近 8 年的脚镣手铐。那是土铐子，白天打开干活，晚上就背铐，睡不好觉。时间一久，铁就陷入肉里，化脓了，才叫狱医擦点消毒药水。几十年过去了，你看我，肩膀全是斜跨跨的，这手腕子，印记还在。由于被教导员段凤先树为“反改造典型”，批斗会场场有我，自然免不了拳打脚踢。本来，1970 年就熬满了刑期，可在文革期间，两劳人员不予处理，又拖延到 197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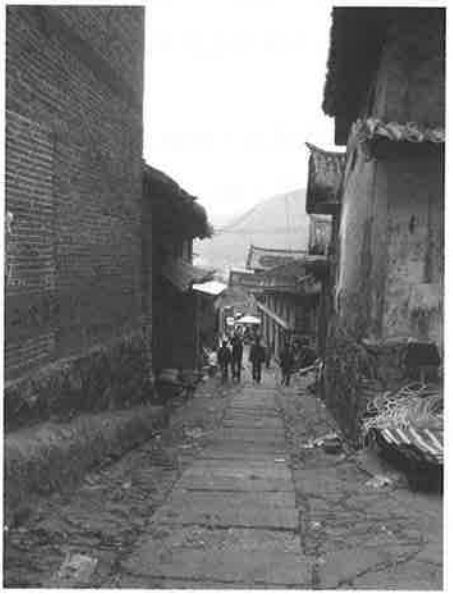
老威：这样算来，老人家的确喝了上百桶尿。

张进谦：不对，应该从 1959 年被段凤先关入地窖开算……还不对，我差点连尿也喝不成了……在汝南化矿区的时候，有一回，我们几个犯人饿急了，就在山上采来些野果，放进口缸，架在火堆上煮来吃。不料让一个叫杨道康的傈僳

族民兵发现了，就过来喝问：那个煮的？我回答：我煮的，肚子饿嘛。他说：你还调皮呢，当心把你捆起来。我一下子火了：你还是不是个人？晓不晓得肚皮饿起难受？你倒是吃得饱哦。他说：一个犯人脾气还大，老子要吊你！我说：道理不会讲，只晓得吊人……嘿，话还没落音，他就扑上来，按倒我，先给我戴一幅大脚镣，不解气，又加一幅，这两幅脚镣总共重 76 斤。然后将我吊在矿洞的门顶上，问我服不服？我当然不服，还不停地骂，他就从火堆里夹炭来烧嘴巴。火炭明晃晃的，人出于本能，都要扭来扭去地躲避，结果嘴没烧着，两边腮帮子却哧哧烙出潦泡，脖子也烤焦了一大片。你个狗杂种啊！我还在骂。他瞄了几回，想把火炭堵进我的嘴，都偏了；于是这个傈僳族的狗杂种，在地上寻来寻去，就跑到坎下面的茅房去挑大便。亏他做得出，要挑大便来堵我的嘴！落到这地步，是个人都不要活了！我乘他还没转头回来，开始晃悠自己的身体，我算个大个子，饿得再一把骨头，也自重百多斤，加两幅大脚镣，一共 200 多斤。我晃起来，感觉手臂也快叫拉断了，至少是腋下的筋拉扯到极限，痛得跟五马分尸一样。可管不了那么多，我还在晃，幅度越来越大，渐渐都带风声了……

老威：他没察觉你要干什么？

张进谦：傈僳族很蠢的，他要是不蠢，能为屁大一点事情，闹得不可收拾？



终于从鬼门关回来了，张进谦说，我把这段路反复走，听自己的脚步声，感觉不真实

老威：他是民兵，你是犯人，再蠢，他也觉得比你高明。

张进谦：高明才去挑屎啊。他终于用木棍挑起一大坨稀屎，皱着眉头，左手还扇着风，自坎脚爬上来。见我晃荡得厉害，就欲从旁边偷袭，将屎整个盖住我的嘴。他咬牙切齿道：你还打秋千给我看！却不提防我突然硬侧过去，连双脚带脚镣，如 200 多斤的钟摆，实实地撞中了他的胸口！这个狗杂种，被撞飞起两尺高，后脑壳刚好弹在岩石上，出血了。最可笑的是那坨屎，盖住了他自己嘴壳，不晓得味道咋样？

老威：老人家有绝招啊，真像抗战电影里的革命英雄对付汉奸。

张进谦：是啰，所以那汉奸从地下爬起来，哇哇大叫，扭过头就拖了条枪。他起身将子弹上膛，抵着我要打。嘿，老子的命实在太大了！

老威：子弹卡壳？

张进谦：是中队长发现了，赶紧跑来，把他的枪筒子按下。狗日的红了眼，还与中队长夺了半天枪呢。中队长大吼：给我滚开些！你以为政府发枪，人就可以随便杀？懂不懂法律？

老威：不可以随便杀人，可以随便吊人。

张进谦：中队长将我放下地，解开大脚镣，还不放心，当即就送我回场部。他说：你这次与他结下梁子了，我向教导员汇报一下，你还是住进地窖保险，以防他纠集其它民兵来报复。看看刚才多险！你一个犯人被毙掉，人家民兵大不了开除回老家了事。

老威：杀人不偿命？

张进谦：社会上杀人偿命，监狱里嘛，嘿嘿。

老威：监狱里怎么会有少数民族民兵呢？

张进谦：饥荒年间，犯人情绪波动大，为防意外，正规警力不够用，就经常从附近或稍远一点的村寨抽调基干民兵，协助监狱看管犯人，汉族、傈僳族、彝族、白族都有。民兵的法律水平很差，有的连汉话也说不利索。

老威：活出来真不容易啊，眼下看来，你喝过上百桶尿也不算稀奇了。

张进谦：没得法呀，如我这般刚强的人，有时也不得不低头呀。在看守所，我还被强迫抽过血，那是一个叫托巴的藏族犯人，起码是小土司吧，得了急病。我和另一个犯人被提出去验血，结果我是 O 型。由于要到专区医院，怕走在街上影响不好，我的脚镣手铐才被暂时去掉。不管押解的兵如何催，我都故意磨蹭，东张西望。当然，好久没这么轻松地穿过街道了，特别是手脚，前后左右随便甩，飘飘然如腾云驾雾。

直到躺在病床上，带大口罩的医生和护士进屋，挽起我的衣袖准备要扎针了，医生才问道：你是自愿献血吗？我不吭声，医生又说：如果你不同意，就算了。我鼻子一酸，差点流泪。唉，你不晓得一个阶下囚的感受！叫你干啥就非干不可，谁会征求你的意见？哪怕就是一枪崩了，也没你开口的份儿，更莫提“不愿意就算了”。

老威：这在西方是最起码的人权。

张进谦：啥子人权啰，猪权狗权都没得。所以我对医生说：人在屋檐下，焉能不低头？我已遭了几年冤枉，现在你

抽我的血，我也算配合政府完成任务。但愿能借此一线生机，摆脱段凤先的毒手！医生点点头，才将大号针管插进我的手臂，抽了 600 毫升，满满一瓶。

完了医生问：头晕不晕？心慌不慌？我答不。医生说：身体底子不错。就要开些补血的药给我。旁边的干部急忙摆手：不需要不需要！跟着，就拽着我打道回府。

老威：他妈的，牛马抽血还要多给些草料吃呢。

张进谦：我享受了近一年的死刑犯待遇，虽然手脚锁住，却没饿饭，还胖了。后来那个托巴土司出院，还隔着铁栅栏叫我，一直合掌作揖：感谢，感谢，你的血救了我的命。

老威：谁又来救你的命？

张进谦：一天天熬啰。经常觉得生不如死，可过了那股劲，又继续嘛。还好，我没被段凤先整成残废。1972 年，算正式脱了劳改犯的皮，可依旧留在 8 队当工人，工资 19 块 3 毛。

老威：46 岁了，才挣一个学徒工的钱。

张进谦：人生的大半截都过了。幸而我性格豁达，周围也有亲戚朋友暗中相帮，要不，哪娶得成老婆？1973 年，我结婚了，就跟眼前的这个。大山坳仁和乡人，家庭成分富农，小我 5 岁，之前就育有两儿两女，都已成家立业。

老威：你们咋个认识的？

张进谦：我们从小就是邻居。成婚是在劳改队。当时啥子都兴票证，粮票、布票，肉票更紧俏，所以只能简简单单请个客。亲戚朋友都商量好了，张进谦岁数大，穷得心慌，我们就不虚张声势送东西，只尽各人的能力，凑钱给他就行。

老威：你没落下亲生骨肉？

张进谦：同房不久，孕就怀了。我还在说：我工资少，肚皮大，养活你都困难，何况添一口？她说：不用你养活，我自己有手。我说：有手也变不出粮食。她说：我娘屋里还存着几百斤，有杂粮，有苞谷，这两天我就上山去背下来。我说：来回一趟，爬坡下坎十几里，太累了。我要忙活路，你的身体不方便，不如请我们赶马帮的老表（也是地主），雇他的牲口，一次就驮回来。脚钱我开，估计他也不会多要。

我老伴不吭声，我还以为她同意。不料第二天，我前脚出门，她后脚也出门。她到底舍不得花劳改犯男人的辛苦钱，还是自己上山背粮食，太自不量力了！头一趟她就背了 80 斤，吭哧吭哧爬一个阳坡，挣得汗如雨下，一会儿就流产了。这个蛮婆娘，还一趟子跑到河里去洗，这下就成习惯性流产——后来又怀上 3 胎，都流掉了。我抓来很多副草药，亲戚们也送阿胶、人参，还捉鸽子给她吃，都无效。

老威：真是造化弄人。

张进谦：她有良心，还哭兮兮地说：张进谦，我生不得了，我们把离婚手续办掉，你另外再找，找了再生。我说：命中有就有，命中没有不强求。哎呀，我的命硬，脾气大，能得到这么个好心肠女人的照顾，应该满足了。我好赌，全石鼓街上都晓得，打起麻将不要命，我老伴一再劝说，我当耳旁风。可前 3 天，她突然给我一个 6000 元钱的存折，把我感动得说不出话——她平时没啥子钱，不晓得攒了好多年，才有这些啊。唉，我张进谦对不起人啰。

老威：你现在享受离休干部待遇，也算翻身了。

张进谦：我在劳改队蹲了 26 年，1983 年才正式平反，法院的《判决书》、丽江军分区的《复查决定》都有。此前我专程去昆明，在云南省政协拜访了原边纵 7 支队副司令员朱家壁，得到老首长的大力关照。1986 年，我恢复了中共党籍，党龄从 1950 年 10 月算起。而目前呢，我还在坚持申诉，强烈要求补发 26 年的“冤狱费”，31 年的工资，还有军龄，应该从 1943 年我参加抗日开算。

老威：没错。

张进谦：我每天坚持长跑，在长江第一湾，我可能是岁数最大的长跑者；我还坚持吃肉、吃核桃；坚持练书法——有了这些身体和精神本钱，不管有没有结果，我都能坚持申诉。整过我的人，丽江有，石鼓街上有，昆明也有，我张进谦要和他们比比气长。看嘛，我年轻时候那股劲，那股老虎威风还在，我这个抗日军人，这个所谓的恶霸地主的儿子，要等着把你们这帮狗腿子送进坟墓。

老威：没错。

张进谦：差点整死我的那个段凤先，直到现在，我还年年告他。嘿，真是冤家路窄，我曾经 3 次碰见他。第 1 次在丽江到石鼓的那个丫口，八几年，还是荒郊野地，他见我就躲。我拦住他说：段凤先，心虚啥子？眼前没人，本来可以一锄头挖死你，但是我张进谦堂堂正正，不干这种阴损事。总有一天，我要把你送上法庭。

上头半截是解放前的戏台子，小时候我经常光顾，可是我的戏是不是太长太曲折，没人看？

老威：他咋个回答？

张进谦：全身在打抖，回答个啥？第二次是在丽江新城的红太阳广场。第三次是看电影，他刚巧坐我前排。莫看我老，都随身带着匕首呢。我拍着他的肩膀说：狗杂种段凤先，你为啥子要害我？他说：都过去了嘛，张进谦，我们都老了。你现在也是离休干部，资历还比我深嘛。我说：你伸手摸一把，这是啥子？匕首！晓不晓得？我再老，还是有这股子劲，将它稳稳当当插进你的腰杆。老天安排的机会啊，可是我不会，我比你懂法律，我死活要把你扯上公堂。

老威：你和这人的过节深如海。

张进谦：段凤先的老表，在旧社会也当过石鼓乡长，曾经欠我的赌债。这个都不提了，他还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所以我从远征军干训团回家探亲时，一冲动，就打了他。

老威：这是哪一年？

张进谦：1944 年，我十七八岁。

老威：段凤先起头整你是哪一年？

张进谦：1959 年，我 33 岁。

老威：改朝换代这么久了，旧仇还在延续。

张进谦：至死不忘。

老威：如今，了解你，了解你这些旧仇旧事的还有谁？

张进谦：住在丽江的和瑞尧，76 岁，研究孔子的专家；住在剑川县城的郭正洪，大我 1 岁，就是在劳改队和我分吃生腊肉的那个。都是地主哦，你要去找，我就将电话告诉你。

附录 1

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83）丽法刑申字第 15 号

申诉人：张进谦，男，五十七岁，丽江县石鼓公社人，现在云南省大研农场留队就业。

申诉人张进谦因破坏生产一案，本院于一九五七年法刑（57）字第 073 号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八年，本人不服判决，提出申诉，现经本院复查，查明。

原判认定张进谦解放前一九四四年在大理伪滇西干训团

加入国民党员。四五年在昆明后勤第五兵站司令部第一前进仓库任少尉通讯运输员。四六年任通讯营见习员，四七年在丽江团管区当二等兵，四九年混入我边纵，五二年资遣回家，对我党和人民怀恨不满，一惯进行破坏，不好好进行生产劳动，不服从队里分工，队里分工他打麦子，才打了两天说难打吃不消，就跑到另一组搭田埂，并煽动社员说："搭埂子是苦工分不划算，平田活路很好做，工分又多。"结果打乱了各个专业组工作计划，队长无法领导，窝工浪费 110 个工，生产计划完不成，麦子未打被虫吃二千多斤。一九五六年入社前，因田苗将要入社该有意把水放在田中不管，结果冲垮六堵田埂尚未修复，影响大小春放水，田苗不好，被告言行上经常打击生产队长朱××致使朱不敢大胆工作。

申诉人张进谦解放前曾参加过国民党军队，并集体加入国民党，一九四九年参加边纵第七支队，后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四军，一九五二年资遣回家后，由于家庭、个人婚姻等原因不够安心农业生产劳动，在打小麦中有怕苦怕累的思想和不服从生产队分工的现象，但并没有破坏打小麦的行为，因此，破坏打小麦应予否定。一九五六年有意放水冲垮田埂一事，无确凿证据，所以不能认定。至于打击生产队长朱××的问题，该平时对朱有些意见，说过一些气话，但并非是打击。

综上所述：申诉人张进谦解放前虽参加过国民党军队并集体加入国民党，但未发现有历史罪恶。一九五二年资遣回家后，在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中有一定的缺点和错误、但无破坏生产罪行。根据我党"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政策精神，

应予纠正，据此，特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一九五七年法刑（57）字第073号判决。二、对张进谦宣告无罪。

如不服本判决，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日内，写出上诉状及副本三份，可上诉于丽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一九八三年五月十一日

附录2

中共丽江军分区四十二师委员会
关于对张进谦问题的复查决定
（83）党字第74号

张进谦，男，现年五十七岁，云南省丽江县石鼓公社石鼓大队人。一九四九年八月参加“边纵”工支队，五〇年十月入党，曾任十四军通讯科报务员、电训队学员，四十二师报务员等职，一九五二年因历史问题资遣回乡。

根据云南省委（1982）31号文件精神，经复查：“张一九四四年参加国民党，一九四五年在昆明伪后勤第五兵站第一仓库任少尉通讯运输员，属一般历史问题，应按既往不咎的政策对待，作资遣处理是错误的，应予纠正。”

现研究决定：“纠正资遣，恢复原处理前所任报务员职务，定为国家行政廿三级，作离休安置。按地方干部离休的现行规定，由丽江县委组织部办理离休手续，工资从接收之月起发给月工资47元，物贴5元，每月合计52.00元。

不修建住房，不发修建住房补助费和安家补助费“就地安置”。

特此决定

中共丽江军分区四十二师委员会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附录 3

申　请　书

具申请人张进谦，男，现年 80 岁，纳西族，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石鼓镇石鼓村居民，中共党员，离休干部。

一、我于 1943 年在日寇侵华云南省腾冲县、龙陵县沦陷时，我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正义感”投笔从戎，毅然考入军校，于 1944 年终分到芒市抗日前线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第二军工作，抗战胜利后，我回家读书，没有参加打内战，因此要求我的军龄应从 1943 年算起。

二、我于 1948 年 8 月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滇西二委地下组织亲民主主义青年团，并于 1949 年 8 月参加边纵七支队司令部电台任台长，于 1950 年 8 月编归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四军通信营，后调四十二师电台工作，于 1952 年 6 月 8 日被错处（资迁回家）：于 1983 年 11 月平反作离休处理。我要求补发 31 年工资。

三、我们石鼓八甲人民全是指云寺、文峰寺的佃农，我们祖辈住地都要向两寺上租纳粮。我们本属佃农，错划为地主后，没收了家产，最后给我耳房两间，因我长期冤狱无法修补，现以破漏将倒，我只好寄住二弟家中。请求给我住房一套，以度晚年。最近，承政府关怀发给三万多元的建房补

助费，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因此请求给予住房一套。

四、随着年龄的增长，疾病频繁，医疗开支越来越高，加之我因抗日又参加地下党的革命工作，失去结婚机会，因此无子女，现只有老伴一人相依为命，各种苦楚不言而谕，因药费高昂，在经济上常有寅支卯粮挖肉被疮之困境，请政府给予解决。

谨呈

申请人：张进谦

二〇〇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附录 4

阳光下的呈诉，冤狱中的遭遇

自 1952 年 6 月 8 日，在大理十四军错处资遣回家的一系列：非法逮捕、无理斗打、关地窖……　具体事实：

1953 年 3 月 1 日乡政府以行动罢张判刑一年在家管制；1973 年 7 月乡政府发动群众毫无理由的连续批斗三天三夜，同年 9 月 13 日未通过公安局被非法逮捕，即没有逮捕证，也没有检查院的合法手续，被判刑 8 年，送往大研农场劳改；11 月送永胜米里铜厂；1958 年 7 月份调丽江长水铜厂，得免于饿死米里铜厂；1959 年 10 月份段凤仙调长水铜厂任教导员，他在炉房风到我竟咬牙切齿地对我说：“张进谦你也来劳改了！”我说：“我不认识你”，他说：“我早认识你了”。

1960年3月调上白华矿区，段凤先也在，10月的一天晚上，无故将我拉出去斗打，竟关进地窖（在监房后面顺山坡的哨楼下面挖的地洞，内空不到三尺，高只有四十多公分，如遇地震，非活埋不可；气候太冷，洞内阴寒，如此关了42天，其中拉出来毫无理由的斗打7次）。

1960年2月30日早上5时，当我已经脚镣背铐，还加一根麻绳给我捆起，拉到院中后拿出三份黑材料说没有时间再念，然后强制将我的手按上印泥向黑材料上压，当时在场的有犯人600多人，干部50余人，武装大概有一个连。我当即大吼说："你念也不敢念，你这些黑材料我决不承认"。当即由一个姓杨的民兵来送我从后山翻，我当时带的是三扣脚镣每一步只能走三寸，这样翻五台山、走丽江坝，到晚上12:46分，才到丽江专区看守所。我当即向安所长要了40页纸，当场写好材料请安所长交到专区公安处，要回收条，由背铐变前铐后就关进小监房，八间小监房我都坐了，当时对我的生活是饭管饱，肉二份，就是早晚随时拉去斗打。到1961年6月30日早上，科长杨平领着杨干事叫我出去，还用枪吓唬我，叫我好好的交待。我说："你们不要来这一套，我玩枪时你们还没有出世，但是为了你们好回去交差，我说什么，你们记什么，我相信共产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走一个坏人的，我一不逃跑，二不自杀，我相信政府会帮我查清的，好了我给你们盖手印，你们回去交差吧!"

1962年元月初，一大早由段凤仙和杜荣春队和将我拉回汝南化矿区仍然关入地窖，五天后的一个晚上，将我拉到院心里面，叫我跪下，当时有100多个犯人带着脚镣哭泣着对

我说：“张进谦，我们不知道你，以前也没有见过你，怎么说是我们参加你的暴动计划”。我说：“我和你们一样啥也不清楚”，段凤仙当时就喊打，结果我头部被打破后流血晕迷，是医生杨文灿将我背回地窖里抢救的。后来听杜荣春队长说：这个会不开了，段凤仙说：“不开你怎么向上面交待”，杜说：“你官大，你负责，而且今天晚上所有的犯人都说不认识张进谦，前年 1 月份才调张进谦到汝南矿区，今天他们都说不认识，这样的逼供的事我不干，今后我也不再参加这些的会了”。我在地窖内又关了 11 天扣才又将我用马车把我送到专区看守所，同样又是不分白天黑夜的斗打，这样两年的时间，我挨打近两千多次，都是喝自己的小便活过的。

1962 年 5 月的一天，把我拉到专区医院强迫抽了 600 多 CC 血，说去医治一个托巴的藏族犯人，过了几天就把我调回 4 队。

具呈人张进谦

二〇〇六年九月六日

疯狂的石鼓

为期 3 日的艰苦寻访终于结束，我松了口气，而张进谦老人却紧张起来。他一再追问：全是犯禁的内容，这本书在哪儿出版？我答：在海外。可总有一天会在海内。他又问：你会不会受连累？我反问：你呢？他说：我都 80 岁了，又是离休干部，劳改队恐怕不敢收。我笑了。

接着，他又重提付费，令我哭笑不得。这石鼓镇的老年协会里，就数我做生意早，他说，除了修房子，我还攒了好几万，你不要客气。

我握住他的手摇了又摇，边起身边说绝对不客气。老人陪我们出门，本来已告过别了，可又坚持送到车站。日刚过午，我在中巴车里坐了几分钟，直待老人转身离去，才跳下来，望了一会儿老人的背影，咀嚼着一丝丝莫名其妙的感伤。

心血来潮，我让朋友先去，自己却信步闲逛。随便一拐，就进了石鼓公园，屁大一点地盘，门匾还是臭名昭著的伪才子郭沫若题写。中央的架子上，搁了一面簸箕大的石鼓，浑

身斑斑驳驳，看来有些年头了。果然，这是记录丽江境内两次战争的文物，为世袭的纳西族知府木高在 1561 年所造，原立于“拉八”峦下河边——据传，仗打得很惨烈，双方都死了许多人，可时过境迁，儿孙们化干戈为玉帛，大伙又混一块了——我想，牛皮战鼓眨眼变成擂不响的石鼓，是否在暗示一种徒劳的疯狂？

土地改革也是一场战争，至少毛泽东把它视为铲除剥削阶级的“千百万人头落地”的战争，从此，也奠定了一套运动治国的模式。开始都气势汹汹，你死我活，到头来却是一派徒劳的疯狂。不过今人没有古人凿碣刻石、打造文物的嗜好，忘就忘了。

沿昨日张进谦老人指引的路线，我又在绕坡而上的羊肠巷子里穿梭起来，不一会儿，竟有些神思恍惚。肉红色的裸土围子一座接一座，头顶的天只有两尺多宽；高高在上的蜘蛛们不断地结网，似乎要将人类的世界包裹起来；而在更上面，是亘古不变的太阳、鸟和山峰——还有群山中的大量坟墓，低处的人死了，就往高处埋，去接近那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

然而共产党来了，那些如我一般的叫做“工作组”的外地人，怀揣革命火种，挨家挨户走访，以政党和政府的名义，鼓动人们起来斗争、抢劫、杀人，以改变“天意”安排的慢节奏的传统生活——可眼下呢，还有没有 56 年之前的蛛丝马迹？这一扇扇褪色的院落门板，有的紧闭，有的虚掩，有的敞开着，只要心生动机，我都进去，见人就打打招呼，闲扯几句；没见人也不用慌张，照样东瞅瞅西瞅瞅，参观个饱。碰巧主人家从

外头回来，还露出好客的笑容。于是我就问：你家是地主吗？回答是：早就没地主了。或者是：上一辈人的事情，不太清楚。

临别石鼓，遇见这“全国河山一片红”的老人

我瞎钻了五六条背巷，进出了无数院落，几乎没遇见什么行人。正准备窜出巷口，打道回府，突然，身后响起卜卜卜的脚步声。回首一看，在 20 多米远的那一端，一团火苗直

闪而来，转眼就拢跟前。原来是个红衣蓝帽蓝裙的老太太，可我从没遇过行走这么快的老太太，她埋着脑袋，步子僵硬，右手还拽着一个跑得气喘吁吁的孩子。我急忙从背包里挖出相机，乘她与我擦肩而过，不顾死活地喀嚓一张，稍后回放照片，老墙似乎也随着帽檐下的发丝，在朝后动荡。而那种疯子特有的痴笑，却清晰地凸现。

接着我又冲到她的前面，战地记者一般蹲下，拍了第 2 张和第 3 张。第 2 张脸黑了，周围的墙、天和电线杆子倒是亮的；第 3 张是大祸临头的特写，笑得像哭，极恐怖，每根神经都在抖。为了这件作品，我狗日的翻了个滚儿，否则疯老太僵尸般直来直去的脚肯定迈入我的怀中。

庆幸之余，我起身跟踪。刚才所感受到的那个亘古不变的静穆世界变了，我在一个疯子的牵引下，腾云驾雾。两边的土墙纷纷后退，如时间甬道，模糊不清。我原以为她有个目的地，家、街面或车站，可是个把小时过去了，我一直跟她在巷子里兜圈儿。难道她故意的？难道她不是疯子？可她背弓着，没回过头，走路的姿式从没变过呀。

刚才拍照的地点已路过三四次，我只得满头汗水地止步。因为不少院门已大敞开，人们成堆地站出来，观看疯子撵疯子的闹热了。我谄媚地笑着，与蹲在一门坎上抽水烟的老者打招呼：老人家，高寿哦？回答：76 啰。我口称“看不出看不出”，顺势并排蹲下。孩子们哄笑着散了，我的周围仍旧堆了十来个人。

我单刀直入：你们晓不晓得我追的是啥子人？

群众答：疯子嘛。

哪家的疯子？

拐角那一家。

她家还有人吗？

有个姐姐，八几年死了。侄儿侄女在嘛。还有侄孙嘛。

她咋个疯的？

不晓得。一个中年人抠着脑门道，好像我一出世她就是疯的。

追着打人？

不打人。就这么穿尿巷子，1 年 365 天，每天都穿，不歇空。

你们不晓得，我晓得。抽水烟的老者终于开口。她六、七岁就疯了。

六、七岁？哪一年？

1951 年底？1952 年初？记不清了。她爹被当作恶霸地主公审枪毙，就在那长江第一湾的滩滩上，脑壳完全打开花了。她看没看见我不晓得，总之她吓疯了。先是满街跑，后来怕人多，来抓她，就躲着人，在尿巷子里兜圈圈。

她爹叫啥子名字？她叫啥子名字？

不好说，不好说，老者躲闪道。并抬起碗口粗的水烟筒顺势一指，石鼓村党支部在斜对面，你找他们了解吧。

我装模作样地过去瞅了瞅，见斑驳门墙间，除了党支部的招牌，还有并排的 3 条残缺标语——开国主席毛泽东思想万岁！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奋勇前进！拥护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总书记！——这至少是两三年前的产物，因为本届领导人的大名还没添上去。

土改疯子，一年四季都在跑

待我再回首，老者已溜之大吉。我一问，四周群众全嘿嘿笑，这是另外一种麻木的呆笑，在我看来，远不如那个疯女人的笑——一种从50多年前一直持续至今的惊恐的笑，一种见证过血案的迷狂的笑，一种死灰里的笑，一种与张进谦老人的控诉相对称的笑——令我突然记起青年时代写过的诗句：

我是一座空城沈陷于另一座空城，
世界宽敞，我是夜夜爆发惨笑的房间。

阴历七月十五，坟头涨潮似地侵入城市，
与人类的房屋对峙……

她在巷子里逃，她从儿时逃到老时，还在逃。或许某一天，肉体倒下，消失，灵魂还要继续？在风、月光和乌云弥漫的虚无的巷子里继续？人类的记忆之旅能够抵达那么高的

地方？贯穿几十年、几代人的暴力之手还能伸那么长？

2007年9月14日下午4点，雨住了，但云层很厚，打瞌睡的太阳偶尔露一下头。我来到路边车场，正要登上一辆返程中巴，却被又一位红帽红衣的老太太扯住。我给了她10块钱，连拍3张“红色年代”——主人公披挂着五颜六色的佛珠、仿真象牙、旅游帽，而醒目的左胸上，有一颗比公章还大的毛主席像章。

我想起我的音乐搭档阿泰讲过，这个老太太是石鼓的一道旅游风景，收养了一大群流浪狗和一只鹅。她经常将这只训练有素的鹅顶在脑壳上，她叫一声，鹅就应一声，以此吸引游客，赚些生活费。阿泰是西藏那曲出生的画家兼鼓手，他曾受她的邀请，去她靠近长江岸的窝棚拜访，遭遇了五、六条瞎的、跛的或某个部位正溃烂的狗，感官和心灵均受到强烈刺激。阿泰说：那是个用塑料布遮风避雨的地坑，老人在里面办了个动物的临终关怀医院，好吃的，先喂狗；好住的，先让狗。我问：她的家呢？儿女呢？阿泰说：她没家没儿女，原住地离石鼓镇有十几公里。她遭受冤案，房子被人烧了，一直找村支书评理，人家不耐烦，就把她当作疯子赶出来。在外头混久了，本地人就真叫她“鹅疯子”。

客车卡卡发动了，我向老太太招手，她竟一脸困惑；我只得喊道：你的鹅和狗呢？她摇摇头，似乎没听懂；我又喊：你的鹅和狗呢？她点点头，听懂了，还抬臂指了指远处。

四周的看客都笑了，还是那种我所熟悉的麻木的呆笑——我不禁自语道——如果真像福柯讲的，中世纪以前的疯子

自由自在、逛来逛去，跟哲学家一样受到尊重，那谁还愿意做正常人呢？你以为你正常吗？你以为大多数就正常吗？你以为被大多数尊重就正常吗？哪毛泽东和共产党过去、现在、未来都认为自己代表着广大人民的利益——只有疯子才会这么说话，可你曾经习惯这么说话，正常吗？你，你们，正常了几天？

土改受害者和瑞尧

前奏

从石鼓返回的当日傍晚，我就拨通了和瑞尧老人的电话，那端的声音及其微弱，在我滚滚闷雷一般的长篇自我介绍以后，就越发气若游丝了。加之屋外风雨交集，我费了相当的功夫才搞懂对方的零星意思，却是关键的意思——老人同意小子登门拜访，至于采访，就免了吧。

2006年9月15日也不是什么好天。由于昨夜在38号黑沙龙里，被音乐搭档阿泰的鼓声和酒客的喧闹催得骚兴大发，又许久缺乏女人的温柔管教，就肆意将平生吹鼓之乐器，诸如洞箫、口琴、算盘、拇指琴、铜钵，像兵器一般轮番舞上阵，配以毛毛草草之啸吟，佐以火火烈烈之青稞酒，所以醉得深沈了。一大早被渴醒来，赤条条翻身寻水，灌了两三斤，渴意缓解，脑袋却如进气的氢气球，晕乎乎的大。于是回笼又睡，午时方在狗叫中还魂。

穿戴毕，又穿插数条人烟稀少的鬼巷子，抵达位于丽江古城北边外沿之农贸市场，挤在一大堆四川民工中，享用斗碗装的大份拉面，油辣子汤喝得呲牙咧嘴。整饱了，才 6 块钱，这是整个丽江地区分量最足的一家面馆，外来混混们都晓得。就是卫生稍微差点，一脚盆水，大概要洗 200 多个碗吧？我开始来吃也拉稀，多吃几盘自然不拉了。

我记得成都还有 5 块钱随便加面的民工馆子，吃了拉得更凶。我怀疑面里加了什么不明物体。

既然饱了，就该干点正事。叫辆出租车，让司机带我去北郊的玉峰小区。由于是雨季，遭遇了一段被雨水泡透的烂泥巴路，司机不想开，就声称到了。却不料碰上自称“老丽江”的坏蛋，不达目的就拒付车费，只得屈服。

在两三排高楼背后，是大片迷宫似的纳西族庭院建筑，都是整齐划一的楼底带院子，我钻来钻去，问了六七个人，迷宫里的狗起码叫了七八个轮回，我才认准了门。

虽然一身运动装，我还是如孔子的门徒一般，双手垂放大腿间，向露面的孔子研究者躬身问好。小院不过弹丸之地，但极安净极安详，花草众多，可每片叶子均一尘不染。我被让进书房，台桌上迭满书法作品，架子上都是书。

我正襟危坐，绞尽脑汁与老先生谈孔子，才疏学浅是真的，谦虚好问也是真的，总之，老先生比较高兴，终于接受了我的录音采访。

已接近下午 3 点了。我跟前的这位着过《长江第一湾》的纳西族学者，埋着眼睛，声音依旧微弱——这给我后来的

整理造成了一定障碍。

正文

老威：老先生是从哪一年开始研究孔子的？

和瑞尧：1974 年，我在劳改队教书，当时，全国正轰轰烈烈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将林彪和孔子捆绑一块的挖祖坟文章铺天盖地，我却借机系统地读了好几遍“反面教材”。如《四书》《五经》《增广贤文》《三字经》《百家姓》等等。特别是《论语》，我是逐字逐句，圈圈点点，可颇多心得只能在脑壳里积累。当然，我们这代人，稍微有些家底的，从小都读过圣贤书，但小儿启蒙和细读、体会、研究是两回事。

老威：我才疏学浅，却也记得“天不生仲尼，长夜无明灯”这句话。孔子作大学问，司马迁作大历史，所以被称为亘古至今的知识界泰山北斗。而我们这种泰山北斗笼罩下的蚂蚁，只能做点眼前的小小历史，所谓学问更谈不上了，但我尊重你这样认真做学问的老人。

和瑞尧：你太客气了。

老威：有个叫丁东的朋友，编了一本口述历史杂志，其中某一期，刊登了一篇谈著名作家老舍死因的文章。好多人都晓得老舍在文革中投湖自杀，可对临终前的种种细节弄不太明白，于是作者采访了 3 个目击证人。万没料到，3 份“口供”都不一样，甚至在投湖的具体时间、地点上也有出入。怎么办？只有将 3 份“口供”原封不动地同时公开，让读者自己去评判——这就跟中国传统的文史哲不分家不一样，大凡圣人

和瑞尧的老家—石鼓老君山远眺

作史，都有雷打不动的论断。

和瑞尧：我懂你的意思了。不过，因身体关系，我作“口供”的时间是否可以短一点？

老威：好啊。

和瑞尧：恐怕也谈不了那么细。土地改革距今已相当遥远嘛。

老威：还是尽量多些细节吧。当然，分寸你把握，能说就说，不能说不勉强。

和瑞尧：我生于 1931 年，老家距石鼓街子 7 华里，老君山脚下的高民村。

老威：我拍有老君山的照片，从红军渡江纪念碑看过去，

那云雾里的山头，似乎触手可及。

和瑞尧：可我父亲早年追求进步，还是从仙境中出去，投考了昆明的云南陆军教育学校，也就是朱德任过教官的云南讲武堂。稍后，二次革命爆发，父亲又参加了蔡锷的讨袁军，因作战勇敢，升任滇军连长。大约二几年，他返乡成家立业。据说他当时就建了嵌大玻璃的房间，采光很好，显得很新潮。

老威：那个时代的玻璃非常昂贵的。

和瑞尧：家底比较厚实。可到了 1937 年的某一天，村里抓住了一个小偷，于是群情激愤，几十人上去拳打脚踢。眼看要弄出命案，我父亲就挤进人堆制止。众村民不依，他又费尽口舌，讲了半天道理，大伙方勉强同意让官府来处理。然而万没想到，小偷还有个同伙，躲在远处窥视，见我父亲站在人堆中央指手划脚，就认定他是打人的主使。跟着，就在后半夜放了把火，猝不及防地将我家烧成白地。

冤啊，可有啥办法？只好举家流落至石鼓街上，暂时栖身富甲一方的舅父家。随后，江岸数村爆发了会道门性质的农民起义，几千穷人揭竿而起，攻打官衙，焚烧寺庙，直到丽江派来几百人的正规武装，才镇压下去，起义首领也统统砍了头。

经历这么短时间的家国巨变，我父母均心灰意冷，靠舅父的接济，正式搬家，接着就精打细算地做起买卖来。

老威：开铺面吗？

和瑞尧：铺面没咋个开，做过田地的二手买卖，买进卖出，或者卖出买进，吃中间的价差。这当然得罪了不少人，

因为那时国家政局不稳，物价涨跌大，大家都不愿捏死钱。于是争田争地争房，比拼得厉害，虽然没到抢的程度，但是红眼睛绿眉毛的情景还是经常有的。真是风水轮流转，现在似乎又回到那个时候，圈田圈地圈房，有一亩还想十几亩，有十几亩还想几十亩，也是富人之间、官场上下明争暗斗。如果再来一场土改那样的群众运动，可能个个要杀头，财产、二奶也要瓜分掉。

老威：其实发财是人的本能欲望，穷富相同，没有想有，有了想更多。

和瑞尧：对啰。

老威：那你们家在竞争中发展得不错？

和瑞尧：比较差。我父母心不算狠，争不过别人。我家在高民村有十几亩地，平常自己种，龙忙时才按天付费，请个把短工；后来搬家了，路远，自己种很麻烦，就佃给别人，照契约收租，以支撑一家人在街上的生活开支——后来，这成了划地主的一条硬杠。

老威：你当时已成人了？

和瑞尧：十八九岁，在丽江国立师范读书，思想进步，经常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地下读书活动，接触到不少从延安偷运来的社会主义小册子。接着又考入教育部直辖的丽江省立中学，类似的学府在全云南都只有 3 所。读了两学期，暑假时加入党的外围——民主青年同盟，跟着碰到石鼓解放，如果按政策，我也该享受离休待遇。

老威：解放石鼓是哪支部队？

和瑞尧：地下党。1949 年 6 月 13 日，乡政府房顶上的

青天白日旗放下来了，自卫队的枪也交了，地下党召集开了个会，宣布起义。

老威：就这么简单？

和瑞尧：是啰，大家都说好了。脚跟脚，7 月 1 日，丽江也起义，各机构由边纵 7 支队接管。我呢，立马投入新生活，在石鼓完小教书，还是青年团的文娱委员，唱解放歌，跳时代舞，热闹了一段时间。可好景不长，四大运动开始了。

按当时政策，在区级以上单位工作的地主子女，应回避，调其它区县；我倒霉，属区级以下的地主子女，就在当地接受运动。我父母是清匪反霸后期被抓的，大约是 1951 年，关起来，天天审，天天挨斗。

我是独儿，我家是 7 代单传，现在祖坟上都刻着，多少有些神秘。唉，能指望谁呢？1949 年，我刚刚 18 岁，就结婚，年轻啊，打心眼想在新社会干一番事业啊。然而人没法选择父母，我就这受株连的命，先从石鼓完小下放到 10 多公里以外的一所村小，才教了几天书，就叫控制起来，哪儿都不准去。

老威：你担心你父母吗？

和瑞尧：我自身难保。有一天，校长觉得我有逃跑嫌疑，就带人绑架，然后翻箱倒柜搜查，看是否“转移财产”。接着我就彻底失去自由，被押回石鼓关押——至此，我被剥夺了教书育人的资格达 20 多年。

老威：你被关了多久？

和瑞尧：半个多月。

老威：审讯吗？

和瑞尧：也不审讯。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关押的人太多了，民兵都是几班倒，一天到晚整得喊爹叫娘。我仅仅是地主子女，又参加过革命工作，能放出来，算网开一面了。

老威：你父母呢？

和瑞尧：关了几个月？半年？记不清了。

老威：整个石鼓有多少坏蛋被抓？

和瑞尧：五一二年是抓人的高峰，石鼓街上，整整的大院子好几处，每个院子至少拿 3 间房关人。保守估计，每间房关 20 余，那乡一级至少抓了 100 多。而乡下面大村四五个，小村 10 来个，也抓也关，打死了人也不填命。如此一算，就上 1000 专政对象了。

老威：有多少人死去？

和瑞尧：非法弄死的不清楚，通过乡一级公审公判被毙掉的，有好几十。我父母大概是 1951 年清明节前后，不超过 10 天，被双双镇压的。

老威：那天的情况你亲眼目睹了？

和瑞尧：没有，总之人山人海，枪声很大，快到天黑，民兵就通知我们领尸体。跟着就埋了。

老威：其它呢？

和瑞尧：就不用提了。

老威：你父母犯什么罪？

和瑞尧：总之，恶霸地主，血债累累。书里都这么写。

老威：怎样取证？

和瑞尧：就是上面的工作组来了，串联发动农民，开会诉苦。把这些苦一条条整理出来，拿到公审大会上去宣读，

就上纲上线了。其实解放前夕，我家正频临破产，房子都叫别人当出去了，只是赖在里面没走。

老威：此话怎讲？

和瑞尧：某某县长要买我家房子，还没谈好，就预付了几千块钱。这钱被父亲花掉，一时还不出，人家就将我家房子转当抵押。打官司，对方官官相护，自然是我们输——嘿，眼看到“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改朝换代了。

老威：晚解放几年，你家恐怕也是贫农？

和瑞尧：难说。土改快开始，我们还叫撵到老岳父家住；土改结束，我们反而分得地主范义田家的房子，虽然只几平方米。这个范义田是沈从文的学生，曾当过石鼓完小校长，有两百多万字的文化、教育专著，在云南都有很大的名气。

老威：你家被抄过吗？

和瑞尧：抄过许多次，但也没啥可抄。

老威；财产和房子几乎光了，只凭收租一条就划地主？

和瑞尧：父母死时还没正式划阶级。

老威：他们是伪政府的官？

和瑞尧：不是。

老威：袍哥、乡霸？

和瑞尧：不是。

老威：本地名流？

和瑞尧：算。父亲他参加过倒袁革命，当过连长。两金牌奖章都在土改中没收了。现在，我们老家的大门还保存在高民村敬老院里呢。

老威：哦，那他就是被大伙推举出来的革命刀下鬼。

石鼓的巧遇。据张进谦介绍，她是和瑞尧的夫人

和瑞尧：当时没有公、检、法这一套，明明是经济纠纷，也可上升为剥削压迫，几个贫雇农检举了你，就跑不脱，况且父亲他还不止得罪几个。那时每个村都有农民代表，就是最最苦大仇深的，同时是说话最最管用的。然后分乡、区、县、专几个等级，越往上，人数越少，在土改中权力越大。专区农民代表只有 4 个，与工作组一起四处巡查，要人死就不得活，厉害。

老威：那么……

和瑞尧：没有“那么”了，关于土改话题就到此为止吧。

老威：可以后呢？

和瑞尧：我们就一直住土改分得的房子，一直到 1985 年，我重返教育战线，还住着呢。

老威：几平方米住了 30 几年？添人口怎么办？

和瑞尧：我陆陆续续有 5 个子女，添 1 个增加一点点，添 1 个再增加一点点。

老威：不太明白。

和瑞尧：我自己会木匠，就不断靠着住房搭建玉米杆棚子，不断地修修补补。

老威：日子过得可怜哦。

和瑞尧：我不觉得。据说山西有个县，在文革期间，地富子女被喊去，一个个杀光了，石鼓远没到这个地步嘛。土改过了，乡里乡亲又继续交往，我们那个村，暗中对我挺关照。

老威：据张进谦老人讲，你与他一块劳改过？

和瑞尧：是，在大研农场。

老威；什么原因入狱？

和瑞尧：知识青年问题。

老威：能具体一点吗？

和瑞尧：就是知识青年问题。

老威：女知青？

和瑞尧：有人栽赃陷害。

老威：奸污？

和瑞尧：当时我在石鼓完小代课，她也在，加上我的背景是黑的，就被陷害了。1974 年进去，1984 年才出来，平了反，推倒了一切不实之词。

老威：知道谁陷害你吗？

和瑞尧：知道。这事牵涉现任地方领导，就放过吧。其实坐牢也是人生的磨练，因为文化算高，我在里面一直做教员，也没吃什么亏。

老威：张进谦呢？

和瑞尧：性格问题，文化问题，他的确吃了大亏。如果他懂得孟子的那段话就好了。

老威：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和瑞尧：不错。

老威：那老先生是以天下为己任了。

和瑞尧：不敢当。但我30年多如一日研读孔子，著书立说200余万言，还是想给子孙后代留些东西。

土改受害者郭正洪

前奏

2006 年 9 月 17 日上午，久雨初晴，我背着沉重的行装穿过大半个丽江古城，来到破破烂烂的客运站。根据路人指点，我从售票厅退却，在周边地段寻觅去剑川县的小面包。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我以 100 元人民币的价格包得一辆。

接下来，我记不太清了，笔记潦草而简单，也查不出所以然。两三年了，数次在丽江进进出出，感觉已麻木。这是否有点“错把他乡当故乡”？王力雄曾说，若照居住时间的长短来界定故乡，他起码有 7 个以上的故乡，而出生地就勉强算着“第一故乡”。我呢？出生地在四川省盐亭县境内的海门寺，我母亲在寺旁教过乡村小学。我是在成人之后，偶然听父亲提到那“第一故乡”的，我没寻过根，所以觉得有种诗意的虚幻，如大美女金斯基主演的《得克萨斯州的巴黎》，

美国的得克萨斯州不可能有巴黎，但人家就是要东游西荡地追寻，因为那是自己的出生地，是被热恋中的父母所命名的“第一故乡”。

而现实中，我的“第一故乡”是癌症的高发区，有全国著名的肿瘤试点医院，我父亲后来就死于肺癌。我没有哥哥大毛衣锦还乡的热情，我本能地回避，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除了埋在老家的爷爷、父亲及姐姐的尸骨，那儿就是一场缠绕至今的屈辱的噩梦。接下来是成都，接下来是涪陵（包括坐牢之地重庆和大竹），接下来又是成都。如此推算，丽江就是我的“第四故乡”了。

虽然已过大半年，我还是记得小面包 11 点出发，依旧那条去石鼓的老路。翻了山，可过没过石鼓？有些恍惚了。抵剑川县
城已下午两点半，匆匆找家旅馆，放下行李，就出门寻觅。这实在是一个没啥可提的地方，两三条笔直的灰蒙蒙的大街，周围拥挤着潦草搭建的楼房，地方特色为满街的乳扇招牌，这是一种奶制品，云南 18 怪之一——牛奶搞成片片卖。

人力车拉着我经过城中心，一座花坛内，耸立了全城唯一的艺术雕塑，腾双蹄的马背上，骑着腾双手的人，举起一把龙头琴，似乎在向天弹奏。可惜上下左右密布嗡嗡响的高压线，犹如蜘蛛网，将此不伦不类的风景也煞得七零八落。我想，即使有采访对象，来一次也足矣，虽然早就风闻城郊有南昭国时期的石钟山石窟。

然后进入弯弯曲曲的背巷，满目令人作呕的垃圾，路如

剑川县城最引人注目的标志

癞狗皮一般，在车轮的碾压下摊开、卷曲、流脓。我捂着口鼻，渴望下一段路能呼吸稍微新鲜点的空气，不料车却在一座小石桥前嘎然而止。车夫擦把汗，指点斜对面说：过桥，沿着这条古河道一直走，就是环城北路，门牌号你就自己问吧。

这座叫“永安桥”的建筑的确显得老旧，于是我掏出相机，咔嚓一张；冲着桥下再咔嚓一张，胃口就翻江倒海，如牛一般呷姆反刍。那是怎样浓稠、怎样静止、怎样散发着呛人臭味的“河水”啊！如果是露天大粪池，虽臭，倒还纯粹，偏偏这是大粪与生活垃圾的混淆，与发酸的豆腐脑的混淆，

还掺入了摧人泪下的农药！我顺“古河道”一阵快走，尽量调整呼吸，我不能憋，不能跑，因为路还长。天哪，这就是曾经环绕整个城镇，供人类繁衍生息的河道吗？

又钻了几条短巷，打听了几个路人，终于找准了 34 号。这是一幢自建的 3 层楼房，嵌在其它自建楼房中间，共临一条千古臭河，谈不上有任何特色。

我扯开破锣嗓子叫门，露面的是郭正洪老人的女婿，也算个头发花白的糟老头了。他将我请上台阶，问明来历后，就让稍候。等了大约一刻锺，大铁门开了，81 岁的郭正洪竟骑着三轮车进院子，还拖了满满一车蜂窝煤！未及喘息，他又一摞摞搬运入屋，方才洗手，冲我点头寒暄。

我终于握住了那双劳动人民的黑手，浸入掌纹的煤渍似乎永远洗刷不掉了。主客互相谦让着在阶沿上落座，我抬出张进谦、和瑞尧作为采访的招牌，还顺带问道：你与他们都是石鼓地方人，怎么没落叶归根呢？老人答：我命里没根，所以女儿嫁到剑川，就挂靠过来了。

是啊，对于这个历经坎坷的老人，此地可算与“第一故乡”对称的“最后故乡”？

正文

老威：你的电话号码是张进谦老人给的，他对你念念不忘呢。

郭正洪：哼哼。

老威：怎么啦？

寻访途中，遭遇深巷

剑川县内保存最完整的老街

郭正洪：他肯定提起如何与我分吃生腊肉的故事，将我丑化了一番。你想想，那年头饿死鬼一片接一片，连粗粮都不好找，到哪儿去弄肉？况且他张进谦就是孙猴子，能折腾上

天，也不过是个劳改犯，更不可能从彝胞手中弄肉。

老威：他描述得活灵活现，不亲历咋个能编得出来？

郭正洪：见他的鬼！退一万步，就算他神通广大，弄到了 9 两腊肉，依他张大炮饿了连屎都吃的个性，会把比钻石还稀罕的肉分给别人？那不成雷锋了？既然是雷锋，共产党又何必关你劳改你，搞个神龛将你供起嘛。哼，都是劳改犯，谁也不欠谁，可他张大炮偏偏到处乱吹，我分吃了他的肉，如果不是他的肉润了我的肠，我就熬不出头……气死人了！有一回，我两个吵着吵着，差点在丽江街头打起来。他说：姓郭的，狗吃屎还晓得舔老子的屁股，你连狗都不如。小同志你评评理，这叫有文化？这叫老革命？骗子啰。

老威：都 80 出头的人了，还记啥子仇嘛。

郭正洪：活人记，死人就不记，憋着，看那个死在那个前头。

老威：那我们不提张进谦了，从现在起，将他一笔勾销。就算我为了你，专程到剑川来。

郭正洪：不敢当啰。

老威：土改期间你多大？

郭正洪：我 1925 年生，土改时已 20 好几了。我们兄弟姐妹 7 人，加父母，全家共 9 人，在石鼓街上还算有名。我家有 10 间铺面出租，包括两个院子，所以按当时的土改政策，划成了地主。

老威：你家有多少土地？

郭正洪：你指自家耕地？没有。祖祖辈辈都没有。田地属于喇嘛寺，在丽江地区有 5 大寺，周围的农民世世代代都

从寺僧手中租地种，然后向他们交租子。当然，直接用新粮交租也可以。拉市坝的指云寺你可晓得？当年我们就是给指云寺交租。

老威：指云寺的名气太大了，仲巴活佛经常光顾嘛。去年中共政府指定的转世班禅由仲巴活佛护驾，也来到指云寺。当日惨雾愁云，辟哩啪啦下了好大一阵冰雹，我住的院子里一片白，樱桃树叶子全打没了。

郭正洪：我家从指云寺租赁了六、七亩，另外还在我姐夫（也划为地主）手里佃了几亩，所以总共有十一、二亩自耕地。

老威：按人均占有土地面积，你家也够不上地主啊。

郭正洪：但农忙和收割时，我家请过长、短帮工，这又是划地主和富农的一条杠杠。

老威：如此推测，石鼓的剥削阶级不算少。

郭正洪：不止 20 多户吧，几乎都是世代的石鼓人，辛辛苦苦积累了一点家底的。而贫雇农都是没住两年的外来户，人人都在寻觅发财机会，一土改，果然就鸡犬升天了。其实呢，大家都是苦命，地富分子也就是一种上纲上线的说法，国民党跑了，共产党来了，为了显示自己的厉害，不是换汤不换药，就要闹翻身。我琢磨着，这翻身嘛，跟翻地差不多，原先压在下面的不太见光的土，一锄一锄翻上来，见光过多的土，一锄一锄翻下去，要长庄稼，就得年复一年折腾啰。可妇女闹翻身是咋回事？几千年受压迫？不就是几千年受压迫吗？难道还要翻到男人身上去？

老威：老人家很幽默。

郭正洪：要活下去就得想开些。1947年，国民党的壮丁抽到我……

老威：你家是地主，不可以出钱雇人顶替吗？

郭正洪：兵役制度比较严格，不像电影《抓壮丁》里演的。当时我大哥在昆明读大学，弟弟们还不到岁数，只有我正好。当然，也可以“骡马代役”，那就要拿票子去堆，看你家出得起多少匹骡马钱。我结婚不久，虽然不愿与老婆分开，可也没办法，只能向老岳父岳母赔个不是，主动去兵役科报名，随后就拉到丽江团管区。石鼓籍有3人，1个是我的侄儿，另一个由于出身贫农，后来叫解放军留下，分往铁道部队，一直干到营长。

气都没歇，一大堆新兵蛋子就开拔，丽江到昆明有18天路程，我们走了20天。跟着挤闷罐火车，拉拢贵州沾谊下站，又急行军到盘县（现在叫六盘水），修整一下，再步行至贵阳，暂时驻扎在十几里外的郊区。

老威：地名叫什么？

郭正洪：亲镇县中正堂。那时的交通没如今方便，人都折腾散架了。加之天气阴冷，伙食极差，我的侄儿终于患了重病。再次开拔，我们就找架马车拖着他上路，才走几里就不行了，门牙漏出来，鼻子也冰冰的，我们就将他翻到路边，草草埋了几把土。唉，云南人啊，真不适合远离家乡。

老威：有点逃荒的凄惨劲。

郭正洪：仗没打，一天到晚东跑西颠，后来又在四川境内打转，重庆南岸的弹子石呆过，璧山县也呆过，随后又坐民生公司的轮船抵达万县，在那儿，我们丽江团管区10个排，

1000 多号新兵才编入蒋介石嫡系的新 7 旅，旅长田鄂荣。我进了通讯连，因为有点文化，受到排长的赏识，被提为生活委员。

马上要去湖北打内仗了，所以新 7 旅驻扎万县，加紧练兵，我却打起了逃跑的主意。我身上有钱，家里带出的现金兑换成一根两钱重的金条子，突击搜查了十几次，连卵蛋、裤腰带、鞋底都翻了，都没暴露……

老威：你的本领通天啊。

郭正洪：不通天，将丽江出的松香肥皂掰开，插入金条子，再合拢就行了。另外，我赌技高明，在军中还赢了不少，做回乡的盘缠绰绰有余。因此 1948 年的春节刚过完，我就溜了。

交谈快完了，女婿也回来了

老威：这么容易？

郭正洪：我当生活委员，有许多机会去码头瞎混，与做买卖的、撑船的、喝茶的、说评书的都打成一片了。我还买了地图偷偷研究，有了十足的底，才与五、六个人约好，一起开小差。当晚就雇船到瞭望家坡（音译），第二天抵达一个大码头，将多余的军需品典当了，又日以继夜地逃。终于进入重庆江北，却正撞上四川团管区在训练新兵！来不及躲闪，就闻打雷一声吼：站倒！哪里的？我们只得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衣服上有番号嘛！没长眼睛啰？人家又问：啥子地方来？我们答：前线。不料兵营里一下子出来十几个端枪的，将我们逼进去，转眼就扣押了两三天。

直到连长回来挑明：你们就再留一段，等上峰视察过了再走。原来这家伙吃了兵员空缺，想暂时拿我们抵名额！罢罢，又熬几天，陪他过了关。

屁滚尿流地放出来，赶大半天路，谁料刚拢白石驿机场，又叫 79 师给逮了。他们声称“专门收容散兵游勇，为国所用”，没办法，我们又耽搁下来。

老威：让你们干什么？

郭正洪：站岗、放哨、出操、下苦力，日他妈，人都折腾成皮包骨头了……

老威：还好，没被就地正法。

郭正洪：为啥？

老威：你们是逃兵嘛。

郭正洪：兵荒马乱，遍地都是逃兵，都正法了，就没人去打仗了。

老威：难怪国民党搞不过共产党。

郭正洪：本指望一完事就开路还乡，可突然之间，来了一道紧急命令，79 师全体开拔！除了随身穿的，啥子都不准带！

老威：你的金条子呢？

郭正洪：当逃兵的第一站就上金铺兑换了，老板是个云南人，童叟无欺，足足给了我几万块，相当于现在的 1 万多吧。我脑袋都大了，以为回家做个买卖不成问题。没想到这一开拔，等于遭了抢劫！那晚黑，兵营里轰隆轰隆进来几十辆美式大卡车，车灯、探照灯齐刷刷地亮着，连排长守在房门口，点一个出一个，出一个搜一个，然后直接上车。等总体点完数，再每人发给 11 个龙头大洋。

老威：也算对你的一点补偿吧。

郭正洪：妈的屄哟！天生的穷命，有金子也留不住。这黑灯瞎火出去，一家伙就抵拢陕西汉中！军中盛传要上陕北前线打共军，愿不愿意都得豁出去了。可才过两天，真跟演戏一样，又变了，我们转到安康县，被编入警备师，不属于前线部队了。

老威：你的运气不算太差。

郭正洪：干了几个月，我就成老兵了，还升任上士班长。前线抓得土八路，也由我们看管。整天昏昏噩噩过日子，熬不下去了，又开溜。餐风露宿近 1 个月，终于回到云南昭通，裹一身美式黄狗皮混火车，也没人敢来查票收钱。

老威：已经穷极潦倒？

郭正洪：按说我不缺钱，缺钱就不会二次开小差。但遭

了同路的连部传令兵的算计。我两个逃到重庆璧山县城，正逢赶场，人头攒动。我去买包烟，才一眨眼功夫，这个杂种就和行李一道消失了！

老威：早有预谋哦。

郭正洪：掐指一算，离家到现在快 1 年了，身上曾捆了大把钱财，被老天牵着鼻子，转了若干个地方，到头来却分文不名地流落异乡！真跟评书里讲的差不多。

老威：可你还是混过来了。

郭正洪：在昆明见着我大哥，喊了一声，就饿昏过去。幸好穿了身黄狗皮，面子绷起，能骗吃骗喝，否则沦为乞丐，连祖宗的脸都丢尽。

大哥刚从云南大学法律系毕业，分到法院做书记官。恰逢 1948 年的中秋，我们就一起过节赏月，感慨苍海桑田，捉摸不透。可没料到，这是我们弟兄俩最后的闲情逸致。

老威：最后的闲情逸致？

郭正洪：对。因为我回到石鼓，合家团聚不久，就解放了。脚跟脚就闹土改，我家划为地主。父母都被关押批斗，又吊又打，惨得很啰。

老威：这是土改的哪一阶段？

郭正洪：1951 年，清匪反霸过了，减租退押当中。当时粮食大涨价，政府命令我家交公粮，1 年 9000 多斤的定额，给不起，就把家里所有东西都拿去变卖抵押，值钱的，不值钱的。先是首饰、细软，后是桌子、板凳、床。柜子上的铜扣忍痛撬下来交了，过一阵，实在没法，才交整个柜子。唉，门坎都交了，农民协会还不罢休，将我母亲连斗三天三夜，

跪倒压杠子，昏过去也打，醒来也打，就是不准合眼。

老威：当时你母亲多大？

郭正洪：59 岁。

老威：算老人了。

郭正洪：管你老不老，挤干为止。本来按政策，我家是自耕土地，每年要向指云寺交租，顶破天也就划个富农。可工作组是外来的，不了解情况，一切就任由贫雇农主席团宰割了。地主帽子乱套，你不承认就暴打，还问你：为啥不老实？人毕竟是血肉之躯嘛。我父亲一直关了大半年，等到地主帽子戴落实了，才放出来。

老威：划阶级有硬杠啊。

郭正洪：不错，对富农实行征收，对地主实行没收。所以多划地主对大家来说，意味着多分财产。穷人咋能不积极？斗垮你，你的就变为我的。毛泽东指示可以过左，啥子叫过左？就是够不着地主，可以通过斗争，搞成地主。当时我有个堂妹在区委工作，曾摸黑回家找到我：二哥哟，人家说啥都认账啰，运动中过左，哪怕弄死人，大方向都是正确的。

老威：你没挨斗吧？

郭正洪：没有，上头有父母顶缸嘛。土改时，我已输成穷光蛋，家徒四壁了，但作为地主子女，仍要背整个大家庭的黑锅。

老威：听说你曾被劳改？

郭正洪：那是 1957 年反右期间了。

老威：农村也反右吗？

郭正洪：城里反右，农村组织学《人民日报》，没右派？

就把四类分子弄来斗争，算解放前的旧帐。我和张进谦就在这个时候被揪出来……

老威：我记起来了，你就是张进谦提过的那个胆小鬼老表。你经不住恐吓，把啥子陈谷子烂芝麻都坦白了，可政府却没有从宽……

郭正洪：这老狗还说了我些啥？

老威：他还说你一直都在抖，抖，尿都抖裤裆里了。

郭正洪：哼，他狗胆包天，他抵赖到头，差点叫打死述了，刑也没见比我少判。

老威：听说他扇了法官一耳光？

郭正洪：可转过来就多挨了几百拳头。

老威：他的罪名呢？

郭正洪：除了参加国民党和“放水淹秧田”，还有他老子张永生纵子行凶，唆使张进谦本人殴打贫农李继魁致残。

老威：张进谦了不得哦。

郭正洪：那是十几年前，张进谦十几岁的时候，他家里的花牯牛跑丢了，他就在山沟钻来钻去地寻，急得满头大汗。正巧碰上李继魁坐在路边石头上耍，他就拉住问牛的下落，不料李继魁根本不买账，还开玩笑：这阵你找牛，隔会儿牛找你。张进谦气惨了，就飞起踢他一脚。

老威：姓李的滚下沟了？

郭正洪：没有。他从小就是个瘸子。

老威：哪“致残”罪名咋个贴得上？

郭正洪：有人揭发，就贴得上。嘿嘿，张进谦这辈子，吃亏就在脾气坏，强出头，死不认输。

老威：你呢？

郭正洪：我？罪名比他还吓人：充壮丁，帮国民党打共产党算一条；倒卖枪支弹药和鸦片烟算一条；通匪算一条。

老威：如此罪大恶极，该枪毙了。

郭正洪：瞎鸡巴编嘛，不承认就吊起打。我说当壮丁连枪都没放过，逃回来几乎就变乞丐了，谁相信？枪支没贩过，匪没通过，鸦片烟嘛，从丽江到中甸，是人都贩过的，因为解放前，这方水土盛产这东西，差不多当作货币在流通。可是张进谦稀巴烂的狗头榜样在眼前，我的身子骨远没他结实，统统不认账，肯定叫乱棍打死。哎哟，熬不过就认嘛，公审会一开，丽江县法院判的，他抗拒从严，8 年；我坦白从宽，7 年。

老威：没多大区别啊。

郭正洪：皮肉少吃苦啰。我跟张进谦一起长大，一起当地主子女，一起判刑，一起劳改。日他妈的土改！我在国民党手头，受够了窝囊气，到了共产党手头，反而是剥削阶级！活到 80 几，尽在受剥削，现在都撑起一把老骨头下苦力。我日他妈的土改！

老威：你俩的命运差不多，可你们的身板都硬朗。

郭正洪：张进谦嘛，有时蠢到家，有时又精到头。我们一道蹲看守所，下劳改队，在米厘铜厂，狗日的经常装病，逃避下井；到了长水铜厂，又搞成反改造尖子，人人都不相

古桥之下，水比大粪臭

信他活得出来。嘿嘿，他硬是有 9 条命呢，现在还摇身一变，享受离休待遇了。

老威：你似乎还不太服气。

郭正洪：我和他都当过国民党的兵，可他太能折腾，一出来就东跑西颠地告状，居然撞进边纵副司令朱家壁家里去喊冤，去要待遇。脸皮太厚了。

老威：不能这么说人哦。

郭正洪：总之，张进谦是出了名的“八张嘴”，从石鼓到劳改队，没有人能辩过他。所以朱家壁一听他是边纵 7 支队的兵，就同病相怜，亲自出头帮他恢复党籍，落实组织关系。因为边纵被打成“土匪武装”，大伙死的死、亡的亡，朱家壁虽为中将，也含冤几十年，直到 80 年代平反，已经风烛残年了。这张进谦捡了个大便宜，第一个就跑我家来报喜。本是一个槽里拱食的猪，转眼间他的级别也高了，水平也高了，硬是飞黄腾达，忘了自己爹妈是谁，也忘了眼前站着知根知底的老郭。还边喝酒边给我唾沫横飞地乱吹，说啥子我的平反也包在他身上！给地富分子摘帽是中央的政策嘛，平反冤假错案也是中央的政策嘛，毛泽东死了，邓小平出山嘛，跟你小小张进谦有鸡巴关系？你能左右国家的大形势？

老威：你没必要较真嘛。

郭正洪：穷途潦倒就来找我，还说我沾他的光。这一次，我没对他客气，我们大吵了一架。我说：姓张的，我以前咋从来没听说你是地下党？他愣了一下，我又说：你因为作风问题，从维西电台被部队资遣回家，啥子都抹光了嘛。他气疯了：与自己的娃娃亲婆娘约了几次会，就是作风问题？还不是因为他妈的地主家庭牵连！政治迫害！懂不懂？

老威：你们翻脸了？

郭正洪：没有他张进谦，我也平了反，不实之词全推倒。

老威：依你的性格，劳改不会吃啥子亏。

郭正洪：1964 年我就刑满，遭强迫留场就业。

老威：劳改犯人和就业人员有啥子区别？

郭正洪：一个叫犯人一个叫职工。到了文革，又没区别了，统称“反动派”。挖煤、修铁路、搞建筑，我换的单位不比张进谦少，直到 1985 年，才算正式退休。

老威：平反补发了多少钱？

郭正洪：没有一文钱。

劳改基金会出版书目

《黑色文库》系列

《我以我血荐轩辕》	2001 年	徐文立 著
《沧桑岁月》	2002 年	陈文立 著
《凄风苦雨四十年》	2002 年	成中和 著
《雪山下的火焰》	2003 年	班丹加措著/廖天琪译
《苦难的历程》	2003 年	文彻赫恩 著
一个人的两个故事：（上册）		
《昨夜雨骤风狂》	2003 年	吴弘达 著
《永远的北大荒》	2004 年	黄　湛 著
《从诗人到囚徒》	2004 年	尚建国 著
《红尘白浪》	2004 年	叶少华 著
《中国冤案录》第一卷（2001-2003）	2005 年	廖亦武 著
《我和我的三个半奴隶》	2005 年	闵和顺 著
《梦断未名湖》	2005 年	陈奉孝 著
《中国冤案录》第二卷（2003-2005）	2006 年	廖亦武 著
《赤海漂零记》	2006 年	曾石荣 著
《记忆的声音》	2006 年	阿妈阿德 口述 乔伊·布雷克斯莉 著 杨莉藜 译
《中国第一罪》	2006 年	秦　耕 著
《中国巴士底》	2007 年	李贵仁 著
《从列宁格勒到新肇监狱》	2007 年	张轶东 著
《燕园风雨铸人生》	2007 年	王书瑶 著
《花旗梦别神州泪》	2007 年	唐彼得 著
《最后的地主》（上）	2008 年	廖亦武 著
《最后的地主》（下）	2008 年	廖亦武 著

人权书目（中、英文）

- 《劳改手册》2005-2006 2006年
- 《劳改手册》2003-2004 2004年
- 《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刘晓波 著 2005年
- Better Ten Graves Than One Extra Birth 2004年
  China’s Systemic Use of Coercion to
  Meet Population Quotas
- 《劳动教养和留场就业》 2004年
- 《国策下的国难》 2003年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评析
- 《共产党的慈善事业》 2001年
  ——关于中国摘取死囚器官的报告
- Communist Charity 2000年
  A Comprehensive Report on the Harvesting of
  Organs from the Executed Prisone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订购请联络：laogai@laogai.org
网上浏览地址：www.laogai.org
电话：202.408.8300 / 8301

由此，廖亦武的纪实文字，便非预期地跨进了文献作业（documentary work）领域。我说他“非预期”，是指这位“前六四”诗人兼路边吹箫人，六四大屠杀以后不写诗了，乃是“to write poetry after Auschwitz is barbaric”这句话在中国的一个实践者。然而，他写了比诗更有魅力的文字、尝试了比诗作艰难无数倍的书写努力。我不清楚他是否自觉到这种转型，但这是一种开创性（groundbreaking）。

——苏晓康（著名作家，流亡者）

这就是见证文学的伟大意义：对于那些深受苦难并从现实中看不到任何希望的人们，被记载是他们在此生此世所能得到的唯一的安慰。苦只要记下来，就不算白吃了——因此廖亦武选择了写作，写作成为他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他不但承担起历史代言人的角色，而且还承担起现实代言人的角色。

——胡平（著名评论家，流亡者）

黑色文库第21集

最后的地主

(中国冤案录第三卷・上册)

廖亦武 著

The Last of China's Landlords
Tortured Souls: Stories of Lost Happiness Vol.3 (1)
By Liao Yiwu
Black Series, Volume 21

Th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2008
www.laogai.org

ISBN: 978-1-931550-19-2

Printed in Hong Kong
U.S. $35.00